



意大利人

路易吉·巴尔齐尼著 刘万钧等译



019

路易吉·巴尔齐尼著



意大利人

刘万钧 张天润 张 军 译

张契尼 刘万钧 校



Luo Hongbo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连 卫

封面设计：王师颀

Luigi Barzini

THE ITALIANS

Atheneum Publishers 1972

根据美国万神殿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译出

西 欧 译 丛

意 大 利 人

〔意〕路易吉·巴尔齐尼著

刘万钧、张天润、张 军 译

张契尼 刘万钧 校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300,000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书号 11002·674 定价 2.55 元

关于《西欧译丛》的说明

战后以来，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欧美、苏联、东欧各国学术界和外交人士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陆续出版了许多新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同有关研究和出版单位合作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翻译并编成一套《西欧译丛》。这套《译丛》包括整个西欧及其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的观点，我们并不都赞成，但是这些著作在学术上有一定价值，而且资料是比较新鲜和充实的，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西欧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译丛》读者对象为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和涉外工作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和研究生，以及关心国际问题的、尤其是西欧问题的其他人士。

这套《译丛》将从一九八四年开始陆续出版发行。《意大利人》便是这套《译丛》的一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编译室

FQ31/02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路易吉·巴尔齐尼是意大利著名的作家兼记者，一九〇八年在米兰出生，一九八四年三月三十日在罗马去世。他青年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新闻，并在纽约原《世界报》当记者，后来成为《晚邮报》最有名的驻外记者，报导了当时的许多重大事件，如罗斯福实行“新政”、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中日爆发战争，等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日本飞机炸沉长江上的美国船帕纳伊号时，他正在船上。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执政期间，他于一九三一年被放逐国外；一九四〇年回国后受到战时拘押。同盟国军队刚一解放罗马，他就开始写作。他的著作有《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孤独之人》、《莫斯科》、《明天上午的欧洲》、《蒙古漫步》、《呵，美国！》、《难以对付的欧洲人》、《从凯撒到黑手党》和《意大利人》。

伦敦著名文学评论家西里尔·康诺利称巴尔齐尼为“哲学家兼英语语言大师”，而《意大利人》是他那令人赏心悦目的文风的典范。

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作者满怀深情地赞美她：“我的意大利母亲有光荣的过去，辉煌的成就，高贵的传统，赫奕的威名，无穷的魅力。”但是，他同时也痛心地看着“她的某些隐蔽的缺点”，“她的腐化堕落和伤风败俗”，他“终于发现她并不象他年轻时所认为的那样白璧无瑕”。作者决心用“最忠实的肖像画家的笔法”写下意大利“最突出的特点”，“尽可能忠实地画出她

的肖像”。

作者文字优美，笔调活泼，对意大利民族性格、风土人情的描写色彩鲜明，并富有哲理。《意大利人》原书一九六四年出版后轰动一时，被译成许多种外国文字。我们这个中译本是根据一九七二年英文第七版翻译的。张天润译了《前言》和第一、二、三、四、五、六、八、十章，张军译了第七和第九两章，刘万钧译了第十一至十六章和《结束语》。刘万钧校订了第十章以前各章的译文；张契尼校订了第十一章以后各章的译文；最后由刘万钧统一定稿。在全书翻译过程中，得到张契尼同志的大力帮助，在此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书后附有“专名索引”，是按原书的“索引”翻译的，条目后注明的页码，是原书页码。本书在页边印有原书页码，以便读者查考。

由于水平所限，译文中错讹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于一九八五年一月

前 言

IX

过去昭示未来，世界永远如此。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必定曾在过去某个时间发生过。同样的事物会循环回来，但是具有不同的名称，带着不同的色彩。并非人人都能认出它来，只有聪明并勤于思索的人方能做到这一点。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在欧洲有哪个国家，其人民的性格受政治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影响象意大利人这样小呢？

W·H·奥登

（摘自歌德《意大利游记》的序言）

本书并不自命为一部科学论著，它也不象十九世纪消闲小说那样，在开头几章就不厌其详地介绍故事将在其中展开的那个国家的国情、民情和历史状况。读者在看过本书之后可以到意大利去，将他实地遇见的活生生的人物写进自己的小说。在那里他们会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他们想知道的东西。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它为形形色色的冒险、合法的与不合法的爱情、对艺术的研究、对怜悯的体验、对阴谋的策划都提供了舞台。气氛或喜或悲，既有疯狂，也有闲适，既有古典，也有摩登，一句话就是非常dolce^①。

① dolce 在意大利语中表示甜蜜、宜人、惬意、温柔等意。——译者

我打算只写下最突出的特点，采用的是最忠实的肖像画家的技法。肖像画家往画布上涂的一笔一划都是为了表现被画者而不是画家自己。我作画的对象正好就是我的祖国；我时时感到，我好象是在画我的母亲。这项工作是最困难的。我的意大利母亲鼎鼎大名，她有光荣的过去，辉煌的成就，高贵的传统，赫奕的威名，无穷的魅力。长期以来我就了解她，赞美她，热爱她。

但是，我长大以后（象许多著名母亲的儿子一样），由于看到了她的某些习惯，我开始变得清醒起来。她的某些隐蔽的缺点使我震惊，她的腐化堕落和伤风败俗使我反感。我终于发现她并不象我年青时认为的那样白璧无瑕，这使我十分痛心。但是我只有这一个母亲，我无法不爱她。在我写作本书时，也不愿伤了她的感情。我不想不必要地令人感到痛苦，也不想忘记母亲的优点，但同时我也尽力避免恭维她，不受她魅力的诱惑，也不受自己偏爱的驱使。我决心尽可能忠实地画出她的肖像。

* * *

编写本书是困难的。如果写不十分了解的人和事，那倒要容易得多，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疑虑。写自己的祖国实在是一件折磨人的工作，因为我的所知所见太多，有时我可以同样容易地证明一件事的正面又证明它的反面。种种例外情况使我困窘，我反复审查了论点，推敲了词句。在我年青时，热情冲动的爱国主义是当时的风尚。当我急于纠正这种偏颇时，还得当心别破坏了经久不变的合理观念。我既怕自己太保守，又怕自己太趋时，唯恐赶了新思想的时髦，追随了知识界的潮流，热衷于接受某些诱人的新理论，而这类理论可能在成书问世前就被淘汰了。

意大利人许多世纪以来创造了那么多辉煌成就，但这个民族的历史却黯淡无光，这种荒谬的脱节现象使人困惑不解。意大利出现了许多超凡轶群的著名人物，名震欧洲以至全世界。意大利

的建筑师和工匠参与修建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和列宁格勒的冬宫，意大利的艺术家装饰了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在整个天主教的欧洲，到处都有意大利人修建的教堂、辉煌的宫殿和高雅的别墅，特别是在维也纳、马德里、布拉格和华沙。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能感到意大利建筑风格的影响。意大利风格的特点是，对建筑物外观华美悦目的重视，显然超过对实用目的的追求。在南美洲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为当地英雄修筑的华丽的纪念碑。

意大利对日常生活的小小贡献不可胜数，以致人们都习以为常而不予注意。没有 Pistoia（皮斯托亚）城就不会有 pistol（手枪），没有 Savona（萨沃纳）城就没有法文的 savon（肥皂）这个字，没有 Faenza（法恩扎）城，哪儿也不会有 faience（彩釉陶器）。妇女头饰 millinery 得名于米兰城 (Milan)；蓝布工装裤起源于热那亚，那里首先制出蓝棉布。还可以数出热那亚三角帆、那不勒斯花冰砖、罗马焰火筒、威尼斯软百叶帘、博洛尼亚大红肠、帕尔马干酪、来亨（莱戈恩）鸡，等等。意大利人为美国人发现了美洲，教会了英国人作诗、搞政治和在作买卖时耍手腕，教给德国人军事，法国人烹调，俄国人演戏和跳芭蕾舞，给全世界以音乐。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的世界变成了太空中的放射性尘埃云，那请不要忘记，核武器的发明也得到了意大利科学家的重要帮助。^①

① 这里列举一批令人敬畏的意大利名人。先列举一下比较好，因为我假定读者对他们已很熟悉了，所以后文很少提到他们。主要的人物如下：圣者——圣弗朗西斯、圣卡塔里纳·达谢纳、圣贝尔纳迪诺·达谢纳、圣路易吉·冈扎加、圣托马斯·阿奎那。无赖——博尔贾家族（是西班牙人，但归化了意大利）、切利尼、卡拉瓦焦、卡廖斯特罗、卡萨诺瓦。政治思想家——但丁·阿利吉耶里、双西西里国王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菲特烈（他生于意大利，是现代国家即“作为艺术品的国家”的发明者）、洛伦佐·德梅迪奇（“均势”论的发明者）、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马志尼、加富尔。军事领袖——乔万尼·达莱、班代·内雷、拉伊蒙多·蒙泰库科利（奥军统帅）、拿破仑、加里波第。海军将领——安德烈亚·多里亚、莫切尼戈、莫罗西尼、布拉加丁、卡拉乔洛。科学家——

无可否认，意大利的所有天才人物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使她至少成为精神上的伟大国家，成为文化、艺术和思想的国度。只有她最杰出的儿子们和一些在意大利时时感觉得象在家里一样的杰出外国人才有资格当她的正式公民。但说来奇怪，在年鉴和历史书上我们却看到了另外一个意大利，一个经历过战争、和侵略、签订过条约、发生过政治动乱的实际的意大利。那些伟大的人物并没有使这实际的意大利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事实上，人们可以说，这许多精神巨人对此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意大利人总是喜爱那些能刺激他们的感情、吸引他们注意、使他们获得赏心悦目之乐的人。他们欣赏有才能的画家、音乐家、雕刻家、建筑师、演员和舞蹈家，只要这些艺术家不要求观众有太高的才能。他们尊敬并赞美伟大的科学家，特别是当科学家的发现和理论深奥难懂的时候，他们就更尊敬。他们忍受和畏惧强有力的领袖，但总是为他的垮台而欢欣鼓舞。一般来说，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反对以致嘲笑那些破除疑虑提出标新立异的理论的预言家、哲学家、政治和宗教的改革家、传教士、革命的科学家以及所有各方面的杰出人物。

在其他国家，确实也曾有过伟大人物遭受迫害以至被杀害的事，但哪里的迫害也不象意大利这样武断、持久和坚决。在其他文明国家，大多数英雄人物都能生活下去并得到发展，为其祖国

伽利略、达芬奇、沃尔塔、马可尼、费米。航海家——哥伦布、韦斯普奇、卡波特家族。思想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康帕内拉、柯罗齐、维科。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薄伽丘、彼特拉克、莱奥帕尔迪·曼佐尼。雕塑家——韦罗基奥、多纳泰罗、吉贝尔提、德拉罗比亚、切利尼、米开朗琪罗、贝尔尼尼。画家——焦托、波提切里、弗拉·安杰利科、达芬奇、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佩鲁吉诺、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廷托莱托、提耶波罗、莫迪利亚尼。音乐家——帕莱斯特里纳、佩尔戈莱塞、蒙泰威尔迪、维华第、罗西尼、威尔第、贝利尼、多尼采蒂、普契尼、托斯卡尼尼。这些当然只是头等人物的名字，如果再列上二等、三等的名人，那就会很容易写满一个小城的电话簿。

——原注

的富强、荣誉和伟大作出贡献。一般没人认为他们是古怪疯狂、离经叛道。他们被看作光辉的榜样、民族精神的体现者和超群拔俗的开拓者。意大利却本能地压制一个试图为其人民注入伟大精神的人。马基雅维利被排斥于重要事务之外。现代思想之父詹巴蒂斯塔·维科住在阁楼上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伽利略因其思想而受到迫害，但丁、马志尼和其他许多人被流放。有的人如康帕内拉在土牢里过了大半生。有几个最可敬的人在群众欢呼中被杀害；布鲁诺和萨沃纳罗拉被烧死；一七九九年那不勒斯共和国的爱国者们被绞死；李恩佐被棍棒乱石打死。

* * *

两个意大利的同时并存提出了一些难解的问题。这样一个充满了活跃、机敏、智慧的人民的国家，为什么行动那么软弱无力，在历史上那样多灾多难呢？她在每一个世纪都遭到侵略、蹂躏、洗劫和侮辱，却毫无能力保卫自己。是意大利人怕死不敢作战吗？他们进行过的流血战争同他们更为显赫的邻邦一样多，不过常是在外国的旗帜下作战。他们死的人比外国人更多，平民被外国军队屠杀，兵士被优势的敌军压倒。他们也确实打赢过几次，但那多数是反对另一些意大利人及奥地利人的战争。其中最艰苦、最殊死的战争可能要数在阿尔卑斯山积雪里的三年半战斗。当时意大利人极其豪侠，不顾卡波雷托之役的挫折，最后不但打败了奥地利人，而且打败了更为顽强的德国人。可是其余的战争他们多半都输了。决不能认为这是因为意大利人软弱、怯懦或过于文雅，他们是极其活跃、勇敢和奋发的，常比其他人更能吃苦，更为英勇。

战争的胜负作为一种终极的考验，它不是检验作为个体的人的品质，而是检验一个民族共同努力和共同承受牺牲的能力。有一个问题在四百年前就引起了马基雅维利的注意，而我们至今还

在争论不休，那就是：当欧洲其他国家完成民族统一，建成中央政府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却没有做到？这个问题可能要追溯到一些悠久不变的倾向，这些倾向十分悠久，不可能仅仅是妨碍了意大利凝聚成一个国家的偶然事件的结果。这些倾向可以列举如下：迅速而热心地接受不断变动的政治风尚和外国的征服，这使任何革命不可抗拒而又流于肤浅，建立不起稳定的新政权；把一切法律看作无论如何也要加以克服的讨厌的绊脚石，把最好的法律搞成无能而可笑的东西，以此作为一种生存的技巧；习惯于把任何一个本地的或外国的握实权的统治者当作容易腐化的人物，认为最认真和最开明的统治者也会很快腐化；确信最坚定的政权最终也要从内部腐化掉。因而，我们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得到的全国政府多半都是软弱、专断和无能的。这也包括刚过去的那个极权主义的专政，它被称为“因完全无视一切法律所造成的暴政”。为什么我们这么晚才发展起现代工业和自由制度呢？为什么在其他列强将要放弃殖民地时我们才开始去征服殖民地呢？

尽管我们的坏习惯很不值得称赞，但是使我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优点和缺点却迷住了外国人。从十五世纪末以来，外国旅行者毫不掩饰对我们的轻蔑，但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到意大利来。许多人现在开始赞扬我们，倾听我们的声音，模仿我们，甚至羡慕我们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仍然善于做过去擅长的那些事情。我们确实在许多领域有了进步，但是在过去引起外国人嘲笑的那些方面，我们并没有什么可观的进步。我们并不比过去更为忠诚可靠和守法，我们仍然组织得不好，治理得很坏。我们的爱情生活仍然放荡不羁。难道外国人不再确信他们自己的美德是最优良的吗？难道我们的缺点在当今世界上已变成了理想的优点？或者证明是求生存所必需的品质？是我们变了，还是世界其它地方变了？意大利的优缺点到底是些什么呢？

我知道并没有什么弄清意大利国民性的可靠办法。不能去调查已死的人，也没有可信赖的作家。意大利作家们很少描写意大利的风俗习惯，即使写到了也不很清楚。很少有几位作家是靠得住的。作家们各有其写作的目的：或证明自己的主张，或提出行动的步骤，或发泄心中的不满。各人都从自己特殊的角度来写作：他们受到时代、阶级、地域、教育、政见、遭遇的局限。

然而也有三、四个小小的例外，如十九世纪的诗人莱奥帕迪。尽管这位天才人物身为贵族，还是驼背，住在一个偏僻的镇子上，但他所写的文章却尽力反映了客观的真实。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也写过几篇揭露性的文章。一百年前，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教授桑克蒂斯写过几篇关于意大利文化的文章，乃是探讨意大利国民性的钥匙。此外就不多了。莱奥帕尔迪说：“意大利人不写，也不考虑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似乎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对自己没有用。”外国人写的书当然是成千上万，但其中只有一位真正的权威，就是司汤达。其次我看要算西蒙兹。虽然他严格的道德观和对教皇制度的仇视有时妨碍了他的观察。其他作者由于某些原因，对我们不是爱过了头就是恨得过分，即使在他们论述意大利的最好的著作里，直觉的火花和正确的揭示也常常是包含在杂乱肤浅的陈词滥调、沿袭前人的先入之见、错误百出的道听途说和拼写错误的意大利文单词之中。

我从以下的事实得到了帮助：意大利人虽然没有写出他们民族的优缺点，但却时常在谈论着这些优缺点。在火车车厢里、道旁咖啡馆里、报社编辑部里，人们总在不停地争辩，而最吸引人的话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一生都在参加这种无休止的辩论。我听到无数的说法，但从来没有肯定的结论。不过我发现，大家本能地有一种共同认识，即有些习惯、品质、倾向、

行为毫无疑问是我们特有的，我们把它叫做Cose all'italiana(意大利式的东西)。人们有时骄傲地说出这个词，有时带有爱慕、嘲讽、怜悯、取乐或无可奈何的情绪，常常还带着气愤和轻蔑，但无论何时总含有隐隐的悲哀。

xvi 到底什么是Cose all'italiana呢？它象一面镜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自己。它包括故作大方的廉价姿态、拙劣的遁词、精巧的骗术、聪敏的急智、复杂的策略、勇敢或邪恶的独特行为、引人注目的表演……这些东西无法用统计方法来显示，但它们是意大利所特有的，是不可忽视的线索。我经过探索和追寻，把它们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仔细地综合在一起，便渐渐从中看出一个轮廓。它们显示出，什么是我们擅长的事，什么是我们办不到的事。它们显然决定了过去事情的进程，而且必将决定将来的发展。可能我们人人都逃不脱它的影响。正是这种深深地植根于民族倾向中的感情之物，给予意大利人的生活以光辉夺目和富有生气的外表以及隐藏在这种外表之下的辛酸、幻灭与惆怅。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前 言	1
第一章 和平的入侵	1
第二章 永恒的朝圣	14
第三章 迷人的魅力	41
第四章 重要的场景	59
第五章 幻觉与骗术	76
第六章 硬币的背面	103
第七章 李恩佐——好古成癖	118
第八章 墨索里尼——作戏的极限	134
第九章 现实主义和圭恰迪尼	158
第十章 对生活的探索	177
第十一章 家庭的力量	192
第十二章 成功之道	217
第十三章 南方问题	239
第十四章 西西里和黑手党	257
第十五章 福尔诺沃战役及其后果	283
第十六章 长期持续的巴罗克风格	308
结 束 语	335
专名索引	352

第一章 和平的入侵

战后以来，有大批旅游者来到意大利，其人数增长之快，令人难以相信。意大利人对此既高兴又感到困惑。现在旅游的规模已达到空前的、实际上令人费解的惊人程度。在五十年代，每年游客数是八百万、一千万、一千二百万。后来，是一千五百万、一千七百万、一千九百万，现在则已突破了两千万大关。平均每两个半意大利人就要接待一个游客。这个数目还在增加，看来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在十年内达到三千万不成问题，而且终有一天游客数将赶上甚至超过这个半岛上的居民数。外国人是吓不退、挡不住的。他们如同一股持续不断的人流，翻山越海，不舍昼夜。他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甚至也有步行的。在冬季这人流是涓涓细流，入春就涨成了河川，到四、五、六月就成了洪水暴发，冲决堤坝，一片汪洋。到九月它开始收敛，但是从不干涸。

游客来自五洲四海，有的来自历史悠久的欧美国家，有的来自新近建立的亚非国家。但大多数还是来自北方，来自庞大的、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工业化的欧洲和北美。现在也有些人来自最北的国家——俄国。他们组成观光团，行动起来就象部队穿过危险区，提防着抱有敌意的土著居民。他们胆小羞怯，竭力自制，就象色诺芬率领着穿过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俄国旅行者总是穿得笔挺，好象刚结婚的乡巴佬。他们的雨衣长得盖脚背。他们看起来营养良好，称心如意，循规蹈矩。他们好象渴望获得尽量多的文化，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越快越便宜越好。他们有些象本世纪

初的勤勉的德国旅行者，威廉二世的死板臣民。

许多旅行者的本国就是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但他们还是离开本国奔往南方。他们到底是在寻找什么胜过家乡的东西呢？没有多少意大利人愿意出国旅行，无论是往东西南北。他们在异乡总多少有些不愉快的飘零之感，真诚地确信自己家乡的胜景最为宜人。意大利的魅力首先陶醉了自己的人民，他们对家乡的风景、气候、饮食、音乐、生活永不厌倦。比如说，那不勒斯人几千年来总是为家乡景色而销魂。他们吃起家乡的实心细面条来总象头一次尝到一样津津有味。他们创作了无数歌曲奉献给自己的妇女和港湾，歌颂他们那万古流芳的美色。出国的意大利人一般是财大气粗的米兰工业家或者是已采纳外国生活方式的罗马巨头，还有内阁部长、外交人员、新婚夫妇，再有就是没有继承权的人出去找工作。他们在国外全都同样思乡。他们无论到了哪里，无论是穷还是富，都会抬头寻找 **Caffè espresso**（一家出色的意大利饭馆），而且总是盼望着归期。

旅游旺季是从六月初到九月底，这时旅游者充满了意大利一切可利用的空间。火车、汽车、船舶、饭店、大教堂、小教堂、博物馆、音乐厅、希腊和罗马的古迹、古碑旁、观景楼上……凡有美景可赏的地方（导游图上画双星的地方）都挤满了外国人。我们到处都能遇到外国旅游者，往往就在我们的桌旁遇见他们，甚至有时素昧平生的朋友的朋友会出现在我们的浴室里或床上。

3 他们还挤满了专门为他们留出来的两所大学，佩鲁贾和乌尔比诺。他们在这里学习意语、吸收灿烂的拉丁文化、谈情说爱、游泳、大吃便宜的意大利面条、橄榄油、西红柿和大蒜。美国的大学有时来此举办夏季学习班，内容是欣赏艺术，学习文明史和有关科目。举办地点有时在佛罗伦萨附近小山顶上的古老别墅，从那里可以观览全城景色；有时在威尼斯主运河边的宫殿。瑞典和挪威

的工人俱乐部在无人居住的海滨买下一些树林地带，兴建起他们自己的俱乐部和娱乐中心。

在闷热的七、八月份，本地人走光了，城里几乎全由满身汗水尘埃的外国人接管。在午睡的时间，就连驿马也在它们的草棚下睡着了的时侯，这些不知疲倦的外国人才终于停息下来。他们睡得到处都是，花园的长凳上，人行道的镶边石上，喷泉的围边上，古迹的旁边。他们两臂交叉，头往上一枕，就趴在咖啡馆的桌上睡着了，就睡在空瓶子、脏餐巾和刚买的纪念品中间。他们的模样真象刚打完了仗，拖泥带水，疲惫不堪。不过他们打的是胜仗，敌人逃走丢下了城池，这地方成他们的了。

我这里讲的不是那少数有经验的外国人，他们了解意大利，知道为何而来。不少人已经来过，是熟门熟路；有的人没来过，但懂得干什么和要什么。他们总是避开炎热和尘埃，少去出名的地方，如果非去不可（出名的地方一般都是最值得看的），也挑恰当的时间，在人群已散、暑气消减的时候去。他们的服装从众，普普通通。他们或爱自然，或爱艺术，或爱文化、考古和音乐。有人爱交朋友，有人喜欢去寻觅偏僻的海滩和无名的岛屿。有人宁肯多走路，也要去看少为人知的妙品杰作。有人喜欢好酒好菜，熟悉连本地都只有几个人知道、外国人还根本没有发现的饭馆。有的人意大利语说得好，很容易跟本地人打成一片。我感兴趣的不是他们，他们并没有特色。我讲的是游客中的大多数，是千百 4 万因无名的冲动而来的人们。

众多游客年年准时到来。在一般意大利人眼中，他们的到来就象自然现象一样不可抗拒，象燕子、鹤鹑、鹧鸪等候鸟的季节迁徙一样出自本能，象是游牧部落为牛羊寻找青草牧场而定期迁徙的人类学现象。在意大利人看来，许多游客的模样都差不多，这就更加深了他们的这种印象。游客的服装过于鲜艳，好象古代

的蛮族和现在的吉卜赛或柏柏尔人所穿的那样。人数众多的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皮肤本是浅粉色的，太阳很难把他们晒成大方的棕色，而只能晒成嫩红或者是晒出些斑点。他们热得大汗淋漓，身着尼龙衬衫，脚登凉鞋，鼻上架着墨镜，光着头或戴着廉价的草帽，草帽边上印着或绣着各城市、圣地、海滨、岛屿或其它名胜的名字。

说来奇怪，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要一进入意大利国境就感到有点乱了方寸，改变了他们的本性。仿佛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生理兴奋控制了他们的机体，使他们忘掉了自己，也忘掉了其余的一切。这象鲑鱼逆流而上去产卵一样，是服从某种深奥的大自然的推动。世上任何地方的蜜月情侣全都是如痴如醉的，他们感到温柔的陶醉和幸福的晕眩，但是在意大利，这种感觉就倍加浓厚，这不但因为他们在蜜月中，而且因为这蜜月在意大利度过。事实上，许多普通的游客也象新婚的情人一样，为新的幻想和希望所陶醉。稳重的专业人员、认真的店主、忠诚的雇员、严谨的科学家和严格的教育家、整洁的主妇、戴眼镜的老小姐、纯洁的少女、品行高尚的夫人、听话的丈夫到意大利后都失了常态，若在本国，他们可能不会如此。更准确地说，他们好象摆脱了原来分派给他们的角色和大自然赋予他们的身份，这种角色和身份忽然使他们感到反感。生活的规则变了，或者说暂时停止生效了。说来奇怪，有些人好象是完全或者部分地失掉了平常具有的判断力和自制力，把在大多数国家里为了生存所必需的疑虑、踌躇、慎重和对生计的操心全抛到了脑后。他们陷入各种困境。他们跟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他们对样样东西都死盯着看，流露出明显的喜爱、赞赏和领会的神色，至少他们原谅一切，宽恕一切，不管是好是坏，是平常的还是可厌的。他们常常轻易受骗，但是，如果受骗了，他们总是满不在乎。

来自北欧的游客大多数都爱喝酒，他们喝得多，不挑三拣四。不论是产自著名葡萄园的名贵佳酿还是带硫磺味和木桶味的粗酒以至为不大会喝的人特制的甜糖浆酒，他们喝起来都一样兴高彩烈。说来有趣，德国和奥地利人只要南行一过布伦纳山口，第一件事就象通常上加油站那样，把汽车停在酒店门前进去开喝。刚一过边界，山道两旁酒店就鳞次栉比；每家酒店都挂着熟铁打制的招牌；枝叶婆娑的藤萝架下摆着一张张铺上方格桌布的桌子；女侍者们身穿阿尔卑斯农家少妇的那种带褶长裙；样样事物都有一种迷人的童话色彩，这种色彩是这个从地理上和心理上都是半德半意的地区所特有的。德国和奥地利人在布伦纳山路上的表现就象美国人当年不顾禁令越过加拿大边界冲向第一家酒吧间一样。这种现象本身是难以解释的。德奥两国都不缺乏便宜的酒类，有土产的也有进口的。大概他们想解决的不是生理上的渴而是心理上的渴。这可能是一种下意识的惯例，以痛饮来庆祝他们进入新的角色。就象人们在除夕夜的钟声响起时痛饮香槟一样，庆祝他们越过了精神上的边界，去追求新的希望和新的生活。

这些夏天的来客，以同样奔放的热情，不加选择地欣赏一切未必出色的游览地和他们在家乡未必愿看的东西。他们屏气凝神，乐陶陶地欣赏在罗马、米兰和斯波莱托上演的世界最好的歌剧，同样也爱听乡村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小乐队的吹奏；听维华第的无懈可击的四重奏，也听空洞无力的舞曲。他们高兴地品尝名厨烧制的精美佳肴，也同样津津有味地大嚼农民的庄稼饭菜，那多半是西红柿加大蒜烧的。他们也在渔民那里吃他们的章鱼或河虾，那是在荒无人烟的河滩上用气味很重的橄榄油煎的。他们买很多东西带回家作纪念，有别处得不到的东西，也有日本造的便宜小饰物；有贵重的名作，也有俗气的仿造品。

许多人试着说意语，有人确实很快就说得不错了。还有一些

人是自以为说得不错。他们觉得把事物用当地话说出来就更有意思，更有趣味。铁锹不过是铁锹，但如果说成**badile**（意文：铁锹）就自然有了一种异国的、地中海的、使人陶醉的情调。有些人学习按发音拼写在本子上的单词表，有人在随便谈话时就学会了这些单词。他们在说话时拼命比划，劲头就象扮演意大利人的外国业余丑角演员。他们笑声朗朗，到处找人交谈，不论是餐桌旁的人还是火车上的旅伴，或者是侍者、乞丐、卖唱的、导游者，看见谁就找谁谈，不挑不拣，脾气总是很好。就象爱狗者对所有的狗都抚爱一样。

男人，至少是许多男人，不管是什么年纪的，都有一个自然的爱好，就是欣赏和追求意大利姑娘。必须承认，意大利的姑娘和年青妇女现在比男人们记忆中或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美丽动人了，这原因没有人确切知道。她们肯定比过去那些最著名的雕塑和油画中的形象更吸引人，更使人中意。波提切里的“维纳斯”，提香的“神圣的爱”，拉斐尔的“面包师的女儿”现在不能使街上行人转身回顾了。意大利姑娘不仅比过去更吸引人，更容易接近，而且胜过如今许多国家的姑娘。在战前，意大利的美女就象意大利的繁荣那样，是少数地区才有的尤物。在外国人中美女较普遍，特别是美国人。那时漂亮的意大利小伙子每到春天就盼望着美国姑娘的到来。他们身段美，会打扮，穿得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长腿，简直就象来自一个较为年青的世界。她们健康、诙谐、无拘无束、无所顾虑。而现在的妇女也有了令人吃惊的美丽长腿，可爱的精神焕发的脸，发达的胸部，纤细的腰身，象双联曼陀琳般匀称的臀部。除此之外，她们的态度坦诚、友爱、毫无拘束，她们的话语既温柔又爽直。有时她们用优美的音调讲出来的话，又有伤风雅，不能公之于众。

外国人确实一直在意大利追求妇女。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和威

尼斯的名妓极蒙赞赏。许多世纪以来罗马和威尼斯的狂欢节不过是一个在街上追逐戴着假面的女郎的机会而已。现在这种猎艳达到了更坚决的、几乎是拼命的程度。许多游客迷恋姑娘已到了话也说不清，事也断不明的状态。他们醉心于姑娘们微波起伏的优美步法，接待客人的殷勤态度，仿佛贴身缝成的漂亮服装，特别是极小的两截游泳衣。外国人常在街上尾随特别动人的天生尤物，就象饿狗追随着送肉的肉铺伙计一样。在咖啡馆或海滨交个朋友并非难事。许多男人很容易（也许过分容易了）就找到了通向姑娘卧室的道路。有些人总是深陷爱河，他们真的想要结婚。他们希望从这阳光灿烂、气氛亲切的国度带一个活的纪念品回到他们阴晦的国家去。每到夏末，常有人威胁说要自杀（有人真自杀了），原因是爱上了一个与之未能谈过几句话的美女，其实这个美女如果真成了他的妻子可能也不会忠实于他，不会给他带来幸福。

许多外国女人认为意大利人是难以抗拒的。意大利的男人也有长期形成的名声。有的确实是不可抗拒。他们的魅力、伎俩、果决和勇敢众所周知。他们多数都觉得自己象鸟儿一样自由，即使是已结了婚或订了婚或已有很深爱情的人也是如此。许多人往往不分白天晚上，也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毫不犹豫地寻求鱼水交欢：在汽车里，在海滩上，在灌木丛后面，在山顶上，在水里面，在床上。无论是小伙子还是成年人，胖子还是瘦子，农民还是城里拥有汽车的花花公子，要挑动他们并不难。他们很少会耽误时间。在许多情况下，女人只要隔着咖啡桌送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秋波，自己对自己作一个神秘的微笑，挥一挥手，或者嘴上叼一支未点燃的香烟，装出在提包里找火柴而又没找到的样子就行了。对正经男人则要多费一点力才能诱之上钩。某些妇女，胸脯扁平的丑小鸭、人老心不老的中年妇人、保养良好但又十分寂寞的老太太，全都抱着以桃色的回忆来充实生活的希望而来到意大利，在星空

下、大海边、吉他伴奏声中体会一种异国情趣的浪漫生活。在意大利南部和某些岛屿上，一些外国团体建立了收费低廉的海滨营地和一些草棚，为男女幽会提供了场所。外国的那些无人问津的穷妇女，就在这里会见如饥似渴的意大利男人，不管这种原始环境能提供什么样的人，是渔民、水手、士兵，还是卷发上抹着头油、面孔上闪现微笑的失业农场工人。

* * *

许多外国人去而复返。有人越来越勤，有人一次比一次呆得久，决心在意大利多住些时间。有人最后惊愕地发现自己再也离不开了，他们感到没有勇气作出永远离开的决定。到罗马旅行过的霍桑，早就精彩地描写过这种感情，他看到自己是如何逐渐变成一个移居国外的人的。他写道：“如果我们在外国呆得过久，岁月终将变得空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牵就生活的现实，直到我们重又呼吸到故国空气的那一天为止。但是久而久之，这一天落空了；或者，假如我们确实回到了家乡，我们也会发现，故国的空气已不再有振奋人心的作用了；实际生活已悄然移到了我们以为只是暂居的土地上。结果，我们处在两个国家之间，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最后只能在两国之一的一小块地方埋下我们烦恼的尸骨。”

在意大利的外国移民现在有多少？几十万？一百万？谁也说不清。有些人已入乡随俗，完全意大利化了。他们热爱这块地方，他们定居于此，并且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定居于此。一种特殊的思想气质，一种有选择的亲和力，使他们成为荣誉意大利人；其中有少数人，比意大利人本身还更意大利人。他们对这个国家比许多本国人更了解，了解它的文化、生活方式、历史、秘藏的珍宝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使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些人，比如由于害怕革命而从动乱的南美迁来的百万富翁、有成就的艺术家、好莱坞

的演员、靠艺术消闲的年金领取者、在瑞士银行立了户头的厌世的唯美主义者。

他们有的住在佛罗伦萨的某个邸宅里，或者住在梅迪奇家族的某个能俯瞰全城的豪华别墅里，时间从一季到几年，甚至整个一生（维多利亚女王、勃朗宁夫妇、马克·吐温、贝伦森、赫胥黎就是这样）。有的在威尼斯主运河边租一座宫殿，包括镀金平底船和穿号衣的船夫（拜伦、缪塞、拉斯金、瓦格纳、胡顿和波特就是这样）。或者就象亨利·詹姆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那样，搬进一座豪华罗马宫殿的底层，住在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有人喜欢选择比较特别或富有戏剧性的住所，比如山顶上的房屋或俯瞰湖海的房屋（雪莱在莱里奇，芒恩、道格拉斯和克鲁伯·冯波伦在加普里，高尔基在索伦托就是这样）。

富人来到意大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想逃避在其本国应缴纳的沉重所得税，或者避免为财产上遗产税。另一些人想过僮仆环绕的富豪生活，而在意大利他可以花同样多的钱财照这样多维持几年。暴发户总希望能久享富贵荣华，他们都希望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风光体面。但除上述这些以外，还有人有别的动机。许多人显然是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中强烈的烦嚣，为自己保留下心爱的浪漫幻想、风雅趣味、才华、美丽和身份，以免它们被本国严酷的对抗所粉碎。他们衷心希望避开与现实的矛盾。

移民中的穷人比富人更多，而且年年增加。和过去几世纪一样，他们中许多人是艺术家，有些是优秀的艺术家，也有正在奋斗的年青人；有年老的失败者，也有年青的希望之星；有成功者，也有明知自己永远不会有什么作为而又对此满不在乎的人。意大利适合他们，在这个国家里他们可以工作、彼此交流思想、进行实验、会见激励人上进的人物、广泛发挥潜在的可能性。他们包括各种各样的人：作家、画家、舞蹈家、音乐家、演员、雕塑家、

诗人以及各种新兴的未名的艺术的追随者。有些人仅是艺术的尝试者和爱好者，他们对艺术的热爱超过自己有限的才能和天资。他们在艺术的环境中，在艺术世界的边缘上，尽力勉强糊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意大利是一个永恒的世界避难所，是能够逃离急流的河岸。

缺乏艺术修养的穷移民可能更多，他们之中有在战争中丧偶的德国寡妇、有靠在已被遗忘了的过去时代的爱情游戏中挣的钱来维持生活的法国老妓女、印度的陆军上校、挣退休金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学校教师、讨厌南加利福尼亚的美国老夫妇、不适应环境的人、落魄的人、各国的离婚者和各种流浪汉。许多人住在大城市，在陈旧的宅子里租一套带家具的小房间或艺术工作室。他们回避忙碌的工业中心和千篇一律的公寓大楼。他们宁愿欣赏意大利的别致、贫穷与衰朽，衰朽之中有安慰。许多人还选择了有古老历史的山城、山顶上的村庄、海边的小渔港、岩石裸露的岛屿。过去的几代穷外国人发现了许多令人喜爱的地方，如加普里、伊斯基亚、拉维略、陶米纳或博迪盖拉（爱德华·李尔曾在此度过一生中最后几年，并写出最后几首打油诗），这些地方现在已变得远近闻名、生活豪华、喧嚷嘈杂和拥挤不堪，但总还有未被污染的新地点。

这些穷人衣着破旧，但很别致，他们有时自己烧饭，有时跟农夫渔民搭伙，或者在廉价的煎饼铺或小酒店里花几个里拉吃上一餐。普通的饮食就跟法国外省的饮食或以前中国的饮食一样好。这些外国人一般都说他们来意大利主要是因为这里气候温和，钱比别处经花。不过他们所喜欢的当然不仅是物价低廉和阳光充足，而是喜欢这样的地方，在这里，与周围的贫穷一对比，穷就好象是不过分富有，穷也可以有体面，并不引人注目，也不显得寒酸。在一般意大利人当中，缺少财产很少成为怜悯或轻蔑的对

象，它被认为是人的自然状态。贫穷完全是私人的事，就象宗教、政见或其它品质、习惯和缺点一样，别人用不着去打听。换句话说，他们所寻求的就是意大利人传统的“不计较”。意大利人不计较别人的仪表和癖好，不计较别人是否贫穷。这种“不计较”有时近于纵容和怂恿。

在这些穷的和富的外国人眼中的意大利是一个虚幻的国家，它和意大利人的意大利完全不是一回事。移民们往往并不真正注意观察和喜爱意大利人的意大利。首先，许多人认识的本地人太少，对他们观察得太模糊，以至不能理解他们和他们的问题。穷外国人交往的多是仆人、旅馆的门房、侍者、店主、一两个工匠、邮递员和杂七杂八的混饭吃的人。富人交往的是当地咖啡馆里有文化的人，是那些懂外文、出过国、或者在外国有亲戚、喝威士忌的人。他们很少了解大多数的人民。外国人对意大利人态度都很好，因为他们误解了意大利对待他们的那种有趣的纵容态度，其实这种态度近似于人们出于礼貌和同情而屈尊地对待儿童的态度。

当代意大利的问题是太纷乱，太难理解了，地方的政治事件又总是显得莫名其妙和无足轻重。在战前，许多人讨厌法西斯政权，然而他们认为它没什么害处，却又别致又滑稽。他们说：“这对意大利人来说就够好了。”在战后，有些人又相信，有一点共产主义“对意大利人会有好处”。艾兹拉·庞德在战前和战时对墨索里尼及其政府的看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代表了一种心地善良而又糊涂透顶的头脑混乱。也有少数人从心里讨厌意大利人。他们认为美丽的风景是安排他们梦幻生活的舞台，这种风景被千百万多余的男女、吵吵嚷嚷的儿童给弄乱了，弄得不调和了；它还被摩托车、荧光灯、噪音、现代化建筑和各种画蛇添足的东西给破坏了。大多数外国人所实际居住的这个国家是一个移居者的

小意大利，它包括一些古城中最有名的地区、几个城镇和村庄、著名的风景区和三四个岛屿，在这里他们物以类聚，跟与他们境遇相似的人协调共处。

许多人，比如霍桑，在某个时候发现自己再也离不开那个实际上不存在的国家了，他们再也不能面对那个他们之所从来的比较粗糙的世界。在那里，他们看问题过于分明，他们熟悉的母语的每一个字的意思都是清清楚楚的。他们已经无可挽回地沉溺于亲切温柔的意大利情调之中，许多人实际上回去也没人可找了。使他们留恋的有他们自己的小窝、自山上眺望的海景、一扭头就能从窗口看到的竞技场、威尼斯的主运河、佛罗伦萨的屋顶、拉帕罗的荒废别墅、一大堆多年收集的杂乱古董，还有已经养成的习惯。意大利充满了垂老之人，他们再也不想离开，他们一人独居，以猫狗自娱，侍候他们的常是忠心的仆人，但更常是靠偷东西养家的肆无忌惮的女仆。这些老人病苦无援的日子终会到来，这时他们已远离了年青时熟悉的所见所闻，对自己为什么要自我放逐的原因也记忆不清了。在这异国土地上，他们从未确实看明白事物的所以为然，也没有很好理解过。在临终时，有些人还穿着年青时剩下的花哨服装，周围是外国的景色和外国人，这些人不知怎么已成为他不可缺少的支柱和人生虚幻戏剧的重要角色。每年都有不少人去世，他们被匆匆埋葬在某个意大利公墓为异教徒保留的角落里。有些人的遗体被装运回国，送交他们实际上不认得的和冷淡的亲戚。许多人至死也没弄清为什么自己要选择意大利度过残年。

* * *

许多懒散移民不是老年而是青年。他们所寻求的并非用较少的钱换得王侯般的豪华生活，不是平和舒适，也不是意大利所能提供的没有竞争和逆耳之言的和平。他们并不想为自己制造幻

想，不追随新奇的倾向也不盼望光荣的未来。他们中许多人不是衰弱绝望而是生气勃勃、怀抱希望、快活健康的。在罗马夏末的下午，西来的海风吹凉了沉闷的空气，可以看到这些头发蓬乱未梳、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外国男女青年，穿着皱巴巴的棉布衣服，敞着扣子，脚着凉鞋，有些时候，男的奇怪地显出女性的娇柔，女的奇怪地显出男性的气概，拥挤在西班牙广场三位一体山的台阶上。

他们有的倚靠着古老的石灰华栏杆，有的在台阶上坐着或躺着若有所待。他们是在等谁？等什么呢？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他们所占据的这些地方，在过去，在一百多年前，另一些青年汇合于此，他们是等待主顾的懒洋洋的艺术模特儿。在西班牙台阶上曾坐有白胡子的圣僧、强盗、带着扇形贝壳的朝圣者、准备到某个画家的路旁神龛作祈祷的穿外套的美丽农妇、戴尖帽留大胡子的洗手不干了的土匪，“神圣家族”恰好都凑到一块来了。这里有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出卖灵魂的犹太、酒鬼、年青的信徒、披山羊皮或水牛皮斗篷的模样好象森林之神的牧羊人、白胡子的教士、眼露凶光的山区农民。这些外国青年并不知道，他们现在呆的地方曾是不可侵犯的避难所，被教皇警探追踪的模特儿、盗贼、凶手等人都逃避到这里来，根据一项古老的特权，他们只要不离开这里就不受逮捕。

现在的青年在外表上未必与过去那些人相象，但他们破旧打皱的服装使他们显得好象也是逃离家门，在寻找某种避难所。他们也处于意大利政府的管辖之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好象也得到某种古老特权的庇护。这些外国青年是在逃避什么难以名状的未知罪行和恐怖呢？呆在意大利的土地上能填补他们什么莫名其妙的精神空虚呢？

第二章 永恒的朝圣

以上这一切实在是太古老了，古老到可以认为是事物本性的一部分，它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世界的黎明。那时，众神之父农神被他的儿子丘庇特所废黜和羞辱，逃离了奥林波斯山。据说他在拉丁姆找到了避难之所，这块地方就包括后来的罗马城。他在这里当了国王，他统治的时期是一个黄金时代。但是他仍是一个意气沮丧的流亡者，力图忘掉那些误解、忘恩负义和失败。在诗的语言里，现在仍把意大利称为“农神之地”。每年十二月份，罗马人都把一个星期奉献给这位流亡的神祇、他们的第一位外国来宾，这就是十分重要的农神节。在节日中，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法律都不算数，搞得天翻地覆。学校停课，不宣战，不打仗，穷人可以向富人发号施令，奴隶可以羞辱主人，小偷无人干涉，胆小鬼敢去引诱贵妇。

从人们能够记得起来的遥远时期以来，各种各样的外国人，信教的和不信教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单个的或大群的，就一直到了意大利来寻找象农神时代那样的安逸日子。在罗马帝国衰微时，大批的蛮族来了。他们来追求和平与稳定的生活、丰富的战利品和新的牧场，但更起作用的动机是一种村汉慕雅的心理。他们用尽办法也要学到没落的罗马人所具有的风度、才艺和体面，盼望自己能被承认为罗马人。还在北欧人受洗入教以前就有他们的旅行者到圣城来了。当格雷戈里教皇还是一个普通牧师的时候，他曾在罗马的广场上遇到一群漂亮的盎格鲁青年。当时他说出了

那句著名的拉丁语：“**Angeli non Angli**”（他们是天使，而不是盎格鲁人）。

在古老中世纪那些黯淡的日子里，虔诚的香客们从未停止过脚步。他们象蚂蚁一样互相追随，行进在荒废了的帝国大道上（如奥雷里安大道、卡夏安大道和弗拉米尼安大道），有的步行，有的骑马乘骡。那时真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去罗马的朝圣者中有国王、领主、平民、教士、主教、僧侣、圣徒、流浪汉、冒险家、强盗、骑士、商人和学者。他们全希望在死前能亲眼瞧瞧万国大教堂的所在地，能得到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教皇本人的祝福。所有基督徒都说拉丁语，因此不存在语言的障碍。他们虔诚地挤满了著名的教堂和神奇的圣殿，参加高级的宗教仪式，聆听世界著名的传教士布道，对着可敬的圣像和圣迹祷告。他们无心访古，没人肯费心去看一眼罗马帝国的使人敬畏的遗迹。事实上，较为虔诚的人对这些古迹极度厌恶，他们认为这些古迹是残留下来的魔王撒旦的作品，也就是那个该入地狱的鬼魂的手艺。那些异教的神祇难道不就是乔装改扮的魔鬼吗？

在中世纪晚期，日耳曼诸皇帝和军事领袖常常率领着铁甲军南下。他们来祈祷只是顺便，主要目的是以武力压迫教皇和意大利人，掠夺和扫荡造反的意大利城邦，援助他们忠诚的盟友吉伯林派（反教皇派），消灭他们的敌人盖尔菲派（教皇派）。他们本可以很容易地转向别处，比如说去找碴儿跟土耳其苏丹或莫斯科大公争斗，或者跟随条顿骑士团进入波罗的海，或沿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路线杀向印度，如果那样就会改写欧洲的历史，改变世界的面貌。但多数时候他们宁愿往南走，就象被磁石吸住一样。他们翻过积雪的阿尔卑斯山，进入狭窄多石的半岛，置身于奸诈难测的居民中。在这里，虏获物充其量也不多，居民不了解他们，不喜欢他们。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象所有日耳曼人一样，

被罗马的威名和这个名字至今还能唤起的一切所迷惑，所以他们
17 把自己叫做“罗马”皇帝，而不是“日耳曼”皇帝，并且自称 **Kaiser**
(凯撒)。他们觉得，如果不象查理曼大帝那样，在圣彼得教堂由
教皇加冕，如果不采用那个早已灭亡的帝国的名称，他们的统治
就没有合法性。

迷惑这些皇帝的还有另一些他们自己也很少意识到、很少注
意到的东西。他们是纯粹的北方人，所有使他们喜爱和厌恶的东
西，后来又使许多其他北方人也感到喜爱和厌恶。他们喜欢温和
的气候，但又害怕它。使他们同时又爱又怕的东西还有意大利优
雅的生活、安逸的快乐、易变的道德观、复杂的推理、葡萄酒、
女人、和谐的风景、醉心历史并且以历史为自豪的感情。意大利
总是使北方来客产生一种自鸣得意的愉快感，使他们觉得自己的
道德比本地人要高一等。皇帝们运走各式各样的纪念品，那是卑
鄙的意大利人的奇技淫巧。多少世纪以来所有的征服者们都干着
同样的勾当。拿破仑曾从圣马可教堂偷走了青铜马，那本是威尼
斯人从君士坦丁堡弄来的。希特勒和戈林曾把他们能找到的最好
的艺术品装满了许多节车皮。

十字军在去圣地的途中曾经过意大利，因为这是最短的路
线。在回程中，狮心王理查德曾在墨西拿度过了一个不舒服的冬
天，圭·德蒙泰福特当康沃尔的年轻亨利留连于维泰博大教堂的
圣坛时，把他砍成了碎块。后来，商人们来到意大利，他们的目
的是购买来自东方的商品：香料、宝石、丝绸和阿拉伯种马。再
往后到文艺复兴时期，又有一些商人来学习银行业和商业的最新
技巧：如何管理和增殖金钱、如何记帐、如何用商品和黄金进行
交易和投机。乔叟作为他的国王的外交代表曾两度来意大利，足
迹可能远至帕杜阿，在那里他单独会见了彼特拉克主教们来是为
了跟教皇磋商；神学家、法学家和学者来是为了跟博洛尼亚的著

名大师们研讨问题：骑师来是为了完善驯马术；骑士们南来是为了寻求冒险。约翰·霍克伍德爵士可能是所有这些人中最杰出的一个，他是另一类北欧移民的早期代表。这类人在许多世纪里一直兴旺，而且现在仍然兴旺。他们是些专门家和实业家，他们能挣下一份财产是因为意大利人认为他们比本地的竞争者、本国的同胞迟钝和老实。 18

约翰·霍克伍德是一三六〇年来的，当时布勒丁尼和约中止了英国国王对法国的百年战争，霍克伍德发现自己无事可做了。他曾在克雷西呆过，赢得了黑太子的好感。他喜欢住在辉煌的城堡里过奢侈的生活，这城堡是连同住户、仆人、厨房和酒窖一起征用的。他也尝到过美丽多才的大陆妇女的爱情。象所有的战争暴发户一样，他再也不愿穿老百姓的服装，不愿回本乡埃塞克斯去重操鞣皮匠的行当。他觉得意大利强烈地吸引着他，于是他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切尼斯山口，率领一队自称为“白帮”的骑兵进入了意大利。不久，意大利的诸侯就雇他们来打自己的小型战争。“白帮”总是替比较有钱、比较强大的主顾打仗，他们的首领被叫做“乔万尼·阿库托”，这样叫决不是因为约翰·霍克伍德头脑敏锐^①，而是因为这个名字最接近他名字的英语发音。

他是红脸蓝眼高个子，动作迟缓，寡言少语，但非常勇敢。他被认为是一个不太奢侈的好人。他打起仗来总是全力争取胜利，避免让自己的士兵作太多的无谓牺牲，但毫不顾惜敌人的生命。他被认为是从不叛主的人，是当时有数的几个忠诚可靠的雇佣兵首领之一。教皇感激地封他为洗马勋爵，这对一个英国骑兵来说可算是很好的称号。他成功地担任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军队终身总司令这样一个有实权的、值得羡慕的职位。

① 阿库托 (acuto) 在意语中就是敏锐之意。——译者

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对他进行过的一些战斗的翔实记述。这些战斗都是计划得很好，执行得很认真的军事行动。他的英国兵很出色地为他服务。他们打起仗来胜过他们的对手，因为他们有一种渴望胜利的激情，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寻常和可怕的。“白帮”
19 是意大利境内第一支训练良好、装备统一、有纪律、讲军容的部队。编年史家菲力浦·维拉尼曾这样描写过当时人们的惊讶：

“他们个个都是性如烈火的年青人，武艺高强，不顾安危。在队伍里，他们行动迅速，服从上级，而在宿营时，由于无拘束的闯劲和勇敢的性格，他们有时无秩序地横躺竖卧……他们人人都有一两个听差，有的还拥有更多。当他们卸下盔甲时，听差就来把它擦亮，因此当他们出现在战场上时，浑身披挂就象镜子一样发光，从而也就显得更怕了……他们手执短矛，万众一心，缓步走向敌人。他们使敌人发出恐怖的尖叫，而自己的队伍却毫不动摇。”维拉尼沮丧地总结道：“他们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意大利人的懦弱，不如说是由于他们的英勇。”

马基雅维利指出，当时曾有不少雇佣兵首领奴役了其他自由城市，可是佛罗伦萨人却信任约翰爵士，不怕他奴役他们，这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个英国人有足够复杂的头脑来做这种事。约翰爵士最后吃了亏，他本与共和国政府约定，待他死后给他在多莫建一座骑马的塑像，可是当他在—三九四年死去之后，昂贵的塑像被代之以一幅在门上方很高的地方的壁画，而且画得很坏，以致许多年后保罗·乌切洛不得不将它重新画过。

* * *

在过去，只身到意大利去的旅行者总是危险的，人们可以在路旁看到他们的无标志的坟墓。然而，教会承认在朝圣途中遇害是一种功德，它可以减少在炼狱中将受的惩罚。一到阿尔卑斯山，性命攸关的危险就开始了。道路常常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和雪崩

所埋没，在这种情况下就连向导也要迷路。这些向导中也时常有不可信任的流氓，他们会抢劫和杀害他们的主顾。旅客的尸体总是要到春天到来、厚厚的积雪融化之后才会被发现。雪崩是第二 20 大威胁。为了发现和援救被掩埋的受难者，教会下令沿主要道路修建了一些招待所，僧侣们在其中贮存了木柴、食物、舒适的床、温暖的毯子、白兰地酒和强壮的狗，这种狗能嗅出几英尺厚的雪下面的活人。雪崩的景象是如此激动人心，以致在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铁路隧道最终修通之前，好运动的英国人总好停留在某些适当的地方用手枪向山上射击，目的是震动平静的空气，使积雪从高峰上滑落下来。他们认为如果过山不见雪崩，那就象过海不见鲸鱼或飓风一样乏味。作为他们成功的科学实验的结果，这些勇敢的旅行者有时连同他们的行李和旅伴一起被活埋掉。

在路旁旷野里，土匪窥伺着行人。有些人在路上躲过了埋伏、抢劫和杀害，可是有时却在床上被贪婪的小店主谋了性命。为了谨慎起见，外表显得越穷越好，以免引起各色人等，其中也包括自己的旅伴的贪心。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书商比斯蒂奇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威廉·格雪（即后来的伊利主教）曾在科隆求学。后来，到了他该回意大利的时候，他的启程必须安排得万分谨慎，因为他是一个出名的有钱人，从他身上可以勒索高额的赎金。更有甚者，在科隆虎视眈眈地注意着他的行期、准备在路上打他闷棍的人已经很多。而且，途中到处是小领主，旅行很危险。根据得到的报告，他决定了一个可能保证旅途安全的计划。他决定最好是装病，叫一个医生天天来看他，然后打扮成爱尔兰的香客，只带一个旅伴神不知鬼不觉地上路。同时，继续让那医生每天到他府上去拜访，坚持个七、八天”。

当时还要躲避一些地方性的战争。旅客们总是力图打听出在 21 道路前方有谁在打谁。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消息搞不到，搞

到了又不可靠。意大利的政治，外国人永远搞不清，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战争可能出乎意料地爆发；毫无任何警告，战线就转移了。一夜之间友化为敌，敌化为友。旅客们忽然发现自己正处在战斗的核心，并且常常消失得无影无踪，死在了死人堆里。有的旅客遇见了兴高采烈的得胜之军，用抢来的酒喝得烂醉；有时遇见损失惨重的败兵，也同样用抢来的酒喝得烂醉，这两者是一样的危险。有些没有在路途上死亡或失踪的不屈不挠的幸存的外国人，却可能在平静地休息或欣赏某个意大利城市的风光胜景时遭到厄运。许多世纪以来，他们之中有大批的人被流氓暴徒杀害，或者由于在小客店里的口角而在决斗中死于风度翩翩的先生们之手。有些人死于无名的疾病，还有些保全了性命的人却因遭抢劫后无法生活而被关进监狱。

海路常比陆路更危险。暴风雨颠覆船只，水手们为了抢劫船货和乘客而暴动之事，时有所闻。阿拉伯海盗强行登船，全船人都作了俘虏的事并不少见。不知有多少好基督徒在去罗马朝拜的途中被掳去当土耳其船上的桨手或在北非及东方当微贱的奴隶，在悲惨的处境下度过残生。他们的家属永远不知道他们还活着，并且为他们的灵魂作祈祷。只有少数人有时能设法送出自己还活着的消息，并且被赎了回去。当他们恢复自由回到家中时，已经是人老体衰；已经忘掉他们并另找安慰的妻子也不要他们了。直到一八〇五年，华盛顿·欧文在乘船从热那亚去西西里的途中还被一艘私掠船所截。一群手执生锈的弯刀、手枪和匕首的暴徒冲上了甲板。由于这次遭遇，这位美国作家刚一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就理所当然地觉得这里到处是土匪。海盗们看到了这位年青旅客随身带的给一些名人的介绍信之后，把他释放了。海盗们这样做倒不是因为势利眼，景仰高门大户，而是怕搞了与权贵有联系的人会遭到报复，对无名的穷人他们就不在乎了。

有些侥幸途中平安的旅客也还有另一些令人苦恼的麻烦事。当时在意大利和在欧洲其它地方一样，旅店床位很少，而且通常是臭烘烘的爬满了虫子。被单和毯子都很脏，沾满了经年累月在这里睡觉的人们的汗和泥。男人和女人、不同年龄不同卫生程度的人们通常都只能分享有数的几张床。直到十七世纪末窗户上才安玻璃。（蒙塔伊内在他的日记里总是抱怨屋里的穿堂冷风，不严实的木窗挡它不住。）食物很坏，常常令人作呕。直到十八世纪，斯莫莱特还发牢骚说：“小客店足以使一个赶骡子的呕吐，食物的做法就是霍屯督人也要感到恶心”。

时至今日，房间里冬天也没有取暖设备，壁炉和火盆都是稀罕物。从一八五八年版的穆拉伊的《南意旅游指南》中可以看出，地方上的小客店从中世纪以来没有什么大改善。它说：“边远地区的旅馆还是跟蒙塔伊内时代一样糟糕和不舒服，唯一例外是木窗一般都换成了玻璃窗。如果旅客能自己动手煎鸡蛋或是教小店主怎样做一客火腿蛋，他才能在连牛奶和奶油都很稀罕的高地村庄里得到这些东西。”业余的英国烹调家们一动手，本地的做饭手艺就一钱不值了。

租用一匹马、一辆车，雇一个仆人、一个向导，租间房子都是麻烦事，有时甚至是危险事。直到不久以前，情况还是如此。穆拉伊的指南劝告旅客们，“一到地方就要跟房东讲好价钱。所有其他国家的外国人都惯于采用这种谨慎做法，因此他们不但能比 23 英国人少花三分之一的钱，而且避免了为值得怀疑的帐单烦心和耽误时间。”另一本十九世纪的导游书说：“无论何时在驿车上都要订前排座位，并且无论如何也要把车价合同当着公证人的面写下来。”向当地警方求助也是一件危险事，在边远地区直到不久以前还是如此。警察常常宁愿帮助他们狡诈的同胞，因为以后他们还要生活在一起，而外国的旅客不管多么正直，反正以后是不会再

见面了。

尽管如此，旅游者前来，从未中断。他们不顾旅途上的种种不便和意外事件，不顾透风的窗户、冰冷的房间、坑洼的道路、有虫子的床、变质的食物、劫道者、土匪、谋财害命的家伙、大胆的暴徒、雪崩、地震、战争、好抢劫的军队和穆斯林海盗。在中世纪，到意大利来旅行的人肯定比去其它国家的要多。宗教无疑是无比强大的动力。朝圣者到罗马来，不分时间，不分季节。尤其是每逢五十年一次的圣年，他们更是蜂拥而至。因为在圣年能得到大量的赐福和免罪。在第一个圣年，即开始设立圣年的一三〇〇年，平均每天来参加的有二十万人。在第二个圣年一三五〇年，编年史家维拉尼估计总共有一百二十万人进了不朽城的大门。这个数字虽然可能不准，但已经够惊人了。其中许多人可能是邻近省份的意大利人，但更大量的还是从远方和外国来的。

罗马向信徒们提供了独特的有利条件，然而，严格地说这种旅行并非必要。通向天堂的道路不止一条，为了涤罪和蒙神恩完全可以有其它较为便宜、迅速和安全的途径。信徒们可以到欧洲随便哪一个较近的圣所，向同一个上帝祷告，求得几乎同样的免罪，然后在几天之内平安健康地回家。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不离开自己的村庄，照样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奉行高尚的道德原则，从而达于圣域。从宗教的观点来看，去罗马虽不能说多余，但也不是必需的。

事实上，寻求神恩已逐渐退化成了去罗马旅行的一种借口。当然，只有在罗马才能参拜圣殿、圣所和圣像，参加高级教士主持的仪式和极不平凡的节日活动，向神求得对重罪的赦免和解脱，这些特殊权利始终是人们离家而来的主要原因之一，直到现在仍然如此。但随着岁月流逝，它们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已经减退。人们参观宗教建筑不仅是因为它能唤起敬畏与启示，而且是为了欣

赏它新颖的世俗之美，它那美轮美奂的装饰和点缀其间的艺术品。对圣母神像，人们逐渐也不仅是膜拜她那超自然的神力，而是欣赏美妙的画技，推崇画家的名声和赞赏模特儿的美貌。

经过了多少个世纪，艺术才第一次因其自身而被欣赏。其实，宗教艺术本来就不完全是赞美上帝和圣徒，它同时还赞美男人和女人、美好的事物、尘世生活的快乐，色彩、阳光和辛勤劳动。在修女和大胡子神父的身后，意大利的画家们得意地描绘了玲珑的小镇和美妙的风景，小得只有靠得很近才能辨出全部细节：墙壁、塔楼、教堂、街道、正在做活的手艺人、河里的轮船、阳台上的妇女和儿童、吠叫的狗、阳光里晒着的鲜艳衣物、庄稼汉和猎人。守旧的北方来客在意大利的艺术与生活中可以嗅出地狱的硫磺味，渎神的气味，今天他们仍有这种感觉。意大利逐渐得到了异教的、不敬神而且亵渎神明的坏名声，并且始终难以洗刷。可是这坏名声并没有赶跑客人，事实上，失掉灵魂的危险所吸引的人与得到灵魂永生的希望所吸引的人一样多。

* * *

毫不足怪，在不敬神的文艺复兴时期来的人要比在虔信而严肃的中世纪来的人更多。这时的意大利成为基督教世界中最富有、最迷人、最有教养、信仰不诚却又聪明的国家。意大利人改造了整个宇宙，起码是改造了人对宇宙的观念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他们揭开了一场革命的序幕，这场革命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要改造欧洲。人文主义（或称对人的成就的研究）意味着承认人类既能行善也能作恶的巨大能力，承认他们的美德、缺点和本性；他们的本性既不同于其他动物，又不同于天使。在很短时期内，令人惊异的新发明、新技术、新发现迅速涌现。新的活动产生出无数难以想象的财富，这些财富在连锁反应中又引燃其他的新活动，结果产生更多的财富。地理新发现、大胆的科学试验、机灵

的商业策略和金融谋算、绞尽脑汁的投机事业，全都设法增殖可利用的财源。富裕使人们的举止文雅，使诗人、画家、雕刻家和学者容易生活，使学校和研究院也能得到资助。

然而阴暗面也是惊人的。西蒙兹曾写道：“在社会文化的辉煌表面之下，潜藏着粗鲁的肉欲和野性的激情，它们不受中世纪虔诚的束缚，也不受现在经验的控制。意大利社会为我们展现了文学、艺术和优雅的空前奇观，但这中间也交织着淫欲、叛逆、腐化、暗杀和暴力。由于沉迷于异教的学问，仿效古人的风格，按照奥维得和忒俄克里托斯的方式来考虑和感知问题，用腐化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有教养的阶级放松了道德尺度。政治上的忠实在意大利几乎成了一个被忘却的名词。连当时第一流的作家和最有才能的思想家也嘲笑基督徒的操守。古典美德只是修辞的题目，而不再是行为的动机。”西蒙兹是一个非常了解情况的作家，他很富有，但健康情况不佳，遵照医嘱长期住在意大利，他在这里研究文艺复兴，为的是写他那不朽的著作。他的私生活就是英国圣公会的原则与他所谓的“粗鲁的肉欲和野性的激情”之间的斗争。他最喜欢年青的娇弱男子。他独自死在罗马一家旅馆里，葬于英国人公墓，离济慈的墓不远。参加葬礼的人不多，其中有他的瑞士男仆，人们看见这个年青人哭了很久。

当时的欧洲人如果想做一件较为重要的事，不先上意大利去看看是不行的。他们必得去看看意大利人近来在忙些什么，发现或发明了些什么。画家、建筑师、雕塑家不用说了，就连造船木工、医生、神学家、工程师、天文学家、法学家、数学家、科学家、学者也都络绎不绝地前来。英国的文人学士来学习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写诗，并且抄走了新的范文。商人们来往于各集镇之间，他们赶着骡车，走在比过去较好、较安全的道路上。各种新式的、价廉物美的玩艺儿特别吸引人。托马斯·柯里亚在一六一一年曾

向他本国粗鲁的同胞们讲过这样一种玩艺，它曾使外国人吃惊达一个多世纪之久：“我发现一种习惯，是我所经过的其它国家所没有的。意大利人和许多久居意大利的外国人在吃饭切肉时总要使一把小叉子。小叉子大部分是钢或铁做的，有些是银制的，但银的只有绅士们才用。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意大利人决不能忍受用指头接触盘里的菜，他们认为所有人的指头似乎都不干净。”

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些服务周到的旅馆，其中最好的要数乌尔比诺大公修建的一家，它可能是第一家现代意义的舒适旅馆。一位法国无名氏曾在一五七八年这样描述它：“它是意大利最好、最宽敞的旅馆，每一层有四十个卧室，门都朝同一条长走廊开，有五、六个装饰华丽的餐厅；这座建筑物就象贵族的城堡。”但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大学里满是外国青年，其中有的很用功，但全都有嘻戏、欢闹的时间。他们在北方的有钱有势的老子们送儿子来，为的是学习意大利人的知识，其中包括适合于外交场合、27 宫廷生活、谈情说爱和策划计谋的语言。他们信奉查理五世的格言：“我对上帝说西班牙语，对女人说意大利语，对男人说法语，而对我的马说德语。”

这些来学习的青年们的首要课题是如何作一个完美的绅士。这种为人的典范是当时的意大利人创造并使之完善的，它被广泛地模仿。西蒙兹写道：“成为一个绅士（他本人就是一个绅士）意味着他至少要熟悉基本的学问，措词优美，善于选择恰如其分的词句，通晓艺术之美，聪明好古，以古代的伟人而不是以教会的圣者作为行为的楷模。他还要争取证明自己精于体育和从骑士时代留存下来的礼节习惯。在文艺复兴时代，智慧觉醒了。人文主义为它开路，美妙的艺术为它增光，财富涌流的环境使它发扬光大，它在欧洲其他地区还相当野蛮的时候，就把意大利人带到了一个如此的境界。

* *

在文艺复兴已扩展到许多北方大国以后，旅行者们仍未中止前来。他们发现意大利又变了。在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灾难性的几十年中，毁灭、失败和耻辱取代了骄傲与光荣。国土上外兵横行，许多最辉煌的城市被攻占和洗劫。天主教徒们出于古老的信念仍然来此寻求安慰与鼓励。来学习的人仍然不少，但多数外国人已不再指望来获取教诲和指导，来欣赏繁荣的文明的光辉了。他们是带着取乐的心情，以高人一等的轻蔑态度来瞧瞧意大利的各种事物。他们抱着厌恶的心情看待这个国家的沉沦。他们中许多人认为这个国家就是魔鬼的老家。让我们看看英国编年史家霍尔是怎样写的吧：

“某些地理学家认为，气候影响到人们的性格。这个意见加强了敏捷灵巧的南欧人在榨取迟钝呆板的北方人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变成一种固执的怨恨。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受到审判，就是由于那个时代的人总想揭露出炎热南方的阴险和狡猾。尽管许多旅行者记述了一般意大利风俗习惯的严肃庄重的一面，但对意大利人的成见已经形成，总认为意大利人即使骗得了北方人的金钱，也不会把它花在正道上，而是浪费在奇装异服和古怪的癖好上。意大利化了的英国人公然嘲弄上帝，身围进口缎带，从裁缝店一直跑到妓院和斗兽场。一个去意大利旅行的人如果学会了穿戴打扮和鞠躬行礼，那他必然会把无神论、淫邪、毒害和鸡奸也捎带回来。”

一五七〇年在伦敦出版的罗杰·阿夏姆的著名的《教师须知》用大量篇幅警告天真无邪的青年们，要抵制难以抵抗的意大利的诱惑。他指出，一个年青的英国绅士如果没有谨慎的导师而贸然前去，就必定陷入“象教廷那样腐化堕落的生活”，“女妖将会缠住他，把他从一个朴素的英国人变成一个道地的意大利人”。托马斯·帕尔默在一六〇六年写的一篇关于到外国旅行的文章里指出，就意大

利来说，根本不到那里去才最安全。意大利人会把最忠诚老实的北方人教坏，使他们学会刺杀、下毒、施诡计和背叛。在约翰·韦伯斯特的两个剧本里，剧中意大利人以四种方法来毒死他们的受害者：把毒药涂在书的纸页上、圣像的嘴唇上、马鞍的前桥上和涂油的头盔上。从那时以来，北欧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意大利叛徒、骗子、皮条客、间谍难以数计。在伊利莎白女王时代的戏剧中、在哥特式小说中、在十九世纪古典浪漫主义文学和后来巴伦·科尔沃的创作中，都有为数众多的懦弱而狡猾的凶手。直到现代的侦探小说和影片中也不少了地中海杀人犯和西西里歹徒。

但是，许多旅行者并没有被这些不祥的告诫吓倒。他们有的想，如不亲见亲历一番，怎么能产生对那些卑鄙荒淫的东西的憎恶呢？有的想，意大利的环境纵然是堕落的，但去一趟总可以丰富自己的教养，锻炼自己的智力。看到里查德·拉塞尔下面这段话，英国青年们就无所顾忌了：“在你头脑里加上意大利的份量吧。那个国家把文明带给全世界，教会全人类认识人的价值。”意大利是难以抗拒的。密尔顿曾苦苦思索，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去那个凡好教徒都应小心回避的国家呢？他们心自问：“难道我是跟农神一样，到拉丁姆去寻找避难所吗？”他作出了一个稍带挑战意义的回答，好象生怕人家不相信：“不，那是因为我很明白，并且一直体会到，意大利并不是如人所说的那种罪恶渊薮，而是文明的基地，是适于各种学问繁荣生长的沃土。”

* * *

到十八世纪，旅行者未见减少。但是他们为这样的旅行找了新的理由——想要陶冶自己；要达到这一目的，意大利之行是不可或缺的；对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进行较长时间的游历乃是完成一个人的教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哲

学旅行。中世纪的神圣的意大利过去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不神圣的意大利，浮夸、腐化和迷信的意大利也过去了。在十八世纪，意大利成了一个进修班，是全世界的精修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人的地位高的象征。例如，约翰逊博士相信，“一个人如没去过意大利就觉得矮人一截，因为他没见着过那些人人想见的东西。”但是这位博士与当时的多数人一样，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去看他爱看的和感觉兴趣的东西，而只去看公众舆论要求他看的东西，他才是道德高尚和值得尊敬的。

一个呆在家里的人决不比旅行归来的人低一等，但他自己总觉得自己低，而且旁人也有这种感觉。为了摆脱这种自卑感，他只有动身上路。人家推荐给他的旅行路线还是跟自古以来去罗马朝圣的路线大体相同。他一路寄回家打着各个名城邮戳的信：他在日记里记满了新奇的体会、不寻常的相识、自然界的灾害。有的人（如波斯维尔）还描述了愿跟他睡觉的标致姑娘。许多人旅行归来便扬眉吐气了，以至于必须刮目相看。意大利已经入了他们的脑筋，他们模仿意大利人的言谈举止，在谈话中不经意地吐出意大利字，哼起歌剧中的唱段，穿着华美的服装，并且总是思慕那个最为宜人的国家。

按旅游指南的路线去走，一件不丢地看遍指南所介绍的东西，可以获得最佳的效果。不同指南的意见总是差不多的。十八世纪已经摒弃了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的作品，认为它们丑陋不堪、一文不值。得到人们喜爱的只是数量有限的较晚近的作品：宫室、雕像、教堂和绘画。十七世纪末的风格被认为具有最高的水平。拉斐尔和圭多·雷尼（“天才的圭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画家。旅行者们不但欣赏艺术，也不放过天然的美。诗人和画家都曾描绘过意大利的风光：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湖泊、受到狂热情绪感染的罗马城郊、那不勒斯的海湾。当时一位英国作家曾

热情地写道：“在所有国家里，意大利是用艺术品装饰得最多的国家，而同时，她又是最不需要艺术装饰的国家。”

除艺术和风景之外，旅行者还十分注意古建筑的遗迹、那些几年前还无人问津的十足的废墟。只有直接接触这些残存的古罗马遗迹、历史的界碑、重大事件发生地，人们才能受到教育，吸取文化和得到自我陶冶。诚然，有些古迹会让旅游者上当，如弗米尼亚的所谓西塞罗别墅遗址、那不勒斯的维吉尔墓、罗马附近卡夏安大道上的尼禄陵，但这些伪迹对那些一心访古的人还是起了作用。许多古迹无疑是真的。旅行者伫立观赏备受赞美的风景，如特拉西梅诺湖滨和卡纳平原（迦太基曾在此打败罗马人）、阿庇安路或索拉克特山（荷拉斯曾描述过它）、盖塔附近的海滨（西塞罗在此被刺死）、加普里（提比略曾在此度过了悲惨的余年）。他们用自己想象出来的鬼魂填满了这些地方，他们在古罗马广场遗址上凯撒被刺的地点脱帽肃立，或在大竞技场为那些被狮子吞食掉的大批基督徒默哀。

旅行者的注意力集中于艺术、风景和古迹，这可能是他们对意大利其他景观不太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他们以漫不经心的超然态度看待意大利的现实生活，研究古埃及的学者们也是用这种态度看待埃及农村里众多的阿拉伯农民的。大街上衣着鲜艳、熙来攘往的人群很少被描写，好象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活人，而只不过是戏班子里精致的木偶而已。司汤达尖刻地形容英国人对现实意大利的无知：“许多英国人不管到哪儿都只限于诵读拉丁诗人留下的记述，在离开时却诅咒意大利的生活方式，其实他们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了解仅仅是从与下等人交往得来的。”多数旅行者只把注意力放在建筑物上。格雷在从罗马写给他母亲的信中，把罗马描绘成了一个无人之境：“我惊叹罗马的宏伟，它超过了我的想象。当一个人走过大街时，不能不赞赏宫殿、教堂、广场和喷泉，它

们是人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妙的东西。”只有忆昔怀古才能给当代的景物增添一些引人入胜的色彩。一个旅行者说：“瞧，那个可怜虫乱弹曼陀琳的地方，也许就是一个圣德的父亲为了不让自己女儿去给皇帝当泄欲的奴婢而杀死她的地点。”

旅游指南也很少介绍现实的意大利，它只针对每一个旅游点提供许多从希腊和拉丁作家原书上抄来的引文。希腊文的引文在脚注里有翻译，拉丁文的没有，因为假定一个绅士是能读五、六十首六韵诗或大块古文的，无须别人帮忙。在英、俄、美和北方各国旅游者的日记和家信里也充满了从旅游指南中抄来的大量引文，有的是原文的。但是，其中也有意大利的见闻在忧郁的旅游者心中激发起来的伟大思想。野无花果和茴香复盖的石块墙垣使他们想到人类文明的脆弱，激励某些人去争取更大的成就。吉本回忆道：“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五日，我坐在卡皮托^①的废墟中沉思，一个赤脚修士正在附近丘庇特神庙唱晚祷歌。这时一个念头第一次在我头脑里出现：应当记叙这个城市的衰落与覆亡。”只有已过世的意大利人才被认为值得注意，死得越久就越有价值。

十八世纪外国人心目中的意大利是一个死语言、死人和哑巴石头的国家，它跟意大利人的意大利毫无共同之处。旅游者当然无法闭眼不看周围欢乐的、世俗的与腐化的现实，但他们不肯正视它。这种现实震惊一些人，诱惑了许多人。他们欣赏它，并曾在此享受过美妙的时光，但是谁也不肯承认自己前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与那些卑鄙的人们一起寻欢作乐。他们来的目的是渴求知识，只有很少时候受到了难以避免的不道德的插曲的干扰。说来有趣，这个虚构的意大利，这个教育博物馆，可能主要只是一个人的发明。正是他极有权威地让来访者闭眼不看周围的现实，而专注于

① 卡皮托（Capitol=Capitoline），罗马城内七山之一，是丘庇特神庙和古罗马市政厅所在地，故成为它们的代名词。在本书这里代表后者。——译者

那些值得看的、能唤起伟大思想的事物。他非常合乎逻辑地是一个古董商，一个清教徒，一个改宗的新教徒。他出生于普鲁士，但终生都在罗马工作，忙于精神建设。他即使对自己也从不肯承认他住在意大利是因为生活有吸引力、道德规范较为松弛、酒类便宜和人们不去注意不合群的学问家的弱点。回顾他的一生是会有启发的，因为对于许多追随他的足迹的移民来说，他是一个典范。

他名叫约翰·乔基姆·温克曼。他在一七三五年来到罗马时，还是个青年。他皈依了天主教，并且在一些友好的高级教士的帮助和鼓励下，热心地研究艺术和宗教。他很快被擢升到修道院院长的地位。他身穿教士的服装，在罗马一点不显眼，但严格说来他又不是个教士。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阿尔巴尼是个极其富有的艺术收藏家，他用无价之宝的杰作装满了罗马最豪华的别墅。他作了温克曼的保护人，因为他实际是个瞎子，必须靠这位年青的普鲁士人替他买画；雕像他自己还能抚摸。直到今天阿尔巴尼别墅完好无损，还是红衣主教和温克曼布置的原样。

温克曼对南方人的淫荡极端反感，这种淫荡到处泛滥，污染了一切事物。温克曼宁愿赞美罗马雕像冷若冰霜的纯洁，欣赏古典建筑调和然而平淡的线条。为了试验自己对人间乐趣的诱惑的抵抗力，他曾经和他的朋友和同胞拉斐尔·门斯的模特儿，一位俊美的意大利妇人玛格丽塔·瓜琪一起在床上躺了几小时。在罗马的炎夏里，这位修道院长和这位女士赤着身，裸着体，讨论着关于文化的高尚话题。这个值得称道的实验其实并不象听起来那么困难。温克曼不欣赏女人身体起伏不平的、不和谐的美，而宁可欣赏少年男童平滑的美，这种美最接近于温克曼所钟爱的希腊雕像的那种典型的美。他的这种嗜好很少给他的生活带来麻烦，因为它一般不惹人注意。然而他与一个迷人的阉人，歌剧院有名的女高音歌手的温情脉脉的友谊曾一度引起了丑闻。梵蒂冈（他当

时正在那里当图书管理员)提出了责难,他的恩主们也起了嫉妒心。他无奈只好断绝了这桩私情。

这个普鲁士籍的修道院院长是鉴赏、测量、研究、抚爱、分类编目如此众多的从希腊到罗马时代的雕像的第一人。这些雕像实际上就是能在意大利找到的全部雕像,也几乎就是当时世上所有的全部雕像。他也是第一批南行直到派斯图姆的旅行者。他寻访了希腊庙宇的遗迹,独自在荒凉的沙滩上面对大海,陪伴他的只有野玫瑰和成群的水牛。一般人因为害怕沼泽地区的热病,太阳下山以后是不敢在这种地方停留的。他常去庞贝城,当时该城才发现不几年,基本上还埋在火山灰下面。他还常去另一座黑暗的地下城赫库兰尼姆。只有从圆柱门廊下的隧道爬进去,借助火炬的光亮才能看到地下城的面貌。

他关于艺术和美学的理论最终概括在他的《古代艺术史》一书中,这部书标志着对以往思维方式的一个革命性变革,标志着一个新学科——艺术史的诞生。要么是他的热情和学究式的钻研精神改变了同时代人的欣赏口味,要么是上帝随着他的降生也及时地把他的独特偏好和新颖思想带到了人间,从他开创了“新古典主义”的风格。他认为希腊雕塑已经尽善尽美,无可超越。希腊雕塑家已观察并再造了在最美妙的状态下的最理想的人体。普拉克西泰雷斯观察了他那众多的美丽绝伦的侍妾;菲迪亚斯每天都去体育场,研究裸体运动员们的运动姿态。奇怪的是温克曼也和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认为在绘画艺术中唯有拉斐尔才达到了希腊雕塑的完美境界。在所有后来的画家中,只有一个德国人能与这位意大利大师相比,这就是他的朋友门斯。(门斯实际并不很高明,他只是个勤勉认真的杂烩家。正如他自己声称的那样,他“混合了拉斐尔的表现力,提香的色彩,柯勒乔的光与影的绝妙和谐”。温克曼把他比作一只蜜蜂,说他“从不同的花朵采蜜,酿出蜜来格外甜”。)

在这位普鲁士人看来，完美性就是高贵而和谐的人体形式，在它匀称的形式面前，姓甚名谁几乎无关紧要，也不受个人品格的影响，它冷漠无情，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在罗马街上常可见到有的人体比无感情的希腊雕像或拉斐尔的死板的圣母像更美，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妨碍温克曼。他认为，活人的美是外表的，这种美的表现方式是错误和无意义的，因此根本就不是美，只不过是合人意，使人愉快而已，是漂亮。如果他活得再长久些，真不知他的革命要朝希腊的艺术和爱情规范推进多远。他死得较早，只有五十一岁，是做了他的癖好的牺牲品。当时他正从维也纳归³⁵来，住在特里亚斯特一家破旧的旅馆里。在维也纳他获得巨大的光荣，得到他的朋友和保护人，以至玛丽亚·特里萨女皇、帝国首相康尼茨亲王的赞赏。杀害他的是一个十八岁的洗碗工。温克曼把这工人请到房里，给他看一些式样稀有的古代勋章。温克曼死后这洗碗工被人发现口袋里装着这些勋章在野地里走，于是审判了他，并把他绞死了。

温克曼在观赏艺术领域里所做过的工作，另一个人在文学领域里也做了，他就是温克曼和门斯的好朋友，约翰·沃尔夫冈·歌德。这位诗人终生都在爱恋美丽的姑娘。当他七十三岁时他曾向他的朋友米勒首相抱怨说：“我感到不愉快，可能因为我现在没有爱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人在爱我。”在他旅居意大利的时候曾为追求裙钗尽了全力。他一七八六年到罗马时是三十七岁。温克曼的书是他游览古代罗马的向导，这本书教他去眺望巴罗克式和当代的建筑，给他指点主要的私人和公家的雕像搜集，激起他对古代典范的强烈热爱。

温克曼的所有教导加强了歌德的尚在朦胧中的观念，歌德来意大利就是为了要使这些观念完善起来。他多年来对这次旅行早已心驰神往。他把这次旅行设想为与过去的决裂，是他跟“狂飙与

突进运动”的北欧浪漫主义决裂的象征。他一到罗马，就把温克曼的不动感情的奥林匹克美学推广到文学、诗歌、哲学、道德规范的领域里。与这个难于驾驭的国家的接触使他认为，艺术和生活里的每件事都是控制的结果，都是人们控制事件、暴行、感情奔泻和混乱状态的表现。他写道：“罗马以外的人无法理解，一个人在这里受到什么样的训练。他必须再生，或者说学会象回顾自己的孩提时代那样反思自己原来的思想。他发现任何事物都应有一定的法则和形式，这些法则和形式支配着自然界。Gesetzlichkeit（法则的本质）就是最高的控制。对一切无秩序的形式，不论它是上帝的创造还是米开朗琪罗或莎士比亚的作品，都同样应该感到遗憾并尽力避免。

- 36 歌德和后来的许多外国人在意大利到处寻求菲迪亚斯式的和谐、冷漠、拘束和凝滞，寻求北欧人所偏爱的合法性，蔑视无拘束的热情和不加检点地表露人类的天性和弱点的行为。但是就在这同一个意大利，本地人所遵循的却恰恰是相反的原则，他们听任自己受热情支配，无拘无束地表露自己的天性，追求生活的欢乐，不理睬无味的义务和愚蠢的法律，放纵人类的各种弱点。到底哪个才是意大利呢？歌德想必自己也心存怀疑。他初到意大利时曾住在威尼斯附近的托博勒的一家小店里，有一天他问老板浴室在哪儿。老板含糊地指了指院子。德国诗人追问，刚好就在院里吗？老板的回答是“*Ma da per tutto, dove vuole*”。（“你想上哪儿就上哪儿。”）这可不是什么Gesetzlichkeit（法则），也很难说成是对无秩序的自然控制。

我们现在猜想，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旅行者们不知不觉地开始欣赏在意大利活人中间得到的快乐，这胜过了他们在意大利死人中间对古代历史的追求。很少有外国人肯承认这一点。他们置身于意大利人中间，观察他们喧闹的生活，接受他们松弛

的道德规范和放纵的风俗习惯，从中得到特别的快乐，但极少有人试图去分析这种快乐的实质。他们所体会到的解放感首先是一种独特的肉体感觉。在他们刚踏过边界的那一刹那，就感到一种无声的激情和感觉的骚动，但是没有敢去探讨它的原因。

司汤达把这主要归因于气候。他说：“可以肯定，气候这个因素对外来者产生了神经质的和难以名状的影响。一八〇六年，马博特指挥的军团穿过德国，到达威尼斯的弗留利。这时，这一万五千名法国人好象焕发出了新精神。平时最粗鲁的人物也好象变温柔了，人人高兴，个个心里冬去春来。”不过要说一下，威尼斯省最北的弗留利的气候与马博特的法国兵刚刚离开的南德省份并无多大差别。³⁷

雪莱也多少同意用气候来作解释。他在越过阿尔卑斯山几天后写道：“我们一到意大利，秀丽的土地和明朗的天空就使我们的情感起了强烈的变化。”他后来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序言里又重申了这个最初印象：“在万物昭苏的春天，罗马的气候好极了，蓝天明净，新生活使我的精神陶醉，本剧的灵感就是由此产生的。”很自然的，来自阴冷的北方的客人可能对这里的阳光和（如歌德所说）“明于白昼的月色”产生较深的印象，他们很容易认为，这种气候和光明使他们的精神得到许多陶醉的享受。亨利希·海涅在意大利曾说：“在我们德国，夏天有绿色，冬天是没有的。在冬天，太阳就象穿着一件法兰绒外套……在这黄法兰绒外套般的光照下，水果不能成熟……肯定地说，熟果子只有我们家里的烤苹果。”俄国诗人们的想法略有不同，马依科夫热情地写道：“在炽烈的阳光下，在哗哗的雨声中，你的心醉了。你对我说：‘在这儿我们可以死了，我们两个一块死’。”果戈理写道：“到过意大利就不想别处，上了天堂就不想尘世。拿欧洲跟意大利相比就象拿阴天来比晴天。”“我就生在这儿”，他对他的朋友，诗人茹科夫斯基宣称，“俄罗斯、圣彼得堡、雪、肮脏的人民……全是一个糟糕的梦。”

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当然喜爱意大利的温暖气候，他们为此写了一些最好的诗和无数二流的诗。奇怪的是来自温暖国度（如法国）的人，他们显然并不缺乏阳光，可是也对意大利印象深刻。沙多布里昂在给他的朋友德封坦的一封信中说：“你不是确信无疑地赞赏克劳德·罗兰的画里的光线比自然界里的光线更理想，更美丽吗？要知道，那是罗马的光线！”缪塞写道：38 “迷人的天空是那样纯净，在这里就是一声叹息也比别处更容易传到上帝耳中。”

不管这种感觉是什么引起的，是太阳、气候、天空还是光线，它都是强烈的，压倒一切的，常常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状态。马考莱描述自己难以置信的心情说：“我不知道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还能找到这样一种我未曾体验过的，如此称心如意的强烈激情。”亨利·亚当斯回忆说：“意大利几乎就是一片激情，这激情自然集中在罗马。一八七〇年以前的罗马有不可抵抗的魅力。一八六〇年五月份，正是绝妙时光……人们下意识地感到似乎每一片树荫都在呼吸和发光，充满了柔和的形态。”“罗马是何等美丽、奇妙、富有魔力啊。”易卜生在一八六六年写道：“我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工作能力和能打败巨人的力量。我曾为我的诗《火炬》整整奋斗了一年，但是还不成形。后来有一天我散步到圣彼得教堂，在那里我忽然看出一个非常清楚的轮廓，那就是我的作品必须采取的形式。”亨利·詹姆士于一八六九年到达罗马的第一天，在日记里写道：“我终于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生活。”

在这种感情之下，人们觉得意大利跟上帝所创造的其它地方不一样，它是上帝特别高兴时创造的杰作。他以精确的方法塑造了每座山岳、每个湖泊、每棵树木和每一段海岸，以求达到诗情画意的特殊效果。法朗士怀疑是否存在另一个擅长艺术的上帝。他在《红百合花》(Le Lys Rouge)中写道：“看，亲爱的，这是一幅多么

奇妙的图景啊！（这里指的是从菲耶索莱山上看到的佛罗伦萨）世上再没有如此精致优美的景色了。创造佛罗伦萨周围诸山的上帝是一位艺术大师。那座紫色的圣米尼阿托山怎么会设计得如此纯正和严整，难道它会是出于勃朗峰的作者之手？”

许多旅行者都受到一种蒲鲁斯特式的诱惑，都喜欢把各种事物与艺术想象的虚构之物作比拟。他们总是把每处风景比作某幅相应的油画，把每个真人比作能塑造这种人物的作家，把心中的每一种情感比作最适于表现它的诗篇。这倒不仅是一种文人的积习。面对意大利的风光，许多人感受到了通常只有伟大的艺术作品才能表现出来的那种高涨的激情。意大利似乎不仅是艺术的家园，而且她本身就是艺术品，拜伦写道：“汝乃世界之花园。”“花园”的含义就是经过艺术家设计布置，精心安排，完全为了给人的愉快和娱乐的地方。

“在欧洲只有一个国家”，俄国的革命富翁亚历山大·赫尔岑这样说过，“她使人心情宁静，她使人不是由于厌恶和幻灭，而是由于高兴而流泪。这个国家就是意大利。”这番话显然更适合于描写人们对于伟大的音乐、悲剧，不朽的诗篇的印象，而不是对一个国家的印象。这种“心情宁静”和“高兴得流泪”无疑是亚里斯多德所谓“艺术对感情的净化力”起作用的象征。许多人情不自禁地认为，把日常生活的场景转化为艺术的杰作在意大利要容易得多。意大利的自然景色与艺术作品之间的距离较小，容易沟通，胜过旅行者较为熟悉但风景较为逊色的世界其它地方。华兹华斯后悔没有及早发现这个现成可资利用的诗的源泉。他懊悔地说：“无数的形象丰富了我的头脑，若在过去我本来可以把它们写成诗篇，用感情给它们注入生命。若它们早些在生活中涌现，我便会完成崇高的目标，可是现在不大可能了。”

艺术与自然浑为一体的感觉使拜伦十分烦恼，因为他一意识到

这点就很难成诗。他的老朋友托马斯·穆尔曾讲过一个他们在威尼斯久别重逢时发生的生动故事：“我们站在阳台上，想在白昼的余辉消失之前观赏一下主运河的风光。我正好仰望着西方天空仍然明亮的云彩，说：‘意大利的日落景象中我觉得最动人的就是那独特的玫瑰花般的紫色’。——这‘玫瑰花’三个字我还没能说出来，
40 拜伦就捂住了我的嘴，大笑说：‘嘿，该死的汤姆，别这么有诗意。’”

这种销魂的愉快感并不完美，它们常伴随着另外一些使人烦恼与惊恐的感觉。人们常幸灾乐祸地觉得意大利人的可怜与可鄙，情不自禁地认为他们只配受腐败、愚蠢、贪得无厌的暴君的压迫。他们缺乏其他国家那种使人灵魂高尚的美德，他们缺乏卫生习惯，衣服、房子、街道都是脏的。他们喧闹得难以置信。他们好骗人，好挥霍。他们的不幸好象是缺乏道德的必然结果，而不幸的处境又使他们更缺乏道德。这个恶性循环很难打破。对意大利比对爱人还更热爱的拉斯金在一八四五年给他父亲的信里却说：“总的来说，我极讨厌意大利人……他们是带着蛆虫的约里克头骨，没有任何人的特性，只有些汗臭罢了。”他在《佛罗伦萨之晨》一书中抱怨说：“在街道上……你听到的从来都是怒气冲冲的言辞，有的即将上火，有的一瞬间就气冲斗牛，男男女女甚至小孩子，全都大嚷大叫，发表着仓卒愚蠢、不值一提的意见和想法。不论为了多么微不足道的原因，他们都会瞪起眼睛，哑着嗓子，大说一顿废话。他们愚蠢地希望用大喊大叫来说服他人和上帝，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看看大街上那些讲话的人吧，他们基本上不能正常说话，而是以手代唇，指天画日，挥手扭身，摇晃手指，揪住对方……他们这样做毫无说服力和效果，不过象在风中乱晃一棵树罢了。”

曾在佛罗伦萨居住多年的兰道完全不愿跟当地人打交道，他坚决地说：“我从不拜访他们，也不在家里接待他们。我从不去

赌场、咖啡馆、剧院、宫殿和教堂。”他对本地人如此反感，以致他竟曾经对在他花园里干活的工人拳打脚踢，有一次还把到他屋 41 里来送帽子的房东撵了出去。劳伦斯表示极其讨厌意大利“市民”——资产阶级。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写信给艾斯奎斯女士说：“我到了粗俗的米兰，那里有密如刺猬的教堂和可恨的意大利市民，还有他们的短袜、蓝围巾和盖耳帽。”几天后他又写道：“我讨厌透了意大利人，他们从来不争辩，只是鹦鹉学舌，耸肩歪头拍手。一个正派人拿他们怎么办呢？”

许多人扪心自问：意大利真是那么美丽和令人愉快吗？那是不是由于感官受欺骗而造成的海市蜃楼呢？他们是作了情感魔镜所玩弄的恶作剧的牺牲品吧？霍桑对北方道学先生的这种迷惑不安曾作了精彩的描述：

“我们一旦认识了罗马，而要告别她时，她给我们留下些什么印象呢？她象一具陈尸，虽然还可以看出当年的好模样，但是尘封埃积、霉菌滋生，已今非昔比了。她那狭窄弯曲、错综复杂的街道使我们深感厌烦。路面上铺的是小块的熔岩，走起来很难受，但是却有赎罪的妙用。说它是街道，不如说更象陋巷，从来不见阳光，冷风把它有害的气息吹进我们的肺部。我们看腻了那些刷成黄色的陈旧的七层大房子（或者把它们叫做宫殿），在那里，意大利生活中一切沉闷的东西好象都加强了，放大了。大房子的底层用来开了菜馆、鞋摊，养马和住了骑兵，中层住着亲王、红衣主教和大使们，在楼顶蓝天之下住着些艺术家。攀登这些楼梯使我们疲惫不堪。白天，我们在暗淡与冒烟的火炉旁发抖，夜里睡在罗马人的床上，用自己的身体来招待床上贪婪的小居民。我们从心里厌恶意大利人的阴谋诡计，它使得延续至今的人类道德中任何值得信赖的东西都荡然无存。使我们厌恶的还有酸面包、酸葡萄酒，变质的奶油，蹩脚的烹调，更不用夸那些臭肉了。到处都是神圣的伪饰和 42

污浊的实质同时并存。有生命力的东西早已被消耗殆尽或被一次又一次的屠杀所摧残，整个国家处在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之中。回首过去，灾难重重，满目凄凉，展望未来也没有希望，这个国家已经从精神上垮了。总而言之，我们对这个国家毫无好感，她由于自己过去的罪孽已遭到无穷的诅咒，现在我们又把我们的诅咒也加进去。但是，当我们离开罗马以后不久，我们就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心情起了变化，我们的心弦被‘永恒城’神奇地拴住了，它拉着我们再去，好象那里比我们的诞生之地还更熟悉、更亲密。”

许多人发现，意大利具有软化外国人对她的引诱的抵抗的魔力，他们（如霍桑）还吃惊地发现，这个软化过程并没有使他們不愉快和后悔，相反却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顺从接受、心安理得的心情。例如李顿说：“意大利的风土以它柔和的魅力降服了我们，使我们不知不觉、莫名其妙地就范，与它和谐一致了……来访的每一个人就象脱离了尘世，把一切人间的烦恼都丢在脑后，跨过象牙之门，进入了梦幻的国度。”艺术，这是诚心正意的来访者的高尚追求，是来此朝圣的主要目的，但人们不禁要怀疑，是否它有时不过是寻求轻松放荡的生活的借口呢？霍桑对此就很怀疑，他在《凡^①的大理石像》一书中说：“每个年青雕刻家好象都认为他应该给世界上增添几个不雅的妇女形象，把她们称作夏娃、维纳斯、尼姆弗^②或其他什么名字，其实这不过是为她们缺少合乎礼仪的衣服打掩护罢了。看到这样的东西，我不但感觉羞耻，而且感到厌倦。现在的人实际上是一生下来就穿着衣服，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赤裸的人体。只要艺术家们经不住诱惑而偷偷地向雇来的模特儿投去不洁的眼光，他们便不可能以纯洁的心灵去塑造裸体的形象。在这种环境气氛下，大理石也难免失去了它的高雅。”

① 凡（Faun），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农牧之神。——译者

② 尼姆弗（Nymph），希腊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译者

意大利的魅力究竟有多么迷人呢？要准确地测量它有时好象是可能的——正如科学家通过观察插在水中的小棍显现的弯折角度来测定光在水中的折射率一样，我们要估量意大利的魅力，只要把一个欣喜若狂的旅行者的个人体会去跟对同一事件的较为严肃的客观描述相比较就行了。让我们拿拜伦在初访威尼斯时所写的家信作为一个例证吧。他笔下的女人是何等美妙啊，全都年青，全都爱他，全都美得难以置信，有的是出身寒微的姑娘，有的是骄傲的女伯爵。她们你来我往，都来拜访他在莫切尼戈宫的著名套间或在佐贝尼戈的单身住所，有时为博得他的注意而争吵起来。

他在给伦敦友人的信中说：

“我已陷入了情网，深不可测的情网。我的女神虽然只不过是一个威尼斯商人的妻子，但她美得象一只羚羊。她只有二十二岁，有东方式的黑色大眼睛，意大利人的面容，光滑的深色头发……她嗓音象琵琶，歌声象天使（虽然没有那么庄重），此外还有难以尽述的风度、品德、才艺……但他最大的优点是能看出我的长处，还有什么能比知心更亲切呢。”“一个威尼斯姑娘，眼睛又大又黑，脸庞象福斯蒂娜^①，体型象朱诺^②，身高和劲头象派瑟奈

① 福斯蒂娜 (Annia Galeria Faustina)，罗马帝国皇后，生于105年，卒于141年，以荒淫放荡而臭名昭著。——译者

② 朱诺 (Juno)，罗马神话中的天后。——译者

斯^①。她的眼里闪着光彩，深色头发在月光下飘洒——她是一个可以比作任何美妙东西的女人……我敢肯定，要是我交一把匕首在她手里，我叫她扎在哪里，她就会扎在那里；如果我冒犯了她，她也会把它扎进我的心窝。”

再让我们看看雪莱对拜伦在威尼斯这段爱情生活的清醒描述吧：

44 “其实，拜伦所结交的第一批意大利女人可能是天下最糟糕的。她们无知、讨厌、固执，一身强烈的咖喱味，使一般英国人很难靠近。真的，拜伦结识了一批最下等的女人；这种女人连他的船夫也能在街上捡到。她们几乎是直说直道那些难以出口的、在英国甚至难以设想的事情。拜伦说他也不同意，但是他忍耐了。”

请看这魔力如何？是什么蒙蔽了拜伦的判断力？这种魔力曾使严肃尽职的中产阶级的海军英雄纳尔逊忘记了贤德的妻子，忘记了军人的名誉，忘记了作为女王陛下派驻那不勒斯宫廷的外交使节的尊荣，爱上了不足称道然而却迷人的汉密尔顿夫人。这种魔力使心灰意懒的中年人又感到生命的活力，虽然不能重返青春，但至少获得了取悦他人的勇气，憧憬着能用假牙重新品尝生命之果。这种魔力使一些有罪之人祈祷忏悔，使绝望的人希望复萌，使低微的人自觉重要，使失掉生活目标的人明白，在生活中最聪明最实际的态度就是别抱期必实现的人生目标。这种迷人的魔力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在如今的世界里，它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力量，是影响千万人生活的力量之一。在今天很容易看出，吸引人们前来的最主要动机是寻求意大利生活的独特品质，寻求那种提神壮气的感觉，而不是别的。因为现在千百万人还在涌来，吸引他们的仍是过去那些原因，这些原因彼此矛盾，互相

① 派瑟奈斯（Pythoress），阿波罗神的女预言者。——译者

排斥和抵销。

许多人当然仍是为了追求宗教的神圣和神祇保佑而来。他们并不全是天主教徒，其中有新教徒、犹太教徒、佛教徒和穆斯林，甚至还有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但他们都来参见教皇。数以千计的非天主教徒获得了受教皇私人接见、接受教皇祝福的机会。他们公开并不相信这些，但却非常喜欢这么做。他们为自己的朋友购买念珠和圣章。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忘记宗教理论的争执，而羡慕起天主教芸芸众生的那种毫无疑问的、心平气和的信仰。许多非天主教徒承认，访问罗马和在很近的距离上瞻仰圣父使他们得到了精神上的升华，他们的这种感觉往往比真正的天主教徒还更强烈，因为后者对这些天主教的仪式很熟悉，结果就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了。教皇又成了伟大的精神领袖、象征性的伟人、一切以善伐恶的力量的道义上的首脑。

天主教徒当然不仅是来看教皇，他们要参拜那些传统的礼拜堂、大教堂、圣所和神龛，当然也想玩个痛快。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成群结队地去阿西西，那里还保存着对圣弗朗西斯的诗歌的甜蜜回忆和焦托描绘自己生活的壁画。在洛雷托，天使们从小亚细亚凌空搬来的圣母的茅屋还依稀可辨。在意大利靴尖上的加尔加诺山上有一个圣米歇尔圣所，也是常有香客去的地方。它建在一个深洞里。据说十一世纪时有一群诺曼骑士从圣地回来，就在这里见到了天使显灵。意大利的各百货公司都出售一种成批生产的、价廉而难看的新式圣母胸像，在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听说几年前卖的这种像会流出丰盈的眼泪，而且据市政当局化验，这种眼泪里含有真人眼泪的全部成份。

在离圣米歇尔的山洞不远的阿普利亚有一个圣乔万尼·洛屯多村，这里近来特别热闹。在旅游季节，每天都有直达车从罗马开到这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小村庄。象许多世纪前一样，人们是去

礼拜一位活圣人，他就是皮奥神父，一个蓄须的托钵僧。他过着简朴圣洁的生活。从一九一八年以来，他在脚、手和两肋上都烙了圣印。他总是戴一副连指手套，小心翼翼地掩盖着手上的圣印。当然，要作为一个圣者，圣印只是圣者身份的起码标志，并不是
46 最可信、最有价值的标志。因为听说就连新教徒甚至异教徒也有打圣印的。教会不承认圣印的合法性，皮奥神父并不是因为有圣印就被认为圣者的。较为可信的标志是拔地升空、无所不在、超凡的禁欲生活和创造奇迹。

皮奥神父可能从未表演过飞翔，可是他无所不在的能力和神奇的医术十分著名。他从不离开单人修道室，可是却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出现。许多彼此相距很远的目击者证实了这点，神父还跟他们谈话呢。有一次一位著名的主教甚至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看见他，他正跪在那儿全神贯注地祈祷。如果求助于他，他就在病人和垂死的人的卧室里、在医院病房里、在监狱囚室里显形。如果去不了(他显灵的本领当然并不是无限的)，他常常送去一种奇妙的香味，异香满室，使人想起木本紫罗兰的气味，在场的人不管信不信都能闻到。这就是从中世纪早期以来，被许多名人描述过的“圣香”。许多绝望的人向他求助，结果治好了致命的不治之症(这有很多医生的证明书可以证实)，摆脱了烦恼和痛苦。

如今洛屯多小镇已经成了一个热闹的活动中心，其中有些活动有利用他的名声营利的嫌疑。教会对这些活动大部分都未置可否，只是警告信徒们小心上当，并且定期派观察员去了解情况。这里有一家外国人资助的大医院，还有客栈、旅店、饭馆和出售各种纪念物品的商店。一些十分可疑的中间人答应为任何人安排与皮奥神父见面；如果再多给点钱他们甚至还允诺给你显示奇迹。

皮奥神父本人对此似乎浑然不觉，而且从不介入。他每天照例很早起来作弥撒，在他面前总有一大群人，其中有当日往返的旅行者，也有追求圣洁的香客，还有希望摆脱痛苦的病人。有不少虔诚的信徒甚至抛弃了一切，到这里来和他一起过贫穷的生活。他的弥撒要作一个多小时，字字清亮，句句虔诚，常常达于忘我⁴⁷的境地。弥撒作完之后，他就跟几个约好的人谈几句话。他的谈话幽默而机智，完全不象一个苦修的神奇的圣者，倒象一个农民出身的善良的乡村牧师。实际上他正是这样的人。

他的信徒中有一个前美国轰炸机驾驶员。在上次大战中的一天，他到巴尔干执行任务回来，准备在到福贾着陆之前把用剩下的炸弹丢掉。当时他正在洛屯多村上空，已经准备开舱投弹了。忽然，云层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也好象就是云本身，是一个留胡子的僧侣的身影。他双手高举，坚定地命令他不许投弹。飞行员完全被镇住了，他只有服从。若干年之后，他已经把那段冒险经历差不多忘了，只是偶尔在饭后闲谈时还提到它。有一天，他在一本旧杂志里看到了皮奥神父的事迹，他猛然领悟了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和自己的遭遇的意义。他来到阿普利亚，跟圣僧谈了话，并皈依了天主。

* * *

可能有许多人来访的动机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意大利是西方世界仅剩的一块乐土，在这里潘神^①还未死亡，异教风味的生活还在继续，古希腊和罗马的欢乐的传统和风俗还没有被基督教扫尽，文艺复兴余韵犹存。他们指出，古老的风俗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宗教外衣。被各村庄尊为保护者的圣者，其实不过是当地土神的化身，他们的称号往往透露了这一点。例如，在西西里岛的埃

^① 潘神(Pan)，希腊神话中的畜牧神，体现顺乎自然的精神。——译者

特纳山腰，人们崇拜一个称为“圣韦内里纳”的圣者，他除了别的本事以外，就是能使不生育的妇女怀孕，这很象古时的维纳斯，意大利人称为韦内雷的神。那不勒斯有一个被尊称为亚努留斯主教的圣者，他的干涸了的血每年两次变成液体。在维苏威火山猛烈喷发时，他的遗骨曾多次在城门口挡住了熔岩流。他与古罗马城的守护神，保卫每一个大门和门口的亚努斯之间没有关系吗？据说教会对这一切都是有所了解、有疑虑的，但教会聪明地听其自然，因为它与基本的教义无碍。取缔一个圣者和造就一个圣者几乎同样费事。近来只取缔了两个圣者，这是在教士们进行了多年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之后才决定的。其中之一是显赫的老圣乔治，受他保护的地方包括热那亚共和国和英格兰王国，每个高贵的君主的宫里都有他的像。另一个是圣费罗米纳，他的产生是由于十九世纪早期一个博学者的错误——读错了古碑文。

外国人到罗马来，到韦内托大街、夜总会、阿皮亚大街的别墅、电影制片厂、马古塔大街的艺术家工作室，去品尝甜蜜生活的滋味。有些人到荒凉的海滩以及偏僻的山洞和树林去扮演凡和尼姆弗的角色；他们在那里可以光着身子洗澡，喝葡萄酒，用手抓吃简单的食物，与农民和渔夫作伴，过一种接近自然的生活，以与人类异想天开、随心所欲的本性协调一致。对这些人来说，意大利就是地上天堂，这里不知什么叫罪孽，人人都是上帝的宠儿，所有的爱情都是纯洁的。这里是风流韵事的绝好场所，不管是合法的不合法的，自然的、半自然的还是不自然的，甚至是稀奇古怪的蜜月、合欢、私通和私奔。

来意大利的有希图唤回青春活力的半老徐娘，也有渴望得到穷苦的年青姑娘的爱情的成年男子。来的还有结成同性伴侣的中年男女，他（她）们找一个地方就过起市民的生活来：一个上街买物，一个在家煮饭；一个洗衣浆裳，一个修鞋补袜，两人一起

把银器擦得锃亮。有时有的单身男人在街上转来转去，他们发现在意大利引诱一个身无分文的村童、水手、烧火工比别的地方容易些、保险些。

另外一些人则追求那些保留着自然情趣的东西，因为这些质朴的情趣已被工业文明的俗物排挤殆尽了。他们喜欢粗酒、几里外就无人知晓的土产奶酪、还带着阳光温暖的新摘水果。他们喜欢用锈刀把还滴着盐水的海胆一剖两半，加上几滴柠檬汁吃下去。他们喜欢家制面包，喜欢散发出健康汗香的、热情粗壮的农村姑娘。他们最喜欢意大利人那种质朴真诚的感情，意大利人从不以此为羞，从不遮遮掩掩。意大利人有吸引人的、戏剧性的品质，他们直来直去，使惯于自我克制的、惯于故作冷漠和真正冷漠的北方人为之耳目一新。如司汤达所说，他们寻求“把爱情、肉欲和真诚结合起来”，这话至今仍刻划出这个民族的特点。“一个人在这里可以做一个自然质朴的人，这在巴黎是万难办到的”，还可以再扩展一点，在北半球任何地方都是万难办到的。他们赞同司汤达所说的“音乐”连同其他艺术的享受“只存在于意大利”。“在这个美丽的国家，人们只应该去爱，其他的灵魂之乐都要束之高阁。这里的爱情滋味无穷，任何其它地方的爱情与之相比都只不过是一种低劣的翻版”。

* * *

今天的意大利又一次成了艺术的教师。意大利人不但保持着而且新创了众多的工艺和技术，它们在今天仍然是稀世之珍。外国人向意大利人学习雕琢大理石、驯马、汽车大奖赛；还学习拍摄不加遮掩的影片，其主角多是性欲冲动的、被剥夺了继承权而住在贫民窟里的人；还学习为汽车设计优美的外形，设计衬衫、外衣、鞋和各种新式小玩艺，以及按混凝土结构大师内尔维的华丽建筑风格设计新式建筑。从世界各地严格挑选来的年轻钢琴家

50 他们在都灵附近的一个城堡随奥妙莫测的艺术大师米开朗杰利学习。在冬天，年轻的歌手、作曲家、导演、指挥勤奋地学习罗马的歌剧。到年底，当梅诺蒂不使用斯波莱托的大剧院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进行毕业演出。许多学艺术的学生在古老而著名的学院里生活和工作，许多国家为了培养学生都出资在这里办学院。有些是西方出资的，如亚尼库拉山的美国学院，蒙蒂的法兰西梅迪奇别墅，在罗马各处还有比利时、西德、西班牙和丹麦的学院。令人吃惊的是还有由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和中间国家——如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埃及——资助的学院。

这些学生中有些人做事比意大利人认真，学成之后就青出于蓝。几乎年年在罗马的赛马中都有采用意大利骑术的外国骑手击败本地的冠军。在蒙扎的车赛中也常见外国选手驾驶着他们的费拉里斯牌或马塞拉蒂牌汽车战胜了本地的对手。对许多移民来说，意大利人象过去一样，常常很幼稚。电视和配乐喜剧的舞蹈设计被高薪的年青美国人垄断了。在许多歌剧院和剧场里，都由俄国流亡者担任舞蹈设计和布景设计。美国的电影导演为意大利制片厂家炮制许多大型历史题材的、粗制滥造的彩色影片。一些美国大学在这里设了分校，他们以传教士的热情向意大利人传授商业管理和市政管理的知识。美国公会会友到农村各地去教文盲们读书写字。苏联的理论家和组织工作者有时也把手伸到这里的共产党组织里来。德国的技术人员、工程师、化学家和美国的经理们与意大利厂家洽谈业务。英美的广告公司在米兰和罗马都设有办事处。瑞士的书画刻印专家，匈牙利和西班牙的足球教练在许多地方任职。象旧日的约翰·霍克伍德爵士一样，这些外国人都发现在这里过得十分如意，他们的意大利学生纵然有时也显得
51 很顽强，但赶上来可不容易。

外国人来意大利的动机是各不相同的。把讲究派头的人和不讲究派头的人对照一下，就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和过去几个世纪一样，讲究派头的人来这里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天堂。意大利是暴发户和声名狼藉的不可靠分子的幸福猎场。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重建很久以前王家才有的那种显赫生活。在他们本乡他们是花不起这样多钱来维持这种生活的，而且过这种生活也显得狂妄到了荒谬的程度。名称古雅的邸宅，带有家具，说租就可以租到，因为主顾不多。在几小时内就可以买到或租到号衣。按天或按年雇用的仆人，充满邸宅上下，包括著名的管家和优秀的厨子。如果急需，那么有专门的公司会马上把这一切预备好。只要有点耐心，就可以请到鼎鼎大名的客人，并没有特殊的困难，他们的名字可以回溯到十字军东征或者跟著名的教皇拉上关系。这些人有如十九世纪小说中的人物，穿着华丽，态度高雅，而且仍是什事也不做。他们钱虽少口味却很高，最喜欢受人宴请。有时候这类大型活动的邀请还会向全欧美广播，大老远从伦敦、芝加哥或好莱坞赶来的女记者和饶舌的专栏作家聚集到这里来，用热情奔放的言辞大写特写这些宴会和舞会。这类活动一般总是把意大利人冷落在一边，即使在地方报刊上也很少提到他们。

不讲究派头的人来这里欣赏意大利人待人接物的平易态度，这种态度完全不因对方身份高低而有什么差别。只有少数意大利人才为争取别人承认自己的社会地位去操心费力。这些喜欢摆阔气、向公众炫耀自己的财产、称号和社会地位的意大利人，多半与外国有联系或有血缘关系。他们模仿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国外受过教育，或者是由本世纪初从英国来的保姆带大的。德施达尔夫人很久以前就发现，意大利人一般不为衔头和仪表所动。作为一个富有的、妻随夫贵的有名的人，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气愤，她抱怨说：“社会地位的差别在意大利毫无作用……民众不为贵族 52

的偏爱所感染，社会也容忍一切而不去褒美讥评……这里没有沙龙，也没有一点要争个光彩体面的想法。”司汤达也指出：“一个最高贵的侯爵夫人可以跟出身低微的图画教师交朋友……在人们的感情里并不是没有虚荣心，不过它远不占统治地位……一个收入一千五百法郎的人跟收入六百万法郎的人讲话照样不客气，就好象他们是平起平坐的一样，这在英国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

老摩根死在罗马的格朗德大饭店。这里他生前每年至少来一次。他总是上小饭馆去吃饭，在那里谁也不知道这个长着洋葱鼻子的美国胖先生是谁。他喜欢夜里在街上逛，边走边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聊个没完。这是他在纽约和伦敦都做不到的。他的这位朋友是意大利的穷记者萨尔瓦托尔·科泰西；他们在一起谈论人生的意义、爱、死和上帝。在被修建成豪华的游览胜地之前，加普里和陶米纳充满了道德上和社会上的平等精神，那是在任何其它地方享受不到的。俄国的革命家、来自德国和美国的百万富翁，英国的贵族，身无分文的画家、诗人或外来的流浪汉、当地的二流子、农民、水手和渔夫全都同样穿着用廉价棉布缝制的衣服，上同样的饭馆吃饭，喝同样的酒，一起闲聊消磨时间，过着同一种生活。

今天的要人们也觉得韬光养晦，悠然自得是一种很大的快乐。瑞典国王一家都是考古爱好者，国王穿上旧衣服，尽量不引人注意地去发掘埃特鲁斯坎的陵墓，寻找小小的铜器或陶器。荷兰女王在埃尔科莱港海边为自己盖了一间简陋的棚舍。阿利汗的朋友，孀居的贝蒂娜在撒丁岛为自己买下了一块海岸。与名人们为了换换口味而来享受当普通人的快乐的同时，平凡的人们也得到了一种满足：他们可以摆脱由于人家显赫而自家惨淡的对比所引起的烦恼。他们也尝到了更多的乐趣。一些现在还几乎无人知晓的风景如画的小村庄可能十年二十年后就会出名了，因为大人物到那

里去走过，穿着旧衣服跟每一个人谈过话。而一个身份低微的外国人在这里也容易被当成大人物，或者是跟大人物地位相同。他在这里也容易交朋友，而在其他地方要困难得多，甚至是不可能的。

* * *

来访意大利的许多过去的原因和理由都纯属虚构。确实，罗马教廷只在罗马，维苏威火山只在那不勒斯，庞贝城的遗迹只有到庞贝去找，佛罗伦萨的艺术珍品保藏在佛罗伦萨，但是，其它许多有吸引力的事物是在别处也能找到的。那些地方位置更方便，常常并不比意大利逊色。就拿诗人们讴歌赞颂的气候来说吧，它始终是来意大利的主要借口之一，“阳光灿烂的意大利”总是挂在外国人的嘴边。这个名词显然是英国、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创造的，因为他们本国气候太坏，是文明世界上最糟糕的。意大利夏天的阳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实在许多其它地方夏天的阳光也是一样的灿烂。不知有多少肺病患者成了这种误人的老生常谈的牺牲品，他们被劝说到罗马、佛罗伦萨或比萨去过冬，可是在那里他们却受尽了雨夹雪和寒冷潮湿的空气中的折磨。从十九世纪小说的人物里，我们就可以数出几百个这样的牺牲者。德施达尔夫人的《科林纳》中的荒唐可笑的主人公奥斯瓦尔德·内维尔爵士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健康受到巨大疼痛的折磨，医生怕他的肺出毛病，让他去沐浴南方的空气。”他离开了祖居的爱丁堡，但病情并未因此好转。

其实意大利北部的气候与欧洲大陆的多数国家差不多。米兰和都灵冬天比哥本哈根还冷，夏天比瓦莱塔和阿尔及尔还热。中部和南部的气候和其它地中海国家相似，海边比内陆温和一些，54但并不如香港或克里米亚那么好。意大利冬天的气候显然比不上埃及、佛罗里达、撒哈拉、利比亚绿洲、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罗马的气候最不宜人了，一年差不多有两百天刮西洛可风，它是一种闷热的南风，吹得满天都是低沉潮湿的灰色云，使得到处都发霉，墙上尽是猪肝色的潮斑。人在这种气候下觉得软弱无力，心烦意乱，脑袋里象塞满了棉花。诺曼·道格拉斯曾以此风作为他的一本书的名字，他把这种风称作“要命的风，它吹到身上热烘烘，粘糊糊，加速了死亡与腐烂”。威尼斯的秋天、冬天直到初春都是阴雨连绵。要是刮起东南风，那么世界上就再没有比这里更糟糕的空气了；全城都隐隐地闻出一股烂白菜和死水的气味。奥斯卡·王尔德曾在这样的天气里乘坐一艘黑色的大型平底船，他沮丧地说，他好象是“坐在棺材里穿过下水道”。这座城市使托马斯·曼萌发了死的念头。

再看看人们常说的另一个旅行原因——美食。意大利的饮食一般是比较好的。在著名的大小餐馆里，菜肴总是无可挑剔，质量一般的时候很少，从来不会低劣。他们菜的特点是纯任自然，每样东西的色香味都是其本来面目。菜的各部分特点鲜明，保持原味，不用浇汁的办法来模糊它们的外观和风味。每样食品都是在适宜的季节，在风味最佳的时候趁新鲜吃。水果和蔬菜不是温室培育的，没有人工产品的包装纸味。它们不是在成熟之前摘下来捂熟的，也没有经过冷冻和化学储存。它们的颜色多教人欢喜：米兰烩饭是黄的，西红柿沙拉和西红柿酱面条是红的，菜花是白的，托斯卡纳豆是绿的，烧熟的章鱼是叫做主教紫的那种紫色，双奶油片是金色的。这些颜色全都十分鲜明，就象旗帜和孩子们的彩色笔的颜色一样纯正。煎饼好拟描绘夏天落日的画家的调色板。当阳光照到酒杯上的时候，美酒就象珠宝一样璀璨，其色彩和香味都是毫无瑕疵的。

意大利的美餐是美妙的，它胜过北方的发达国家，也胜过西班牙，远胜于希腊。但是必须承认，意大利的酒食并不比法国好。

意大利的烹饪只是尽善尽美地表现自然，而法国的烹饪却是向自然挑战。法国的烹饪打破了材料的本色，创造出自己的特色，它是一门艺术。意大利酒是专门品种的葡萄汁酿造而成的货真价实的产品，而法国酒则往往是一种天才的创造，是许多种或粗或精的原料的绝妙混合，是专家操作制成的。那一种更高明一些呢？显然法国人做得更好。

再看看古迹。有些意大利的古迹被公认为是无可匹敌的。意大利南部就是古时的大希腊，那里有依然屹立在原来柱石上的希腊神庙，有各种古希腊的遗迹，其数量也许超过了小希腊。但是，全世界还有更古老、更著名、更使人肃然起敬的古迹，从尤卡坦的丛林到柬埔寨吴哥窟，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到伊朗，从埃及到印度。有许多伟大的宫殿、博物馆、世界驰名的杰作受到人们的观赏赞叹，它们比起意大利的古迹并不逊色，甚至要更好，比如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宫和国立绘画雕刻博物馆，列宁格勒的冬宫和修道院。再看看艺术。当代艺术活动的中心是巴黎和纽约，在那里，有雄心抱负的年青艺术家们不但能学习而且能成名；收藏家们有着广阔的选择范围。斯卡拉剧场无疑是世界最大的歌剧院，但是在维也纳、伦敦和纽约也照样可以看到、听到出色的歌剧。能听到美妙的交响乐的地方包括维也纳、慕尼黑、柏林、杜塞尔多夫、科隆、法兰克福、巴黎、伦敦、纽约、波士顿以及若干美国城市，更不用说还有苏联了。意大利的芭蕾舞水平不行，莫斯科、列宁格勒、纽约、伦敦和哥本哈根的芭蕾舞要好得多。

是不是意大利壮丽的风景、雄伟的山岳、五光十色的海湾和瀑布、动人的湖泊、漂亮的岛屿使旅行者流连忘返呢？诚然，意大利确实富于自然之美和闻名于世的风景，但是这些在别处也能找到。比如在美国，有许多没有遭受人类干扰的地方，那里的大自然特别迷人。在意大利找不到象新英格兰和上纽约州的那些古

老森林，这些森林到了秋天变得五彩缤纷，从金黄到绯红，颜色应有尽有。在意大利也找不到峡谷和沙漠。里约热内卢、伊斯坦布尔、香港象那不勒斯的海湾一样美丽。阿尔卑斯山在法国、瑞士和奥地利的那一侧也是同样的雄伟壮丽。其它许多山脉也同样陡峭高峻，有的更为偏僻、粗犷和难以攀登。在欧洲可以找出几百个能与意大利湖泊媲美的绿树环抱的湖泊，而意大利的瀑布虽然有诗意，但与非洲和美洲的大瀑布比起来就显得太细小了。在世界上前几名的大河面前，意大利的河流简直是小溪。要说岛屿吗？希腊的岛屿多得多，而且更加偏僻，更加原始，终年更加温暖。

有些人说，是意大利特有的惬意的生活吸引了他们。这不过是用了一个新词而已，实际上自古以来惬意的生活就吸引着旅行者，他们在著名的狂欢节时到威尼斯，在其它时候到意大利其它地方都是为的这个。但是，意大利的生活真比别处更惬意吗？比如说，比巴黎、拉斯维加斯、纽约、慕尼黑或好莱坞更迷人吗？这很难比较。可惜，惬意的生活并不总是旅行到某个地方就能找到的东西。它有因人而异的特性，是一种走到哪里都能引起轻松愉快的探索之乐的能力。许多来客对罗马很失望，因为他们发现生活还是跟家里一样拘执古板，而大多数罗马人也不过如此。

意大利是否象某些人所说，是法律松弛的地方，是逃避苛刻的所得税和其它税收的避难所呢？世界上有许多小共和国和小公国尊敬富有的外国人，把他们置于法律之外，在那里交一个得力的好朋友或及时给官员送件礼物就可以免掉好多的麻烦。如果纯粹是为了逃税，那比意大利强的地方也有的是。意大利的富翁就宁愿选择瑞士。蒙特卡罗、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都是隐藏招人眼红的财产的有名去处。那么，外国人是不是特别欣赏意大利居民殷勤好客的态度、乐于助人的热心肠、生动的语言和精巧的手艺

呢？在意大利人中很容易找到手艺高超的工匠和奉承专家，但是，许多国家都有这样讨人喜欢的居民，这是古老优雅的文明已经衰落，而现代化的工业化社会还未建立的地方的一个特点。

以上所有这些解释显然都未必充分。人们到意大利来并不总是要寻求绝对的好，而是因为意大利有一种别处所没有的特殊品质，它渗透了一切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东西，它比绝对的好更能打动人心。在旅游局的广告上可以看到对它的一个概括，就是“意大利的魅力”，它使一切吸引人的东西都增添了份量和兴趣，因而胜过其它国家的同类事物。它的作用就象菜里的盐，没有盐，菜就淡而无味。有了它，就连痛苦在意大利也是贵重的。海涅曾写道：“意大利使生活变得美丽。在这里的大理石宫殿里，一声叹息引起的回声也比在我们简陋的砖房里引起的回声更美妙；在月桂树丛的荫影下哭泣，要比在我们黑黝黝的冷杉树下哭泣更动人；眼望意大利变幻的云彩而胡思乱想，也比在德国灰色的天穹下幻想要甜蜜。德国连天空也象在上班，它的云彩也显出一副一本正经、呆板阴沉的小市民的表情，无精打彩地打着呵欠。……究竟什么是快乐呢？还不就是一种特别甜蜜的痛苦吗？”到底什么是“意大利魅力”呢？司汤达断定，它就是“一种与陷入情网差不多的东西。”他这么讲必定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花了大半生来煞费苦心研究这两样东西：爱情和意大利的魅力。它们二者是相似的，又是相辅相成、互相增强的，爱情到了意大利就格外甜美，通过爱人们的眼睛看意大利就分外迷人。

58

意大利到底是爱情呢，还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意大利就是艺术呢？象这里的风光一样，意大利的艺术也能陶醉人、改变人，有力地移人性情，激起人欢乐的情欲。沃尔特·佩特关于艺术的一段话可以同样适用于意大利和爱情。他说：“艺术不是别的，它只是使得你在流逝的每一刹那时间里得到最高的享受。”但是，意

大利这个古国，这个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的狭长半岛，这个拥挤着五千万人口，充满着历史遗留问题的地方能与复杂敏感的感情、与生俱来的情欲、人类精神的花朵认真地相比吗？地理的因素能跟心理的和美学的因素换合在一起吗？

* * *

亨利·詹姆斯猜想，意大利的乐趣是与人的因素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在许多世纪的过程中创造了意大利的美景。只有人“才能把人类历史和心理感情与空气土壤因素，以及色彩、形状和结构因素融合在一起，形成精美绝伦的总汇，正是这个总汇使意大利具有感染力，成为最优美的国家。”有一天，他在罗马南面一个单调的小镇韦莱特里漫无目的地停留了几小时。这地方很沉闷，没什么可看的，但他还是被吸引住了。他写道：“在镇上两三家咖啡馆中最好的那一家门前，有一个带台阶的凸起的平台。在温暖柔和的六月夕阳的沐浴下，几位沉思默想的人物心平气和地围坐在肴核既尽的桌旁，他们边抽着长长的黑色烟卷边打量我们。他们此刻的思想活动十分微妙，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许多意大利人的难以理解的天真（我敢这么说）和单纯。古往今来意大利的魅力就在于这种情调和气氛，在于这种临事欣然的气质，它使一切积极的主张和反复申明其重要性的事务化为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在古朴的环境中，感到身心交泰。我们体验到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比它的外在的偶然的表现形式要深刻得多，它能够恰当地精辟地表达那些从古以来就使热爱意大利的人们大费思索的问题。”

另一些人看到了人与意大利魅力之间不可否认的联系：看到了人的心情、习惯、容颜、生活态度与意大利的欢乐之间的联系。有一位意大利化的美国人叫威廉·迪安·豪厄尔，他因写了林肯的传记面受褒奖，得以就任驻威尼斯的领事。他说：“使佛罗

伦萨人如此受人喜爱的原因不是他们的古迹和艺术，而是他们可爱的生活方式。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可要早晨送咖啡的女仆的一个隽永的微笑，也不要多纳泰罗的名画圣乔治：宁愿看那年老女侍者充满母性的面孔，不愿看圣母马利亚新教堂的正面造形。”他热爱“可爱的、自然的人们，在这块人性解放了的土地上，他们总是这样纯真。”司汤达说：“那就是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他们顺乎自然的风采、和蔼愉快的态度和快活度日的艺术。好好先生们不懂得快活度日是一门艺术，而且是最困难的一门艺术。”

当然以上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意大利人明白，他们国家的一切事物都受个人体验的影响，物质劳动的产品也渗透了人的精神。他们认为，实在不必在女仆脸上的微笑和多纳泰罗的圣乔治之间分个高低，也不必争论古典主义的构图和佛罗伦萨附近山景的优劣。它们都是艺术品，既是“快活度日的伟大艺术”，也是使他人愉快的艺术。这门艺术拥抱着、鼓舞着到意大利的一切人。它是唯一值得学习的艺术，也是永远学不到家的艺术。这是在地球上生活的艺术。

* * *

说到底，这才是最终的动机，它支持、促进、规定着所有其它的动机，它能回答密尔顿的“意大利为何如此”的问题。从古至今，人们来意大利，都是受着意大利生活独特风格的吸引。不管他们是否明确意识到了这个动机，它都加快了他们血液的流动。60 他们在这里体会到农神的那种解放感，他们周围的意大利人好象弄懂了困扰着其他国家人民的问题，好象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捷径，这些捷径有的拙劣，有的可疑，但却总能使人躲开生活中最浓的阴影。他们好象会搞出一套办法来冲破历史的堤岸。这套办法远非完善，它只在事情不大要紧时效果较好，但它总能温暖人心，用幻影来骗过命运。意大利人总显得快活，他们不论做什么都象

海豚一样劲头十足，这股劲头很有感染力。在歌德旅行意大利时，他的一个旅伴曾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干嘛要操心？”他对年青的诗人说：“人必须永不操心，操心老得快。人应该只把一大团事情装在脑干里。”人应该听任彼此矛盾的倾向去发展，应该培养对立的观念，应该只服从理性，任何时候都不要为生活中的缺陷而发愁，应该我行我素。意大利的欢乐来源于生活，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人们为了自己，按照自己的尺度而建造的。

第四章 重要的场景

61

意大利人异常活跃，外人一来马上会注意到当地居民蚁冢般的热闹生活。街道、广场和集市上都挤满了兴奋、嘈杂、活跃、繁忙、精神饱满的人群。穿制服的持枪警卫搭拉着眼皮，监视着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人物：慢悠悠地闲逛的胖牧师、穿着粗绒衣服的农民、出来休假的漂亮年青士兵、挎着沉甸甸购物袋的妇女、留长发穿工装裤的颓废派青年、成群结队的俊俏姑娘、在大人长腿之间钻着玩的小孩子。女人们用绳子从四楼窗口坠下一个小篮子，邮递员在篮子里放上邮件或者面包师放上面包，然后再拎上去。乞食僧把小木匣递到人们鼻子底下求布施。一个驼背在卖彩票：“就剩最后几个号了，准保中彩！”

妇女们常把衣料从店里拿出来，在阳光下细细挑选颜色。小贩大声吆喝夸自己的货（卖西瓜的总是说自己的瓜“好吃，解渴，透心凉”）。手艺人就在自己铺子门口露天献技，边干边唱，或者跟过路的朋友聊天。修理工钻到拆开的汽车底下，鞋匠钉着皮鞋，细木匠以一个乐队指挥指挥一场柔板演奏的轻快动作给桌面抛光。堂倌换桌布的动作很有特色，他轮番地把每一块桌布拿到阳光下啪地一抖，再往手腕上一缠。街上有时会有宗教行列通过，队伍里有乐队，有制服整齐的持枪兵，卷边的帽子上插着红红蓝蓝的翎毛。走在前面的是口中念念有词、身穿网织白法衣的牧师，还有戴白面纱的少女和肩上缚了天使翅膀的小男孩。首席牧师走在古式的天鹅绒伞盖底下，虔诚的教徒把这伞盖在他头上高高举

62 起。有时还能看到送葬的队伍：昂首阔步的黑马，马具上装饰着黑色大翎毛和银饰；玻璃罩着的棺材，顶上有一群金色的木制天使在飞翔，还有更多的黑翎毛和各种象征永生的杂件，后面跟着哭泣的亲戚朋友。

马车上、商店橱窗里、货摊上都堆积着蔬菜、鲜花、水果、玩具、服装、鞋子、鱼类，好象是从希腊神话中象征丰饶的羊角里倾泻出来的异彩纷呈的礼物。北方的菜花是白的，罗马的是绿的，而卡塔尼亚的是紫的；短小碧绿的小葫芦到处都有，可是那不勒斯的小葫芦是白的，而且有六呎长；里维拉的洋蓟有刺，南方的就没有。桔子堆成许多尖塔，有的桔子剥成了片以展示意大利人喜爱的鲜红果肉。鱼类品种繁多：珊瑚红的鲷鱼，好似发亮石膏的乌贼，长长的箭鱼和西西里出产的金枪鱼，产于波河河口的壮健的鲟鱼、亚得里亚海边的箬鳎鱼，痛苦地卷曲扭动的章鱼。猪肉铺的橱窗值得让来自贝加莫的静物写生画家们好好描画一番。（贝加莫是一个以食物和美术学校闻名的城市。）橱窗里有火腿搭成的凯旋门，从顶上挂下来的香肠好象威尼斯的灯笼；用猪蹄、乳酪、水牛酪摆成了花边；小干酪泡在牛奶里，帕尔马干酪做成车轮状，辐条涂成漆黑的颜色；大罐的油浸橄榄和蘑菇，新摘的黄瓜；还有成桶的盐水鳀鱼。

处处的商品都陈列得引人注目，看似零乱实具匠心。花布拆开了卷，从摊床里抖露在顾客眼前，有如鲜花怒放。细条实心面都拦腰系上白、红、绿三色的爱国丝带。装葡萄酒和橄榄油的瓶子装饰着勋章，好象战争中的英雄。肉店橱窗里摆着些苍白的小牛头，它们合着眼睛，嘴唇上显出神秘的笑容，牙里咬着柠檬或石竹，好象对死亡满不在乎似的。就连整形院橱窗里展出的疝气托带也装饰着小旗和彩带，成了吸引人的玩意儿。

噪音震耳欲聋，人们聊天、吹口哨、赌咒发誓、唱歌、骂人、

喊叫、抽泣、嚎哭、互相招呼 and 叫嚷、进行详细的讨论或微妙的谈判。母亲们对孩子念叨着爱抚娃娃的话语，招呼过路人来看她 63 那宝宝的可爱之处和傻样儿。有的母亲在顶楼窗口叫她们的儿子，嗓门之大隔省可闻。钟楼上铜音深沉的钟声响起时，就超过了其它一切声音。有人总在练习长号和短号。有时候，某一首流行歌曲或著名歌剧唱段处处可闻，从每个商店的收音机里、公寓的敞开的窗户里、咖啡馆的桌子下面，从顾客的衣袋里和过往的家庭妇女的肚子里，都可以听到它。飞机、卧车、摩托车、卡车，带着马达的轰鸣来来往往。

空气里已经充满了噪声，以致一个人要想让别人听清他的话就得大声嚷，这样就更加强了喧闹。恋人们在这里窃窃私语，说“我爱你”时，也要用报童叫卖报纸的嗓门。一个人临死时如果是躺在一个面对杂音鼎沸的大街或广场的房间里，他就无法向哭泣的亲属留下最后的希望和告诫，因为他已无力让人听到他的话了。这噪声在众多的石墙上快乐地来回反射，经过缺乏绿化的狭窄街道而愈加放大。这种情况从黎明持续到半夜；就是到了半夜，最末几个散步者还会在你卧室的窗根停下，争论起一个微妙的政治观点或某位朋友的个人品质，而且都可着嗓子嚷。

这些场景非常吸引人，所以许多人花了大半生时间专门来看它。这些人在咖啡馆里总把桌子摆在一个合适的地方，一边从容地喝着咖啡和开胃酒，一边观赏，重要的东西无一遗漏。少言寡语的老太太躲在帘子后面，隔着帘子的绿色木条端详这景象，什么也逃不过她们的锐眼。她们还会抓住各种细节进行推论，比如女人买的东西啦，姑娘们的新装啦，小伙子脸上浮起的微笑啦，城里开来的新式汽车啦，某个男孩子对着三楼窗口吹口哨啦，等等。在向阳的地方有为老年人预备的长凳和小台，所有房屋的临街面都有阳台，就象戏院的包厢似的。你可以在阳台上放一张扶 64

手椅或者凭栏伫立，在观看这个有千千万万个人物和成百上千个情节的游行行列的同时，也眼看着一天天，一年年，以至你整个一生时光的流逝。

意大利人传神的面孔给这些场景增添了巨大的魅力。当几个意大利人在谈话时，你只要从远处观察他们面部表情的变化就可以领会谈话的意思了。你可以从他们的表情里看出欢乐、痛苦、希望、愤怒；宽慰、烦恼、绝望、爱情或失望，就象看大字广告一样容易。种种毫不掩饰的感情，真诚的或做作的，一个跟一个地在意大利人的面孔上滑过，就象在刮风的春天里云彩的影子一个跟一个地从草地上迅速滑过一样。例如，一个饭馆的侍者在顾客为午餐点菜时，会迅速地显出如下一系列的情绪变化：（1）当他给新顾客送菜单时，表现出一种讨人嫌的奉承和职业性的礼貌；（2）当他拔出铅笔，在本子上准备记那些司空见惯的菜名时，表现出恭顺；（3）如果顾客点菜费了思索，或者咳嗽，或者提出了一些内行的问题，他会有点好奇；（4）如果顾客显得不好伺候，在点菜时有些迟疑，他就投以怀疑的目光；（5）如果后来发现这顾客是一个精于此道的行家，他就显出一副精神振作、倾慕快慰的神色；（6）如果这顾客最后终于点出了普普通通几样菜，他就恢复到开头那种讨厌的奉承相。

观察面部表情在意大利是一种从小就学起的重要本领，它对于生活甚至比识字还重要。人们说的话有时与同时所作的表情不一致，这时就不能管话，只有表情才算数。意大利人在北欧常常感觉困窘、不愉快和孤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周围尽是些无表情的面孔，缺少激情，从脸上观察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北方人感情不外露，意大利人就误以为他们无感情可表露。他们认为，英国人著名的内向性格就证明英国人是冷漠和缺乏感情的。说来奇怪，意大利人过分外露的性格却是当演员的一种障碍。

也许自然赋予他们的这种礼物太多了，以致超过了需要。他们花哨的表演如不严加控制就容易过火，他们中的好演员必须花时间去摆脱许多外国演员要学的东西。韦尔斯说过，意大利人其实个个是演员，共有五千万，而且个个都出色。他们中也有少数几个蹩脚的，那得到舞台或银幕上去找。

再说手势。意大利人的手势也很出名。他们的手势确实比别国人用得更多、更有效和更有想象力。他们用手势来加强语气，把意思表达得更为清楚，暗示不便说出的字眼和意思；有时距离太远，听不见说话，便直接用手势来传递信息。在今天这个繁忙的世界上，为了节省时间，手势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了。司机们再也不象几年前那样，放慢车速、浪费宝贵的时间来互相叫骂或训斥行人，而是向他要骂的人伸出一只手，这只手除食指和小指外全都卷曲起来。这个手势表示，被骂者已经长了犄角，或应该长犄角，或很快就要长犄角，也就是说他的妻子（或者是未婚妻或情妇）给他戴上了绿帽子。有些手势是任意编造的，有些是根据传统，就象聋哑人的手语或美洲印第安人的符号语那样，但多数手势是以自然与本能的动作为基础的，它适合于大多数人，尤其是西方人。它精细、强烈、有风格、能传神，已成为一种艺术。象其他伟大的传统艺术一样，它能够被广泛地理解，没见过的人也能一看就懂。

这些手势并非如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总是夸张地、戏剧性地曲臂扭腰、转动眼珠、拼命摇晃手和指。这种错误印象可能是某些歌手们根据意大利人自然姿势所作的夸张表演所造成的。最好的 66 手势常很经济，甚至难于察觉。例如，西西里人能在面肌几乎不动，手也几乎不动的情况下传达重要的甚至是性命攸关的消息。如果他们慢慢地抬起下巴，那就意味着“我不知道”，甚至是“可能

我知道，但我不会告诉你”。警察在询问黑手党杀人案可能的目击者时，总是得到这种回答，而这杀人案就当着成百的人发生在喧闹的市场上。当一个并无恶意的外来者向胆怯的西西里农民询问通往附近村庄的道路时，他往往也得到这种回答。

把一只手的手指伸开，在抬起的下巴底下慢慢摆动，意味着：“我不管，那不是我的事，管不着。”一八六〇年，墨西拿城的某某先生的祖父向加里波第打的就是这个手势。当时加里波第已经带着他的志愿兵征服了西西里，正向大陆推进。加里波第看见了当时还是个壮小伙子的某某的祖父，他正在乡间小路旁的角豆树荫下，骑在一堵小石墙上打盹。加里波第勒住马向他发问：“小伙子，你不想参加我们的战斗，从波旁王朝血腥的暴政下解放我们南意大利的兄弟吗？在我们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可以睡觉呢？起来拿起武器吧！”这小伙子一言不发地打了上述那个手势，加里波第就策马过去了。

抬起一条眉毛意味着“我准备作出必要的决定”。慢慢合上双眼，而脸的其他部分纹丝不动，不带表情，意味着顺从不可避免的命运，接受困难而不愉快的任务。例如，它可能代表下面的意思：“我们反复地警告他，但他这个人顽固得很，不愿听人讲道理，但我们总要尽到本分。”

我有一天在巴勒莫的棕榈旅馆见到的手势也许是最经济、最有表现力的西西里手势了。有一个人从街上走进来，他显然是想让大家马上毫不含糊地知道，他是一位绅士，一位有钱有势、习惯受人伺候的人物。他先环顾四周，仿佛是在屋里寻找一个朋友，然后脱掉大衣，只在手里拿了不到一秒钟，很本不费心去看看身旁是否有仆人就把它丢开了。一个真正的绅士，在他脱下大衣时，总是有人替他接过去的，他根本无须去注意。那大衣当然没有掉到地板上，一个服务员把它接过去了。

说来奇怪，这个课题从来没有人认真研究过。据我所知，有一个那不勒斯的牧师兼古董收藏家卡农·安得烈·德约里奥曾企图整理他的国人的手势。他开始是想弄懂那不勒斯波旁博物馆里收藏的希腊花瓶与罗马壁画上的图画和马赛克与浮雕上的雕刻的意思。他自己揣摩：如果画里的这些神祇是今天的那不勒斯人的话，他们会说些什么呢？而一个现在的那不勒斯聋人，会怎样理解神祇们的手语呢？首先他从周围的生活里识别和收集了几百种手势，对它们进行了描述，并且请艺术家给它们画了样子，做了模型。然后他为这些手势编了目，作了双重的索引。在许多年以后的一八三二年，他以一大厚卷书的形式发表了他终生工作的成果，并把它呈献给世袭的普鲁士亲王，霍亨索伦王朝的弗雷德里克·威廉。该书的题目不大准确，叫做《通过那不勒斯人的手势来解释的古人手势》。

对古人手势的解释只占该书很少的篇幅，大量的内容是完备而独特的手势表，不论在那不勒斯还是在别处，人们都可以用这些手势来表达一切或几乎是一切意思而无须开口。该书很难得，在图书目录、百科全书、稀有书目或意大利图书馆的目录里都找不到它，专家和学者们也不知道它。我所知道的只有我手里这一本，是我从一个心地实在的英国老先生的书库里偷来的。

看一下该书的内容就可以认识到，这些手势是多么自然、易于理解、通用和永恒。从一八三二年到现在，它们变化很小，很可能正如卡农所试图证明的那样，它们与古时候的手势差不多。把该书翻到题为《愤怒》的那一章，它列出了不用语言而表达这种感情的十种主要姿势。让我们只引述标题而略去详细的描述，它们是：（一）咬嘴唇；（二）咬手和手指；（三）扯头发；（四）抓脸；（五）一手紧握拳，另一手包此拳，用力揉搓以致关节发响；（六）咬牙咧唇；（七）嘴唇神经质地颤动；（八）猛力跺地；（九）双掌对

击有如鼓掌，但只击一两下，而且用力。唯一不好理解的是第十种“假装咬自己的肘子”。它来源于意大利人的习惯语，用话说出来就是：“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报仇，即使是不可能的事，夸张一点说，哪怕是咬自己肘子这样的事，也要去干。”

标题为《不、否认和否定》的一章列出了表示否定概念的十三种方式，按强烈程度递增排列。第一种比较简单：“尽力扬眉，动作要快”，然后是：把脸从要拒绝的目标扭开；左右摇头；下嘴唇包住上嘴唇，或把嘴角往下撇。博学的卡农讲表示爱情的方式时只讲了五条，都是高雅的。他可能是故意闭眼不看周围那些众多的刺激性的实例。在那不勒斯街道上，从古至今这种实例都是非常丰富的。

往往一个简单的姿势，加上适当的面部表情可以代替不只是几句话而且是一整篇滔滔雄辩的演说。举例来说，假设有两位先生坐在咖啡桌旁，其中一个正不厌其烦地解释着他所感兴趣的某个复杂问题，可能是这个世界怎样才能迅速变好，应采取哪些新步骤。他可能这样说：“我们这个老朽的欧洲大陆，总是分成许多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又分成省，这一个个的国家和省份都过着自己的小家子生活，说着难懂的方言，培养起各自的想法、偏见、缺点、厌憎……我们每个人都牢记我们战胜邻国的记录而完全忘掉被邻国打败的时候……如果我们彼此融合成一个整个的欧洲，那生活将变得多么容易啊！古老的基督教王国，这是查理曼大帝、梅特涅和许多伟人的梦想。不是吗？这也是希特勒的梦想……”另一位先生一直很有耐心地听着，注意地望着头一位先生的脸。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好象完全被他的朋友的大段雄辩和运用自如的乐观主义压倒了，于是他慢慢地举起一只手，从桌面上笔直向上举，举到最高限度，超过了他的头，同时只发出一个声音，是拖长了的“嗯——，嗯——”，好象是在叹气，他的眼睛却始终不离

开头一位先生的脸。他心平气和，略显倦意，模模糊糊地透出一
点怀疑。这种姿势表示：“你得出结论太快了，我的朋友，你的推
理多么杂乱，你的希望是多么不合理啊。我们都明白这个世界一
直是这样的，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而提出的所有聪明办法都会引
起更多另外的问题，那些问题比我们所习惯的老问题更严重，更
叫人受不了。”

* * *

异常的活跃、眼花缭乱的色彩、纷纭繁多的神祇的东西、士
兵的军服和牧师的长袍、表情丰富的面孔和传神的姿势，还有喧
嚣的噪声：所有这一切给每一个来意大利的人留下了最初的表面
印象，不论他在北方还是南方，在大城市还是在寂静的村庄，在
现代化的中心还是在被历史遗忘了的衰老残破的棚舍都是如此。
当然，地区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时间长了旅行者就会一点点地
体会出来。在博洛尼亚附近罗马尼阿的卢戈牲口市与派斯图姆牲
口市就显然不同。卢戈是位于波河河口附近的中世纪城市，它拥
有一座红砖城堡和许多古老的巴洛克式教堂，它周围是水道纵横，
肥沃丰饶的土地。这里的农民高大肥胖，红光满面，有着棕色的
头发和浅色的眼珠。这里的牛喂得很好，又欢又壮。派斯图姆位
于塞莱河口，萨莱诺以南，在一块至今还是贫瘠干旱的土地中央。
这里曾经霍乱流行，直到战后才部分地得到开发和灌溉。这里的 70
农民又黑又瘦，一双黑眼睛象要燃烧，一口白牙闪亮。这里的牛
又小又瘦。然而这两个地方的人都是好心热肠，十分活跃的。

再看罗马，维内托大街是欧洲最气派的大街之一，是首都的
一条主要干道。实际上，它不过是任何一座意大利小城的街道的
放大。在街两旁是挤满了顾客的咖啡桌。顾客们在喝开胃酒的时间
和散戏以后，观察着在街上来回闲逛的人群，其中也混杂着本
国的和外国的旅行者，在这难以认清的背景的衬托下，可以辨出

习惯成自然的本地人。过一会儿你就能学会用眼睛认出几个本地人了，你可以经年累月地追踪他们的生活。他们有的是瘦削而精神、野心勃勃的年青人，他们在某一天从郊区或外省来到罗马，身披一件上衣，口袋里装几个里拉。他们设法交几个酒友，结识某个有权势的人，结识他的太太，赢得他的信任，博得她的欢心。然后通过他们，再认识几个更有权势的人。这样这年青人就象泥塘里的沼气泡慢慢地升起来了，你可以一天天地观察他的上升。他起初是又买了一套衣服，然后是买一辆转手旧汽车，再买几套较好的衣服，再买第一辆奢华的新车。最后，他穿起最时髦的服装逛街，陪着他的的是最漂亮的珠光宝气的女人；他表现出一种油腔滑调、居高临下的态度，开着速度最快的闪闪发光的轿车。所有这些需要花多少时间呢？有时就花把一个百万富翁介绍给一个独立电影制片人或漂亮的女演员相认识那样多的时间，或者是把一个高级政府官员介绍给一个市政工程承包商相认识那样多的时间。

你还可以看到意气沮丧、衣衫褴褛的老人（在墨索里尼统治时期他们正年青，身穿军服、皮靴，胸前佩着饰物，何等傲慢，何等神气，可是战后他们很快就消声敛迹了），他们现在努力掩饰自己的衰老、孤寂和乏食。人群中还有未曾出名的小星们，她们每天都有从乡下新来这里的。她们走来走去，希望得到一个新的大导演的注意。再过一会，她们就只希望博得任何一个老导演的注意了。这些老导演善于生产廉价而热闹的彩色历史片，向南美和中东市场推销。他们也许能让小星们拍上两三天的电影，给她们几个特写镜头和几句台词。到了最后，她们只希望博得任何一个男人的注意了。一个独身男人可能请她们吃上一顿好饭，到早晨分别时送她们一点小礼物。她们中有些人的最后结局是从寄宿所窗户跳下去，你在次日报纸上可以认出她们的面孔，第一次知道

她们的姓名。她们中有些人后来变得驰名世界，难得再到维内托大街来了。每年来上两三次，身边也总是簇拥着友人和摄影师，以及美貌显然不及她们一半的妇女们。女演员老了常常借酒浇愁（仅仅在昨天她们还是多么苗条可爱啊！），有时由傲慢的年青情人陪伴着出门。这里有成百的妓女和男妓；有许多为黄色地下杂志服务的摄影师，他们等待着世界名人，以便参与大喝一顿，他们有时与同伙争吵，有时被抓起来。他们常常心满意足。有卖走私香烟和毒品的黑市贩子，有演员的代理人，有妓院老鸨，也有出来散步的单纯的罗马市民。你在维内托大街可以同时追踪许多平行的生活，一个时间追踪一个情节，一年又一年，无须费力，只要坐在咖啡桌旁就行了，在意大利任何地方的干道和城中广场上都可以。

即使在那些表面上不象意大利而更象其他北欧国家的地方，一个敏锐的观察家也总是能在其貌似外国的表面下发现某些民族的特点。譬如米兰，这个钢铁和玻璃工业之都，商业与金融的中心，它处处都象苏黎世、杜塞尔多夫或麦迪逊大街。这里的人看上去都吃得好，穿得好，目标明确，工作效率高，而且繁忙。他们皱着眉头横冲直撞，好象必须在几分钟内请医生来救命似的。他们常常站在快餐柜旁狼吞虎咽。你所会见的实业家们多半是态度冰冷，寡言少语的。他们在说话时也很少转动眼珠和挥动白晰的手。他们经营世界规模的企业，与日本人和德国人竞争，创建崭新的工程，在非洲和亚洲建筑水坝和桥梁，一开口就是几百万美元。他们办公的楼宇在欧洲最高，比纽约的办公楼更有气魄、
72
更现代化。

这还是意大利吗？你开始怀疑了。那么你就到城里到处走走，去探寻一下古老的街区，拜访一下主妇们常去购物的、不为人注意的广场吧。你可能会找到加莱里亚。它位于两条街正交的路口，

全罩着玻璃，好象维多利亚时代的温室。它正在市中心，街两旁都摆着咖啡桌，挤满了悠闲的顾客；他们观察着过往行人。那情况完全和圣马可广场、维内托大街和那不勒斯的卡拉乔洛大街以及几百条其他街道一样。闲汉们议论着大事，挥手强调着某些重点。他们有的是失业的歌手，正等着天上掉下职业来，不论是到外省、外国以至南美或任何地方去唱圆舞曲或民谣都行。另一些逛游者显然来自乡下，他们是红脸膛，肥胖强壮。这是些农民和代理商，每逢一星期中谷物交易的日子就聚集在这里，从加莱里亚建成以来的一百年左右一直如此。他们活跃而精明地买卖，握手成交，在小本子上记下帐目。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谁得手了，谁失算了。空间充满了噪音和手势。或者你可以在去喝开胃酒时到拿破仑山大街走走，这是一条有许多漂亮豪华商店的短街，服装漂亮的英俊青年迈着猫一般轻灵的步子，傲慢地望着妇女们。服饰漂亮、清秀大方的妇女与男人温柔地互送秋波。世界最贵的崭新的格朗图里斯莫牌轿车缓缓行进或停在路边，每辆车都有独特的样式。在这里，你也可以从人们脸上看出发生的事情。你可以分辨出初始的调情和惯熟的私情；看到满怀希望的姑娘追求可厌的男人；看到情急的小伙子向成熟而狡猾的美人献殷勤。

观察得再细致一点，你会看到米兰的许多事物都竭力想要显得洋气，显得绝对高效和现代化。强有力的实业家、以几百扇玻璃窗映出冉冉白云的摩天大楼、铺筑在混凝土支架上的高架公路、仿佛是由疯狂的工程师所设计或者是应存在于科幻小说里的复杂工厂……你开始觉得许多东西都有点过火，过分强调了设计意图。真的，米兰的新区比苏黎世更象苏黎世，比杜塞尔多夫更象杜塞尔多夫，比麦迪逊大街更象麦迪逊大街。这到底是意大利啊！

* * *

给游客以深刻印象的另一个现象，是人人或者几乎是人人都

表现出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做什么事都又快又好，干净彻底。事情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在做工作时有一种外露的高兴劲，好象干活并不是苦事。在别的国家，你会感到招待你的服务员显然以为他自己本应去干较好的工作，是残酷的命运迫使他不得不干这种下贱的差使，因此他才不得不跟你这种讨厌的人打交道。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决不存在。他们不会对生人粗野失礼，也不会露出厌烦、无礼和反感的情绪。发现这一点后，你会感到高兴，但很快你又要想，这是真的吗？意大利人为什么如此例外呢？难道他们这样高兴是因为他们人人所做的刚好都是自己想做的工作？都符合自己的希望设想和老天爷的安排？

意大利人做事时那种明显的快乐和工作愿望很有感染力。你只要一踏入意大利国境，周围便围绕着喜孜孜的面孔。喜孜孜的海关检查员一挥手就放过了对你的汽车或提箱里的雪茄的详细检查。喜孜孜的脚夫拎起你的提包。到了旅馆，喜孜孜的门房或领班为你在客满的情况下挤出房间，就象你是他的好亲戚。喜孜孜的侍者会轻声建议你今天不宜吃鱼，好象他真正关心你的健康。你可以认识到，他们每个人不管身份多么低微，毕竟都有自己的尊严，都有不羡慕他人而自觉心安理得的那种人的尊严。

看看露天餐厅里唱那不勒斯歌曲的歌手吧，他们不但没有音乐听觉，没有好嗓子，而且连歌词也记不清，他们不过靠顾客扔 74 给他们的几个钱维持生活罢了。他们有时用重新热一下的厨房剩饭来填肚子。但是他们唱起歌来却有令人难以相信的热忱。他们即兴创作变奏曲，把甜蜜的感情灌注到无力的唱段之中，使它变成情感沸腾，生气勃勃的欢乐的歌曲。通过他们的小圆嘴把音符拉长，仿佛他们是真正的男高音似的。他们为每一桌选择适当的歌子：为年青人选小舞曲，为孤独的夫妇唱孤寂凄凉的爱情歌曲，

为上年纪的和怀乡的人唱过去的老歌，简直就象一个订了固定的合同、领取高薪的表演家。再看看某些严肃慈祥的妇女吧，她们是在公园或饭馆里照料盥洗室的。她们小心地开门，给你递上肥皂和毛巾的姿态就象献花一样，讲上几句彬彬有礼的话，最后接受有限的一点小费，象一个女王似地点点头，微微一笑。她们好象认为，再没有什么比这样度过一生更好的了：置身于发亮的瓷砖和鸣叫的水龙头之间，周围充满了精致的香皂发出的香味，和许多杰出的人们相接触。

许多世纪以来，在意大利的外国雕塑家总是为他们的大理石切削匠的技艺、谦卑和热情所迷惑。这些人把他们的粗糙的粘土模型翻制成永久性的石像，而且常常作了改善。和这情况类似，有些在其本国本来是头脑清醒、效率很高的外国电影导演，他们一般是不会沉溺于幻想的，可是今天在罗马，他们却变得头脑发热，产生了一种神妙的全能之感。这种感觉是他们在与他们的合作者，顺从的副导演们、摄影师们、舞台设计师、建筑师、置景人员、机械师、细木匠和电工们一起工作时产生的。原来极温顺的人发现自己变成了提比略、尼禄或卡利古拉，变成了一个神圣的专制君主，向忠顺的奴隶发出做不到的和反复无常的命令。他发现，不管什么事，在别处要争论好几个月的，在这儿几个小时就干了。他在这儿显然可以毫无障碍地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想法，没有来自决策人物的小诡计，没有财政上的困难，没有妨碍75 灵感的工会章程。最后他终于证明他自己是个天赋之才的大艺术家。

任何时候，只要有个好想法打动了，甚至只凭一时冲动，就可以对正在拍摄的电影脚本进行修改、提高和增补。可以下令为在一夜之间设计出来的新场面安排新布景，把日程表完全打乱。为了利用导演在乡下见过的某处自然景色，或为了发挥导演在晚

会上遇到的某个金发小姑娘的未曾表露的天才，就匆忙地改写情节。这样一种即兴创作的热情使工作激动人心。往往一个好建议是化妆师或在屋顶打灯光的电工提出的，并且马上被采用了。“这是戏剧艺术所由产生的素材”，欣喜若狂的导演说。每个新主意，对情节的每个新改动，他提议的每个新场景，都得到他的意大利同事们的热烈欢迎。意大利人热情奔走，马上作出新安排。他们说：“Che ci vuole?”意思就是没有办不到的事。

这些人当然不反对延长他们不固定的工作，如能无限期延长才好呢。拍摄一上午往往变成一整天，只要需要，有时又加一整夜，无人打扰，无人抱怨。好象谁也没想起要吃、要休息，忘了还有一个家可回，家里有张床可睡。这样，一部原定六星期完成的电影往往要拖三、四个月，有时竟总也完不成。这些快活的即兴创作和新主意很少能把电影改好，最后许多电影搞得太长太慢，复杂难懂，不象专业人员的作品。回国以后，他们要作大量剪裁来把它缩短，要加画外音来解释那些难懂的情节跳跃。不少自以为是拿破仑的导演在罗马遇到了滑铁卢。

即使是无所事事、甘心混掉自己的时间和金钱的普通外国人，也非常欣赏意大利生活中的机会与轻松。他们租一所房子，雇一两个仆人，订购一套衣服和几件衬衫，让细木工按在信封背面勾画的粗略草图或杂志上的插图做几件家具，寻求几件稀有的古董。⁷⁶在做所有这些事时，他必定会被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的温顺和热情服务冲昏头脑。他们开始发现一种新的自由，一个人可以发号施令，要求做几乎任何东西和任何事情，而这比起他在别国不得不从权威方面接受的东西来，并不多花代价或者只多花很少一点代价。生活是随心所欲的、软绵绵的、百依百顺的，可以被塑造成任何形状。机会好象无穷无尽，只要有钱，什么怪想法都能得到满足，而且钱也不是要得太多。一个人在意大利真正可以表现

自己。

再如妓女，有经验的旅行者和意大利人自己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欧洲别处的妓女都比不上意大利妓女，她们有自己的特点。她们言语温柔，彬彬有礼，有时甚至有点娇怯和羞涩。为了讨好主顾，她可以表现得象母亲，象姊妹，象妻子，也能一变而为不知羞耻的荡妇，狂热的色场老手。她们从悠远的过去继承了许多精确文雅的知识，并把它们藏在娇怯迷人的外表之下。“*Ars est celare artem*（艺术就是藏而不露）”，她们虽然不能用古老的拉丁文说出这句话，但她们却从古罗马人那儿学会了它。伟大的艺术必须由看不见的技巧来引导，仿佛能使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同时开花。

象所有大艺术家一样，她们的直接目的似乎不是钱。当然，她们干这一行为的是成千的里拉，但她们却给人这样的一种印象：有时候，尤其是当前这一次，报酬不过是个形式，是粗俗的需要，而完美的表演才是她真正的目的。这是快乐，是毫不费力的爱情所带来的快乐，是她自己的快乐，也是男客容光焕发的脸上显出的快乐。她最终追求的是产生片刻纯净的、缥缈的幻觉。最后她把钱毫不顾惜地撒在一边，而不惜用宝贵的时间来与顾客象老朋友一样地谈心，把自己寄养在乡下母亲家的小儿子的照片拿给他
77 看。她会注意到男客衣服上的污迹，拿苯来洗净它。她还会把一枝石竹插在男客衣服的扣眼里。她往往会长久地吻着门前的石阶，表现出令人惊讶的贞洁和深情，决不象在做样子或挑逗人心。她没有丝毫死板枯燥的商品气。她是个值得自豪的姑娘。

在得到了这许多表面印象之后，在还没有真正深入意大利生活之前，旅行者一开始便被诱惑得出一个结论：人家告诉他的和他从书本上读来的东西全错了。他认为，意大利人是些纯净透明的人，不会做假，不会伪善。虽然他弄不清这种气氛何以形成，

但却轻松地一头扎进了这新鲜醉人的气氛之中。只是到后来，他才开始怀疑所有这一切是否有作戏的性质。作戏虽然加强了这一切的效果，但也有点贬损了它们价值。

第五章 幻觉与骗术

显然，意大利的生活从表面看来是欢乐有趣的，但有时又是凄凉悲惨的。它的许多特点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象一出戏。首先，它象所有好戏一样吸引人、感动人、形象鲜明、无须解释就能明白，人物栩栩如生。其次，它的一切效果都自觉不自觉地经过了精心设计和反复琢磨，向观众传达着确定的信息，在观众心里唤起特殊的激情。再迟钝的人也会随剧情变化时而不禁要微笑，时而目瞪口呆，时而泪流满腮。只有笨伯才领会不到眼前这些东西的意义。

演员当着观众表演才起劲，情感才发挥得更细腻。请看一个抚爱孩子的意大利母亲吧。当她独自一人时，她和任何其他母亲一样，实事求是地温存和关心着孩子。可是只要有人进了房间，她马上就津津有味地扮演起母爱的化身来。她立刻满面生辉，爱泪盈眶，把孩子紧搂在胸前，给他唱歌，爱抚他，给他起好听的小名。意大利人常常一边发表着庄重真诚的言词（由于愤慨、嫉妒、捍卫自己的利益与尊严或狂热的爱情而发的言词），一边用眼角偷偷观察他给公众造成的印象。

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可以看出，经过人制作、改造与修正的那部分总含有一种追求效果的倾向：初生婴儿的羞怯的微笑，著名教堂的宏伟庄严的外观，在深蓝色的大海边、粉红的桌布上、
79 两只黄色柠檬旁，那个盛着红酒的绿玻璃瓶，都有追求效果的倾向。大胡子老渔翁坐在海堤上叼着粘土烟斗，那姿态就象准备照

彩色相片登在旅游广告上。荒凉破落的西西里村庄广场连同巨大的巴洛克式教堂、无所事事的失业工人、灰不溜秋的毛驴，便是衰落与绝望的具体表现。北方工业城市里镀铬的窗棂和玻璃构成的几何图形则是同样具体的高效率现代化的表现。

这种“表现”的第一个目的是使生活合乎心意。意大利人认为未经雕饰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可怕的。他们处在自然物中间就感到不舒服。几百年来，意大利人一直在砍伐古老的森林（异教的神祇们曾在这些森林里找到最后的避难所）和独立而雄伟的大树。意大利人早就发明了随心所欲地改造植物的方法，他们把灌木修剪成雕塑的模样，把花园建设得酷似一座绿色的城市。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可能比别的意大利人更象意大利人，他用其一生的最后几年，拔除了自己在加尔代湖边的美丽花园里的灌木和乔木（这些树是一个热爱自然的德国人在许多年前种植的），腾出地方来安置石柱、石墙、大理石拱门和甚有寓意的雕像。他甚至还运来了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鱼雷艇的铁船头，把它摆在几个花坛之间。意大利人早就发明了喷泉里用水构成和谐的藤蔓花样的方法。今天在维也纳由“西班牙派”的骑手教授的驯马术，其实是早在四百年前那不勒斯的一个名叫皮尼亚泰利的人研究并加以完善的。

生活中阴郁和无趣的时刻，应当用适当的装饰和仪式来加以调和与美化。丑事应当隐藏起来；悲惨不快的事应当扫到地毯下面去。样样事都要搞出光彩，一顿家常饭，一桩小买卖，一席无趣的讲话，一次懦怯的投降，都要以娓娓动听之词和缠绵哀怨之语来添枝加叶，予以拔高。许多人以为，这样做的是那些认为生活很有价值、生活令人振奋的人，其实正相反，正是那些悲观失望的人、正视现实的人、逆来顺受的人和诚惶诚恐的人在这样做。他们认为人们的病痛不能根治只能缓解，灾难无法避免只能减轻。

80 他们宁愿从生活的表面轻松地滑过而不去向深处探索。

如果总是不顾现实地一味追求肤浅的快乐消遣而不伴之以Garbo，就可能变得过分而使人反感。Garbo是一个意大利词，很难准确翻译，它在这里描述一种特别需要、特别受到赏识的品质。举例来说，Garbo是人在临近危险时一步步改变自己政治上的忠诚的那种细心和谨慎；是从容地宣布不愉快消息的那种机智本领；是裁布成衣而使人体线条得到完美体现的雅致技巧；是使相思若渴的私情得以成功的那种心有灵犀的谨慎交流；是在造反的省份里逐渐恢复起秩序而不致激起愤怒的能力。没有Garbo，振奋人心的爱国演说就成了玩弄辞藻，华丽的爱情表白听起来象无病呻吟，精心雕饰的建筑会使人讨厌，过分华丽的乐曲也让人难受。Garbo把一切保持在可信的界限内和风雅的韵味中。

在这洋洋大观面前不心醉神迷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在意大利决不会孤独地沉思默想，他始终觉得沉浸在人性之中，周围的一切，都鲜明而撩人。自然环境、风景、人、建筑物都在作优美如画的表演，构成一种永不终场的表演会。样样事物都在讲述着自己的动人故事，使你急于往下听。人们对这种快乐的事从不会厌倦，就是本地人离开它们久了也受不了。当意大利人迁居国外时，他们在新国家，总尽可能地选择本国同胞多的环境，周围是熟悉的噪声、手势和面部表情。有时他们定居在与本乡动人景色相似的地方，就象前几代人定居在加利福尼亚那样。那不勒斯人一见到那不勒斯城，就想到世上别处的人怎么活得下去，因为他们一离开那不勒斯就觉得身体明显衰退。

外国人到此倍感兴奋，因为他们从未体会过如此迷人的感觉。他们好象是没看过电影的人第一次看电影，被银幕上逼真的影像82 所迷惑，被电影引起的激情弄得失去了控制，他们虽然觉得电影里必然有些技巧窍门，但却不愿费心去弄个明白。他们很少想过，

为什么意大利的生活竟如此动人，为什么意大利人竟要充当这出全民大戏的演员、剧作者、舞蹈设计和导演？他反正很喜欢这出戏。外国人一旦开始认识到事物并不总全是象它们看起来的那个样子，客观现实并不一定是阴郁丑陋的，他们就大异畴昔了。这个心灵感觉是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影响到普通旅行者的发现，而且微妙地影响了与意大利接触过的大作家，并且通过他们影响到欧洲的精神。许多大作家到过意大利，如乔叟、密尔顿、歌德、果戈理；另一些大作家从未离开过故国，但他们也从传闻中了解意大利，如莎士比亚、普希金。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可以感到一种新颖的生气，这可能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研究了意大利的语言，模仿过文学的典范，采用了新颖的技巧，但最主要的是他们意识到了振奋人心的意大利秘密：生活可以上升为表现生活的艺术，可以加工制作成为艺术作品。

* * *

客气话和恭维话常常是实用主义的，但在大多数时候，它们也可以成为美化生活的真诚努力。它们是使人们的关系变得更为融洽的润滑油。恭维能使最谨小慎微的人感到自信和大胆，因而慷慨豪爽起来。这在意大利极其普通，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引人注目。一个人在恭维的气氛里呼吸，就象春天在树林里呼吸到紫罗兰的气味一样，弄不清这种微妙的气味从何而来。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常受别人恭维。老年人总被说年青几岁；任何丑女子也有人说她美，今年比去年美，今天比昨天美，晚上比早晨美。许多恭维是难以察觉的，意大利人在按你吩咐办事时，会表现出一种特别主动积极的劲头；在请教你的意见时，他们会表现出巴结的神态，不管你对该事有没有特别的经验。你的名字被加上各种学衔和称号，好象你对这些荣誉是当之无愧的，不授予这些衔头称号简直不可能。一个中产阶级的人在年青时被称为 **dottore**（博

士)，四十岁以上的被称为commendatore（爵士）或者Knight Commander（高级爵士）。普通信件的抬头称谓是“最卓越的”、“光辉的”、“大名鼎鼎的”、“杰出的”、“声望卓著的”某先生，或简写为N. H. 这是Nobil Uomo（贵族）的缩写。裁缝恭维你的身材，牙医惊叹道：“你简直有满口古罗马人的牙齿！”内科医生则情不自禁要评论一番，说他很少遇到象你所得的这样奥妙难测的流感。古董商、珠宝商、堂倌、肉铺掌柜个个赞叹你眼力绝佳，能伺候你是他的快乐，说除了你，他决不会把这么好的东西卖给任何人，当然除了你，他也决不肯只要这么点荒唐可笑的价钱。

当然不会有人认真看待这种显而易见的恭维，也没有人去特别注意日常招呼中隐含的恭维。我的一个朋友在那不勒斯（夸张与恭维之都）听到的招呼既简单又谦卑：“先生，把我当作你最末的仆人号衣上的最后一颗纽扣吧。”这真是风味十足了。我朋友不是那不勒斯人，他听了这话大吃一惊，不知如何应对，弄得语无伦次。其实正确的回答应当是：“先生，我最末仆人号衣上的最后一颗纽扣可是钻石做的。”

大多数恭维之类的客套话实在太明显了，并不能使说话者本人得到什么好处。当一个鞋匠以手按心向你保证说，“先生，礼拜四你当然会得到新鞋，没错，请放心！”的时候，他心里明白他是不能实现诺言的。可是他撒谎不是为他而是为了你，他希望你能够在星期四之前心情平静，至少怀着得到鞋的希望。很久以前诺曼·道格拉斯就曾在他的《塞壬之地》一书中描述过这种好意的习惯：“‘能给我些吃的吗？好康斯坦萨。’‘怎么不行，随你吩咐吧。’随你吩咐，这话就象南方人的客套，是个彩色的肥皂泡，一戳就会粉碎。”但是无可否认，在肥皂泡破灭前的几分钟，就象等待新鞋的星期四之前的那几天，人们总算从期望中得到了安慰。

在意大利就连车速计和钟表这样的精密仪器也可用来骗你高

兴。你轿车上的车速计总比你行车的实际速度快百分之十到二十，这是为了能让你因自己的车子和开车的技术感到自豪，也为了使你开得慢些，以免出事。火车站的大钟全要快五分钟，这点当然谁都知道，但是当一个人即使是步行也不会迟到的旅客看到它时，也不能不加快脚步。有些外国人曾经因此在时间还够时就泄了气，结果误了火车。与此相反，列车上的电钟却常常慢几分钟，这使乘客在车晚点时还以为是正点，或者觉得还早到了一点。

* * *

显而易见的欺骗常被用来满足意大利人的感情需要，他们最珍爱的一种感情就是做一个独特的人，一个值得特别考虑的人物。意大利人认为，在同是人类的中间培养这种幻觉是一种本分，而首先是他自己的本分。从来没有一个意大利人肯承认自己是“普通人”，人人都自以为是上帝的宠儿，并为此找出复杂离奇的理由。支撑这种意识的不仅是言词，还有其他许多手段。就拿买戏票这件事来说吧，如果买全票看戏，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小人物，没有路子，没有特权。不必惊讶，意大利的剧院历来有一半位子坐的是不付钱的观众，另一半观众也少付了票款。（看白戏的人称作Portoghesi，这并不是因为葡萄牙人有看白戏的特别习惯，而是因为在这好几百年前，罗马曾为葡萄牙使团举行过一次盛大演出，结果涌进大批罗马人，他们都厚着脸皮说自己是葡萄牙人。）与此类似，没人肯买全价的火车票，各种各样的人都白坐车，买票的人多半也在票价上打了大折扣，只有一些显贵、外国人或天真幼稚的意大利人才买全票。这样自然会给结算帐目带来复杂的问题。据估计，如果人人买票的话，车费就可以降低一半。

北意大利人喜欢讲以下这个笑话来说明，那不勒斯人是如何强迫别人把他看做一个不平凡的人物的。这是一个米兰人在那不勒斯买邮票的遭遇。这人拿着信上街，想寻找一个代售邮票的香烟

铺。此时，他遇到了一个认识的那不勒斯人，那不勒斯人一下就看出了他的企图。“你想买邮票？”那不勒斯人说，“你知道上哪儿去买吗？随便哪儿？这多傻呀！碰上我算你走运。这几天您得留点心。我知道一个好地方，是全城，不对，是全南意大利最好的地方。这是一个老式的香烟铺，店主忠实可靠，不是现在那种财迷心窍的烟铺老板，我带你上他那儿去。”他带米兰人进了店，一边对柜台后的店主挤眼睛一边说：“朱塞佩，这是我的朋友，他从米兰来，请特别关照。他想要一张邮票，是三十里拉的，他这封信特别重要，必须马上寄出。我跟他说只有你能让他完全满意。那些好的三十里拉的邮票还有吗？就是上礼拜你卖给我的那样的，那种非常好的邮票。卖给他一张吧，要最好的。”

比较殷实的人能成功地把讨好的技巧隐藏在不动声色的职业语言之下。态度谦和的北方商人故作秘密地向顾客提出愿意作一桩意想不到地令人鼓舞的买卖，这是特别有利的好机会，最优惠的价格，而且“只给你”。实际上这些好事多半都跟花三十里拉买三十里拉的邮票差不多。

* * *

85 这些表演当然并不总是无私的，它们常常是为了表演者及其家庭、朋友和门徒的利益。在这里，靠恰当的服装、恰当的面部表情，恰当的现场表演和台词常可使许多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不可克服的困难被绕过。靠着这些，随便什么人都能迅速地赢得公众或某个重要人物的注意、怜爱和同情。一九六二年在佛蒙特有一个文学家集会，要把两项奖金授给不出名的作家。莱德在会上赞叹了这种特殊技巧，他写道：“意大利人发言时是如此雄辩，以致别人难以用约定的七分钟发言限制去约束他们。（有一次，维托里尼戏剧性地在演说中途停下来，说超过时间了，可是听迷了的群众叫起来：‘接着讲！接着讲！’结果他足足多讲了十分钟。）

他们每次出场都象是表演，每次发言都象是雕章琢句。”（那年意大利人为自己的候选人争得了一项奖金，给了一个正在努力奋斗的女作家，摩拉维亚教派的信徒。）

有时这种表演是全城通力协作的，根据情况的需要，既可表现繁荣又可表现不幸。一九三八年希特勒来访时，罗马建起了齐齐整整的纸板房，好象电影的布景，这使罗马显得更加现代化、富足和强大，就象波将金的村庄一样。（一位方言诗人特里卢萨就此事写了一首著名的讽刺诗：“石灰石的罗马，用硬纸板来加以重建，向裱糊匠致敬，他将是罗马未来的主人。”）希特勒对此印象很深。有时候，全国都一齐来表演。大战以后，意大利官员们跑到纽约去，一些人诉说他们的国家是如何饥饿、贫穷、破败和绝望，这是为了争取美国政府无偿给与谷物、棉花、煤、石油和其他原料；而同时另一些人却描绘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意大利人民在热情工作，充满新的希望，情绪高涨，艰苦创业，对民族的未来满怀信心，这是为了争取贷款。有时，有的人一身二任，⁸⁶他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从政府官员的宴会跑到私人银行家的聚会，迅速地转换着面部表情和声调。当然他们决没有撒谎，两种情况都是确实存在的。

* * *

很久以前就有一本著名的书介绍这种行为，但很少有意大利人去读它。也许作者的学说太深入其同胞的内心了，现在成了他们的本性的一部分。他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仅仅是整理了或多或少人所共知的，并且在几世纪后的今天也还是人所共知的东西。该书作者是卡斯蒂廖内，书名是《Il libro del cortegiano》，一五二八年在威尼斯出版，不久译成英文，书名取作《为臣之道》。直到爱德华七世时代，这本书实际上作为英国国教会年青成员完美的指导书而闻名于世。卡斯蒂廖内在书中讲授了许多关于如何赢得或保持

主人对你的好感和在社会上获得成功所必需的技巧：在比武场上、在宴会厅里、在女士闺房里、在会议室里如何才能应付自如。

卡斯蒂廖内特别适于写这样一本书。他父亲是富有的伯爵，母亲属于高贵的贡扎加家族。他本人于一四七八年生于曼图亚公国的卡萨蒂科，受到细心的培养教育，成长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样样本事都在行，不过没有一样出类拔萃的。他是军人、政治家、学者、外交家、有名的拉丁诗人、运动家、艺术鉴赏批评家和讨女人喜欢的行家。他自如地出入于欧洲各主要宫廷。他于一五〇六年出访伦敦，在那里代表其主人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接受了亨利七世授予的嘉德勋章。当时许多名人都是他的朋友，拉斐尔曾为他画像，这像至今还挂在卢佛宫里。他向朋友提出的劝告总是既切合实际又敏锐。

举一个例子，关于如何应付战争危险，他的书的英译本里是这样说的：

- 87 “在发生冲突、受到袭击或参加战役时，或者在类似的场合，一个善于讨好的人应聪明地应付。他应把自己和人群分开，尽量显示自己出众的武艺和勇敢。这样做时同伴要尽量少，并且要让营中最受尊重的贵族们看见，最好是有自己所侍奉的国王或大人物在场，在他们眼前表现，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很恰当的机会，可以显示自己的能干。”

卡斯蒂廖内是一位正派人，他劝读者不要逃避自己的责任，不过也不要浪费自己的英雄气概，应该勇于承担“无可推托的”危险任务，但要注意分寸得宜地避免把自己的表现混合在众人之中，要在有价值有影响的人们面前出色地表演，这样他的英勇不致白费，面会得到奖赏。这种讨好的艺术是否光明磊落呢？卡斯蒂廖内向读者保证，他所传授的这个技巧，只要使用得恰当，是不会不光彩的，至少不比较好的运动员用来在比赛中战胜对手的技巧更

不光彩。（难道你不是也说得胜的击剑选手骗过了对方是因为他技高一筹吗？）有才能的珠宝匠，对宝石进行适当的镶嵌加工，使宝石变得更美丽，难道你能说他是欺骗观看珠宝的人的眼睛吗？

要这些心眼并不总是出于欺骗和迷惑观众的不体面的目的。这种表演本身常常就是对抗命运、对付生活中的不公正的唯一可怜办法。这种武器适合于绝望而勇敢的意大利人和他们的想象力。人人都想强大富有，谁也不愿衰弱贫穷，国家也是一样。意大利人的想法和别人一样。但由于某些原因，意大利人及其祖国在争取强大富有的斗争中总是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他们只好对真实事物进行逼真的模仿。在不发生冲突的正常时期，力量的表演和力量本身可以被认为有同等价值。只要表演得令人信服，仅有力量的影子也跟力量本身一样吓人。靠使用这种技巧，⁸⁸一个人可以得到几年以至几十年的安宁，这样他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如果发生危机，那就只有真实的力量才能保护他。但危机毕竟不多，而且来有先兆，可以凭老练的应变本领来推迟或避免。这是一种冒险的游戏，它可以搞一段时间，也许是很长一段时间，但不能永远搞下去。在一定的時候，真正的力量将粉碎假装的力量，那时就大祸临头了。但是有这种表演总比什么也没有强，比无可奈何地接受眼前的失败强。

与此类似，真富当然比装富好得多，但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既无能力也无机会去夺取财富或积累财富，那怎么办？结果在意大利就培养了一种别处没有的装富的艺术。在过去几个世纪，地方上的省城和小诸侯国的国都，如卢卡、摩德纳、帕尔马、曼图亚、费拉拉，都炫耀似地建起巨大的王宫和城堡、宏大的教堂、雄伟的歌剧院，这些与它们的幅员、财力和人口很不相称，有时不相称到了荒谬的程度。在那不勒斯有一家贫寒的贵族，他

们置不起马车，只拥有几扇门，在门上光彩夺目地刷上他们家族的盾形纹章，需要在大庭广众中炫耀时，就把门贴在雇来的马车上。在各地都有这样的没落家族，他们节约每一个里拉，在自己的邸宅里只住几间房间，在厨房里跟仆人们一起吃煮土豆，这些只是为了一年里有一天能举行一个大舞会。在那天，装饰一新的沙龙敞开了，成千支蜡烛照得一片辉煌。为这天而现雇的仆人们穿起古老的号衣，站在大理石楼梯上，用通红的农民的手擎着银烛台。两个管弦乐队交替奏曲，从无间断，香槟酒象水一样流。直到今天也还有这样的先生，他隐居在偏僻的乡村里，经营着一些仅存的产业，但每年必有几天出现在蒙特卡罗、巴黎或比亚里茨，在那里他住最豪华的饭店，由珠光宝气的女人陪着吃饭，与富豪的客人互相宴请，给起小费来惊人地慷慨，然后，他回到自己的隐居地去，省吃俭用地再过一年。

89 虽然今天的意大利已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富裕，但你也不要忘了上面所说的那一些。意大利人现在穿着好衣裳，开着新汽车，昂贵的饭馆里座无虚席，新开的公司用钢和玻璃建造起宏伟的总部大楼，但是他们中有些人（当然不是全部）除了身上的好衣裳、汽车上已付过款的那部分和用来买几顿昂贵饭食的钱以外，就没有多少钱了。有些公司把大部分的财力用来建造和装修辉煌的总部大楼。社会学家曾经统计过，南方的文盲和非熟练工在多年来第一次得到稳定工作以后，他买的第一件东西决不是生活急需的物品，而是象手表、收音机、电视机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他们最需要的是显示自己的走运，在乡亲们羡慕的眼光里感到心满意足。这以后他们才想到修补自己的房屋、购置家具、地毯、床单和炊具。他最后去买的是较好的食品，因为食品吃到肚子里人家看不见。

* * *

一个人在意大利总要怀疑周围是否在作戏，这种怀疑十分恼人。意大利的青少年就在这种无形的教育下变得复杂起来。外国人在这里呆的时间一长，他们起初得到的欢乐就被怀疑踌躇之感所破坏。驻罗马的外交官们不痛快地说：“意大利和俄国正好相反，在莫斯科一切都保密，但一切都清楚；在罗马样样都公开，没有秘密，人人畅所欲言，干事轰轰烈烈，但我们却什么也弄不懂。”因为怕犯错误，一些人就下了匆忙的结论：这里的一切都是作戏，表里不一，充满假象，就象醉汉眼中的世界，样样都有双影。这些谨慎的先生们象幼稚的孩子一样容易被引入歧途。意大利的外观并非始终都是假象。如果一个小伙子求爱时用了戏剧性的方式，就说明他爱得不深吗？如果一个演说者用眼角观察公众的反应，⁹⁰就说明他缺乏愤怒、嫉妒或热爱等感情吗？西西里的农村确实把自己的穷苦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这样一来它就不那么穷苦了吗？难道炫耀声威的军队必定是无能的军队吗？当然这些都不一定。本质和现象有时十分吻合，有时大致吻合，有时完全不吻合，这里并无一定之规。

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一个漂亮的外国姑娘趁着月光，在花园里或平底船上与她的意大利情人相会。这男子在她耳边温柔地说着保证与恳求的话，同时他的手就象自己有生命似地活动起来，抚爱她，把她拉近身边，抚摸她后颈上的短发，使她发痒，又大胆地滑到她衣服下边去。他的面颊挨擦着她的，他变得越来越热烈和放肆，难以抗拒。她怎样看待这些表演呢？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可能和其他忠实的情郎一样好，不过有点老练过分。与此相反，他也完全可能是个演技纯熟的骗子，也可能介乎二者之间。本质与现象之间可能只差一点点，就象照相机测距镜头里的两个像一样。那男子常常自己也不知道真实到哪儿结束，虚伪从

哪儿开始。他可能自以为是真诚地在爱，但其实这并不是全心全意的爱，而是被冲动和自己的能力所激起的暂时的情欲。在跟一个特别守贞的姑娘打交道时，他面临的情况就很困难，他的技巧和勇敢受到强烈的挑战，他的爱情因绝望就更其狂热。但无论他的感觉怎样，他的表演总是愉快动人和老练的，很少粗暴。那可怜的姑娘只有顺理成章地屈服，俯首帖耳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共同欣赏这幕活剧。

并不只是漂亮姑娘、外交人员或实业家才遇到问题，普通的游客也是如此，样样事都需要进行类似的分析判断。让我们从为
91 国父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二世所建的纪念碑说起吧。它是全国最大的一座纪念碑，座落在罗马的韦内齐亚广场。很显然，它体现了人民对解放他们并于一八六一年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国王和统帅的感激和歌颂。它华美的建筑风格是在二十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称为 *Belle Epoke* ——“美好的时代”）对罗马帝国风格的模仿。自从该碑一九一一年落成以后，有几百个电影的布景模仿它，无数的硬纸复制品模仿它的柱廊和门楣中心，这些情况有些损害我们对它的最初印象，但我们先不去管它。

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这座巨碑为什么要建在古罗马的正中心，在最神圣的七山之上呢？为什么它不建在城外公园里如马里奥山那种不太神圣的山上呢？为什么它掩盖了，实际上吞没了丘庇特神庙？难道这座名山的景色妨碍了现代意大利人的自豪感吗？（碑的大理石非常洁白，它不是罗马传统的石灰华，而是在北意大利的布雷夏附近开采的大理石料，因为当时的首相扎纳尔代利是布雷夏人）为什么碑的风格如此类似罗马帝国呢？

不久以后，我们开始察觉第一座碑之下的另一座碑。纪念碑特大的规模、所建的位置、建筑的风格揭示了没法完成意大利统一的爱国者少数派的不安全感，他们面对着几乎占压倒优势的反

对派，力求巩固国家的统一。他们想用对一位民族英雄的称颂来抵销掉许多昔日的英雄，用一个爱国者来抹煞所有非爱国者的意大利人，用一位国王来对抗所有复兴运动的共和党分子。如果埃马努埃尔二世没有存在过，或者他并不是那样一位勇敢慷慨的君主，可能当时的统治者上层也要把他发明出来，赋予他应有的种种品德。最后，我们得出结论，这碑不仅是心怀感激的人民对伟大君主的纪念与歌颂，而且是这种歌颂的一种戏剧性表演。

还可以看看教堂。最大最庄严的要数圣彼得大教堂，它无疑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圣所。从文艺复兴以来，许多最伟大的艺术家共同努力才使它成为今天这样。米开朗琪罗就是它的建筑师之一。各种与神作礼仪上的沟通所必需的道具和人员这里都有尽有。按照罗马天主教会庄严神秘的古老传统，各种宗教仪式都按时举行。在它的殿堂里每年都有成百人皈依正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个教徒坚定了信仰，得到了安慰。但是当人们把它与其他地方的教堂，与罗马城内较小的古老教堂相比较时，就会发现它是太豪华、太庸俗、太浮夸和太庞大了，不能赢得通常与宗教热情相联系的内心深处的感情。

在这里作祈祷也有问题，稀有的大理石的色彩、复杂的建筑形式、尽善尽美的雕塑、姿态生动的塑像、神奇的音乐、来来往往的观光者会使人分心。人们开始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它不仅是教堂和圣所，是神圣罗马教会的所在地，而且是这一切的戏剧性表演。人们发现，它的设计不仅是为了鼓舞宗教感情，而且是为了向观众炫耀教会的力量、庄严、财富和稳固，宣扬上帝的光荣。如果你有机会进入它的一个秘密宝库，看到里面为各种仪式而保存的装饰品和机器，你不禁会产生一个不大虔诚的想法：原来圣彼得教堂也是上帝自己的神圣剧院。

★

★

★

这种对意大利每一事物的幕后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游戏。街上的乞丐是真穷呢还是装穷？A先生是当代著名政界人物，他的像天天见诸报端，他在多大程度上是个真正的政治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个老练的扮演者？B先生是个优秀小说家，C先生是个著名演员，D先生是个名导演，E先生是个大诗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呢？这当然没有简单的答案。这些名人中的多数可能基本上名副其实，然而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是个扮演者。其中有几个可能就是巧妙的骗子，但可能也有几个人比他的公开身份更伟大，其他人则可能各有伟大之处。

例如邓南遮生活放纵得象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亲王，身边围着狼狗，屋里陈设着华丽而凌乱的古董和锦缎、稀有的东方香料、耀眼但不太贵重的珠宝。他穿着象个伦敦的交际家，专爱跟公爵夫人、世界闻名的女演员、狂热的俄国妇女一块睡觉。他写作细腻精巧的散文和诗歌，骑马纵狗打猎。他在政治上是个极右派，但实际上他本是个穷困的乡下才子，佩斯卡拉的小商人的儿子。

与此相反，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穿着高领汗衫和旧外衣，常用没教养的人所讲的笨拙语言来写作，随心所欲地使用孩子们会因发音不正确而受处罚的语汇。他公开陪伴失业的小明星，刚出校门的无名女诗人，金工或瓦工的女儿。他在政治上极左。实际上他是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曾按照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严格标准受过细致的教育（有他身着小芳特尔罗伊勋爵装和航海服的相片为证）。他父亲是一个勤勉的建筑工程师，他凭着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财产收入本可过很舒服的生活。

以上两人都是杰出的作家，分别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典型代表，都想代表一个阶级，代表一种并非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发言。他们表演得十分完美，要想一眼看出真身份和扮演的角色之间相差多远几乎是不可能的，精确的估计需要时间，在这期间必须谨

慎从事。

必须承认，在许多其它国家或多或少也是如此，自古而然。⁹⁴许多杰出人物都出色地表演着各自的角色，他们才能的一部分便是表演才能。尼禄临死时认为自己把罗马皇帝的角色表演得非常成功。路易十六则人人知道他一辈子都在作戏，而且始终不渝。有许多人能说服群众相信自己的伟大，而另一些人则只能在短时间里说服较幼稚的人，经不住推敲。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常采取礼仪性炫耀的形式：许多纪念碑和大厦往往既是它本身，又是对它本身的一种表现。请看看欧洲随便什么地方的古堡吧，它们具有多少严格的军事价值？它们的设计在多大程度是为了向敌人显示自己的坚不可摧？

在意大利情况也是这样，不过还有一个大差别。在别处本质总是优先的，外部表现虽然有用也只能居第二位。在意大利表面形式却跟本质同样重要，甚至重要许多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意大利的气候允许人们在多数时候生活在户外的街道和广场上，他们判断人和事很少根据书报和传闻，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据看、听、摸、嗅；也可能是因为意大利人天生喜欢铺陈场面、表演角色、上演戏剧；或者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喜欢炫耀，以至于不愿正视生活中暴露出来的无法粉饰的真理。这也可能是因为表演能很好地代替他们所缺少的东西，或他们就是喜欢一个能使他们振作的好演员，喜欢一种有艺术感染力的戏剧性气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其结果就是形式和内容永远被等量齐观，视为一体，无此即无彼，事物的表现就等于事物本身。

一个人要想理解意大利，理解它的历史、生活方式、文明、习惯并预见它的将来，就必须清楚地掌握这种对外表的依赖性。这一点决不能忽略，否则就是欺骗自己。这是意大利国民性的基⁹⁵

本特点。它帮助人们解决他们的许多问题。它支配着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决定方针和政策。附带提一句，它是意大利人在那些以表现为主的活动中常居优胜的原因之一，这些活动包括建筑、装饰、园林布置、修辞艺术、举行庆典、焰火、仪式、歌剧，现在又增添了工艺设计、人造珠宝、时装和电影。中世纪的意大利盔甲是全欧洲最漂亮的，它装饰华丽，造型优美，设计精巧，但用来打仗却嫌太轻太薄。真到战时意大利人也宁愿用德国盔甲，它虽难看但却实用，穿上安全得多。

意大利人照例特别欢迎那些危险地偏离现实的表演，这些表演以最少量的材料应付需要，不号称模仿现存的典型而仍然搞得有效、服人、激动人心和有趣。试举人造大理石为例，从很古以来地方上的工匠就有仿造真大理石的独特技艺。人们在教堂和王府里见到的大理石有一半是描画逼真的石膏赝品。它们并不见得一定比真货便宜，有时甚至更贵、加工更麻烦。在这些大理石仿造品中，意大利人更欣赏那些不模仿任何样品，而创造了自然界中所没有的独特的色彩组合的作品。他们最赞赏的是作者的大胆，是他敢于向造物主挑战的创造精神。

这种巧妙的技艺在意语中叫做 *Virtuosismo*。最巧妙的伟大艺术家尼科洛·帕格尼尼在结束他最复杂的奏鸣曲时常常要崩断小提琴的所有琴弦，只剩最后一根。许多世纪以来，意大利人就以巧妙的欺骗而著名，他们能骗过你的思想，骗过你的感情。他们的图书馆里塞满了美妙的爱情诗，但其灵感来源决不是粗鲁的情欲，而是把文字组织得音韵谐和、形式完美的高超能力。他们能写出无可指摘的文章，证明与常识完全相反的东西，能以经过狡猾的细微修改的数据为基础写出无懈可击的科学论文，在历史研究中仔细地删去与作者观点矛盾的史实。有些刑事案件的律师得意地夸耀自己曾使明知其有罪的当事人得以无罪开释。

许多人看出了欺骗，却欣赏这欺骗者的技巧。能这样做的人，是了不起的。人人都会用鸡蛋作煎蛋卷，但只有天才才能不用鸡蛋就作出煎蛋卷来。这技巧不一定是空头把戏，它常常有实用价值。举文艺复兴时代的交战为例。外国的战争都是大军之间货真价实的流血冲突，谁杀人多谁就获胜。意大利的战争却是优雅的不流血的舞剧。重金请来的雇佣兵头目领着漂亮但人数不多的部队，演出徒有其表的战争场面。在这个舞台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漂亮道具：旗帜、彩帐、华丽的马匹、羽毛。部队行动总伴随着适当的军乐、隆隆的战鼓、振奋人心的战歌、使人血液凝结的呐喊。他们满怀信心地来回调遣他们的小小部队，在各省之间互相追逐，互相攻占堡垒。胜利总是由幕后的谈判和贿赂来决定的。这是非常文明而有趣的战争方式。它和别处的战争一样，常常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却少花钱、少死人、少受罪。

在各个时代都有人怀疑意大利人奸诈，认为他们特别擅长在外交之类名声不好的可疑场合施展诡计、进行投机和设置骗局。苛刻的外国人说意大利人集政治骗术之大成，而且有些最著名的国际冒险家就是意大利人——他们经常举出贾科莫·卡萨诺瓦和卡廖斯特罗伯爵为例来证明这一点。这类指责由来已久，有些可以上溯到中世纪，有些还要更早。它们的根源在于种族和宗教的偏见和误解，但其中有些也不无道理。

首先必须承认，和其他民族一样，意大利人的某些美德有时会蜕化成相应的缺点。法国人的节俭容易变成贪婪；英国人的含蓄容易变成孤立冷漠；美国人的好动容易变成无谓的骚动。毫不奇怪，意大利人如此善于装扮生活的外表，这自然有时会使某些意大利人利用这种技巧为自己的利益而欺骗邻居。但是，总有些东西妨碍意大利人的骗局取得持久的、广泛的惊人成功。他们常常成为自己阴谋的牺牲品。意大利虽然也有冒险家、邪教创立者、

骗钱的金融家，但与其他国家的比起来，人数既少，影响也小。过去著名的国际丑闻没有一桩是跟意大利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约翰·劳是瑞典人。“南海泡沫”一案没牵连到一个意大利人，荷兰郁金香球茎的投机、上世纪末在巴黎分脏的巴拿马运河公司丑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的史塔威斯基案件，还有瑞典火柴大王克留格尔的兴盛与倒台，都与意大利人无关。

毫无疑问，意大利的卡萨诺瓦完全可以和国际最著名的冒险家和骗子媲美，但也可以证明，妨碍他达到最后成功的东西说来奇怪正是他极为典型的意大利人特点。他高大英俊，前额很宽，有罗马人的鼻子，样子象上等人，有权威的派头。他精力充沛，非常健康。他很聪明，写作又好又流利，会用好几种乐器，能轻松地
98 说和写好几种语文，而且意文和法文都很优雅。他读过很多书，能毫不费力地引用拉丁和希腊经典作家以及当代作家的作品。他能平起平坐地与哲学家、诗人和小说家谈话。他曾拜访过伏尔泰，跟他论辩某些细微的论点。他一见女人就喜欢，不大顾及年龄和品貌。在他的追求下，一般女人都难以抗拒。他的体力能满足最苛求的女人，他可以整夜再继之以白天几乎无数次地反复为她效力，中间只作短暂的休息。不过这还比不上他的惊人的心理耐力，他从不厌烦，从不反感，全心全意地交往着一个又一个女人，并且随时准备上床去陪伴胖的、瘦的、年青的、年老的、肮脏的、时髦的、贵妇、妓女、修女。他总是讨人喜欢，生气勃勃，直到很老了还象小伙一样有劲头。

他讲话非常令人信服，常能扮演他想扮演的任何角色。“我的秘密很简单，因为我总讲真话，人们自然相信我。”他在回忆录就是这样扯谎的。至少可以这样说，他的真话总是不大可信，有时是完全的胡说，然而有一度多数人都相信他。他毫无顾忌，从没有不好意思的时候。他孤单地死在国外，那时已是身无分文。一

位慈悲的朋友格拉夫·瓦尔德施泰因为要把他从赤贫中救出来，曾给他找了一个沉闷的工作，在波希米亚的达克斯他的城堡里管图书。这位大冒险家的余年十分不幸，他常要跟格拉夫的仆人发生丢脸的口角，这些仆人好搞恶作剧，要弄诡计来捉弄这个无依无靠的老人。

* * *

另一个与卡萨诺瓦齐名的意大利冒险家出生时叫朱塞佩·巴尔萨莫，但他自称卡廖斯特罗伯爵（卡廖斯特罗是当过他的教母的已婚姑母婆家的姓）。他的成功很令人费解。人们形容他又矮又胖，又丑又黑，而且肮脏，庸俗的脸上带着阴沉多疑的表情。他粗鲁傲慢，好自夸，好发火。没听说他有情妇，可算一个忠实的丈夫。他实际上是个文盲，只有一种语言说得不错，那就是西西里土语，而说其他语言时总带着很重的西西里口音。“他没有任何引人之处。”拉瓦特这样对年青的歌德说。歌德对这个著名的骗子极感兴趣，在巴勒莫时歌德特意去找他，以便亲自证实卡廖斯特罗伯爵和朱塞佩·巴尔萨莫是否的确是同一个人。（卡廖斯特罗 99 终生都不承认这一点）歌德在一间极为干净的厨房里找到了他的家人，发现他们都是诚实敬神的穷人。卡廖斯特罗的母亲伤感地请求年青的德国诗人，如果他万一在北方遇到她的儿子，那么提醒他，他还欠母亲的钱呢。几年前他上次回家时把母亲的一些珠宝给当了，一直也没赎。他的亲戚们对歌德说：“听说朱塞佩交了好运，现在生活得象个富翁。要是他能回来关照关照我们该多好啊！”他们坦率地表达了西西里人的一种至今还很普遍的心情——希望得到阔亲戚的接济。

朱塞佩于一七四三年生于巴勒莫。他进过修道院，在那里一些献身于治病救人的好心教友们教给了他起码的医术，这医术在他后来的生活中颇有用处。不久之后他就逃走，在街上长大，没

钱时就做非法的买卖。他参与了一些不识字的穷人的原始巫术活动（这些蒙昧的人们仍然保存着基督教以前的和穆斯林的传统与信仰）。他卖麻醉药，念咒，请神，卖护身符，预言未来，治病，只收很少的钱就为主顾隔着老远咒死敌人。但他在一门技术上有特殊的天才，而且终生都在不断改进，这就是模仿签名的手迹，他的模仿甚至能骗过原来的签名者。他还能伪造任何一种文件。在一七六八年，他认为在巴勒莫已没得可学了，于是决定到别处去碰运气。

他移居到罗马，在那里遇到洛伦扎·费丽恰妮并跟她结了婚。洛伦扎是一个小手艺人的女儿，她有惊人的美丽，在二十年后仍旧迷人。这样一来，朱塞佩为自己讨厌的缺点所限而做不到的事，可以在他妻子的帮助下做了。面带微笑的洛伦扎迷住了有钱人，打消了他们的戒心。有些人花大价钱来跟她睡觉，有的人只要看到她美丽的容辉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全都被她的丈夫刮了一层皮。卡廖斯特罗常装作嫉妒得发狂，向这些主顾讹诈（在伦敦他曾毫不费力地敲诈了一个有家室的公谊会教徒），但更多的情况是平心静气地收费。（这在当时司空见惯，十八世纪一个著名芭蕾舞演员的丈夫常说：“长角如长牙，毗出来不好看，吃饭时还是有用的”。）同时，他还继续搞自己的巫术。

象所有大冒险家一样，这对年青夫妇走遍了欧洲。不论走到哪儿，他们都生活得很阔绰，得到许多有地位的阔朋友的赞助和支持，这些阔朋友很快就在洛伦扎身边聚集起来。在圣彼得堡，波将金本人亲自给他们当保护人。卡廖斯特罗在所到之处都按照自己发明的共济会仪式组织起一个叫做“埃及神社”的团体，它有许多其他团体从未听说过的神奇的秘密。他妻子的那些朋友总是全都履行复杂的仪式而加入神社。神社的特权之一是能向大科普特，也就是神社的领袖，即他本人，买到长生药。他著名的长生

药共有两种，其中比较便宜的一种一喝就能把时间定住，较贵的那种能把时间给倒回去，让服药者返老还童，倒回去的时间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等，视剂量而定。这两种药获得巨大的成功，卡廖斯特罗的药瓶子充斥于欧洲。

他经常宣称，他自己就是他的秘方取得成功的活证明。他已经几千岁了，而且记得他漫长生涯中的每一件事。他时常追忆金字塔的建筑过程、他所遇到过的罗马皇帝和耶稣基督曾对他讲过的话。没有一个过世的大人物逃得过他的友谊。他也许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佚名者。炼长生药只是他的次要工作，他还进行各种各样的魔法仪式和实验，当着持怀疑态度的观众的面把铅变成黄金，与圣灵沟通，治病，预言未来，等等。这些东西有些纯属骗术，但有些却说明他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先验能力，因为他确实治好了不少人的病，而有几条预言竟实现了。他在一七八五年从法国逃走时就预言过革命和巴士底狱的崩溃，还预言过“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即将出现”。 101

罗翰红衣主教确认，他曾亲眼见过卡廖斯特罗炼金，就在他斯特拉斯堡的府邸里，还见过他用一块小石头做出了价值二万五千法郎的钻石。红衣主教说：“他将使我成为欧洲最富的人。”主教为这位魔法大师立了一座半身大理石像，铭文是“神奇的卡廖斯特罗”，安置在他的萨维尔内乡间别墅的楼梯拐角处。在巴黎这个适合江湖骗子活动的大都市，卡廖斯特罗和他妻子获得了巨大成功。洛伦扎采用了塞拉菲娜这个名字，自称是来自另一世界的不老的精灵。卡廖斯特罗既为他阔绰的赞助者，也为那些从早上起就守候在他门前的穷汉们治病。可是不幸得很，他与那位轻信的红衣主教的友谊把他牵连到著名的王后项链事件里去，结果他和洛伦扎都被关进巴士底狱。但他很快证明自己无罪。他被释放了，但立即被警方驱逐出巴黎。

这个意外事件竟导致了他的完蛋。这对夫妇又一次穿行欧洲，但很不成功，过去的魅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已经臭名昭著，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个骗子。这对夫妇最后来到他们大约二十年前离开的城市罗马。这是他最终的错误。他在这里治病完全失败，因为罗马人既不象巴黎人那样爱生病，也不象他们那样容易上当。他使出最后一着，试图组织他那著名的“埃及神社”的罗马分社。他邀请了所有大人物，包括高级教士来参加他在马耳他别墅举行的开幕式。（马耳他别墅紧挨着梅迪奇别墅，它过去属于马耳他骑士团，后来成了一九一四年的德国驻罗马大使冯·俾娄的官邸，现在属于耶稣会。）

102 一个心存怀疑的目击者贝内代蒂神父对于卡廖斯特罗这次企图摆脱困境的绝望努力曾做了如下记述：伯爵个子不高，又黑又壮，坐在一个三脚凳上活象古代的西比尔^①，发表着好象是为这个会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今天我应当揭示自己的身份，公开我的经历……我看到了无穷无尽的沙漠，巨大的棕榈树把荫影投在沙地上，尼罗河静静地流，狮身人面像、方尖碑和圆柱庄严耸峙。这里有奇妙的墙垣，庙宇为数众多。……到了圣城孟菲斯。……胜利之王，光荣的吐特摩斯三世正走进大门，他刚刚打败了叙利亚人和迦南人……我看见了……现在我又到了另一座城，这里有供奉耶和华的圣庙……新神战胜了旧神……我听到了喧嚷，这是群众在向先知，向上帝的儿子欢呼……他是谁？他就是基督。啊，我在卡纳的婚宴上见到了他，他在往酒里倒水……”

神父补充说：“这时他一声大叫从三脚凳上跳下来，并且嚷道：‘他并不是唯一的奇迹创造者，我要让你们知道，向你们公开我的秘密，我无所不知，我长生不死，是大洪水之前的人。……Ego

① 西比尔（Sibyl），古希腊罗马的女预言家。——译者

sum qui sum。”他接着把几滴魔水滴到一个水瓶里，然后把这水兑到酒里。（“这酒象奥尔维耶托酒样闪亮”，神父及时地补充道。）他宣称这就是古罗马人的法莱诺酒。“几个尝了这酒的人都说味道好。”神父是这样记述的，但他自己没去碰。后来伯爵又讲述他所具有的其他神力和长生药。他把几份一号长生药的样品分发给观众中的几个老者。老者吃了以后眼睛立刻有了光彩，面颊也变得绯红。（神父在日记里记道：“长生药的明显效果就好象蒙泰菲亚斯孔的宝镜。”）

最后，他表演了把小钻石变成大钻石的本领。在座的有法国大使贝尔尼斯红衣主教，他是卡萨诺瓦在威尼斯和巴黎时的朋友。卡廖斯特罗向红衣主教借了一个戒指，放在坩锅里，加入各种液体和粉末，嘴里念念有词，他说他念的是古埃及语和希伯来语。当他把戒指还给主教时，上面的钻石已比原来大了两倍。“主教大叫真是奇迹，”贝内代蒂神父写道，“但我认为第二个戒指跟第一个毫无关系，而且第二个戒指上镶的不过是水晶石。” 103

这次活动完全失败。卡廖斯特罗本人被教廷下令逮捕关进了圣安杰罗城堡，这倒并不因为他是骗子，面是因为他的异端邪说以及对教会和天主教的冒犯行为。他的妻子提供证词，进行揭发，保住了她的命。他本人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后来减为终身监禁。他被关在里米尼城附近坚固的圣莱奥城堡的一间小小囚室里。在法国革命军抵达前不久，他就死了。法军后来侵入教皇国并且一路上释放了所有在教皇暴政下的囚犯。

* * *

我认识一个在罗马住了大半生的英国老太太，她常好摇动着一个手指说：“在每个意大利人身上都有一点卡廖斯特罗和卡萨诺瓦，即使在最可靠的人身上也是如此。”这个情况当然并没有使她不愉快，但毕竟不完全准确。的确，卡廖斯特罗和卡萨诺瓦不会

生于别处，他们的冒险生活乃是意大利人特有的一种反抗方式，反抗一个使他们贫穷、无权和受人藐视的世界，反抗当时只给予他们贫困、屈辱和小丑般的生活的国家。他们也有意大利人的共同缺点，他们不能利用自己的特殊天赋去建树一些实在的东西，去稳定地改善自己的生活，去取得持久的荣誉、财富、威望和权力。这些事外国的冒险家们做到了，但他们做不到。

104 有些因素总在阻碍他们。他们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他们得财容易，挥霍也随便，只要看到成功的表面现象便心满意足了。他们的市场在欧洲，而不在意大利，他们只有到国外才能找到足够的主顾。他们的成功部分地取决于主顾和观众中是否没有别的意大利人。上他们当的只有外国人。观众的轻信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过分自信。他们的高超技艺把自己引上了迷途。他们自欺欺人，把自己的经历编造得越来越令人难以相信。因此，只要一踏上意大利的土地，他们就要失败。卡萨诺瓦在威尼斯进过监狱，被迫两次出逃，卡廖斯特罗在罗马最后失败。他们俩都算不上好的意大利人。好的意大利人从不出国，平安过日子，发挥才能时要小心谨慎，尽量不要引人注目，不要死在监狱里或遥远城堡的囚室里，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清白的名声，留下一份可观的遗产。不要变得臭名昭著乃是最重要的原则。

综上所述，现在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意大利人喜欢表演？为什么他们常常喜欢生活于他们自己那个扑朔迷离的装假的世界中，生活于用纸板做成的现实世界的复制品之间？为什么他们喜欢说半真半假的言词，用激烈的手势制造感情和冲动？首先，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驯服和美化原始的自然界，使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好过一些，变得体面、有意义而愉快。其次，他们这样做是为个人的目的。好的表演可使一个人取悦于有权有势的人，帮助他在这世界上生活，达到目的，解决问题，润滑交友之轮，在敌人

的覬覦和强徒的气焰下保护自己。再次，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向不公平的命运进行报复。

在艰苦的岁月里和血腥的暴政下，表演也可用作防身的手段，常常是唯一的手段。在上次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意大利成了外国军队的战场，本身又被内战所分割。我当时正住在托斯卡纳海岸的一个偏僻地方，靠近圣斯特凡诺港。盟军对我们日夜轰炸，在一次轰炸间歇时，一个德国海军上校和一些军官来拜访我。他们仔细地观察了我的房子，看是否有什么可疑之处，彼此含糊不清地讨论着，最后放了心，坐下来喝葡萄酒。我跟他们一起喝。上校叹息说：“你不知道，现在在意大利生活对于象我们这样的人是多么凶险。毫不夸张地说，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敌人，是可怕的死敌。”我没吱声，他就接着说：“并不是人人都象您，先生，从您脸上我能看出来，您希望您的国家和德国盟友获得胜利。您可能不会相信，有许多人只希望我们失败，可是又没有可靠的办法把他们识别出来。” 105

这番话使我瞠目结舌，这位上校竟如此真诚地吐露了他的苦闷。他周围的意大利人走来走去，脸上竟没有一个大记号，看不出是“纳粹德国的忠实盟友”还是“希望本国及其盟国失败的可耻叛徒”，这个事实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怎么可能真正分清敌友呢？难道他能看到人们的思想？意大利人在他面前全都一样地微笑着，温文尔雅地谈论着天气和战争，全都表示同样不明确的希望，祈求胜利与和平快快来到，全都举杯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祝福，显露出同样的诚恳与可靠的神情，就跟在向一个好德国人祝福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凭眼力挑出好意大利人来褒奖而把其他人枪毙掉呢？他显然认为在我这里他可以放心，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并不知道我是被列在法西斯政府的可疑分子名单上，一见到就要逮捕，还可能被枪毙。（这类名单很长，在前线

没有实际意义，因此他们往往把它忘在未拆开的信封里。)他们不可能知道，我正在积极地参加地下工作，当时正在尽一切可能帮助游击队。我不告诉他们，他们如何能知道这些呢？

作为典型例证来说，我举的这个例子是过于极端了。那位上校的头脑比起他的多数同胞来无疑是太不清醒了。可能他累了，被连续不断的轰炸弄昏了头，变得沮丧而紧张。也可能他本来就愚蠢。不过，他那真诚动人的悲哀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在我所遇到的北方人对于意大利生活的复杂性感到迷惑的例子里，这是使人印象最深的一个。他的话附带也证实了，尽管我出国旅行很久并且是在国外受的教育，但我仍是一个十足的意大利人，因为我没费一句话就使一个可怜的、没头脑的、忠诚的纳粹相信我是公开坚定地站在轴心国一边的。

在意大利喧嚣活跃的图景之后，在亲切、喜庆、动人的景象之后，在炉火纯青的表演之后，却存在着另一种肮脏、悲惨和无情的生活。生活本身常常就是令人苦恼的游戏，有时甚至是十分危险的游戏。一个人从摇篮起就被许多邪恶而强大的幽灵所包围，如果他长大以后不能摆脱和击败这些幽灵，他的一生就注定是悲惨的，但他绝望的努力只能对其命运发生微弱的影响。

第一个幽灵是贫穷。意大利至今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总的说来比除西班牙以外所有的西欧国家都穷。（根据计算，它现在的平均生活水准只相当于美国的一九一四年，法国的一九二四年和英国的一九二七年。）南部仍是最糟的地区。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政府大量投资，但总的情况只稍有缓和，仅略好于北非。大多数人的收入仍只够糊口。这比起过去的苦难来当然是一个进步。在新建的工厂里，经理强迫工人每天必须在工厂食堂里吃一顿饱饭，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吸收到足够的卡路里以承担工作。这里人都知道，如果让他们回家吃午饭，那他们就实际上什么也吃不到，因为他们必须把食物分给许多挨饿的亲人。北方工业区情况较好些，但中间偏下的阶层，如收入一般的工人、态度谦和的雇员，他们有一种令人伤感的、隐蔽的贫穷。他们经常注意节省每一个里拉，¹⁰⁷不是为自己争取什么地位，而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让他们受到较好的教育。他们的儿子们因贫穷而愤怒，就是所谓的文化无产者，他们的收入比不熟练工人还少，他们从事的职业包括教师、

城里的医生和村镇的兽医、小官吏、警官、工会组织者和各政党的下级干部。

穷人中还有破落然而骄傲的贵族，他们曾经拥有富饶的土地，但是在价格下跌、土地改革和外国竞争的情况下破产了；有昨天和前天还是上等人而今天已两手空空的人物。所有这些落魄的人都加入了文化无产者的行列，形成极左和极右的狂热运动中的骨干。即使在不存在贫穷的地方，在颇为富足的人群中，也总是害怕可能受穷，这就给一切事物投上了阴影。富人往往把钱看成时疫流行时的金不换的药品。许多人动情地依恋着钱，用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手段保护它。

第二个幽灵是愚昧。文盲仍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到三十，这数字根据对文盲下的定义不同而变化。一个不能阅读只能写自己名字的人算不算文盲？而一个虽上过学但却忘得精光，或者只能在街头广告上偶尔认出几个熟字的人算不算文盲？即使已肯定能读会写的人也不见得熟练精通。在意大利每百万人口中报纸的发行量低于其他任何西欧国家。在有文化的少数人中，他们的文化知识一般也是过时的、狭隘的和不适用的。

除了内阁部长、新闻工作者、外交人员、实业家、少数学者和有钱人外，实际上没有意大利人能出国去研究外国的风俗习惯，并把外国与本国相比较。对于外部世界情况的严重无知，造成了毫无道理的傲慢与偏见、对外国人过分的羡慕或荒唐的轻蔑。战后冒出来的新政治家们，多半都只熟悉一种技巧，最难的技巧，这
108 就是如何让自己在轻率的选民中被选上，如何在本党、国会和政府内谋得高位。他们在日常杂务中忙得不可开交：每天签署成千封信件、磋商事务、乘飞机出席国际会议、旅行各省、在各种场合作各种谈话。他们忙得不仅没工夫认真考虑国家的问题，没工夫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新办法，没工夫调查了解运转不灵的国家机器和分

析它出毛病的原因，而且有时连报纸也没工夫看，只能让下属读给他们听；下属挑出几段供他们细看。政务大半靠耳朵来进行。

大学教授是最博学的意大利人，是民族文化的保存者，但他们却缺钱买书和做简单的科学实验。大学的实验室非常不合要求；图书馆小得可怜，书籍陈旧。因为薪水微薄，教授们必须做额外的工作以谋生，他们或者充当企业的顾问，或者做与所教专业有关的实际工作，如医师、经济学家、律师、地质工作者、工程师、外科医生等，并以此为主要活动。他们名片上的教授头衔只不过能帮他们多挣一些钱罢了。他们必须居住在有钱可挣的地方，坐车到有他们教授职位的外地去上班，这使他们无暇他顾，因为他们又要讲课，又要跑路。许多人只是靠随便翻翻专业杂志来跟上国外的形势。只有少数几个杰出人物一心搞研究，并为进行研究弄到了必需的经费，成为本领域的世界权威，获得诺贝尔奖金。就连教会也疾呼普通神职人员和地方牧师水平太低，他们的世俗知识和神学知识常远低于他们法国和德国的同事。

第三个幽灵是不公正。意大利法律太多，各种法令、条例、规范、规则、惯例乱成一团，有些已经几百年了，有的是上星期 109 刚由国会通过、今天早上才由总统签署的。如果它们一下子全部生效，就会使全国的一切活动瘫痪，使飞机车船停驶，使商店工厂医院学校机关关门。意大利第一流经济学家和前总统，已故的路易吉·艾瑙第曾计算过，如果把法令汇编所载的全部税都收上来，那国家将征得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百一十。法令多如牛毛，而且互相矛盾，模棱两可。可以肯定，如果一个坚决的政府想搞一场或者极左或者极右的革命，那它只要挑出若干个有关法令来把它贯彻到底就行了。谁也不知道有多少法律仍然有效；谁也不知道有些法令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议会辩论这些法令时，即使求助于当初立法者的发言记录往往也弄不清它们的意义和确切的目

的。它们之所以不断出现是因为意大利人有一种奇怪的迷信：当事情出了毛病，问题弄不清楚而没有其它法子可想时，他们就通过一项新法律，这种法律常常是太复杂而无法执行，但人们希望它能创造奇迹，像神奇的符咒一样保佑他们避开某种灾难。法律中当然有些是有用的；少数几项是好的。许多无用的和不实际的已被人们忘却了，“不用等于自动废除”是一个专门术语。但是出于某些有势力人物的利益，过时的法律却可能在说不定什么时候被从遗忘中重新起用，掸掉尘土，作为武器来致对方的死命。

法院很少去清理这些混乱。神经健全的意大利人也决不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毫无把握的公正。一般的情况是，占理的人决不去打官司；那太危险了。只有感到理亏和被动的人才上法院。专家们对这种情况是这样解释的：“首先，法官可能犯错误，使判决对你有利。其次，无论如何诉讼总要拖上多年，一次又一次地延期，这样你的对手就有可能失掉耐性，结果达成妥协。”审判拖得没完没了是因为法官人数既少，报酬又低，而且缺乏助手。法官110 们一般都是聪明博学和忠诚的人，他们忙于处理堆积如山、简直要把他们埋掉的法院文件；这些文件每天都堆在他们的桌椅上、破旧办公室的地板上、靠在墙边摞到一人多高。地方上的法官没有秘书，常常也没有电话。打字机是职员们自己掏钱买的转手货，而且只能偷偷用，因为法律规定所有文件必须用钢笔墨水和正规字体写成，否则不合法。

一九六三年一月，意大利最高级法官中的一位在正式谈话中抱怨罗马的许多法官缺少自己的办公室，缺少桌椅。其中特别恼人的是缺少椅子，因为诉讼过程很长，无法站着进行。多数案子都是律师们之间私下了结的。债权人常被迫接受非常吃亏的解决办法，只收回象征性的或只是一小部分应得的财物，因为若想多收回一点还要等上许多年。“Pochi maledetti, e subito”已成为一

条规律，意思是“就少给点吧，该死的，不过要马上给”。就连这种变通的解决办法也不便宜，穷人多半负担不起，他们常常宁愿当不公正的办法的受害者，接受明显的委屈，然后把这事整个忘掉，而不愿去打这种麻烦而花钱的官司。他们指望有朝一日能找到机会对敌人进行报复，他们说：“干坏事总要遭报应的，说不定是在哪一天。”

官员们当然应该解释和执行法律，他们一开始至少应当知道法律是些什么。但他们收入少、待遇低，被选拔和组织得很差，因此他们一般都缺乏耐心，忙忙碌碌，既专横又无知，对别人的问题很冷淡，傲慢无礼，有时还贪污。他们中也有几个聪明能干的人物，没有他们，国家机器就会全盘停止运转。他们对法律本身知道的不见得比别人多，但他们能够找出一条路子来避开纠缠不清的官样文章和陈规旧套，把大宗文件缓慢地推动，设法解决一些问题。在每个部门里都有两三个人，愉快地把大家的工作都作了。其余的人每天把帽子往帽钩上一挂，证明他们来了，然后就出去蹓跹、回家或干别的挣钱多的工作去了。几个好官员显然 111 是不够的，所以办事必然拖拉。举个例子：一八六〇年加里波第的红衫军曾给西西里岛的财产造成损失，这笔赔偿费直到九十六年后的一九五六年还在支付，但由于里拉贬值，支付的金额已毫无价值，事主的继承人也记不清他们为什么有权收到这么可怜的一点钱了。没人感谢热心的官员，他们的成绩得不到奖励。根据规章制度，薪水只凭资历，少数好雇员跟多数冷漠无能的同僚自始至终经历着同样的过程，他们在同一天增加同样多的工资，同时被提升和授勋，在同样的年龄获得养老金。谁也不会因工作无效率而被解雇，除非是他罪恶昭彰，比如抢了保险柜、偷了款子或杀害了上级。

各阶层的意大利人（除了那些有得力朋友的重要人物）都得

花大量时间去排队，他们气鼓鼓地站在各种窗口前面，无尽无休地等待，不过是为了他们的某些简单的权利得到承认。他们究竟有哪些权利，谁也说不清。“含糊”在意大利被用来作为治国之道。共和国的官员比王国时增加了几倍，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现代国家职能的扩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尽量给执政党的支持者以稳固的职位。当按照宪法的要求把这个国家分成若干较小的自治区之后，这些拥有主权的小区就将拥有自己的小政府，通过自己的复杂法律，合法地筹集贷款、借债，组织自己的机构和规章制度。官员人数和排队人数还将相应地增加。

112 恐惧是第四个幽灵，它是前三个幽灵——贫穷、愚昧和不公正所派生出来的，但比前三个更厉害，影响更大，也更有害。“恐惧”潜伏在意大利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潜伏在人们并不怀疑它的地方。贫穷、微贱和受压制的人害怕他们专横的东家；有钱有势的人害怕他们不可靠的和难控制的下属；中产阶级既怕富人的势力又怕群众的暴乱。恐惧影响到几乎所有的问题，它使政治决议变得尖锐，把不满激成暴乱。它支配着许多人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性格。它使坚强的人丧失意志，忠诚的人丧失道德，自由的人丧失独立，诚实的人丧失对真理的热爱，骄傲的人丧失尊严，聪明的人丧失逻辑性和一致性，忠心的人背叛朋友和信念。它扼杀了一切希望，教人逆来顺受。

意大利人最怕突然横死。他们是容易激动的民族，好象灰堆里的热煤，随时可能冒出火苗。意大利是一个血染的国家，每天都有嫉妒的丈夫杀死他通奸的妻子及其情人，大约也有同样多的妻子杀死她通奸的丈夫及其情妇。诱奸天真少女的人被她的父兄杀死，少女杀死企图强奸她的人。绝望的年青恋人双双殉情或同时分别自杀。这种由爱情所致的屠杀稳定不变地多少世纪来一直在继续，它肯定比蹂躏意大利的天灾瘟疫和在意大利国土上进行

的战争造成了更多的生命损失。

金钱、荣誉、威望、政治、为势力和生存的拼死斗争，也每天造成生命的牺牲。被解雇的工人杀死雇主；破产的实业家自杀或杀死竞争的对手；愤怒的纳税人杀死税吏；不及格的学生杀死老师；黑手党分子杀死对手、侦探、警察和旁观者。法西斯分子杀死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杀掉法西斯分子。骚动的工人用石块、木棒、报纸卷起的钢管和吊货钩打死警察和罢工破坏者；警察杀死骚动的工人。共产党的老领导人被年青党员的暴力行为吓怕了。当号召年青党员进行和平示威时，他们就捣毁遇到的一切，掀翻 113 轿车和有轨电车，恶毒地殴打围观群众，导致自己毫无意义地被杀害。

烟花世界也要求每天都有为它献祭的牺牲品。妓女被发现死在她们衾枕散乱的床上，或乡间小路上，或者是长袜勒紧了脖子，或者是肋间插进了匕首。在公园里发现和善的同性恋者的尸首，他们的头被打烂，口袋被翻出来。黎明时分在荒凉的海滩上发现一丝不挂的应召女郎被淹死在几吋深的海水里。妓女杀死她们平时一本正经地称作“我的未婚夫”的皮条客；皮条客们和毒品贩子彼此为争夺地盘而互相残杀。这里有西方世界最触目惊心的车祸，每年要死数以千计的人。火车事故也死人。此外还有周期性的地震、洪水、山崩和海啸。

即使在没有死亡阴影威胁的时候，在生活宁静而愉快、生命安全有保证的时候，意大利人也必须保持警惕，谨慎行事。意大利与加利福尼亚大小相仿，但没有那么肥沃的土地和那么多天赐的自然资源，而居民却多得难以置信，达到五千万。因此在每一个层次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着激烈的、无情的、无尽无休的竞争。直到最近各种工作还是很难找，现在普通的工作很多了，但好工作仍很少，多数人所追求的工作仍很难得。由于这些情况，回旋

余地不多。这个国家常被比喻为“一盆汤周围的勺子太多”，那就难怪客人的吃相象现在这样难看了。

意大利人从小就学会了闭口不语，遇事三思而后行。他接触到的每样东西都可能是一个陷阱；他迈的每一步都可能踏上一个雷区；他说的和写的每一句话将来都可能成为对自己不利的把柄。在某个仪式上或在郊游时，如果有陌生人与他合了影，他也一定很注意那个人，今后有一天这张照片可能被拿出来当作有破坏性的证据，证明他跟某恶棍是同谋，或者是达成了在政治上忠于谁的妥协，最后可能毁了他。在法西斯统治的最末两年，那些不敢或没有钱而不能离开工作的谨慎的新闻记者，都不在文章上署名。他们辛酸地说：“*Chi si firma è perduto*”（谁署名谁就完蛋）。这句话正好解释了墨索里尼的一句傲慢口号：“*Chi si ferma è perduto*”（谁挡路谁就完蛋）。公然在法西斯文章上署名到底的，或者丢掉工作去坐牢或去搞地下运动的，当然也不算少，但是，这需要特殊勇气。

一个意大利人必须懂得如何在最特殊的环境下照料自己和亲属，并且预见未来的各种紧急情况。在上次大战中，不知为什么农民总十分清楚在军队迫近时应做些什么。“牲口和妇女们上山啰！”他们发出这样的命令，因为他们的祖先曾这样命令过许多次。他必须懂得唯一可靠的只有自己，只要有一刻放松，以为太平无事，他就要完蛋。太平日子在意大利从来不会维持多久。

命运无常，前途多变。“*Pourvou que ça dure*”（但愿能维持长久），这是莱蒂齐亚·波拿巴夫人在她儿子拿破仑统治全欧时，常用她的科西嘉口音念叨的一句话。拉凯莱·墨索里尼在她丈夫走运的二十年中用她的罗马尼亚口音和不同的词句也在重复同类的话。年老的埃马努埃尔三世国王常阴沉胆怯地望着窗外大群向他欢呼的人们，他对随从参谋说，如果他被处死了，恐怕

会有同样多的人为之欢呼，而且同样起劲。他永远忘不了他的父亲“好国王”乌姆贝托是在一九〇〇年被一个叫布莱西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打死的，那人来自新泽西的派特森。

恐惧使意大利人学会了谨慎地生活。他们象老练的侦察员穿越森林那样，前后左右察看，倾听细微的音响，探测前方有无隐蔽的陷阱，注意树干上、断枝上和压倒的草上有无记号可寻。他们有从九死一生的境地活着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最突出例子之一可能是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的一生。在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之后，他刚二十多岁就出国流亡，被派到莫斯科担任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住在高尔基街的勒克司旅馆，跟所有的共产国际领袖是邻居。他每天都跟俄国革命的英雄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莫洛托夫、托洛茨基一起工作。他们对这个不显眼的戴眼镜的小个子意大利人很友好，在他们看来，他唯一的弱点是喜欢追求那些从西方国家来充当信使和秘书的年青姑娘。他只在内战时去过一次西班牙，还去过几次巴黎，其他时间都呆在莫斯科。

最后，他成了他那一代人仅余的几个幸存者之一，成为西方对马列主义最权威的解释者。那些在共产国际跟他坐在一起的人都死了，多数是被斯大林杀了，有些是死于他们那种无秩序的冒险生活，只有很少几个人是终其天年。谨慎寡言的陶里亚蒂是一个国立孤儿院管理人的儿子，这个孤儿院是为撒丁岛下级官员的子女而设的。他是懂得生存的必需知识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知道意识形态之风将向哪儿刮，什么人将是下一个主人，什么人真有力量，什么人只是貌似强大，哪个朋友要停止往来，哪个敌人将要成为朋友，哪里是陷阱需要回避。收入微薄和生活无保障的意大利文化无产者的生存艺术胜过了国际共产主义最高层领导人亚洲式的诡谲、无情和残忍。

有钱有势的人当然担心他们的财产、特权和在社会上的名誉

地位，常常还担心自己的生命。他们因为极其胆怯，觉得缺乏安全保障，所以总是不由自主地追随许诺给与他们持久而可靠的安全的政客。这并不是新鲜事，在中世纪，富人被称为 **popolo grasso**，即肥人，穷人被称为 **popolo minuto** 或 **popolo magro**，即微不足道的人或瘦人。肥人总是瘦人憎恨的目标。肥人组织政党，无情地玩弄强权政治，雇用刺客来消灭他们的敌人。他们把府邸建得固若金汤。现在这些古老宅第多半已经被银行、保险公司、政府机关或外国使馆占据了，直到今天它们的门仍然可以随时设障保护起来。一楼的窗户安着结实的铁栅，有通到屋顶的便道，以便把开水和熔铅泼到进攻者头上。在墙上到处留有不显眼的窄缝，以便射弩和放枪。奎里纳尔宫本是教皇作为世俗统治者的活动中心，后来是意大利国王的王宫，现在是意大利总统的官邸。在它大门左面有一座坚固的红砖圆塔，在塔的厚墙上开有足够多的射击孔，如果再有这种需要，仍然还可以从孔里向袭击者集中开火。

富有的意大利人还知道，他们必须随时准备应付突然的事变。一项新法律可能会一下子剥夺掉他们一部分或全部的财产。革命也可能突然爆发，他们要随时准备出逃。这种事过去有过，现在也可能再发生。多少世纪以来富人们从一个意大利城邦逃到另一个城邦，一次又一次地策划如何率领友好的军队重返故土。自由派和民主派是在复兴运动中，在十九世纪国家统一起来的时候，结束流亡生活和皮埃蒙特军队一起回来的。反法西斯的流亡者是在大战结束时随盟军一起回来的。在一九四四年许多人因受法西斯的威胁或因害怕革命而逃往国外，有的藏在修道院里，直到环境安全了才回来。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准备走：他们在附近港口准备了游艇或在瑞士边界附近准备了快车，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出走。

穷人的恐惧与富人的恐惧大不相同，他们没有保镖，没有私人军队，在国内国外都没存着珠宝，没有宅第，没有得力的朋友。他们能够失去的只有可怜的工作和自己的性命。他们不喜欢现存秩序，但也怕变革。即使革命家们也害怕革命，他们在文章和演说里起劲地宣传下一次浴血之战，但却很少为血战到来作实际努力。斯大林看不起陶里亚蒂的胆小，他有一次对铁托说：“陶里亚蒂永远也不会掀起一场革命。瞧他那样儿。他是个律师，是个教授。”他认为这个意大利人在共产国际里是起草措词巧妙的文件的高手，但别无他能。穷人知道，不论起了什么危机或骚动，首先 117 的受害者就是他们，即使这骚动是由他们自己掀起的也是这样。在法西斯政权倒台时，在最初几天的狂风暴雨之后，在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以及他最后一届政府里的许多成员被枪毙了之后，有名的大人物很少被逮捕、审讯和处决的，可是却有成千的不知名的小人物被任意杀死或逮捕、关入集中营、审讯和判决，理由是他们要对发动这场战争和给国家招来灾难负直接的责任。

* * *

意大利人对几何图形、整齐的建筑设计、普遍的对称有特殊的爱好，这是他们喜欢炫耀的一部分。但是，在这种爱好后面也隐藏着恐惧，是一种对生活和自然界里潜伏着的不可控制、不可预知的灾祸的恐惧：是恐惧，也是恐惧的阴影，是对消灾免难的痴情渴望。对这种整齐、匀称的偏爱随处可见，这种整齐、匀称很少有什么实用意义，一般只是为了悦目赏心。卖水果和蔬菜的小贩不惜花费早上的宝贵时间，把他的货物摆成整齐的金字塔，然后再在一天时间里把它拆下来。新来的女仆天天早晨挪动你房里的家具，固执地要满足她整齐对称的理想。她把壁炉台上的小摆设摆来摆去，直到堆得象个祭坛方才罢手。旧式的花园不给无拘束的大自然留丝毫余地。它有图案复杂的树篱、石径、喷泉、

雕象，一切全都严格地对称。游客们常常弄不懂它为什么要修成这样，因为只有一个乘气球升空的人才能充分欣赏它，他会看到这花园好象一块精美的地毯。

大街、小巷、广场、公园和道路都设计得严格对称。在一个路口两边矗立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教堂，好象一对中国瓷瓶。几条马路的会合处总是同样的方尖碑或纪念塔。在一条长街的两头各有一个相似的甚至一模一样的喷泉互相呼应。耕地总是整齐得过分。人工林里的小树总是种得象军队的队列。只要我们追寻一下就可以看到对规则整齐的爱好的同样也存在于不可见的事物之中。它存在于荒唐的既禁止这样又禁止那样的禁令中，存在于精心拟定的学术论文的大纲中，也存在于政府机关和军队编制的组织系统中。最伟大的意大利文学名著，但丁的《神曲》就是层次清楚，结构井然。学生要阅读它必须先去买一本提要，那上面标出了地狱、炼狱和天堂的位置。全诗由一个开头和三大部分组成，每部分都有三十三章，每章的结尾都用同一个字“**stelle**”（星）。

意大利语中描述这种情况的词叫**sistemazione**。把一切事物都**sistemare**，被认为是世人的重要天职，也许是唯一的天职。**sistemare**和**sistemazione**这两个词都很难准确地翻译。最新出版的字典斗胆列出了几条解释，但其准确程度好似乱点鸳鸯谱。**sistemare**的含意是“**arrange, regulate, settle**”，**sistemazione**当然就是“**arrangement, regulation, settlement**”。不过，这几个英文词不是口语词汇，它们主要用于公文、社论和学术论文之中。这两个意大利词则相反，它象面包与奶酪一样普通，出现在人们的日常会话中。**Sistemare**首先意味着战胜自然。意大利人**sistemare**了山洪、沼泽地、野兽、宠坏的孩子和难以控制的人口。“**Ti sistemo io**”是一种十分常用的吓人话。它的意思是：“我要制服你这倔强的天性。”

这两个词也常用来形容一种“获得安全”的感觉。任何一种 **sistemazione** 都是多数意大利人梦寐以求的事。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勤勉的工作、负责任、高薪和走在别人前头的可能性，它常常不过意味着一个平庸然而持久的职位，避开难以逆料的事变，有一个可以预见的前程，有一些名望，最后还有养老金。（一个罗马人临终时对他儿子的忠告是很有名的：“儿呵，你一生中必须全力以赴地想法谋取一个职业，没有职业的一生是可耻的、没有意义的。但要始终记住，一定不要让你的职业沦为干活。”）全意 119 大利的父亲都想 **sistemare** 他们的儿子，母亲都想 **sistemare** 她们的女儿。母亲希望女儿有一个脾气好、办事稳重的丈夫，不要太有钱，也不要太漂亮，因为有钱和漂亮的丈夫不容易保持稳定的 **sistemazione**。穿比基尼游泳衣、在夏季海滨比美竞赛中获胜的漂亮姑娘，跟身穿直盖到脚背的黑罩衫的丑女子一样，都不象其他国家的姑娘那样常常梦想操电影生涯，她们也不梦想与肌肉发达的男子发生使人陶醉的爱情或过阔绰的旅行生活，她们宁肯选择一个 **sistemazione**。国际名妓也和疲倦的街头妓女一样，只想在一个能够忘掉过去的地方安顿下来，过类似于寡妇的生活，体面地抚养自己非婚生孩子。工业家常常梦想用建立强大卡特尔和牢不可破的协定的办法来平息竞争。战前的国王政府总尽力保持殖民地的安定，严格禁止垦荒者、赌徒、兵痞、冒险家、投机商到那里去。

说来奇怪，就连离经叛道之辈和逍遥法外的亡命之徒也普遍爱好 **sistemazione**。战后在西西里猖獗一时的匪首朱里亚诺给他的心腹都封了相应的军衔，而且维持着虽然原始却很严格的礼仪。恶魔派诗人和先锋派的作家、画家、电影导演以他们的敢作敢为震惊了世界，但他们选择的妻子却往往是一个好厨娘或好管家，因为她既能带好孩子又能省钱；他们吃的东西决不是先锋派

的。在向罗马进军后的一九二二年，几乎所有造反的黑衫党徒都唱着使人毛骨悚然的歌曲（“生命，你是我的朋友；死亡，你是我的情妇”），以表示他们对死亡、权威、法律和惯例的蔑视。他们挥舞着手榴弹、匕首和机关枪，胸前画着骷髅和交叉骨。他们除了建立新政权以外还有一个主要目的，那就是当上正式官员，享受优厚而稳定的薪水，老来还有退休金。这并不新鲜。一八六〇年，加里波第红衫军奇迹般地在几个月内解放了整个西西里和南意大利，他们中许多人也要求能在正规军里安定下来。许多为打败境内的德国人作过贡献的勇敢的游击队员，在战争刚一结束时马上要求转为警察、消防队员、正规军或政府官员。

* *

在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政党的意识形态里，也可以不同程度地找到这类民族观念。这些政党在战后历次选举中获得最大百分比的选票。从左往右数，它们是共产党、社会党、天主教民主党和法西斯党（法西斯党自称“意大利社会运动”）。现在这些党合起来占有百分之八十五的选票。没有哪个党对自由特别感兴趣。法西斯党、共产党和左翼革命社会党人嘲笑自由，把它说成是他们对手的一种感情用事的愚蠢嗜好，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它可以被利用来制造混乱和破坏国家职能。他们各行其是地为自己特定的革命进行准备。与此相反，天民党和右翼社会党人总是高唱自由，在每次讲话中都反复提到自由，把它写入自己的党歌和进行曲。天民党人把自由党的拉丁文名称“**Libertas**”刻在他们饰有纹章的盾徽上。但如果把这些政党的理想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它受到极大的限制，各种各样的限度、附加的但书、阶级的偏见、专横的控制和束缚，等等，以致人们必然得出结论：他们实际上对自由心怀戒惧，有时只想要一点，最好是安全可靠的薄薄一点自由，有时一点也不要。

从左到右所有的群众性政党（以及相当多的天民党人）都梦想着虽各自不同但都同样稳妥的未来，少发生或不发生意外的事。社会应当这样：人们都被划分成一清二楚的层次，就象小贩的桔子、苹果一样摆得整整齐齐；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明白当时和下一步的位置；各种各样的决定，私人的、道德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决定，都由知道怎样对国家有利的英明领袖来作出，因为唯有他们才掌握一切情况。领袖不应当由盲目和偶然的选举决定，而应通过聪明的秘密策划，通过无情的强权政治的斗争来确定。

这些政党担保，人民无须再为抽象的意识形态、政治、各种复杂而专门的问题去操心；人民对这些问题既不了解，也无兴趣，官员们将替他们做这些事。投这些党的票的意大利人极其聪明，他们知道上述理想也许在别个较为有效率和有纪律的国家能行通，可是在意大利不行。他们知道，如果这些政党中有一个竟获得了绝对的权力，至多只能给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增添一点门面的东西，如新的建筑、游行、制服、庆祝活动、群众集会、演说和口号，在这些外表之下，糟糕的生活依然如故。聪明人赚到钱过好日子，其他人还是照原样生活。这种情况过去已经发生多次，今后几乎可以肯定还要发生。人民还知道，如果说在其他国家能够把未来整个托付给官员的话，那么在意大利这种想法就是发疯。意大利的官员早已证明他们不能有效地、诚实公正地办任何事情。但是，意大利人总是希望摆脱恐惧，幻想达到最终的sistemazione，梦想建成一个永恒完美的乌托邦。这种希望、幻想和梦想十分吸引人，使得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参加选举，投那同一批政党的票。

第七章 李恩佐——好古成癖

意大利民族所依赖的策略手段是虚伪做作，在它的历史上有许多人物体现了这一特点。但在这些人物中只有一个人具有全部最纯粹的典型特征，堪称是意大利的英雄。这些特征是：实际上与当时世界无关的、形式优美、内容含混而又自相矛盾的各种思想；统治意大利、重建帝国、最后统治全欧洲的巨大野心；在古代历史的召唤下，建立一个乐享和平、崇尚法治、发扬美德的“新国家”的梦想；对他的人民、他的国家及其光荣的过去的真诚的爱，这爱强烈得就好象在爱他自己，似乎他就是意大利和意大利人民的化身；为他的人民所受的毁损与屈辱报仇雪恨的决心，并把人民所蒙受的这一切全都归因于别人的邪恶。这个人毫无顾忌地向当时所有的强大势力提出挑战，他想要唤醒同胞们对自己的使命的新认识，把他们勉强地拖向无论他自己或他的同胞都毫无准备的战争。

一开始他震慑了敌人，安慰了朋友，引起当时一些最美好的心灵的崇拜，使群众着了迷。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说家，通过在阳台上向聚集在他而前的人群发表演说就进行了所有的公务。他看起来势不可当。他最拿手的是作戏，他使用象征手法，举行壮观的赛会、各种仪式、骑马和徒步的游行，制做各种制服，
123 为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设置堂皇的头衔。他曾一度被赶下台，外国军队使其复位，最后被杀死，杀他的正是他试图使之伟大强盛的人民。他的尸身被拴着脚倒挂在公共广场上，由着那些几天前

还把他奉为救主、为他喝彩的人民去讥笑、嘲弄。他的名字是科拉·迪·李恩佐，也就是劳伦斯的儿子尼古拉斯。

他于一三一三年或一三一四年生于罗马靠近圣托马斯教堂的雷戈拉区，离盖托很近。他父亲是客店老板，母亲是洗衣妇。（墨索里尼的父亲起初是个铁匠，后来开了一家酒店。加里波第的母亲是洗衣妇。）科拉喜欢自以为比家庭里的其他成员血统高贵。他吹嘘自己是亨利七世的私生子，这位皇帝曾访问过罗马，微服在李恩佐的店里住了几天。科拉的举止容貌是他吹的这套话的佐证。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相貌英俊、态度高雅、言谈有说服力，贴切的旁证博引和诗一般的想象，使他的语言活泼生动。当时的编年史家记述道：“他嘴唇上的笑带有奇妙的特性。”母亲死后，他在安那尼乡下由一些亲戚抚养成人。他在二十岁上回到罗马时，已是个善于思考的青年。他埋头于对古代文物的研究、对拉丁铭文的释读和新出土的雕像的考证之中。

他收集文物，特别是玉石浮雕，其中有一些他曾在后来的著作中提到，如西庇阿、凯撒、梅特卢斯、马切卢斯和费比乌斯的肖像。凡是能找到的古典作家的作品他都读，如李维、萨卢斯特、西塞罗、塞涅卡和马克西姆斯等人的著作。他还研究圣经。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能整段整段地背诵这些书中的内容。异教徒的作品，基督教的教义和传说在他自我熏陶的心中形成了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和罗马的光荣的奇特混合物。他常常在街上随便召集一些人，对他们讲话，提醒他们回忆过去的光荣和认识现在的屈辱。他常会惊叹道：“这些罗马人现在在哪儿？他们的美德、公正和力量到哪里去了？我为什么没有生在那幸福的时代？”

没有比当时更惨淡的年代了，罗马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自一三〇五年克莱门特五世不愿面对自己反叛的臣民，而宁愿定居于阿维农之后，教皇就抛弃了罗马，而且没有给它留下一个有效

的政府。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人无贵贱都得尽力保卫自己免受抢劫犯、强奸犯、纵火犯和杀人犯的伤害。每个高门大族在城区都有要塞，在外围地区都有坚固的城堡。奥尔西尼家族拥有圣安杰洛城堡，控制着焦达诺山周围的地域，包括庞贝的剧院和花府。科隆纳家族的城中要塞靠近圣使徒教堂，依傍着奎里纳尔山，他们现在还住在那里。他们控制着从科索到人民广场的整个道路，各贵族世家都拥有私人的步骑军队，由他们的儿辈、孙辈和其他亲戚带领。他们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执行自己的法律和命令，他们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当情况不错时，他们阔阔气气地住在罗马，但当情况不好或湿热的东南风让人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就带着所有的妇女、孩子、财物、牲畜和佣人撤退到乡下去。

罗马的穷人别无办法，只有依靠向统治本区的贵族效忠来换取人身保障与和平。一个罗马人搬家时，他的忠心就随着家具一起走。卑微的平民必须时不时地在小小的私人军队里服务，这样，需要时总可求得帮助，以便击败攻击他的人，若不能及时得到帮助，就事后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复。当然，人命是不值钱的。妇女被强奸、房屋被烧毁、修道院被洗劫、牲畜被拐走、钱财被盗窃更是司空见惯。每天早上从街上收的尸首和垃圾一起被扔进台伯河。建筑物的情况同样令人绝望。圣约翰拉特兰王宫连屋顶都没了；米尔维安桥被奥尔西尼毁成一片废墟，而他占有和控制着圣安杰洛城堡附近唯一的另一座桥；圣彼得教堂的钟楼被闪电击毁；许多教堂、桥梁和教会的宫殿由于火灾、年久失修、恶劣气候和洗劫以及装饰、雕塑、壁砖不断被偷窃而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而荒废了。

一三四二年，前程远大的年青演说家科拉作为晋见教皇的使
125 团成员被他的同胞派往阿维农。他极言力谏克莱门特六世，指出只要法律和秩序还掌握在那些对维护法律和秩序毫无兴趣和蛮横

无忌的地头蛇手中，城市就不可能得到安宁。他特别急于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他的哥哥刚刚被无名凶手所杀。个人的哀伤使他想到了罗马城的苦难。他保护人民的有力言词使得豪门大族的成员很不高兴，而使团中除了他自己以外都是这些人，这些人的亲戚又遍布教皇的宫庭。他含羞忍辱被撵到街上，穷愁潦倒地在阿维农住了几个月。但他闪光的思想，精彩的见解，他的修养和口才引起了诗人彼特拉克的注意。这位诗人多少爱做与科拉相同的梦，这就是恢复罗马旧时的光荣，把它重建为统一的意大利的首都，以至全欧洲的首都。两人相互坚定了彼此的信念，成了毕生的朋友。由于彼特拉克的说情和老教皇恰在这时死去，科拉重新得宠，被指定为教会的公证人并派回罗马。

公证人是大多数意大利人都眼馋的一份工作。科拉每月有五个金福洛林的固定收入，有某些权力，有做实际工作的下属和搞个人研究的时间。科拉四处奔走，会见各种人，思考和揭示罗马衰亡的原因，他漂亮的演说直使听者落泪。他拒绝用鹅毛笔写字，认为这有损一个教会公证人的尊严，而使用银子制成的笔，这恐怕是历史上最早发明的金属笔了。最主要的是他在平民中培养了一帮追随者，这中间有店主、商人、小资产者、下等职员和知识分子。他利用他们对领袖的崇拜和对现实的不满而把他们松散地联系起来。

这时他自称为“寡妇、孤儿和穷人的保护者。”他大概还是政治性漫画的发明者，常常在适当的墙上画画，描绘复杂的寓言，以帮助阐明某些特别的论点。画中的每个女性都清楚地标明罗马、教皇国、意大利、宗教、帝国等等。贵族们常常邀请他到他们的城中要塞去赴宴，让他谈他们的罪恶。一天晚上在科隆纳家中，¹²⁶他大放厥词地说：“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大公或帝王，”然后他挨个儿指着屋里的人继续道：“我将把你们投入监狱、砍头、分尸、拷打、

绞死你们。”听他说话的人都放声大笑，一点儿也没想到不久之后他真的这样做。

一三四七年五月九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在佩斯基耶拉的圣安杰洛教堂里，聆听了二十次向圣灵祈祷的弥撒。早晨他却光着头全副武装地出现了。接着上演了精心筹划的动人的盛大场面。他由武装的同伙簇拥着，一百名雇来的士兵护卫着，以四面旗子为先导，向着本城徒有虚名的无能政府的所在地——罗马市政厅进军。这之间只有几分钟的路。第一面旗是红色的，象征着自由（大概要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革命红旗），上面有绣金文字和图案，图案是罗马坐在两只狮子身上，一手托地球，另一只手拿着棕榈叶，文字内容是罗马是世界的首都的传说故事。第二面旗是白色的，象征着正义，上面画着圣保罗，头戴王冠，手执宝剑。第三面旗也是白色的，图案是圣彼得攥着一串钥匙，这象征着协调与和平。第四面旗是圣乔治的旗帜，这旗又旧又破，只好放在旗杆顶端的木匣里。

很快就有许多二流子、街上的顽童、乞丐和好奇的罗马人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爬上山丘，出人意料地占领了市政厅，没有人阻挡。大多数贵族事先就听说了这个秘密计划，但都认为这不过是那个疯子公证人滑稽的臆想而已，没把它当回事。势力最大的科隆纳家族不在城里，他们全家一起到列塔奎尼亚收麦子去了。当时麦子很缺乏。这家族的首领和元老是斯特法诺，当时已八十岁上下。他几天之后火速赶了回来，听到这一消息时轻蔑地说：“要是这个疯子继续找我的麻烦，我就把他从市政厅的窗户里扔出去。”

科拉占领市政厅后走上阳台去讲话。他在武装的兵士、旗帜、
127 亲戚、心腹和追随者的簇拥下发表了令人难忘的演说。他说到罗马人的悲惨处境，他们光荣的过去，以及建立一个坚强政府的迫

切需要。人群狂喊着表示赞同。在让一个亲戚高声朗读了他事先准备好的新宪法之后，他迈步向前问群众愿意选谁做新国家的领袖，他们疯狂地挥手喊道：“你！”。

他马上开始处理公务，首先是采用一个响亮的头衔：“威严而仁慈的尼古拉斯，自由、和平与正义的保护者，神圣罗马共和国的解放者。”然后他组建了一支有三百六十名骑兵，一千三百名步兵以及在大钟敲响时就会从四面八方带着武器冲向市政厅的平民组成的人民军队。接着他将盗贼、杀人犯处以绞刑，其中包括少数有名望的贵族。他颁布命令，此后任何私家的要塞和设防的炮台都不容存在，所有贵族家族对在他们领地内借道过路的行人的安全要负责任，不准他们庇护任何强盗和罪犯。罗马所有的桥梁、隘口、城门和炮台都要由人民军队守卫。那些被认为不必要的设施一律拆除。

任何不服从命令的人都将放逐到他们的乡下庄园去，再不许涉足罗马。为了保险起见两星期之后他召见所有贵族世家的首脑。这些人差不多都来了。接待他们时，他在铠甲外面罩了一件红斗篷作为他新获得的权力的象征。他引他们到了一个祭坛，祭坛前面他事先放好了教会的会徽。他要所有的人当着圣经和圣餐宣誓决不与他、他的政府、士兵以及人民为敌。他们宣了誓，这样就完全承认了封建统治的终结和“共和国”的恢复，承认了科拉权力的合法性和新宪法的有效性。他禁止平民向贵族老爷宣誓效忠，禁止在私宅或商店的门上挂盾牌以示护卫，禁止称呼贵族为老爷或大人阁下，这样他反封建革命的性质就尽人皆知了。 128

一段时间内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吉本说：“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个人头脑的能力和作用表现得象在这次虽然短暂却很突然的罗马变革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突出了。”吉本早出生了几个世纪，以至未能目睹后来同样短暂而突然的罗马变革。他说：“贼窝般的城市

变得象兵营或修道院一样纪律肃然，大家都耐心地听人讲话；迅速地修正错误；有了错处就甘愿受罚；护民官总能得到穷人和外省人的拥护；出身、等级或教会的豁免都不能保护罪犯或他的帮凶。”当时一个不知名的编年史家可以理解地夸张道：“树林欢快起来，因为不再遭受盗贼的侵扰；牛开始耕作；香客们去朝拜圣地；道路上和客店里重又挤满了旅行者；买卖兴旺了，市场丰富了，良好的信用恢复了；旅途中露出金子来也没有危险了。”

几个星期的和平统治之后，科拉才开始进一步透露了一点他的计划。第一步是要在他的领导下把意大利团结成一个大联邦。为此目的，他不发动战争，不搞大的政治阴谋，而是依靠书信交通，就是派出迅速而可靠的信使，把用流利的拉丁文写成的高尚信件送往众多的意大利城市政府、共和国和小公国。这些信使靠两条腿走路，不带武器，手拿一根白杖作为标志，几乎到处受到兴高彩烈的欢迎。很快，就得到了友善和充满敬意但却闪烁其词的回答。接着各公国和自由城市的大使们接踵而至。这位出身低贱的公证人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尊贵的、当然的国家首脑，他开始被权力腐蚀了。他的头衔越来越堂皇而浮夸，势力所及的领土也

129 与日俱增。这时他被称为“威严而仁慈的尼古拉斯，罗马的救主，意大利的保卫者，人类的朋友，自由、平等与正义的朋友，高贵的护民官”。

他骑一匹白马巡游全城，这本该是教皇和王子王孙的特权；他的衣服由滚着金边的白丝绸制成，这也是教皇的服色。他前面以来自他出生地雷戈拉的一百名步兵开路；他头上总是飘着他自己设计的共和国旗帜，图案是众星捧日和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有一次他耀武扬威地到圣彼得教堂去，老百姓从四而八方赶来夹道欢迎他，景仰他。他的行列以一队武装精良、穿戴齐整的骑兵做先导，然后是政府官员，后面跟着一个手拿一钵金子的人，再

后又是更多的骑兵，乐师们持着银喇叭和罐鼓骑在马背上，还有器宇轩昂的传令官。一个人手握出鞘的宝剑，另一个人往人群里抛着金币和银币，两边还各有一个助手提着满装金钱的袋子。这阵式在以往只有当皇帝进入罗马时才看得见。

护民官一个人催马前行，身着半黄半绿、毛皮滚边的天鹅绒衣服，右手持正义之杖——一根磨光锃亮的钢制手杖，杖头上有个圆球和一个金十字架，这十字架里面藏着耶稣就难的真十字架的一块碎片儿。一杆大旗从后面撑在他头上，两边有五十个来自维托奇阿诺村的人。（他们是罗马的忠诚盟友，至今还参加市里的各种仪式），他们身穿皮衣，手拿大斧开步走，那样子看起来正如当时一个目击者所说：“象武装起来的熊。”他的朋友和支持者们在队伍的最后面。几乎同时，他的穷亲戚们都更名换姓改了行。他当理发师的叔叔穿戴得俨然是个骑士，称自己为“红大人”。从七月开始，科拉写信的下款按照新的时代注明日期：罗马共和复兴元年。他的纪元到此为止，因为他的统治只持续了七个月，从一三四七年五月到圣诞节。六个世纪之后墨索里尼效法科拉的举动，但比他维持得长久些。墨索里尼在临死前三天送给记者的一张照片上骄傲地写着“Anno XXIII E.F.”，意思就是法西斯纪元二十三年。

科拉第一次真正野心勃勃的表演是八月一日在圣约翰拉特兰教堂庆祝他接受骑士称号的时候。这是一次希奇古怪的仪式，因为里面包含了太多象征性的内容：要通过宗教的授职仪式来给他 130 加上中世纪的神秘光环，使他成为贵族，同时唤醒对罗马帝国的回忆，以最庄严的方式宣告历史的转折，宣告一场对当时政治原则的革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七月三十一日，无穷无尽的队伍从罗马市政厅出发，通过装饰着鲜花、拱门和画幕的街道，夹在无数欢呼的人群中到达古罗马长方形会堂。艺人们当众表演戏法，

街头歌唱家纵情歌唱，出名的诗人们朗诵诗章，音乐家敲鼓鸣琴吹喇叭。科拉骑着白马走在前面，紧跟着的是衣着豪华的教会、民众和军队各界的要人，每一部分人都打着自己的旗帜。科拉的妻子步行，一群贵妇陪伴着她，在她的前面抛撒着鲜花。一些外国使者一路上换好几次衣服，随手把换下来的衣服抛向人群。

队伍一到达教堂，所有的人当天即告无事，这位护民官也从众人视野里消失了。在教堂内，他在一口斑岩石棺里洗了圣浴。据说君士坦丁大帝就是因为教皇西尔维斯特让他在这口棺材里洗澡才奇迹般地治好了癞病。这一举动马上被认为是对圣物的大不敬，后来被用来作为赶科拉下台的一大罪状。其实，他不过把这圣浴作为他新权力的一个象征，为这新权力从基督教、封建制和古代罗马的根基中吸取混杂的力量。浴毕他躺到高高的祭坛旁一张豪华的礼床上（他的重量压折了一条床腿，这事故被认为是不祥的凶兆），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他按照自己发明的豪华仪式被授予骑士称号。最后他身着皇家紫袍，脚挂金马刺（骑士爵位和高贵血统的标记），手执出鞘宝剑以王者的姿态走到阳台上与群众见面。回到教堂后他终于向客人们和公众透露了这次庆典的意义，第一次透露了他的整个政治计划。他从宝座上站起来大声宣布：“传讯教皇克莱门特到我们的法庭去，命令他只准住在他的罗马领地里。传讯神圣的主教团。传讯那两个自命为皇帝的篡位者：波西米亚的查理和巴伐利亚的路易斯^①。我们同样传讯所有日尔曼的选帝诸侯，问他们凭什么借口窃取了罗马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力，去选举具有合法权利的皇帝。”他拔出新宝剑，向三个方向挥舞了三次，每次都重复地说：“我也有宝剑！”

^① 当时这两人都声称自己是唯一合法的皇帝，一个得到德国封建主的支持，一个得到教皇的支持。——原注

他的话和手势中所包含的革命意义再清楚不过了。他所想望的，就是要把罗马建成世界的正式首都，使罗马人民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恢复古罗马帝国。他要教皇退居于永恒城主教的次要地位，成为世界宗教组织的首脑，而不再是他的意大利领地的世俗统治者；他把两个皇帝都斥为篡权者，因为只有罗马人民才能选举一个合法的皇帝。那么这个皇帝该是谁呢？只能是罗马共和国的现任领袖，只能出自人民的选择，换句话说，就是他自己，科拉，那个客店老板洛伦斯的儿子。还没有看清楚该拿什么去抵御和击败敌人，他就孤注一掷向当时所有的强大势力挑了战，这里面包括罗马的贵族和封建主、教皇和教会，日耳曼人和神圣罗马帝国。

那天的晚一些时候，他为客人们和罗马的公民举行了在当时长期的饥荒日子里从未见过的盛大的宴会。为此把拉特兰宫进行了改造：推倒了墙壁，新建了阶梯、庭院，走廊和屋子里摆满了桌子，几十个厨房准备着各式各样精美的佳肴。宫殿前有一尊马 132 可斯·奥雷利乌斯骑马的青铜塑像，该像至今被认为是第一个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马的一个鼻孔里流着红葡萄酒，另一个流着水。主餐厅正中设置了一块形如城堡的巨大蛋糕，从这城堡的窗户和门里一道道菜如魔术般地涌出。

下一天的安排又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他的加冕典礼。这个仪式也充满了各种古怪的象征意义。它采用了一些在罗马市政厅加封桂冠诗人时的传统仪式，还学了古罗马英雄载誉归来被抬着通过罗马时的凯旋式。六个著名僧侣先后把六顶王冠戴到科拉的头上，代表圣灵赐给他的礼物，这礼物的数目在当时显然只有六个而不是七个。一个衣衫褴褛的无赖汉一等科拉头上有了王冠就把它摘掉，唯独留下第六顶。这摘帽子的角色也是令人难忘的一个古代遗迹（古时候，士兵和百姓可以对凯旋的军事领袖

任意地讥笑、讽刺和说不敬的话)，它说明世界上的荣誉都有不持久的特点。未被穿破衣的无赖摘掉的最后一顶王冠是银质的，由圣灵医院副院长给他戴在头上（这所医院至今尚在，电话号码是六五二二五七），同时交给他王权宝杖。最后，在几天前授与他骑士爵位的贵族老斯科蒂奉上一个带有十字架的银球，说道：“至高无上的护民官啊，接受和行使公理吧，给我们和平与自由。”

那天科拉的野心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已经位在教皇和皇帝之上，却还不满足这理想的现实，竟敢去自比耶稣基督。在做一次小型讲演时他拐弯抹角提到自己是三十三岁，耶稣恰是这个年龄死的，以此暗指天也将降大任于他。一个一直是他的支持者的圣僧为此大为伤心地哭道：“现在是我们的首领从天上跌下来的时候了。我从未见过这样骄傲的人。靠圣灵的帮助他才兵不血刃地赶走了暴君，为什么他要这样自大，对至圣如此不知感恩呢？”

133 在前几个星期里，秘书厅发疯似地工作着，给一个比一个更显赫的王公写信，并研究他们的复信。科拉甚至分别派了使者到英国和法国国王那里去，指示他们停止交战，因为战争已“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又发一封信到阿维农教皇那里，命他立即说和两家君主。一个来自匈牙利国王路易斯的使者要求科拉站在他们一边去插手一个老大难家庭纠纷，事情是他的兄弟安德鲁王，那不勒斯约安女王的丈夫被谋杀了。他请求允许带军队通过罗马的领土去报家仇。几乎同时有另一使者从约安女王那里来，要求这位护民官保护女王，为她向匈牙利国王说情。科拉写了一封穿插着绝妙的少见的圣经引文的回信，答应尽力而为。这时在意大利所有的城市之间信使们穿梭往来，为在罗马召开一个庄严的律师大会做准备，会上将以完备的法律形式宣布罗马人民的权利（同时所有意大利人都被授与罗马名誉市民称号）。一旦这个由著名的律师们参加的大会明确确立这个城市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科拉律师就相信不会再有人敢来向这最高权力挑战了。

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他邀请了所有贵族世家的首脑来赴宴。席间，这位护民官的装束令老科隆纳感到作呕，老家伙轻蔑地对他说：“你与其穿这套华丽服装，倒不如穿普通百姓的朴素衣服更好些。”科拉不禁大怒，下令把贵族们都关进了监狱，用红白两色的帷幕装饰大厅（代表死刑判决的颜色），召来刽子手，并派牧师去听取罪犯的忏悔。（科隆纳拒绝忏悔，傲慢地说他还不打算去死。）可这时科拉同往常一样，被他所要做的事吓坏了，改变了主意。他把贵族都放了出来，换取他们不破坏和平的保证，送给他们礼物，说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开个玩笑，然后派骑兵开路领他们走过城区，作为和解的公开表示。这一致命的错误断送了他。当时一位编年史家跟老百姓知道得一样清楚，他说：“这个人点了一把他自己扑不灭的火。”（这位编年史家用一句不能用英语写在这里的土谚把这事点得透彻无遗：“*Che vale petere e poi culo stringere? Faticasi le natiche.*”^①从那天以后，罗马的封建主知道他们不能再信赖科拉，最好是号召士兵拿起武器，给城堡配备人员准备打仗。

结果战争毁了科拉。罗马贵族是他实现计划的关键，而他却不得不跟他们打仗以维持在罗马的权势。没有罗马的支持他也就失去了外省的支持。失去了这些支持，他对意大利的野心就只好收起。没有一个联合一致的意大利，他就无力对抗教皇和皇帝，也不能借助一方的力量使另一方屈从他的意志。他跟贵族开战，既无计划，也无经验，虽然偶尔也能获得些胜利，但决无希望摧毁那些远离城市舒舒服服躲在坚固城堡里的敌人。最后人民对他的疯狂、挥霍和炫耀的仪式，对他的妄自尊大和空谈，对没完没

① 这句话的意思是：“放了屁又何必夹紧肛门，使屁股受累呢？”——译者

了的战争和食物的缺乏感到厌倦了，他们渴求“新国家”建立之前的日子，那些古老的苦日子回忆起来突然变得和平而繁荣了。人民叛变了。一次不重要的街头闹事吓坏了科拉，他未加任何抵御就丢掉政府，带着几个仍然还对他忠诚的士兵离开了罗马。这是一三四七年十二月五日。

七年以后，一三五四年八月一日，科拉回来了，有法国人蒙雷阿勒两兄弟率领的雇佣部队给他保驾。这期间他曾象一个香客似的游遍了欧洲，最后在布拉格拜访了皇帝，这位皇帝马上把他当做危险的革命分子和异教徒关押起来，并给他锁上铁链子送去见教皇，结果他通过写大量流畅动人的拉丁文书信和高超的雄辩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友谊与教皇的原谅。他被送回意大利，西班牙红衣主教达尔博诺斯作为教廷收复和平定教皇国的使者与他同行。135 科拉听说罗马人民正翘首盼望着他，就自愿为军队作先导。实际上他被赞为罗马的解放者。罗马的骑兵沿着马里奥山的道路挥动着橄榄枝欢迎他。全城人民向他欢呼，编年史家说：“好象他就是西庇阿·阿菲力卡努斯。”

他又一次沿着有绣帷和金银饰物装点的街道被引向罗马市政厅。他重又走上阳台讲话，人民重又挥动着臂膀，喊着他的名字。但他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了。他既懦弱又迟钝。吉本说：“据传他在日耳曼人和波希米亚人的社会里染上了暴躁和残酷的恶习。困境并没有加强他的理性，培养他的美德，而是冷却了他的热情。”他变得贪财，胆小，多疑和冷酷。他常常通过掩人耳目的审判就把他的敌人或那些被他怀疑是敌人的人判处死刑，有时不过是为了没收他们的财产。他再次对那些兵精粮足的贵族们发动了得不到结果的愚蠢战争，正象他七年前所做的那样，直到他又花光了所有的钱，雇佣军眼看要反叛，罗马人民又一次准备造反。他把沉重的赋税加在人民身上，毫无顾忌地挥霍公款，随便把钱给朋友

花和用于他疯狂的计划，根本不考虑商业的衰退和席卷全城的饥饿。十月八日，零星的骚乱暴发了，群众喊着：“人民万岁！”他们聚集在卡皮托山下高呼：“处死卖国贼科拉！”

开始时科拉还没在意，他拒绝敲响集会大钟，象往常一样穿得象个骑士，头上飘着大旗走到阳台上去想稳定和安抚人群。他举起手臂要求安静以便讲话。喊声增大了，石头块儿扔了上来，科拉的手被一支飞箭射伤，他仓皇跑回楼内，吓得不知该怎么办。他一次又一次机械地穿上铠甲好象是要和他的人一起勇敢地武装对抗反叛，随后又把铠甲脱去好象是要更衣逃跑。这时众人正在宫中放火，火焰已经吞噬了木楼梯。最后科拉下了决心。他把生命信托给他的表演才能。他脱去盔甲，用剪子剪掉胡须，把脸涂黑，穿上一个园丁的旧衣服，背上绑一块软垫以防飞落的红火炭，然后摸出了大楼。

他已经过了最后一道门，混到人群里，操着重重的农民口气喊：“打倒卖国贼！”“上去拿啊，那边东西多得很！”正在这时有人看到他腕上还带着金镯，指头上还带着戒指。他被认出来，打死了。尸身被大棍、长枪、骑兵矛和叉子一遍一遍地戳着，然后沿着科索大道拖到圣马切洛，头朝下吊起来，暴尸两天两夜，由着取笑的男孩子往身上扔石头，吐唾沫，直到最后在奥古斯丁陵墓的废墟上被用于蓊燃起的篝火烧为灰烬。

对于吉本来说，把科拉视作又一个“无赖与疯人的混合体”而一笔勾销是很容易的，而我们现在要看得更深一些。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家都不缺乏无赖与疯人，而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永恒不灭的痕迹者实在是绝无仅有。虽然能这样做的就必须是个疯狂的冒险家，但仅有这点还不够。他们还必须是上帝的不自觉的驯服工具，无意之中正好拨动了宇宙的神秘的和弦，有点象那不勒斯人所说

的那种“能掐会算的人”，这种人往往是老和尚、乞丐、懒汉、衣衫褴褛的女人和扒手，他们不知道也不能告诉你下星期六国家彩票将转出什么数字，但到时候他们却一准儿中彩，天晓得这是怎么回事。你必须跟着他们并密切观察他们。他们偶然的几句话或心不在焉的一些举动，如果能按古代的方法来恰当地解释和判断的话，有时就会揭示出正确的答案，使你发财致富。

137 科拉这类人就是他们时代的不自觉的解释者，他们对于同胞们的需求具有直觉的和预见性的了解。你千万不要理睬他们那些往往是胡说八道的解释，而必须注意他们，听他们对群众讲话。他们说出来的话都好像是群众心中未能表达的情感，能唤起人们心里的共鸣，驱使人们去干番大事业。正常人都热爱生活，决不愿为纯粹的无赖与疯人去死，然而他们却愿意为科拉这类人献身。象这样的人不知怎的就看准了历史将要演奏的伟大旋律，就象勘探队员感觉到了地下的秘密水脉一样。科拉的思想本是无章可循、漫无头绪的一个大杂烩，但他无意中把指头按到了最重要主旋律上，这主旋律支配意大利历史达几个世纪，其大部分至今仍起着主导作用。

科拉体会到人民需要政府、公正（或对人人都平等的法律）、良好的管理、秩序和自由；希望结束血腥的封建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的问题主要倒不在于它的封建性和血腥味，而是在于它的无能。他想给意大利一个统一的政府，这一点意大利人在五个世纪之后才设法做到了。他认识到，任何一个想解决意大利政治问题的人都要冒被视为异端和革出教门的危险，这点后来许多人吃了惨重的苦头才认识到。科拉懂得意大利必须团结和强盛才能两面作战，一方面是对日耳曼皇权的外来压迫作战，另一方面是对教会的政治力量和教皇的世俗野心作战。几个世纪之后，许多热情的学者认为科拉是意大利最早的爱国者之一，是民族理想的先

知，是仅次于但丁、彼特拉克和马基雅维利的复兴运动的先行者。

科拉是属于意大利的，他口若悬河，衣着华丽，发明了各种旗帜，举行了他那个时代最壮观的宴会和仪式，向各个地方的各种人物发出高雅的信件。他偏信法律上的俗套和历史的先例，却忽视了建立拥有实实在在军队的实实在在的共和国，他没有任命优秀的军队领袖和为军事行动筹措足够的资金、制订合宜的计划去击败和威吓他的敌人。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仅仅建造一个栩栩如生的诱人的外表是不够的。外表与实际内容对于他来说完全是一回事。

总而言之，他的成就从实际效果来看是微不足道的，但从艺术性方面来看却有持久的精神影响。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总引起诸如下面几位艺术家的兴趣的原因，这几位艺术家是拜伦（《查尔德·哈罗德历险记》中有一部分写的就是他）、李顿（写过小说《李恩佐，罗马最后一个护民官》）、瓦格纳（歌剧《李恩佐》的作者）还有邓南遮。邓南遮花了宝贵的时间编写了科拉的传记，这是他所写的唯一的历史著作。科拉对其他命里注定的无赖和疯人也具有吸引力，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时，他颠簸的车中有一本切尔切奥的神父安托伊内写的书，书名是《尼古拉斯的阴谋，李恩佐传略》，一七三三年巴黎出版。

第八章 墨索里尼—— 作戏的极限

对仆人最不了解的是他的主人，对臣民最不了解的是他们的统治者。因为仆人和臣民对主人和统治者不象对其他人那样显露自己的本性；他们总是尽力乔装打扮得不同于自己的本来面目。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阿尔多·帕里尼是博洛尼亚的老社会党员，一位谦谦君子。他是贝尼托·墨索里尼早年的好友。战前他有一次求见墨索里尼，领袖在韦内齐亚宫接见了。帕里尼自己并没有什么事求他：他有工作，而且对政治再也不感兴趣。但是，他恳求这个独裁者帮助他们过去的几个老同志，这些老同志在本世纪初曾和他们一起为社会主义战斗过，可是现在一文不名，没有工作，还受到警方的迫害。难道墨索里尼不能下个命令让他们得到安宁以便能求职谋生吗？难道不能从秘密款项里给这些又老又穷的朋友们一点年金吗？墨索里尼喜欢扮演慷慨仁义的君主。他向这老同志保证，他的要求，全部照办，并且记下了那些穷困的社会党人的名字。然后他随便谈起来。

“他穿一套白亚麻布衣服，因为当时正是夏天，他的脸晒得很黑。”过了几年，墨索里尼死后，这老社会党人告诉我说，“他夸夸其谈，表情丰富，下巴往前突出，膝部弯曲，手象骑兵军官一样放在髋部两侧，这一切都很有风趣，他回忆起一些我们共同

认识的朋友。他吹嘘他政权的成就，而我没有搭腔。后来他对我说：‘你真是个固执的傻瓜，不跟我们一起干，你为什么不加入法西斯党呢？’我想当时我若同意，他会马上把党证发给我，那将解决不少问题。但是我不愿离开我的同胞而生活，我忠于年青时的理想，因此我说了‘不’，我不想当什么，也不想要什么。可是他仍然坚持叫我加入，最后我脱口说出了心里话：‘你的这个政权我怕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类东西总是这样的。贝尼托，你的死法会跟科拉·迪·李恩佐一样。’这句话内容很严肃，但我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讲的。墨索里尼听了我的话后做了个怪相，做出假装惊恐的表情，然后又笑起来看着他的手，把手伸到他面前，五个指头都叉得很开。这是一双又短又厚的农民的手。当时他说的话我一直忘不了，他说：‘你瞧，我没带戒指，在我身上不会发生那种事’。” 140

* * *

墨索里尼于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生于罗马尼亚的多维亚·迪普雷达皮奥离福尔利不远。他父亲是个铁匠，也是个热情的革命者（被人们称为“天生的社会主义者”），他给自己的头生儿子取名为贝尼托就是为纪念墨西哥反抗马克西米连皇帝的领袖贝尼托·胡阿雷斯。他母亲是个长期含辛茹苦的教员。墨索里尼从小就憎恨教会、军队、国王、卫兵、法律，他还憎恨富人和有教养的人，衣冠楚楚的人和成功得意的人，他藐视一切权威，反对所有他后来要捍卫的东西。他有时甚至讨厌那些使他失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常把他们叫做“社会党傻子”。他小时候是不安分的孩子，事事都要抢第一，又骄傲又好争吵，喜欢自夸，但有些迷信而且并不总是很勇敢。一个善意的传记作家写道：“他找碴儿吵嘴打架，赌赢了就想捞得比赌注更多，赌输就要赖帐。”他因两次用刀子扎伤同学，被两个学校开除过。他的许多伙伴都恨他，但也有的很喜欢他，甚至狂热地追随他，把他当作领袖。罗马尼

阿的老年人还记得他那带刺儿但又孩子气的魅力，记得他那胜利时的微笑，以及对朋友和追随者的哥们义气。墨索里尼总相信有了不起的好运气在等着他，他小时候曾对妈妈说：“有一天我要使地球颤抖。”他确实做到了。

141 一九〇一年他成为一名教员，第二年又为逃避征兵跑到瑞士。当时认真的革命者都是抵制服兵役的。在洛桑他为了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找了一两次工人的工作，但他发现自己不喜欢艰苦劳动。他喜欢阅读革命书籍和高谈革命。他读书狼吞虎咽，不加选择，他读的多半都是马克思以前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者的书，如尼采、索雷尔和叔本华，马克思主义的书他显然只读过《共产党宣言》。他向他的同胞鼓吹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无神论、阶级斗争、“总罢工的神话”和为革命而革命。当地的意大利人多半是移居瑞士的穷苦泥瓦匠，他们对他印象很深，把他选为他们工会的书记。他在其他革命者中寻找同道，当时的革命者大多是俄国的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亲热地称他为贝尼托什卡，而他开玩笑地自称为“暴力的鼓吹家”。

他从不洗脸，很少刮胡子，脖子上盖着稀疏的长头发，找到哪就在哪住。有一回他跟一个年青姑娘一起住在大桥下面一个废包装箱里。警察注意着他，几次把他逮捕。一个俄国女社会主义者安格利卡·巴拉巴诺娃曾一度受他吸引，跟他交过朋友。她发现在急风暴雨般的离经叛道的高谈阔论掩盖下，他其实是一个胆怯的人，在他认为社会地位比他高和知识水平比他强的人面前就感觉不自在。实际上，他把自己看作一个伟大的角色，这角色是他在前进过程中自己发明的，自己热忱地表演着，而且演得太过火。当时在瑞士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比得上他的惊人热情。列宁当然也不行，那时他正在努力假扮成一个教授呢。

墨索里尼于一九〇四年回到意大利，那是因为太子出世宣布大赦。他当了乡村教师，后来又服了兵役，当特种步兵（不管怎么说，他当兵当得不错）。他取得了高中法语教师的资格，同时还是一名记者，社会主义鼓动家和组织家。他开始锻炼口头表达能力，逐渐发展着使他成为意大利最有鼓动性的演说家的技巧。他只要讲的话生动有力、激动人心，就不在意所讲的内容的逻辑性和真实性。他的手势既有力又有节奏。他的语句简短，断断续续，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他常常来一个长长的戏剧性的停顿，有时声调表情陡然一变，狂呼猛喊，用旋风般的咒骂结束讲话。当听众正被他的口才所感动时，他常会停住话头，提出一个有力的反问，引起热烈的反响。这样就使台上台下建立起一种头脑发热的对话联系，听众来不及细想就被卷入了决定。凭着过激的文章和煽动性的口才，他在社会党内的地位上升很快，到一九一二年他成为党的机关报《前进！》（*Avanti!*）的编辑。142

他是个非常成功的编辑，在他的领导下，报纸的发行量从五万增加到二十万份。记者的角色他无须扮演，因为他确实是个记者，也许是当时意大利最受欢迎的记者。他办报不是面向有理智和有教养的少数人，而是面向半文盲的群众，以原始的感情轻易地赢得他们的欢呼。正是使他成为富有煽动性的编辑的那些品质特征使他成了一个灾难性的政治家。他的全部品质特征包括直觉的肤浅知识，把事情过份简单化和戏剧化的能力；严格的党派观念；平常只关心最吸引人的事物、在利害攸关时不顾及任何真理性、准确性、客观性和连续性的那股劲头；在行动时不受任何顾虑、怀疑和批评的干扰的天才；而最主要的是他那种天生的能力，能驾驭任何情绪上的波涛，知道人们想听什么，知道用什么样廉价的共同感情更容易把他们统统争取过来。如果意大利人象英国人那样爱看报的话，《前进！》报将轻易地达到二、三百万份的发

行量，可是在意大利，二十万份已经是奇迹了。

他后来定居于米兰。他的家庭成员包括同居的妻子拉凯莱（当时社会党人不承认教会和国家的存在，结婚不举行世俗或宗教的仪式）和他的小女儿埃达。他的妻子就是他父亲的情妇的小女儿；他的女儿长得很象他，苍白瘦削的脸上有一对黑黑的大眼睛。他这时的穿着比在洛桑当“暴力的鼓吹家”时稍微好一点，但仍然很少洗脸，一周只刮两次胡子，总穿一套衣服直到穿坏为止，并且很少想到系鞋带。他讲话时会做怪相，使用粗野的不能写出来的字眼，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但他却总能和当教师时一样熟练地驾驭听众，吸引忠心的朋友和盲目崇拜的追随者，这些人有的追随他一直到死。

但他身上毕竟有些惊人和吸引人的东西，这连他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许多很了解他的人，常常跟他谈话的人，为他工作的人，都成了这种使人费解的魅力的牺牲品。就象男人盲目地爱上一个妇女就可以忽视她的一切缺点一样，他们也忽视了他的粗鲁、错误、谎言、自吹、固执和无知。他的一个忠实信徒曼利奥·莫尔加尼从一九一四年起为他工作直到一九四三年自杀身死。他自杀时留下一张字条：“领袖辞职了，我的生命完结了，墨索里尼万岁！”墨索里尼还吸引了许多妇女，他粗暴地对待她们，就象对待福尔利的乡下姑娘一样，往往不加任何解释就在书房硬梆梆的地板上占有她们，或者让她们脸朝墙罚站。她们中只有少数能看出他的胆怯、缺乏安全感、需要赞美和爱戴，这些人就留用得长一些；另一些又着迷又吃惊的妇女很快就被解雇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三二年，当时正在进行军事演习，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十分讨厌。他头戴白色游艇帽，大翻领，身穿双排扣的商人甲克和暗绿色的马裤，脚登黑皮靴，样子就象个业余的马戏演员。这套装扮可能象征着他五花八门的广泛兴趣：

马、海、经商、全国的经济生活和军队。他个子又矮又粗，显得粗鲁而固执。我忘不了他那象牙色的大秃头、黑黑的鼓包眼、苍白的脸色、撅出来的下颚和稀稀拉拉的黄牙（许多人竟认为这种牙象征着好运气）。他脑壳上有一个象小土豆似的赘瘤，下巴底下 144 有一颗大黑痣。他时时移动手脚，好象是一个摔跤手在整理服装。

当时我在日记里写道：“他是火车司机，我们是火车上的乘客，他是否总能知道前方的桥梁有没有倒塌呢？让我们抱最好的希望吧。”我当时实在还没感到他的魅力，因为我一直没同他谈过话，我只是在军事观察所里从近距离看到过他几次。他总扮演着一个不屈不挠的角色。在那个时候全意大利的农舍墙上都用大黑字涂写着：“无论是神还是人，都不能使他屈服。”事实上他确实总是固执己见、不听批评、好猜疑，但他也有反复无常、优柔寡断和耳朵软的特点。他总在设法隐藏自己的犹豫和恐惧，但我当时太年轻，缺乏经验，没有看出这一点来，我只从外表上认识他。

他在关键性的一九一四年夏天肯定是犹豫不决的。当时意大利正以“三国同盟”跟德、奥拴在一起。整个的右翼，保守党人、总参谋部、商界和财界、政府都主张保持严格的中立。而年青人、先锋派的艺术家的、工会、无政府主义者、大学生、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民族主义者、右翼中的急进派、较温和的社会党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都主张站到英法一边作战。社会主义教条里依旧找不到可靠的指导原则。按理说工人阶级应当反对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战争，但他们也有理论上的责任，鼓励这场会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灾难。《前进！》的编辑起初是重复老的口号：“打倒战争！反对备战！国际工人阶级的兄弟情谊万岁！”墨索里尼谴责战争贩子，他在读者中举行投票，问他们“你要战争还是要和平？”他为他写的一篇激烈的文章加的标题是：“把我们引向战争就是出卖我们”。但后来，这位记者内心开始动摇了，因为他发现，支持政府

145 的谨慎政策就会失掉追随者。在他想领导的年青一代造反者中，和平主义不得人心。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之后，墨索里尼在一九一四年十月十八日发表了一篇鼓吹战争的社论。事前他既没有得到党的指示，也没有跟党的领导人磋商，因此他立刻被解职，并在一次激烈争吵的会议上被开除出党。墨索里尼在离开时戏剧性地大喊：“你们恨我，是因为你们无法不爱我！”

靠了本国和外国的钱，墨索里尼办起一张自己的报纸，叫做《意大利人民报》（**Popolo d'Italia**），于十一月十四日问世，他立刻争取到了比编辑《前进！》时更多的追随者和读者。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意大利参战。当他所属的阶层受到征召时，墨索里尼入了伍，在特种步兵里当下士。他在军队里表现不错，直到后来受伤离队。人们注意到，在他伤好后很久本来不必用拐杖了，可他还是在米兰拄着拐杖到处走。内乱、经济困难和战后政府的腐败作风使意大利脆弱的政治统一结构风雨飘摇。这时，墨索里尼用他的报纸为一切不满情绪提供了一个出气口，把不肯安于贫贱的政党老手、觉得自己因没参加上战争而受到欺骗的年青人和各种渴望革命的人团结到他周围。他们盼望任何革命，只要不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就行。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米兰建立了一个叫**I Fascii**（法西斯党）的思想不明确态度却很坚决的组织，通过了一个激烈但却自相矛盾的纲领。这纲领自相矛盾到极点，因此它能吸引一切心怀不满的人和不安分的人，从右翼到左翼，从无政府主义者到保守派，从商人到艺术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就是其中的一分子。纲领的混乱既反映了其领导人的思想混乱，也反映了他的聪明，说明他缺乏原则性而且总是犹豫不决。在当时，不论是在其他城市还是在外省，在镇上还是在乡村，到处都有一帮帮的年青人起来在街道上殴打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这个运动马上得到了保守派的支持，于是巷战频

频发。

人们通常认为墨索里尼是这一切行为的领导者，这个既傲慢又好斗的人物驾驭着这场暴风雨。但他实际上跟以往一样，私心里是勉强的，并且疑虑重重，不过他外表上装得很好，又咬牙又瞪眼，作出果敢的表情。他在《人民报》的办公桌上堆满各种武器：手榴弹、各种口径的手枪、滑膛枪和刀子。（他一生都喜欢武器。在他住在韦内齐亚宫的时候，书房外的等候室里总备有一对决斗用的手枪和一对决斗用的马刀，用以吓唬客人。）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对谨小慎微和胆小怯懦的抨击，象他的追随者们一样，他也常穿黑衬衫。^①他在傲慢的文章里辱骂严肃而谨慎的政治家，向敌人挑战，预言法西斯党将有最光明的未来。他本人从不参加街上的争斗，而是躲在幕后策划，同时巧妙地向各方敞开大门。他在同社会党人和保守派斗争的同时也跟他们谈判；既跟保王党谈判也跟共和党谈判；既和政府谈判也和反对派谈判。他的天才首先得到事实的证明：他持续领导一个由许多不同派系构成的群众性政党达二十五年之久，并且总能击败任何可能的对手。

这些问题不仔细考察是弄不清的。他在公众面前是一个率领手下战士冲破危险的无畏的领袖，但他私下的形象却是另一种样子，只有少数人知道。（他的妻子拉凯莱当然清楚，她常常埋怨墨索里尼说：“你使四千万意大利人屈从你的意志，但却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听你的话。”这是他的一个儿子在多年以前告诉我的。）法西斯党的首领们都了解他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决定进军罗马时的犹

① 意大利人穿着特殊颜色的衬衫以作为政治标志的习惯是从加里波第开始的。一八四三年他在蒙得维的亚让他的为乌拉圭独立而战的意大利军团穿上库存的旧红衬衫，这些红衬衫原来是为屠宰场工人制作的。黑衬衫在意大利曾是铁路工人、钢铁工人和机械工人穿用的服装。——原注

豫。当时巴尔博对他说：“我们不管有你没你都要出发，你拿主意吧。”他到底出于谨慎留在米兰，而黑衫队冒雨冲进了首都，并未
147 遇到任何抵抗。第二天，国王召他去磋商，他才坐了卧铺车进京。他在来到奎里纳尔宫时，象征性地穿了一件借来的紧梆梆的晨装，穿了鞋罩，还有黑衬衫。这副打扮是旧传统与革命的混合物。他对国王说：“陛下，请原谅我穿了黑衬衫，因我刚从战场上回来。我们不得不打这一仗，幸好没有流血……”

* * *

墨索里尼的生涯是一个使人感兴趣的秘密。从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他独裁意大利达二十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几乎跨越了两代人，在这段时间里学童长成了大人，大人变成了老人。他三十九岁夺得政权，而失掉政权时他还差几天就六十岁了。他所领导的国家，毕竟跟他夺权时大不一样。这个新国家是按他的意志形成的，是按他的理论组织起来的，配备了他的部属或者是他教育、选拔的人员。他的权力是无限的：他的合法特权在哪里到了尽头，他那无可争议的权威和巨大的个人威望就在那里开始发挥作用。他的党是官方允许存在的唯一政党，这个党渗透一切，无所不在，它干涉千百万意大利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从早起管到黄昏，甚至管到深夜。（墨索里尼希望意大利人多养孩子，对大家庭给以优待和奖金。），从摇篮管到坟墓。他确定报刊、书籍、广播、电影以至百科全书的内容。他没有任何反对派需要对付。

他是唯一的立法者、执法者、监察官、警察、大使和将军。他是政府首脑、议会议长和内阁总理，他往往自己占据了议会桌旁的大部分席位。在这些年里他陆续担任过内政部长、外交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空军部长；还当过组合部长管理经济事务。
148 他没直接管理的部也受他间接控制。他把每一件事都看成是为最

后考验所作的准备，这“最后考验”就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他在很多年之前就准确地料定它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实际上欢迎它。他作为总司令，组织、训练和武装了一支为战争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得到他为了战争这唯一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经济和工业的支持，得到他创办并经营了二十年的宣传机器的鼓励。在战时，他通过成功的战略调遣，指挥着这支军队；为军队运筹决策的是他本人或者他选定的将军。

他实际上是被他自己一个人打败的。他在他所招引来的拥有压倒优势的敌人面前，在他所鼓励培养起来的傲慢盟友面前，都显得十分软弱无力。他事先准备的资源，扶植起来的工业，他设计制造的武器都太薄弱了。他被自己弄得颠三倒四：他作为外交部长，对世界形势的看法过于乐观；他作为武装部队部长，挑选了错误的将领、战略和武器；他作为内政部长，低估了意大利人民抗拒这场他们所不理解的战争的意志；他作为宣传部长，竟相信自己的报纸；他作为法西斯党魁，竟轻易地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对现代世界所有问题的答案。

在西部沙漠里，意大利炮兵用奥地利人留下来的大炮与英美的最新式大炮对抗，那些大炮是第一次大战留下来的，斯科达兵工厂一九〇八年左右的产品。墨索里尼缺乏原料、燃料和食品来打一场长期的战争。他也缺乏商船来为他所选择的遥远战区提供补给，因为许多停泊在外国领水的意大利商船没有得到本国参战的消息，结果马上被扣押了。意大利的坦克又小又慢，装甲薄弱，象个洋铁罐，用机枪就可以打透。墨索里尼之所以选择这种坦克是因为它便宜，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较多的坦克。墨索里尼说它比重型坦克快，“更适合于反应敏捷的意大利士兵”。他没有航空母舰，他的飞机很好，可惜数量太少，不能迅速更新。这些飞机好象是精巧的玩具或航模、它们是优秀的工匠吃力地用手工做成

供和平时期检阅之用的，而不是靠得住要产生实际效果的工业产品。他的海军总算设法办了多年，较有效能，但不够大，也不够先进，难以与他所攻击的舰队的联合力量相对抗。他的海军没有雷达，更糟的是他根本就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东西，这就使意大利舰艇在英国海军面前成了易受攻击的靶子，无论是在远处还是在夜里都难以逃避。

意军在开始时是纪律良好、士气高昂的。关于意大利兵爱开小差的说法在战争初期并不正确。甚至在他们的整个事业显然已经变成一场可怕而无望的大笑话之后，许多士兵还是牺牲了生命。当然谁也不想力量悬殊的形势下作战。他们的武器装备就好象不是在对抗世界上最强最富的国家和最庞大最先进的军队，而是在进行短期的殖民冒险，与手无寸铁的落后居民作战一样；即使这样，他们还是竭尽了全力。海军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牺牲了全部舰艇和一半的军官。意大利人缺乏的不是勇气和战斗意志，而是在战斗员后面缺乏认真的计划与组织。

即使法西斯统治的实验没有以灾难告终，历史学家们也会对二十年法西斯统治期间所取得的具体成绩如此之少表示惊讶。墨索里尼在这段时间里到底做了些什么呢？确实，他也推动了公共工程的建设，修筑了港口、铁路、公路、学校、高速公路、纪念碑、水渠、医院、排灌网、公用建筑、桥梁等等。这些工程有的颇为实用，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赞扬和妒忌这一点。然而，回顾一下历史，所有这些活动的成果就显得十分贫乏了。要想确定墨索里尼时期的成绩，必须从他成绩的总量里减去任何政府在这时期都能做到的部分。在这段时间里，全欧洲的土路都铺上了沥青，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个独裁者，意大利就做不到这一点。150 开发沼泽、修筑水渠和铁路，促进工业发展等等事情，在法西斯政变之前，自由派政府就曾经做过，再往前追溯则那不勒斯的波

旁王朝和教皇的缺乏效率的政府也曾经做过。这样减下来，墨索里尼所做的成绩虽然仍有其重要性，但可就大大减色了。法西斯政权为了政治原因和粉饰外表的需要，不顾实际效果，还搞了许多显然错误的工程，在搞各种工程时，又有大量金钱消失在奸诈的承包商口袋里。考虑到这些因素，他们的成绩就更要减色了。因此，法西斯政权的总成绩与关于这些成绩的大肆宣传、这些成绩的名气和在道义上付出的代价也是很不相称的。

实际上，在现代化的景象和工业投资的后面，千百万意大利人仍过着史前时期的悲惨生活，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根本问题原封未动。墨索里尼实际解决了的一个问题是实现了与教会的和平，另外还有几个问题随时间推移不知怎么就自行解决了。对其他一些问题，他们也只注意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从不去解决深刻的内在原因，因为这些原因太复杂，太无味，引不起生性浮夸、对事外行而又忙来忙去的记者出身的领袖的兴趣。有些确实只有独裁者才能解决的困难问题，也未被触动，或者变得更加严重和根深蒂固，例如文盲、黑手党、疟疾、土匪、南方各省社会落后和政治落后、收入不平均、农业原始和工业结构不适当等等问题。

他把当代各种困难问题看得过分乐观，过于轻易。当我于一九三〇年在《晚邮报》的驻伦敦办事处任职时，得到的第一个指令就是“不要提到世界经济危机”。这话被传达给所有的记者，这就是他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方法。我记得我曾问自己，如果意大利新闻界全都不提大西洋又怎么样呢？难道这么一来意大利人就能骑自行车到纽约吗？几年以后，我到撒丁去，我得到指示，什么都可以写，只有两件事除外，这就是土匪和疟疾，而这两件事正是当时该岛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把它们从报纸上清除掉很容易，但我想，怎么才能在官方文件和统计数字里避免它们呢？当然不能避免，只不过改叫了别的名字。土匪称作“在逃犯”，疟疾叫做

“间歇热”。在紧迫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同时，却年年都发明出一些假想的问题并且大事张扬地解决了，比如禁止意大利人挥手（只准用作法西斯的敬礼），街道招牌和日常生活中都禁用外来词（如 *Pensione Milton of Rome* 改成 *Miltone*），意语中第三人称单数的尊称 *lei* 被法律严格禁止，并从所有的语法书里删掉。

怎样解释法西斯主义的迟钝和无效率呢？它为什么会失败呢？墨索里尼并不笨，他精明谨慎，学东西快，狡猾多端。他能在几分钟内弄清复杂的情况、成功地应付坚强的对手，常常本能地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决定。不过他工作得是否勤勉呢？我曾怀疑过这个问题。许多年前有一天在罗马，我给了坐车的士兵一点礼物，然后问他上哪儿去，他说去韦内齐亚宫。我问他干什么去，他简单地解释说，他从墨索里尼厨子的家乡来，并给这厨子带了一些东西。“你见过领袖吗？”我随便地问道。作为记者，我当然常常看到他，但只是在正式的仪式上看见他，他总是身穿军服，随从环绕。“噢，是的，”那个兵平静地答道，“我常看见他，他总是呆在院子里，跟司机和门房聊天。”我大吃一惊，我可能偶然发现了当时最隐秘的国家秘密。现在已经弄清楚，墨索里尼书房的灯总是开到深夜，其实他本人常常并不在那里。这是为了给人民造成错觉，以为他总是废寝忘食地处理公务。不过即使如此，他工作得也是够勤勉的。

152 他喜欢工作，他了解在意大利发生的每一件事（每天早晨从警察首脑和指挥卫队的将军得到第一份新闻报告），认识每一个重要的人和想被认为重要而年年都来看他几次的人，了解最微小的秘密（他通过窃听电话不但能揭露政敌和外国间谍的复杂计划，而且了解各种闲言碎语），阅读一切容易读的报刊书籍，看每一个电影，会见每一个途经罗马的外国要人。如果他不是一个想要摆着架子的大政治家，他肯定是个出色的政客，忙碌地处理无数日

常杂务；或者会是个优秀的记者，跟上每一步发展，收集情报以供将来之用。

对他的失败的解释也许是说他没有失败。他确实输掉了战争，失掉了权力、国家、情妇、历史地位和自己的生命。但是，从他夺取权力以来，他想做的事情都做成功了。他想做的不是使国家安定繁荣，不是领导意大利在现代战争中取胜，他毕生追求的只是表演，出色的、动人的表演。在这方面他做得非常成功。他比不上克伦威尔、华盛顿、加富尔、俾斯麦或塔列兰，但他却比得上诸如埃内斯托·罗西和托马索·萨尔维尼之类的著名演员，也比得上P. T. 巴农。他以伟大的十九世纪悲剧演员或者歌剧院的男中音的风格，浮夸地扮演了主人公的角色。记述了墨索里尼大半生的保罗·莫内利写道：“在意大利人眼中，墨索里尼不过象个歌手，他们向他欢呼，就跟许多年前向卡鲁索和塔马尼奥欢呼一样。人们对于歌手向来是只欣赏他的音调和旋律，而不大在乎他的歌词。但是，如果意大利人仔细听了墨索里尼的话，他们就不会因后来的灾祸而惊慌，因为他早已宣告过了。”

他扮演了一个多才多艺的多面手角色，扮演了墨索里尼这个神奇的混合角色，扮演了把文艺复兴的指挥者、马基雅维利式的冷静的思想家、列宁式的革命少数派领袖、心如铁石的独裁者、慈爱的君王、卡萨诺瓦式的好色之徒和尼采的超人混在一起的角色。后来他又在自己的演出节目里加上了拿破仑式的天才，连同他那众所周知的结局。在他临死前不久，他还扮演了社会主义的 153 社会改革家。其实这些角色他都不是。到了最后，他象一个老演员一样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实际身份，忘记了自己的感情、信仰和追求。乌戈·奥耶蒂是一个亲墨索里尼的博学的艺术批评家、作家和风雅之士，他在三十年代曾说过：“当我看到墨索里尼时就不禁要想，当他晚上上床休息时，他的脸该紧得多疼啊。”他时时都

意识到在表演一个角色，这是任何留心的人都看得出来的：他象一个身穿古式戏装的悲剧演员，时而踱步，时而大摇大摆，时而大步迈进，他转身时总是以带马刺的靴子的后跟为轴，那姿式好象总是披着一件紫色长斗篷。他这样做从不疲倦，但总是显得不轻松自在。

他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他比意大利以往任何人都更深入人心，可能以后也不会有人赶得上。贫苦农民把他的照片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贴在破旧农舍的墙上，贴在圣母和圣约瑟旁边。女学生们象热爱电影明星一样爱戴他。他的格言警句被用大字写在村舍墙上供所有人阅读。一九三六年五月，当他在阳台上宣布，埃塞俄比亚已被征服，罗马又成为一个大帝国的首都时，他的一个部属失声喊道：“他象个神……”“象神？不对，不对，”另一个部属说，“他就是神。”

我记得，一九三二年在兰盖进行军事演习期间，有一天，他走过一片光秃秃的大平原，脚下是金黄的麦茬，四周环绕着远处的小山、树林和乡村教堂的尖顶。农民红涨着脸、喘着粗气从四面八方跑来看他，触摸他，向他欢呼。紧随他身后的秘书手拿一个恰如一千里拉钞票那样大小的一个牛皮纸封套，象在赌场上发牌一样地把钞票发给这些穷苦人。墨索里尼后面很快就形成了一支几千人的大队伍，他们手舞足蹈，如痴如狂。墨索里尼不动声色，脸上仍然是惯常那种呆板的坚决表情。母亲们把婴儿高高举起来让他看，尽可能让他摸，就象中世纪时对国王所做的一样。到了一个地方几个修女跑来，长长的黑纱袍随风飘动，她们献给他一篮新摘的桃子。墨索里尼接受了她们的敬意，但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转过头来微笑，只是把桃子交给了自己的随从。凡是见过城中广场上万头攒动倾听他演说的情景的人都终生难忘，无数双眼睛盯着同一个地方——他发表演说的阳台或讲坛。这种惊人的

场面其实并不是吉兆。

我们现在在旧新闻片上看到他的形象时会发笑，他的表演好象某些葡萄酒，这些酒不耐储存，不能远销，但在酿造的当年当地喝起来是很不错的。他的演技热情过火而又幼稚可笑，但非常能打动听众。欣赏他的有粗俗的文盲群众（他就是从这些人里涌现出来）和乡村的头面人物（这些人渴望恢复被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破坏的古代和平秩序）；有“固执和反动的”小资产阶级（马里奥·米西罗利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只关心自己鼻子底下的小事，把大事留给别人去操心；有半瓶醋的知识分子和屡受挫折的民族主义者，这些民族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祖国虽有第一等的声名，却只有第三等的实力，常常被没有那么光荣的声名却较为善战的敌人打败，因此感到羞愧与屈辱。对于有教养的人，他这一套显然不大灵光，但在意大利这种人很少，不值得重视。他们中以贝内代托·柯罗齐为首的一些人曾坚决地反抗法西斯政权；许多人在流放和终身监禁中面临死亡的威胁；许多人在威胁或利诱之下，就与新政权合作了。

玩这套把戏起初很容易，因为外表与实际内容比较一致。许多任务完成了，一些比较容易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处理。国家情况有改善，生活水平有提高。他从前政府那里继承了一套有效的官僚制度。在初期他也愿听好的意见。后来，玩这套把戏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天花乱坠的描绘、热情如火的演说和各种仪式与实际上平淡面丑恶的现实之间的鸿沟，危险地加宽了。经过二十年的独裁统治之后，人民并不知道他实际上并不是在解决什么问题。他们被宣传机器和热烈的表演所麻醉，多数155人竟失掉了或忘记了独立判断是非的能力。有些人觉出事情不对头，但一想到韦内齐亚宫里“废寝忘食地”辛勤工作的领袖，他们的心就安了。领袖是不会让那些无法挽救的坏事发生的。墨索

里尼那张使人放心的面孔从每一面墙上、每一块电影银幕上瞧着大家。许多人暗暗地信赖他能避免实际摊牌，避免一场灾祸。难道不正是他把意大利变成了一个武器装备精良、指挥技术高超、使敌人害怕的第一流强国吗？难道他不是意大利前所未有的伟人吗？难道他不是跟所有的伟人一样并非傻瓜吗？

* * *

人们在探索事物究竟的时候，就象掉进了心理的迷宫，被意大利人的魔镜把戏所迷惑；这魔镜反映出彼此的歪曲形象。毫无疑问，首先是墨索里尼欺骗了人民。他用骗术来作他的统治工具。但这在原则上也并没有什么可悲之处。有哪个大政治家不是时时求助于歪曲、曲解和干脆撒谎呢？墨索里尼不过是比过去其他一切政治家撒谎多一些罢了。他撒得比当时他的许多对手多一点，但到底不如希特勒。他享有垄断权，能够利用最新通讯技术来传播他的谎言。他的荒谬论点和捏造充满了报纸、标语、广播、电影和许多书籍杂志，甚至充满在彼此不大了解的人们之间的谈话之中。在这种空前的灌输之下，难怪大多数人要被他迷惑，相信他想让他们相信的东西。

他并不完全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灵魂工程师，不是那种为了推进自己的计划、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无情地操纵老百姓的情绪、希望和信仰的政客。他有时也可以被说成是这样，但那只是在他明知有错却强使老百姓相信的时候。这种情况虽然常常发生，但毕竟不总是如此。他到底也是个意大利人，他也爱好出色的表演，
156 喜欢盛大的阅兵和检阅海军舰艇，热衷于广场上人如潮涌的集会。他也相信自己的口号，喜欢虚报的统计数字，被空洞的夸口所鼓舞，被自己的演说感动得下泪。他对外表和实质也同样混淆不清，把中空的三合板构件当成实心木头。对于他来说，真理就是外表所呈现的东西，就是多数人愿意相信的东西。

他的表演必然永远是新颖的、惊人的。他只要把观众保持在兴奋、紧张、好奇、惊恐、开心的状态，就能使他们忘掉牺牲了自由，忘掉可悲的贫困，把他们中坚定的多数团结在他周围，使反对派沮丧、分化，保证国内秩序和国际威信。当然，也可以选择一种严肃认真的政策，要求作出实际的牺牲，遵守严格的纪律，老实承认说空话、耍手腕、发漂亮的公报克服不了困难，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仔细的计划、勤勉的工作。但是，选择这样的政策也许就会毁了他的事业。他无论如何不能设想或执行这样一种沉闷的政策。枯燥会把他折磨死。因此我们可以说，墨索里尼的表演不仅代表他一个人，不仅出于他自己的胡思乱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意大利民众本身的需要。在许多时候，墨索里尼不得不说人们想要听的谎言，在关键性的历史阶段编一些人们特别愿意相信的神话。他演的角色并不完全是他自己选择的，而且也是许多意大利人一直盼望着的、正好满足了他们私下的模糊愿望的角色。当时在意大利到处有这样的标语：“领袖啊，你就是我们的一切！”这是有几分道理的。

他不可避免地被他自己的排场和周围的人腐蚀了。古罗马的皇帝们都是从被抬举到帝王高位的那一天就开始腐化的。过去许多伟大的领袖也是沉醉于自己的伟大和非凡的智慧，以为自己一贯正确，被奉承的人包围，最后失足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冒的风险太大，比如拿破仑进攻俄国和希特勒的两面作战。但是拿破仑和希特勒所指挥的都是当时最强大最有效率的军事机器，一直攻无不克。他们两者有适当的运气，并且全都是 157 差一点就打败了强大的对手。

墨索里尼从来就没有这样的运气。当他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参战的时候，他确实以为这场战争快结束了。他指望强大的盟友在紧急时会帮助他，还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幸运。任何谨慎的独裁者

都会准备应付预料不到的情况，可是他没有。他本应当知道，德国人有时是会打败仗的，而且战争拖得越长，打败仗的可能就越大。在意大利参战之前，他一度这样怀疑过，而到战争结束时，才真正明白这一点。他对朋友和合作者说：“德国人是些军事家，不是战士。他们就要失败了。如果他们的政治才能象他们的战略才能一样多，那他们在几个世纪之前就成了世界的主人了。”当时驻罗马的外国大使馆的武官全都晓得意大利缺乏战争准备到了既可笑又可悲的程度，而墨索里尼竟全然不知。是什么蒙蔽了他呢？

他从来没想到，他的表演是缺乏后盾的。他不知道他的国家实际上是多么软弱无力和士气低落。他真以为凭他效率不高的军队、奴性十足的将军、老掉牙的大炮、玩具般的飞机、洋铁皮似的坦克、摇摇欲坠的工业就能打上一场大仗了。他的思想状态真是莫名其妙。他并不是疯了或傻了。虽然紧张的生活、风流韵事（一九三六年克拉蕾塔·佩塔奇进入他的生活，那时他五十三岁，她二十四。）和身体欠佳（他有神经性胃痉挛，发作时非常痛苦）使他受损和早衰，但他总的来说仍十分清醒。归根结蒂他不了解情况，但他是故意闭目塞听的。他对意大利的军事准备情况一无所知，他自己蒙蔽自己，自己欺骗自己，而他的部长和将军们、老百姓们、哗众取宠的作戏、游行和群众集会都在助长这种欺骗。

起初他常常想戳穿由谄媚和谎言织成的帷幕，倘若他兄弟阿
158 纳尔多不死（他死于一九三一年），倘若他能常见见直言无隐的老朋友，他就不会如此危险地脱离实际。但是身居高位、可以任性的环境逐渐使他吃了败仗，他无论如何也挡不住这种有害作用的侵袭。这位作戏大师，当别人向他作戏时，他自己往往也看不清了。问题的核心当然就在这里。他抵抗欺骗的本领本来不强，后来逐渐削弱，最后就完全消失了。当人们提醒他当心马屁精时，他耸耸肩膀。在一九二三年他刚掌权的头一个月，一位年迈的大

使从日内瓦归来，他是代表意大利去开控制使用毒气的会议的。当这位可敬的老先生走进年轻的墨索里尼的办公室时，他没有抬头，继续在写字。过了很久他才抬起眼皮，撅起下巴，毫无礼貌地问：“什么气最毒啊？大使。”大使严肃地回答：“奉承最毒，阁下。”结果大使马上就被列入了退休名单。时间一年年过去，墨索里尼越来越醉心于本是他为别人创造的盛大游行，对奉承和欺骗越来越感到需要。到最后，不论多么令人作呕和荒诞无稽的谎话，只要吹捧了他的思想，证实了他的偏见，他都觉得是不折不扣地表达了客观真理。

每个大人物身边总是围着小人，在意大利善奉承的人尤其普遍。在进攻时，他们运用这种武器来捞好处、除掉对手、攫取权力和财富；在退却时，他们象乌贼喷墨一样用这种武器来迷惑强人、独裁者和暴君。但多数大人物都清楚自己身边的危险。所有的当权者，哪怕仅是个村长，也明白那些微笑、赞扬、礼品、喝采不是给他而是给他的官职的。他们中多数人都设法保护自己，避免祸殃。墨索里尼从来不懂得这一点。他太相信自己的一贯正159确了。他只喜欢那些从不提醒他有危险，从不对他说真话的人，结果接近他的就只有最道地的马屁精了。这些拍马的倒不全是不诚实的人，他们中有的纯属傻瓜，真心相信自己说的恭维话；有的则衷心希望自己说的话是真的，希望墨索里尼真是那样一位活生生的伟人，而且相信所有这一切最终总会实现。他们奉承墨索里尼也是为了安慰自己。另外一些人则是不折不扣的无耻骗子。

结果墨索里尼完全生活在虚幻的王国里。他如果要访问某座城市，该城必定早早就作了仔细准备，给他看的都是让他高兴和适意的人和事，把其他东西一概严密地掩藏起来。他不知道，在向他欢呼的人群中有大量穿黑衫的警察，其中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是在前一天从乡下收买来的。他也不知道，一些由他揭幕的新建

筑、公共工程、村庄很快就被抛弃了，以后就慢慢烂掉，有的水管从来就没通过水。他在全中国检阅了无数的师团，其实这些师团往往就是那么几个，是用车运到这里和那里的。

这种技术十分圆熟，甚至骗过了希特勒。为了他一九三八年的来访，意大利人准备了六个月，全意大利都向这位德国独裁者展现了一副新面貌。任何“十九世纪的、简陋的、普通的”东西都不准留下。迎宾队伍要经过的街道都经过重新设计和重新建筑，就象电影的布景一样。从布伦纳山口到罗马，沿线的房屋都油漆装饰一新。参加检阅的士兵都经过了精心挑选，几乎个个是蓝眼睛、高个子，这是为了向德国客人表明意大利人也是雅利安人。

（使墨索里尼恼火的是他没法把国王变高。国王又矮小又不吸引人，但实际上他是他们中唯一的一个北欧人，身上有很大程度的奥地利和德国血统，这可以从他浅蓝色的眼珠上看起来。）为武装游行的士兵动员了几乎全国所有武器，还给他们穿上崭新的制服。

160 众所周知，希特勒对他的伙伴的赞许（赞许意大利的军事准备以及人民对本国政权和轴心国的忠诚），使他作了若干错误的估计，其中之一可能使他输掉了这场战争。希特勒后来终于相信，他输掉俄国战役是因为晚开始了四个星期，而晚开始四个星期是因为援救意大利耽误了时间。意军由于对希腊进行准备不周的袭击，当时被陷在阿尔巴尼亚。如果这个估计确实，那么，墨索里尼就是一个世界最大的反面军事天才，他一举打败了两个大国——本国和德国。

领袖比希特勒更喜欢这套把戏。他在看墙上的大标语时总爱抿嘴暗笑，好象这真能代表意大利人民的意志似的。他在看驻国外大使的报告时总是津津有味；而大使们都是严格按照他的口味写的。他在看自己的报纸时得到很大乐趣。要胡弄他不难。在战时有一次他看报告时发现几个关于意军所拥有的新炮的数字有问

题，而且发了脾气。因为他知道意大利并没有那么多新炮。他的军务次官，一个精明的将军赶紧回答说：“领袖，这里写错了，这些是我们兵工厂在不久将来准备要生产的数字。”他听了也就安心了。

* * *

墨索里尼是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失权的。这之前几天，盟军攻入西西里。所有海外领地都丢了。意军已在俄国、巴尔干和非洲被歼灭，本土在大规模轰炸下已经瘫痪。德国人自己也只能作防御性退却，精打细算地节省仅剩的一点人力物力资源。当时，所有法西斯魁首都参加了领袖主持的一次议会会议。墨索里尼显得疲倦、憔悴和衰老。他作了一个客观的（或基本客观的）形势报告，这个报告说明他死到临头还保持着他当记者时那种对事物的肤浅认识。他满不在乎，好象是在谈别的时代，别的国家，别的领袖和别人的战争。在会上他的亲信要求他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国王。墨索里尼开始恳求他们，还连哄带骗。他手指着桌上一迭似乎含有妥协秘密的文件威胁他们，还叫他们尊重他的年龄（他说：“再过几天我就六十岁了。”）。最后他闭了嘴，同意降职。

过了几天，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国王在自己的别墅里接见墨索里尼时下令逮捕他。这时没有一个法西斯分子闻讯造反，没有一个他的忠实门徒武装起事，也没人遵守法西斯党的“我誓死用鲜血保卫革命”的誓词了。什么事也没发生，戏已经演完了。意大利人以代价高昂的办法推翻了这个独裁者。这是唯一的办法。人民因此而欢欣鼓舞。墨索里尼被转送了好几个地方，开始是在某海岛上，后来在阿布鲁齐山上他为滑雪者建的一个旅馆里，为的是不让德国人找到。这个旅馆没有下山的道路，只有一条缆车道。但德国人终于还是找到了他，用滑翔机把他救出来。墨索里尼身穿旧军服抵达设在东普鲁士的希特勒总司令部。他对他的救命恩

人表示感谢，并被任命为“北意大利法西斯共和国”的傀儡总统。

墨索里尼把司令部设在加尔达湖边，挨着直通布伦纳山口的道路，以便随时撤退。他一生最后几个月十分凄凉。他知道一切都完了，输定了。他的政权在缺乏武器、士气和资源的情况下，在错误的时间把国家拖入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他滥用了千万人的勇气和热情，为了向盟国显示自己的伟大，外行地指挥了多次愚蠢的远征。他有时为自己找些托辞，把失败归之于意大利人的缺点。他说意大利人软弱，不喜欢大胆的行动，他们不是古罗马人的后裔，而是外籍奴隶、农奴和混血儿的后代。他梦想德国人发明的秘密武器能帮助他重掌政权，那时他就要向敌人报仇。但他实际上已不注意当前事务，只是读很多的书，写了大量毫无意义的文章、论文、辩解、回忆录，甚至还有儿童读物。他最感兴趣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他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耶稣基督，拿破仑还是恺撒？他谨慎地向去访问他的人这样询问，但就是不提科拉·迪·李恩佐或者巴农。他每天到附近的一个小别墅里去看望克拉蕾塔·佩塔奇，样子十分病弱和沮丧，因为他知道末日已来临。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这末日确实到了。德国人背着他跟同盟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作为战俘而投降了。墨索里尼想通过米兰大主教去谈判一个他自己的停战协定，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力量，除了投降别无可能。他曾想依赖米兰人对他的忠诚。仅仅几个月以前，在一月份他们还在街上照旧向他热情欢呼，当他在剧场演说时，掌声还是那样热烈呢。但这时，人民都反对他了，呆在米兰已十分危险。他决定带一小撮忠心的追随者逃到瓦尔泰林纳或瑞士去。但到临走时，他犹豫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下不了决心。他的冒险应当怎样结束呢？

象科拉一样，他决定不下来：是象英雄一样去死呢，还是象

庸人一样去逃。瓦尔泰林纳是一条狭窄的意大利山谷，它象楔子一样插进瑞士的领土。因为左右都是山，它可称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可以很容易地依靠不多的人在这里建立一个最后据点，如果改变了想法，也可以在几小时内就从山路走出国境。最后他象科拉一样决定信赖自己的演员技巧：化装逃跑。他拿定主意直逃瑞士，不在无益的英雄气概上浪费时间了。他随身带上了全部的钱和全部有用的文件，他准备一旦被当作战犯受审，就用这些文件来吓唬盟国的政治家并为自己辩护。在他往北走到科莫湖边时，他被游击队发现并被逮捕；当时他躲在一辆德国卡车里，身穿着一个德国下级军官的大衣，戴着德国钢盔。克拉蕾塔·佩塔奇也和他一起被捕。 163

第二天早上，他们两人被靠在一所华丽别墅的大门上一起枪毙了。他的情妇还试图用身体掩护他，结果被同时击毙。那些钱和文件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尸体在米兰被倒吊起来（和科拉一样），他和其他在逃往瑞士途中被捕杀的法西斯魁首们在一个加油站的房檐下吊成一排。十三年前墨索里尼曾对埃米尔·路德维希说过：“什么样的人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死。”他的罪过就在于欺骗人民；而他的致命错误就在于不知道人民也在骗他。人民把他引向毁灭，这是摆脱他的唯一办法。

第九章 现实主义和圭恰迪尼

意大利人民在法西斯统治下面临的问题，都是些与意大利本身有同样悠久历史的老问题，这就是：在腐化、内战、革命和外国入侵的形势下，在暴君和贪官的统治下，在毫无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如何生存下去并尽可能得到发展。意大利人为此想出的多数办法都不能尽如人意，充其量只能得到部分的成功。少数几个人总算在这日趋腐朽的世界上得到了繁荣发展，但他们过得越好，这个世界就越糟糕。那么一个人应该怎么办呢？他改变不了自己的同胞，也无法选择出生的时代，更无力扭转历史的潮流。他只能尽力在盲目的暴力面前保护自己，缄口不言，少管闲事。在这方面的最大专家就是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他是佛罗伦萨人，在他忙碌而成功的一生中曾出色地当过律师、外交家、政治家，他还是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他把他的经验纪录在一个秘密的日记本里，在他去世几个世纪以后，这本《日记》才刊行于世。这本《日记》是在危险莫测的时代里的航海指南，它在今天也仍然是无价之宝。

法国的蒙田在 *savoir faire* 和 *savoir vivre*（懂得行市，懂得生活）这门艺术上也是一个杰出的行家。他亲切地称圭恰迪尼为“我的圭恰迪尼”，就连马基雅维利这位编纂过意大利处世之道的名扬四海的人物，也对圭恰迪尼表示尊敬。作为竞争对手之间互相尊敬本来就已难能可贵了，可是他还加上赞美、友情和喜爱。他曾写道：“我爱圭恰迪尼和我的祖国胜过灵魂。”这评价实在够高

了，对圭恰迪尼的爱不但可以与他的小祖国佛罗伦萨和大祖国意大利相比，而且胜过自己的灵魂。

这两个人物在历史上曾被反复地加以对比，他们的相似之处确实很多：他们都是佛罗伦萨人，几乎是同时生活在同一城市里（马基雅维利生于一四六九年，圭恰迪尼生于一四八二年），都是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驻外大使，都从事政治，都对统治术和谋求权力感兴趣。在最终失败之后，他们都退隐到自己的乡下住宅里，研读和撰写历史著作，冥思那不可抗拒的奥妙的历史规律。他们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人和事全都各有其道，任何合理的行动计划都必须以这个假设为出发点。他们两人相信，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争取成功都是绝对必要的、唯一正确的目标。马基雅维利说：“一个人在生活中要是没有地位，连狗都不会朝他叫一声。” 165

撇开这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其实他们大不相同。马基雅维利比较年长，但却总保持着年轻人的幻想。他首先是个艺术家，他的散文简练刚劲，可能是意大利文学园地中最美的花朵。这些散文时而辛辣巧妙，冷嘲热讽，时而庄重严肃，气势雄伟，文思总是非常清晰。他过着一种豪放不羁的无规律的生活，从来没能真正达到自己的目标，得到的只是光辉的失败。他没有得到自己所想望的女人，没有满足自己的雄心，没有达到政治权力的顶峰。在他在世之时也没人认真地把当作思想家看待。他死的时候身无分文，因为他无法说服佛罗伦萨共和国替他偿还借款和补助他的开销。他甚至没有能出版他的不朽著作。他总是成为政治变动的牺牲品：在民主派统治佛罗伦萨时他不曾得势，在专制的梅迪奇家族重掌权力时他因被怀疑是共和党而被捕，在拉肢刑架上受了四遍毒刑。后来民主派又一度抬头，他们却错误地怀疑他是梅迪奇一党，把他排斥在共和国的事务之外。这就是马基雅维利这

166 一类人的必然命运，他们虽然绝顶聪明，但还没有聪明到善于隐藏自己的聪明并消除别人的疑惧的地步。

实际上马基雅维利是太富于幻想，太乐观了，而不能产生实际效果。他以为有一套解决意大利民族的问题的可靠办法，以为历史能够重新安排，不幸的命运能够避开，人民能够改变；当然不是靠道德说教、宗教战争、改良运动和祈求上帝来做到这些，而是靠切实的手段和策略。他认为，只要从公民中招募民兵以代替那些在容易收买的首领率领下的雇佣兵，这支民兵就会使本国所向无敌（三百年后的司汤达也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了两院议会制度，意大利的苦难就可以结束了）。较为老练的圭恰迪尼在罗马尼阿当政时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它太不实际也太危险。他知道若让公民们武装起来，他们定会互相残杀，到那时可就没人能阻止他们了。马基雅维利最希望出现一个伟大领袖，一个能创造奇迹的超人，他能统一意大利并用坚强的手腕治理它，抵挡住外国军队和本国的敌人，为此他能调动一切手段：要政治手腕、下毒药、欺诈、恐吓、贿赂、间谍，当然必要时也用司法审判。

圭恰迪尼不是轻率的艺术家的生活，也不不过豪放不羁的生活，不靠幻想自我陶醉。他出身于富豪显贵之家，受到良好的培养教育。他度过了严格的青年时代，从来不曾任性胡为或浪费时间。他唯一的缺点是喜欢女人，包括任何地位和任何年龄的女人，这是他长期以来的（虽然是隐秘的）弱点。（他从不喜欢自己的妻子，他出于政治原因才跟她结婚，婚后就一直把她丢在家里。）他的性格孤僻严峻，沉默寡言，使不大了解他的人产生反感。他跟他父亲皮耶罗学了在那个危险动荡的时代求生存、求发迹的第一课。皮耶罗功不可没。他努力争取出名，但避免达到惊人的程度；他谋求高位，但不高到引起嫉妒和非议。他总能事先估计风向的变化，
167 从容地做好准备。不论在什么政权统治下，无论是平民政权还是

贵族政权，民主政权还是专制政权，他都一样飞黄腾达。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象他父亲一样对政治气候感觉敏锐，在经历意大利历史上若干最复杂、最殊死的变乱时，他都能平稳渡过。他一生多数时间都是如此，但可能比他父亲更得心应手，更显得有身份。趋利避害、功成名就、掌握权力是他终生的唯一目标。他体面地获得了本国一些最高的职位，几乎有和国王一样的权力。他为自己争得了一个稳固的名声，对历史和政治进行了认真研究，也扩大了自己的私产。他用诚实手段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他没向有权势的人讨好，或者说虽讨了好，但搞得很谨慎，不易被察觉。“我总让职位追求我，而不是我去追求职位。”他这样倨傲地写道。这一切成功都得力于他的幸运、他的个人品质和教养、他对人的本性的不可思议的了解以及他的能力和谨慎。他的能力和谨慎使得处于困难地位的任何人都愿聘请他，甚至恨他的人也赞许他。讨厌他的佛罗伦萨编年史家贝内代托·瓦尔基说：“如果撇开他的财富和学识，如果他不是教皇的地方大员和副将，梅塞·弗朗切斯科也仍会名闻遐迩，因为他有对于人类行为的实际知识，他以巨大的洞察力论述和评价了这些行为。”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他步步高升的经历。他本是一个勤奋的律师，二十九岁时，佛罗伦萨共和国任命他为驻西班牙王国的大使。在一五一五年他三十三岁时，共和国派他去向教皇列奥十世致敬。列奥十世也是佛罗伦萨人，当教皇前是乔万尼·德梅迪奇红衣主教。他很善于识别能人，对圭恰迪尼大加宠爱，三年后派他出任造反城市雷焦和摩德纳的长官，一五二一年又加上帕尔马。他这个既年青又无经验的佛罗伦萨民主派十分注意在自己周围保持一种王侯气派，在他公开露面的时候，总带着威风凛凛的扈从和步骑卫队。他无情地对付那些造反的臣民，不但处置那些站在皇帝一边因而也是公开的打击对象的人，而且处置站在教皇一边、在 168

罗马宫廷有朋友，并且能跟他为难的人。他收缴了所有人的武器，逮捕并拷问嫌疑犯，不管他们是什么阶级；处决强盗和凶犯，普遍推行法律和秩序；给主要街道铺设石头路面，还平衡了预算。继列奥之后的教皇也姓梅迪奇（他和列奥之间隔了一小段另一个教皇的统治），称为克莱门特七世，他任命弗朗切斯科为大省份罗马尼阿的省长，三年后又任命他为教皇军的中将。

一五三一年他被提升为博洛尼亚的长官，这是教皇国最重要的地方长官。在克莱门特于一五三四年逝世以后，他辞职回到佛罗伦萨参与政治，成为梅迪奇家族的亲信。在他的支持下，亚历山德罗·德梅迪奇得以夺取政权，这是一个残酷、贪婪、放荡的暴君，他下令把许多漂亮姑娘和俊秀的已婚妇女弄到他的卧室里。人人都痛恨这个暴君，圭恰迪尼也不例外，然而仍然忠诚地侍奉他。后来亚历山德罗被刺。圭恰迪尼运用他的政治手腕和影响把年青的科西莫·德梅迪奇拥上了台，这位新君属于梅迪奇家族的幼支。圭恰迪尼还设法从查理五世那里为新君弄到一个“大公爵”的称号，从而取消了佛罗伦萨的共和国名义，使它只存在于记忆之中。

下面要说到圭恰迪尼一生中唯一的失误。科西莫是个十七岁的孩子，他醉心于体育运动和许多无聊的消遣。圭恰迪尼打算每年给他一万二千金佛罗林让他去消遣，然后把政务留给自己。（贝内代托·瓦尔基生动地描述了圭恰迪尼是如何不自觉地暴露了他的秘密谋划的：“圭恰迪尼脸往下俯，眼往上抬地说：‘一万二千金佛罗林——足够你花了！’”他那种姿态对待一个意大利歌剧或古装电影里的小淘气可能更为合适。）圭恰迪尼没有想到，这个科西莫是个政治上的浪子，一个早熟的少年政治家。他举止谦恭得体，善于逢场作戏。这个没有经验的青年竟利用了这个谨慎而足智多谋的老臣、历来最伟大的一个政治家圭恰迪尼作为登基的梯

169

子，然后又把这具梯子一脚踢开了。

圭恰迪尼很有礼貌地退休，回到他在阿切特里附近一个名叫菲诺基埃托的别墅。他在这块长满茴香的土地上监视他的农民，提高他的酒的质量，做学问，思考，总结他的经验，还写出一些在意大利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著作。他在四十八岁时死于中风。

在圭恰迪尼身上，最吸引人、启发人的特点便是他的思想、信仰和公开行动之间的广泛的不一致。更吸引人、启发人的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对于这种不一致不感到任何不自然和惊奇，而是把它当作生活之常而泰然处之。他从来不让内心深处的信仰妨碍他手中的事业。例如，他本人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忠诚正直，在严格的教育中树立起天主教的信仰。在年青时他甚至一度想当牧师，希望恢复宗教在古时那种虔信和热情。作为一个正直的基督徒，他蔑视教皇的世俗权力，这种权力把教皇变成了一个玩弄文艺复兴时期的肮脏政治的普通诸侯。他在秘密的日记里痛斥这种由权力、财富和野心所必然导致的腐化。然而他却为两位教皇的邪恶的图谋服务，巩固并扩大了教会的势力范围。

他在《日记》中平静地解释说：

“没有人比我更恨教士的野心与贪婪了。这种罪行是以敬神为职业的人所不该犯的……我在几位教皇手下供职，为他们扩张势力服务，其实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不然的话，我宁可喜欢马丁·路德，这倒不是为了摆脱基督加之于我们的训条，而是为了看到坏人要么放弃罪恶活动，要么就被剥夺权力。”

虽然他痛恨暴君，但他从来不曾为把佛罗伦萨从暴君手下解放出来做过一点事，却帮助暴君永久取消了这个城市的自由权。他只在日记里表示对暴君的不满，同时继续完成分派给他的任务。¹⁷⁰他明智地不作任何梦想和期望。他能信赖一个谋划重建自由制度的人吗？当然不能。他阴郁地写道：

“不要过于认真看待大多数（当然不是所有的）鼓吹自由的好处的人，因为一旦他们想在哪个专制朝廷之下谋个肥缺，就会骑上最快的驿马冲过去。几乎所有的人之中，对个人利益的关心都要胜过对光荣和名誉的爱好。”

还有：

“我并不责备那些出于爱国热忱甘冒危险去争取自由民主的人们，但我觉得那样太冒险了。革命从来少有成功的，即便成功了也常常不会给你带来你所希望的东西，而且你还要因此提心吊胆，生怕失败的敌人重掌权力而加害于你。”

人们不得不在暴君统治下生活，为了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得到发迹，有几点必须注意：

“在血腥残暴的君主治下没有任何好办法，可能只有一条，就是象躲避瘟疫一样逃得越远越好。如果一个专制君主出于谨慎、需要或政治上的考虑而显得比较温和可敬，那么，聪明人就必须设法表现自己的才能和勇敢，但暂时不要去触动事物的本来情况……于是，暴君会夸奖他，但决不让他有任何理由存改革政府的企图。如果暴君发现这个人不安分，就决不会夸奖他；如果认为绝对没有办法使他安分起来，就只好想到，最好是把他杀掉或者一脚踢开。

“我认为一个好公民和爱国者应与君主保持良好的关系，这非但与他本人的安全有关，而且关系到其他每一个人的利害。经常会见君主并赢得他的信任，你就有可能促成好事而防止坏事。指摘这种行为才是愚蠢。不过，最好不要成为君主最密切的亲信，这样你一方面可以从君主的权力得到好处，另一方面在他垮台时可以避免受牵连。”

171 在谨慎的行为中不可避免地包括伪饰。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下面是圭恰迪尼对这个永恒的问题的认

识：

“谁都喜欢诚实坦率的人。诚实、坦率是高尚而大方的品质，但常常对自己有害，相反，伪饰和欺骗倒很有用，常常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的本性就是恶。不过人人都蔑视和痛恨作伪欺骗的手段。这么一来，倒使人不知怎样才好了。我建议一般还是要诚实，但也不要把欺骗完全抛开。这也就是说，在通常的生活环境中利用诚实来博取正直的名声；在某些重要时刻则使用欺骗。欺骗使用得越成功，你诚实可靠的名声就越大，人们也就越容易相信你。”

圭恰迪尼的基本守则是：“要想搞好自己的事业和改善自己的境遇，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个人利益，并以此来衡量每一行动是否必要。”这就是在乱世中求生存、求发迹之道。他还补充说，不幸，很多近视的人“以为他们的利益主要在于积累财富，而不大懂得拥有一个好名声的重要性”。圭恰迪尼见识过人，他知道一个没有人望的人即便能弄到财富也很难保住它和增殖它。他还懂得，只有把崇高的理想当成是自己私下的偏见，才不会让理想妨碍个人的成功。他可以跟几个知心朋友谈起忠诚、荣誉、自由、正义、道德以及把意大利从外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愿望，并以此教导儿孙；把这些写在自己的日记里，写时还要锁起大门，四望无人才行。他在这个世界上所作的决定决不受改造世界的愿望的支配。他可以被比作一个饱经风霜的船长，从主观愿望上当然想在平静的海面上航行，乘着顺风奔向正确的方向，但他总是准备好去适应无论哪一种实际起作用的条件。他唯一的目标是安全到达目的地，而不管气候如何。 *Navigare*（航海）这个字常被用作比喻，意思就是顺风转舵，因为个人的力量改变不了政治的风向。西西里有一个方言喜剧演员乔万尼·穆斯科，当墨索里尼问他是不是法西斯党员时，他隐晦地回答说：“我是个海员。”

没有几个意大利人读过圭恰迪尼的书，他们用不着读，他们早就学会了逢场作戏，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锐利的眼光。他们自己会当心自己的事，行为谨慎小心，甚至有点犬儒主义。他们决不会轻信迷人的外表和甜言蜜语，也不心血来潮忘乎所以，而始终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是冷血动物，只要不因此吃亏，他们和任何人一样喜欢真诚奔放的热情。但他们知道，自由地表露真实感情是特权阶级才能享有的奢侈，常常是一种危险而代价高昂的奢侈。只有圣人、英雄、诗人、有钱人、外国人、疯子、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穷人才有资格放纵感情；普通人只能要么尽情表露伪装的感情，要么控制真实的情感。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曾教给他儿子一句谚语，意大利人可能已忘掉了这句老话，但他们实行得不错，那就是“*volto sciolto e pensiero stretto*（表情要开放，思想要深藏）”。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房子的门面都很吸引人，可大门却总是上着双锁。

跟其他任何人一样，意大利人也宁愿要另一个世界，在那里过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在那里羊可以和狼在一起安睡，人们说的写的都是心里话，彼此全都亲如兄弟。但是他们也知道这样自己哄自己
173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现实世界是丑恶而无情的，只有收起无用的埋怨，去适应它那不可抗拒的法则。他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命运，都心平气和地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们就象在荒凉的前线被敌人包围的士兵，一边埋怨着，一边躲避不必要的危险，尽量把掩体搞得舒服些，还用画片和花儿来做装饰。他们盼望得救，但也准备死亡。

只有很少几个意大利人真喜欢造反，众多的意共党员也并不都想发动革命，他们多数是想在一个惊弓之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拥有一个革命者的特殊身份。少数真想建立马克思主义国家的人也沮丧地认识到，正如圭恰迪尼所说，革命解决不了生活中的不

公正。造反无论如何不会给本人带来什么好处，只会破坏生活中那种朦胧的安定，造成不必要的生活困难。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赶上了稀有的机会，革命成功了，那它最终可能改善子孙后代的命运，但几乎决不会改善革命者本人的命运。因此，许多意大利造反者和革命者过去始终是、现在仍然是最无私、最值得钦佩的人。大多数意大利人实际上相信，*condition humaine*（人的命运）是一种不可宽恕、不可赦免的判决；原罪是无法洗刷的；人不能轻易改变其命运；到头来，无论他可能得到什么样的宽容，都必然会以遭到其他麻烦或更大麻烦为代价。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他们宁愿做实际的人，不让自己异想天开。他们恰如其分地注意实际的问题、局势、人和事。他们追求有形的快乐，通常是感官的愉快；如果可能，更希望得到财富和权力所能提供的愉快。他们的决定中绝对服从的指导原则是 *non farsi far fesso*（不要当傻瓜受人愚弄）。轻信是最轻的罪，受人愚弄却是最大的耻辱。受人愚弄一般是指被妻子出卖、买了假货、堕入圈套与诡计、经常接受坏人邀请并甘心与之为伍等。“傻瓜”偶尔也用来指那些遵守法律、完纳捐税、相信报纸、信守诺言和履行职责的人。幸亏意大利还有足够的“傻瓜”，尤其是在北方，这才使这个国家保持运转。如果没有“傻瓜”，也许一切都要停顿了。但是很少有人羡慕和表扬他们，因而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少。如果他们一旦完全消失，真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种对于看得见、摸得着、测得出的现实事物的强烈关注，只要对意大利生活稍有了解的任何人都很容易觉察出来。在每天模棱两可的政治决议中，在精明狡诈的商业谈判中都能察觉到它。只要侧耳倾听一下咖啡馆邻桌的谈话或是在火车上和候车室里的谈话，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一般意大利人谈话的内容总是其他许多人所谈的那些，吃的啊，钱啊，私通的手法啊，还有工

作、服装、仪表、娱乐以及如何对付对手的阴谋和法律的约束。只有很年青的人才谈论艺术、道德、正义、幻想、自由和理想。谈话的侧重点总是脚踏实地落在物质上，落实到精确的钱数和实质性的细节上。他们口中的人很少是有道德、无私和慷慨的；他们谈到的爱情事件很少有纯洁高尚的。他们提到当代的政治家和已故的历史人物，也总是历数他们的各种丑行：同性恋、通奸、诱奸少女、腐化、裙带风、不忠诚、懦弱、侵吞公款以及最恶劣的罪行——愚蠢。为什么某人会得到某个职位呢？他们决不认为那是因为某人能干，而是宁愿认为某人是什么人的小舅子，或者发现了可以毁灭任命他的那个人的文件，或者参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黑社会，或者是跟某大人物的情妇有一手。

举个例子，战后人人都对一个问题感到迷惑不解，费尽心思想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这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把几十亿美元撤到我们国家来呢？共产党肯定，这是企图掠夺、饿死、奴役以至消灭意大利无产阶级的狡猾计划的一部分。非共产党人则下不了结论。美国人疯了吗？他们提出许多解释，经过辩论又放弃了。最后大多数人认为：“为什么他们战胜国竟要使我们战败国富起来呢？这里必有他们自己的原因。无论这原因是什么，美国人肯定是从他们自己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用不着感谢他们。”有许多现实的东西，现实主义的意大利人总也理解不了，因为他们眼光太锐利了，对许多东西反而看不见。

* * *

几年前，一个英国小家庭在佛罗伦萨附近租了一座不大起眼的别墅，他们有一份不大不小的财产，没有什么奢望，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这家人的父亲是个学者，读了很多书，正在写一本大部头的著作。母亲每天照料两个孩子，收拾花园，为丈夫的手稿打字。象他们这种勤奋好学、态度温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总嫌

本国太乱太吵，觉得佛罗伦萨及其周围的山丘真是清静的好地方。这个家庭住在这里觉得很舒服，他们喜欢这里的风景、质朴的村民，喜欢在田野上长久地散步。感到十分幸福。

他们有一个帮忙干家务的女仆名叫埃尔维拉，是个朴实的农家姑娘。他们待她就象家里人一样，教她读书写字和一天刷两遍牙。过了几个月，人人都看出这女仆的肚子大了起来。一天，她终于吐露了人们早已猜到的实情：她怀孕了。她痛哭，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对主人说，她不配受他们一家的信任，他们应当解雇她，把她赶到大街上去才对。她说，她想死，也不能不死，因为她没地方可去，她父亲一旦发现准会杀了她。而使她怀孕的情人几个月前到国外去了，找不到他，根本没办法把他叫回来结婚。

这位英国先生尽力安慰她，夫人把她抱在怀里，孩子们也拥抱她。英国夫妇劝她放心，从他们比较现代化的开明观点来看，还没结婚就做了母亲这不能算是羞耻，不过是个意外事件而已。出这种事的人，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劝她不要再伤心了，伤心对身体不利。从此以后，他们来照料一切家务。她 176 就呆在房子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照顾自己的身体就行了。孩子出生时，要在佛罗伦萨找个好医院，费用由他们负担，孩子出生后，母子都可以来住在这里，想住多久都行。英国人甚至热心地建议由他和他妻子在命名仪式上充当这孩子的教父和教母，如果不在乎宗教差别的话。最后这女仆擦干眼泪笑了。

女仆分娩后带着孩子回来了，英国人就去请她父亲，告诉他事情经过，请他放心，说一切都好，请他和他全家来参加命名宴会。在做完这小小的演说之后，英国人和气地望着这位老农，不由得感到一阵自豪，因为他以自己有限的财产来帮助别人减轻痛苦，尽力保障了埃尔维拉母子的平安和幸福；因为他向这个头脑简单的托斯卡纳农民显示出了，在这些事情上，英国人是多么慷

慨和文明。也许这件善事不会白做，今后在遇到类似情况时也许会想起这件事来，这也许有助于改善当地人粗鲁原始的习惯。

那个老头脸色阴沉而怀疑地听完了这个外国人这一番结结巴巴带异乡口音的话，然后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他当然十分聪明，不会相信刚才听到的这个难以置信的漂亮故事。这个英国人显然既有钱又有教养，为什么他要关心一个生孩子的无耻女人呢？埃尔维拉，她死了比活着给家里丢丑强，每一个懂事的人都会这么认为。那为什么这个英国人不把她一脚踢开呢？为什么他花好些钱去请好大夫，让她住好病房，给她买鸡、肉汤、爽身粉和尿布呢？为什么他还要继续花更多的钱？为什么要当这孩子的教父？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为什么花费时间来讲这些高尚的废话？

很显然，只有一个解释，谁都能猜得着，这英国人就是这新生婴儿的父亲。可能是埃尔维拉引诱了他，她完全做得出这种事，这个无耻的婊子！不过，也可能是他把埃尔维拉弄到房里去睡觉的。看看他那瘦骨嶙峋的英国老婆就明白了，甚至还要同情他呢。那个英国女人既愚蠢又违反了道德——这老农心想——她竟愿为他丈夫的私生子，一个罪恶结合的产物当教母！外国人的行为可真难捉摸呀。然而他决定，不管事情果真如何，他都要做他该做的事。他向英国人草草一点头就出门去了。

第二天，法院的公文象雨点般落到这个可怜的英国户主头上。埃尔维拉的父亲在强词夺理的起诉书里要求英国人赔偿他大量的金钱以补偿他们的损失，安抚受蹂躏的感情，挽回他们家庭的名誉和威信，保证埃尔维拉母女的生活，最后还要付给律师和法院更多的钱。显然埃尔维拉一家认为，借助于这可怜姑娘的耻辱和不幸，从这天起他们就有过好日子的权利了。这个英国人把全部诉讼事务都委托给律师，放弃了别墅，辞退了女仆，带着老婆孩子赶快离开了。

意大利人偏爱那些货真价实的、容易理解的、使人愉快的东西，而对那些光荣的、高尚的、超凡出世的、侠义的东西总是抱着怀疑。他们特别提防感情的陷阱，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利益上而不关心公共的福利。他们确信，所有的事情不管多么诱人，最后都不会有好结果。所有这些都是意大利人的传统特点，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些东西本是古人在精神上自卫的权宜手段，后来被几乎所有的人不自觉地接受了，被希望安全地闯过人生战场的人们发展了。许多外国学者发现这些特点已为几个世纪以来文学艺术中的丰富例子所证实。他们得出结论说，这些已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保持的品质了，是意大利人的本性中永恒的一部分。博学的约翰·阿丁顿·西蒙兹在他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一书中，有几段有说服力的文字专门叙述这种偏爱，他写道：“当我们埋怨意大利人缺乏高度的悲剧性的想象力的时候，当我们埋怨他们对自然缺乏浪漫的感情的时候，当我们埋怨只有他们的艺术珍品才达到完美境界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偏见，这种现实主义的偏见使他们偏好有形的、能体会出来的、能被感官感觉到的、能被人了解的东西……他们宁要有形的实体，不要梦幻般的抽象，要明确，不要含糊，要感官快乐，不要理想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决定了他们的品质特点和全部表现”。178

诺曼·道格拉斯甚至认为，意大利人是如此专心于实际，以致忘记了纯粹的美，特别是他们自己国土的美。“在这里，大地、天空、海洋的色彩是多么美妙啊。”他在《塞壬之地》中这样描写加普里和附近的海岸，“余晖闪烁的落日，婀娜多姿的明月，在山巅滚动，在太空嬉戏；在琥珀色的峡谷里，就连在耀眼的六月天也荫影森森；一串串葡萄从橄榄、榆树和无花果组成的喧闹的绿色海洋里探出头来；在被太阳晒焦的石灰岩的边缘，有紫色的小火

苗在颤动；从岸边潮湿的狭缝里，庄严的海雾盘旋着升起来；在刮西洛可风的黎明，可以看到海上有好似地狱的微光，原来那是地平线上的一些渔船象苍白的幽灵在摇晃。这里有无穷的乐趣，可是当地人却视而不见，尽管有时他们也装着欣赏，但那不过是为了让外国人高兴罢了。他们喜欢的是抬石头小伙子肩膀上疙瘩成团的肌肉；年青姑娘有多子女福相的臃肿身材；起伏的麦田，五月的及时雨，一盘肥肥的烤鹌鹑——这些才是他们认为的美。山只不过是农业的障碍，是好端端的地球面孔上难看的隆肿；山洞倒是有用的，可以用来贮藏干草；海边蓝绿色的山洞也有用，可供渔船躲雨；充满赞美诗般的和谐的大海在他们看来不过是抓鱼的地方罢了。

* * *

179 在古老的 **novelle** 里面，这种追求实际的倾向反映得特别明显。**novelle** 是意大利文学最典型的产品，莎士比亚和其他北方诗人曾从这里面找到许多创作素材。**novelle** 这个字本身就是具体的，它的意思不是故事，不是想象虚构，不是诗人的创造，而是新闻，是对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的报导，是关于富人、强人、名人的轶事，是来自远方的情报。外国作家为他们的剧本和诗歌借鉴这些 **novelle** 的构思，就象今天的作家借鉴报纸上的情节一样合理合法。旧日的 **novelle** 和大约同一时期，即中世纪后期，封建欧洲其他地区所写的故事不一样，那些故事总是描写抱着光荣动机的侠义骑士和高尚少女，故事总笼罩着传奇的气氛，人物总是隐隐约约不大具体。意大利的故事里却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商人、僧侣、手艺人、小店主和亲王，他们情欲旺盛，胃口又好，说着市场上和酒店里那种流利而丰富的方言。

阅读这些东西不会受到多大教育，读者不会从中学到如何避免犯罪，如何与邪恶斗争，如何保护弱者，如何控制自己的本能，

如何尊敬别人的美德，如何改良周围世界和如何使灵魂得救。他能从中学到的主要是如何在别人的欺骗、出卖、傲慢和狡诈面前保护自己；如何利用别人的弱点，看穿别人的伪装；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比如接近壮健的村姑、雇用脸红的女仆、品尝精制的酒菜、交结愉快的同伴和战胜弱小的敌人。在这些故事里，世界上一切残酷无情的东西都被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很少加什么褒贬。温顺谦和的人、轻信的人、天真的人、戴绿帽子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傻瓜”们），都受到嘲笑。他的不幸不仅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魄力的人，既聪明又强壮的人，办事不择手段、对人毫不宽容地利用自己的天赋的人，总是出人头地，得到作者与读者的赞赏。只有几个王公贵族才有条件表现出宽宏大量、慷慨大方；所有其他的人都严格地按照这些规 180 则过日子、定输赢。当时的意大利人都懂得这些规则，今天的意大利人也懂得，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自古以来，意大利的艺术品都主要是颂扬强者，嘲笑弱者和失败者，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它们还赞美肉体，颂扬女人裸体的和谐之美、冰肌玉骨之美。这类作品有些是粗俗下流的，有些则巧妙地加上一点薄薄的掩盖，并且暗含某种寓意。艺术家们即使在创作较为高尚的题材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实用的倾向。有许多圣母像，人们在观赏时可以感觉到作者乍见漂亮村姑的愉快，而感觉不到他的虔诚。拉斐尔画的圣母都是他的纵欲的情妇的肖像。她是一个面包师的女儿，名叫福尔纳里娜，她永不满足的性欲是拉斐尔早死的原因之一。诗人们在为宗教和史诗写作堂面皇之的诗篇时，总容易把高尚的感情表达成措词漂亮的例行公事，语言矫揉造作，思想刻板枯燥。只有在描写残酷的战争、有形的实体、堕落的异教徒、世俗的快乐和伤感的人情时，他们才得心应手。许多作家，当他们模仿着欧洲其他地方所流行的庄严神圣

的诗篇而写出些不虔诚而挖苦人的作品时，心里不晓得有多么舒服！

意大利人喜欢仿效古罗马人，写作些冷嘲热讽的讲阴谋诡计的喜剧，这些剧是如此粗俗，即使到今天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上演。这类喜剧马基雅维利写得最好，他在剧中嘲笑了教士和资产阶级的陋习、丈夫的嫉妒和妇女的贞德。人们要问，何以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家和政治思想家竟会浪费时间去写那样一些色情的笑剧呢？其实这也不奇怪，就连当时一些出名的高级教士、政治家和学者空闲时也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写些淫秽的诗呢。马基雅维利的那些剧本跟他的巨著《论李维的前十年》和《君主论》并不象人们
181 所想的那样是两码事，它们都是受到失败、失望和痛苦的激发：激发前者的是他个人的失败，是一个极其聪明却始终未能腾达的人的失败；激发后者的是一个民族的失败，是一个和他一样极其聪明、文明却始终未能建立统一和秩序以击退蛮族入侵的民族的失败。

在政论文章里，他为了实际的目的而向处理公共事务的动机提出了挑战，这些动机真是那么高尚无私吗？在喜剧里，他向处理私人事务的动机提出了类似的挑战，怀疑它们是否高尚无私。在这两方面，他都象所有真正的意大利人一样把稳行市：他唯恐受人愚弄当了傻瓜，生怕被高尚正直的理想引导到错误的结论和糟糕的结果。他相信 *le pire est toujours certain*（为恶者常操胜算）或者他更愿意用漂亮的托斯卡纳方言说成 *il peggio non è mai morto*（为恶者不朽）。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切当权者都残忍、狡猾和无情；所有的牧师和僧侣都是浪子、嫖客、饕餮之徒、死刮钱的家伙；所有的女人都卖淫。他认为他这样的看法几乎是万无一失的。

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意大利作家终于把他们的才能

转到了一些较有价值的方面，而不再仅仅是绘声绘色地描绘世俗的快乐和男男女女甘心情愿地适应世界最坏的东西的活动了。最后终于出现了一批新的诗人和小说家，他们认为意大利人民能够起来反抗使人窒息的、耻辱的命运，能够改正自己民族的缺点，也能够改善自己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他们高度评价精神的价值、宗教的忠诚、高尚的理想；崇尚爱国主义、坚强的性格、勇敢、诚实、公正和真理。有些作家预言，古人的大丈夫气概将得到恢复，意大利将出现精神上的复兴。他们的感情强烈的诗篇和历史小说，就象威尔第的英雄音乐一样，是一场道德、政治、军事的大变动的伴奏曲，为复兴运动的革命伴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伴奏。

但是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意大利人开始发现他们基本上还是跟过去一样，真正相信复兴运动的人只是极少数。老习惯开始恢复了，老观点又见诸文墨了，作家们又信奉货真价实的东西了。西西里小说家乔万尼·韦尔加曾描写过农民和渔夫是如何贪婪地积聚财产，目的是成为这个新自由国家的布尔乔亚。邓南遮感觉到，爱国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年青纯洁的激情，而变成了进行好大喜功的流血冒险的借口，而他相信的首先是肉体快乐，不管这种快乐是得之于骑马飞奔还是洗海水澡，是得自稀有的香料还是在战场上杀敌的愉快，或者是得自女人身体的无穷乐趣。老传统在继续。今天意大利的一些著名作家（以及部分地受到他们的激发的一些最好的影片）和他们的先辈一样，特别注重生活的实际方面，而且对理想与高尚表现出差不多同样的怀疑。他们用传统的风格表现由于色欲、贪婪和野心所得到的快乐，其描写的大胆和细腻就连在文艺复兴时代也未曾听说过。

然而，当你考虑另一些当代的文艺作品时，你会情不自禁地

觉得意大利人变了，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样子了。这些作品包括沉闷的先锋派小说、令人毛骨悚然的绘画、叫人不愉快的电影和多数批评家所欣赏的悲哀的诗。怕被幻想愚弄而当傻瓜的老观念已发展成了执着狂。人们总想寻求一种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如果需要的话又是十分简单朴素的真理；现在这种寻求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显然再也没剩下什么可相信的东西了。过去的高尚理想和爱国热忱被法西斯搞成了滑稽戏，没有剩下；对光荣、忠诚、道德、正直的热爱受到时俗的嘲弄，也荡然无存；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也消释了，就连共产党也不敢再相信它了。什么也没剩下是因为所有意大利人的最后避难所，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特色——严守个人利益、追求货真价实的东西——都第一次受到了怀疑。最新式的人们连意大利人最终极、最基本的东西——肉体快乐——都不相信了。在某些最新的小说里，私通第一次被写成是冗长乏味和使人反感的娱乐。正象莫拉维亚犀利地分析的那样：什么也没剩下，剩下的只是烦恼。不过，还是去听听咖啡馆里的谈话，看看露天市场上挑三拣四地购买鱼和水果的人们，观察那些欢天喜地听乐队演奏的人们和在街上对不相识的漂亮姑娘微微一笑的老头儿吧……你立刻就会放心了：意大利人还是意大利人。

第十章 对生活的探索

184

有一天，一个离群索居的意大利人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名不副实了；话听起来是一个样，实际往往是另一个样；他从学校、军队和长辈那里学来的，从许多庄重的书里读到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十足的废话。我们认为，这个意大利人，不管他是谁，实际上从这一天起才真正诞生。他从此懂得，如果不加思索地想按人家教给他的规矩去生活，结果必然是碰壁。那就好比一个瞎子在屋里摸索，而屋里家具的放置情况并不象他设想的那样。他学到的规矩都是堂而皇之的准则，这些规矩在其他国家或许可以用来指导生活，他听说北方那些国家都是纯结、富裕和井然有序的。意大利人以为，在那些国家里法律对于弱者或强者同样有效；官员们都清廉；居民都诚实真挚、光明正大、彼此没有戒心，因为他们没有互相惧怕的理由。意大利人以为，在那些国家里，纳税人都高兴地缴纳所有的税金而不欺瞒；工作总是交给最优秀的人去做；奖章授予真正的英雄；瓶子上的标签总与内容相符；花、菜种子袋上画着什么样的花，这些种子种下去后就将开出什么样的花。那里的生活出奇地容易，跟在意大利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必须承认，不光对意大利人，对任何人实际上都有一个醒悟时刻的到来；各国的人都有这么一天会认识到生活竟是丑恶无情的。每个人都有自己通向成熟的方式，一些人需要经过许多岁月不知不觉地流逝后才能醒悟；另一些人只须一件小事就醒悟了，犹如一晃万花筒，景象就陡然一变；还有些人须经重大事件方能

185 醒悟，比如他看到祖国被击败受辱，而他的领袖却原来是令人生厌的恶棍或不负责任的愚人；他发现人家教他的某些永恒原则不过是空话，而他自己不过是玩世不恭的实用主义者手中的傀儡。

应该怎样和实际怎样，诚实与虚伪，实事求是和装模做样，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无处不见。无论在什么地方，事情都不会按照天真幼稚的想象去进行。无论何时在什么国家，都存在着隐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严峻的真实情况，天真未凿的人发现它时会大吃一惊。从来没有目标完全高尚的伟大决定；各个领域里的伟大领袖决不象官方传记里所描写的那样敏锐、英俊、宽宏大量和远见卓识。

阿克顿爵士（他对这类事情非常清楚，因为他生于那不勒斯，是那不勒斯首相的孙子）在给格莱斯顿的小女儿玛丽的信中说：“我敢肯定，迄今为止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本上是不讲原则的，他们行为的动机是利益、狂热或出于自私愿望和无谓恐惧的盲目偏见。”

对于一个普通的非意大利人，在太平时日，当他头脑中整个信念的框架还完好无损的时候，他有可能长梦不醒，把整个生活包裹在温暖慰藉的幻影里，深情地追忆童年时代甜蜜的傻话，崇拜伟大的理想和高尚的英雄。这样对他不见得会造成什么大问题，他可能仅仅有时感到奇怪：为什么会有不正派的人竟比自己得到更多的报酬和荣誉呢？但这并没有使他过份苦恼。在意大利可就不行了，在这儿哪有什么人敢自己欺哄自己？最没有棱角和野心的人要是不把握好方向，也会被愚弄、欺骗和出卖。一个人的地位越低，就越容易受伤害，他也就必须更快地明瞭支配生活的真正法则，这仅仅是为了求生存，还谈不到求发展。只有在他认识到法则之后，生活才会变得简单、有人情味、愉快、容易、充满机会，与其它很多国家的生活比较起来更称心如意，不枉度

一生。当然，这样的法则在哪儿也没有成文的规定，它们通过谚语、烟灰缸上幽默的铭文、弦外之音、挤眉弄眼或耸肩摇头来予以暗示。能够避而不学这一套的意大利人可不多，因为恐惧、屈辱、欺诈和失败在时时教训着他们。在意大利，人们会比在别的国家更早、更频繁地遇到这类事情。 186

贫民窟里不识字的穷孩子和南方乡村的饥饿儿甚至在学会说话之前就清楚地知道所有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了。目不识丁的人头脑反而清楚，因为他们用不着费力气去忘掉其他人不得不学的东西。那不勒斯那些从道旁停放的汽车里偷窃手提包、为上岸的水手拉皮条的小男孩才有多大？他们好象生下来就是老油条了。几年前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同他的祖父（西西里的一个大地主）一起被黑手党绑架。这男孩儿用不着任何人告诉就知道他必须不表现出畏惧，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事后把发生的事忘个一干二净。

许多男孩子在学校里获得聪明才智，他们很快地学会怎样顺利地开拓前进，怎样击败对手同时又获得对手的友谊，怎样不用太费劲就混过考试。他们知道在自己的作文里应该怎样表达情感才能博得老师的欢心。拥有一文不值的法学学位而又身无分文的大学毕业生每年蜂拥而入罗马、米兰、都灵，他们精明得象苏联的优秀分子一样，谙熟在某个不起眼的办公室里找个小小立足之地的技术，然后通过亲戚朋友，过渡到一个较好的位置，把竞争者踩在脚底下，巴结无论什么样的顶头上司，耐着性子一步步往上爬，直至达到目的。意大利的政府官员中有一半就是这种人。靠了这些功夫，在北方的南方人逐渐占据了在私人商业和工业界发号施令的地位。他们中大多数是精明能干的人，干得不错，配得上自己的工作。但若是忽视了攫取工作的招数，他们就得不到

这份工作。

也有许多明显的例外，有些人好象不需要这种生活的艺术，如伟大的艺术家、学者、科学家，他们生活在抽象的概念、理论性问题和虚构的角色之中；还有某些继承了财产和风度的富有绅士也属此类。不过，即使是这些人，只要他们真想进取，真想要保持和增进财富、权力和地位，真想在心怀妒忌的对手面前保护自己，或者是被野心所驱使，也迟早得去学这种艺术。有些地方存在真正的例外，这是一些品德高尚、坚定顽强的人，他们自行其是，不管那些规矩，或者说他们自成规矩。他们独立不倚地面对敌意与指责，坚持斗争，不计成败。他们多数总是失败的，至今还在继续失败。不过也有少数人有时竞争总算得了胜利，这种情况不乏先例。他们是意大利的伟人，在世时不被国人喜欢，而死后受到崇敬。他们之所以不能得众，是因为他们死守自己刚直不阿的原则而不顺从大众的好恶。

在最后去学这种生活艺术的少数人当中，有些是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人，由此可以认为比起他们自己的同胞来说，他们的意大利国粹要少一些，了解时事和议论国情的能力要差一些。当他们看清楚意大利时竟为之一震。例如显赫的那不勒斯将军卡尔洛·菲兰杰里，他是萨特里亚诺的王子，陶米那的公爵，生于一七八四年，死于一八六七年。其父加埃塔诺·菲兰杰里是十八世纪卓越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卡尔洛·菲兰杰里曾在法国的普里塔涅军官学校受教育，后来跟随拿破仑在乌尔姆、马里安佐、奥斯特利茨和布戈斯勇猛战斗，当过那不勒斯王缪拉手下的旅长，于一八一五年晋升为将军。他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决不听任同胞受辱。（在一次决斗中他杀死了法国将军弗朗塞斯奇，仅仅因为这个将军把那不勒斯人叫做恶棍。）另一方面，他熟知本国的民情。他

给他儿子留下这样的话：“**Credimi: per chiunque ha un po' d'onore e un po' di sangue nelle vene è una grande calamità nascere napoletano**”（相信我的话吧，对于任何一个还有点荣誉感，还有点血性的人来说，生为那不勒斯人是一场灾难。）这里所说的那不勒斯人指的是那不勒斯王的臣民，广义地说指的是南方意大利人。

另一位贵人也可作为例子，他的名字叫做马西莫·达泽利奥，¹⁸⁸是皮蒙特的侯爵，受到良好的抚养和教育，是个有荣誉感的爱国者，深谙世故，才能出众。他是著名的画家、小说家、卓越的骑兵军官，当过国王的侍从武官和一八四九年在一八五二年的首相。他与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的女儿结婚，是复兴运动中的爱国分子之一。他非常了解意大利。一八二〇年他年纪轻轻第一次来到罗马，遇到了许多外国旅行家，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英国女士。

他在自传中写道：“与外国人在一起我感到丢脸，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从与他们的友谊中我得到的苦痛多于满足。作为一个意大利人我感到羞愧不已！……英国人冰冷的举止……面部表情中露出来的沉静与自信的矜骄之色……好象这一切是做给我看的，让我感到自己的卑贱，使我懂得当一个国家成为别人的俎上之肉，当这个国家允许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人到此寻欢作乐，就象猎人转移到猎物较多的地方那样，于是，这个国家的人就只能仰外国人的鼻息，而得不到平等待遇，永远也得不到。”

卡尔罗·菲兰杰里和马西莫·达泽利奥辛酸的话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两个人都甚有名望，也因为这些话已见于文字，而通常这种话只是私下里说的。乔瓦吉诺·罗西尼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作者，还是一种负有盛名的牛排的发明者，他常对亲朋好友们说：“有了西班牙人，我们得感谢上帝，……要是没有西

班牙人，欧洲最差劲的就得算意大利人了。”

189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事物的反应明显地更强有力，他们也具有更深的韬略。因为他们醒悟的一天来得虽比文盲同胞们迟，但醒悟得比他们更透彻，他们常常能更清楚地阐明和描述自己的思想。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已经知道了大家都该知道的事情，意识到生活基本上是一场无情的赌博；人应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找到自卫的方法；文明生活的实质就是控制个人的本能。没有这些护身法宝，人在世上就是孤独的，孤独得象一头食肉的野兽，或自己就是一块肉，等待着被吞噬的命运。

这些有知识的人还发现意大利的所有官方机构都是软弱无力和不稳定的：法律可以任意解释，是靠不住的；国家没有威信，易于被强有力的个人或集团控制；社会没有影响（象在别的国家所设想的那样）。虽然如此，他们周围的生活之河却依然轻快地流着：人并不总是被他人吃掉，自己还是可以保卫自己的；日常的工作照样进行；国家可称得是文明国家，事实上它也处于世界最文明之列，并且是世人所喜爱的一种本国的独特文明。这里的人决不孤独，他侧身于人群大众之中，在多方面得到帮助、安慰和保护。实际上，生活常常是快乐的、生动的和令人满意的。不过只有那些不坚持抽象的公正无私的原则、不指望法律机器正常运转的人，才能享受到这种生活的愉快。对于那些看破红尘听天由命的人来说，生活不象在秩序井然的国家里那样残酷，至少残酷和不公正的方式有所不同。好象是人民用自己善良的愿望弥补了严格的制度和法律保护的缺乏。宽厚的容忍之心、对他人弱点的同情、同仇敌忾的亲密合作的感情，这些东西好似巨大的无所不溶的甘泉，以它仁爱的温水洗浴着一切，柔化了生活中一切的粗俗鄙陋。道德的成见很少投下它的阴影。管理社会生活的政府机构无所不在（有五种不同制服的警察，数不情的表格要填

写，各种场合都需要提供证件，最微不足道的活动也需要批准，成百种的法律书籍，几乎每隔一条街就有一幢政府机关的大楼庄严矗立），然而没有任何事情是缺它不可的。意大利人的生活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呢？

有知识的意大利人所发现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封建主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与意大利格格不入，它从未深刻地影响到意大利人的生活。其外部形式和具体方面倒是很自然地接受了，就象接受许多外国的时兴风气一样，但即使是这些时兴风气不久也被改造得适合了当地的条件和口味，变成可资利用和容易理解的东西。190例如，骑士精神在意大利基本上变成了上层阶级的一种文雅的消遣。意大利人迫不及待地采用了那些漂亮的外在的东西：精致的饰有纹章的盾、优雅的礼貌和壮观的马上比武，而道德上的那些诫律却无人理睬了。这里没有同亚瑟王对他的骑士宣誓的誓言相当的东西，也不存在巴亚德那样被誉为无所畏惧、无可指责的武士。

事实上，在意大利人中能听从骑士时代的最高召唤，当真丢下老婆和城堡去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基督圣地的骑士就是比其他国家的要少。比萨、阿马非、热那亚和威尼斯这四个滨海的共和国的人，机灵地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作为承包商和买卖人而赚了大钱。尤其是威尼斯人，他们把船租给德国、英国和法国来渡地中海的骑士们，狡猾地把各种军事行动引向对威尼斯共和国最有利的方面，使之有利于征服那些日后可以作为基地的港口和岛屿，以便对地中海东岸诸国进行从容不迫的商业渗透。

意大利人对于那些风行于中世纪的大部分理想观念当然也是格格不入的，这些观念包括对长官始终不渝的忠心、为君主而献身的热忱以及高尚的义务，也就是附庸、下属、弱者和无依无靠的人的责任感。荣誉这个字的英语是 honour，法语是 honneur，

德语是 *ehre*，可是它却很难精确地翻译成意大利语。在意大利语中最切近的字是 *onore*，但它还是会引起误解。这个字主要意味着从外部给予的赞扬、尊敬或意味着崇拜、地位、尊严、盛名之类东西，几乎从来没有一五四八年版的牛津字典所说的“对于正当的或正确的事物的美好感觉和严格遵循”的意思。例如马基雅维利抱怨说：“*Gli uomini non sanno essere onorevolmente tristi.*”（人们不懂得怎样用体面的方法做坏事。）

191 如果当今世界不是仍然按照封建准则的残余在运转，那么，上面所说的一切就没有什么重要性了。如果没有这些封建残余，世界就会分崩离析。如果没有这些封建残余，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国家、政府、陆军和海军以及巩固的军事联盟，就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大型组织，如金融集团或大工业；没有一定程度的条顿骑士精神，就不会有体育运动比赛。已经渗透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而最后又传到我们身上的这种精神实在太少了。这种精神还包括对真理的畏服，与人较量时的光明正大，对法律、规章和条例的尊重，对敌手的敬意，与人合作的肚量，平等待人的诚意，对自己信念的忠诚，对自己的党派、阶级、学校和国家的忠诚。这些美德不仅使十字军东征成为可能，维系了古时的各强大帝国，而且还继续维系着当代的帝国。

大多数意大利人对于现今的资本主义世界还几乎不能理解。他们常常赞赏、羡慕并很成功地模仿它外表的样子、它的力量 and 实际产品，却漏掉了它的道德品质方面。他们甚至怀疑这道德品质的存在。意大利人把许多公认的现行准则看做十足的无稽之谈，关于这一点可举英国的一句格言“不要踢倒在地上的人”为例。意大利人不信会有人按此行事。他们承认不能踢老人，不能踢身强力壮、马上能回敬一脚的人，不能踢事后要报仇的人，不能踢有强大的亲戚朋友的人，不能踢日后对自己有用的人，要是

有警察在旁巡视，也不能贸然动脚。但是“倒在地上的人”为何不能踢？只要愿意，还有什么情况能比此时动脚于己更有利、更安全、更有效呢？一本由齐塔雷拉阁下用那不勒斯语写的讲怎样玩 **Scopa**（意大利最普通的扑克游戏）的著名手册中，一开始就这样写道：“规则一，时时偷看对手的牌。”这条又具体又实用的规则真不错。

必须承认，古骑士时代有一件小小遗物至今还原封未动地在意大利保存着。这是一本手册，一八八七年初版，以后重印了十八次，实际上直到现在还有人再版出书。在某种年龄的意大利中等阶级分子中，许多人的书房里，都可以找到这本书。这书通常已是边角磨圆，破旧不堪。它很少是主人自己买的，而是多年前匆匆从别处借来，一直没有还。人们往往在紧急情况下突然需要 192 这本书，很可能是在半夜里或星期天突然地需要它。直到今天在不多见的情况下也还要用到它。

这本书的名字是 **Codice cavalleresco italiano**（《意大利骑士约法》），是莱戈恩的一位骑兵上校雅各布·杰利所著。内容是教导人们，无论在什么场合，一旦卷入绅士们之间的纷争，应怎样应付。书中对每一点细微问题都已预见到了，决不让任何一个问题听任自然。作者指出，书中所有的规则仅仅是纪录了在富于荣誉感的人们之间行之有效的成俗，决不是任意制定的。作者很自然地以定义开卷，他说，绅士是“这样的人，他出于高度的道德情操，不相信法律……足以维护他的荣誉，因此他自行遵循一套称为骑士约法的含有特殊规则的严格诫律”；荣誉是由外部决定的，是按照意大利的方式决定的，它被定义为“一个诚实的人通过始终符合自然和民法的行动而在公众舆论中能够得到的尊重与崇敬”。“评价一个绅士，首先是看他所具有的荣誉感，不过以参加过决斗的次数来衡量一个绅士的荣誉只能是粗俗的偏

见。”

一个绅士要是触犯了法律，就可能丢掉绅士的资格（变为下等人，受了污辱也不能要求决斗）；他也可能由绅士专门陪审团根据充分理由取消其资格。这些理由又是严格根据制定的法律。象地震和台风一样，对他人的触犯按严重程度被分为一系列的等级。最严重的是第四级，只要触犯了对方的家族就达到了这一级。由严重的触犯而挑起的争斗只能通过写公开信作谦卑的道歉或正式的决斗来解决。书中接下来是关于怎样组织各种正式决斗的详细条文。

当然，书中漏洞很多。比如杰利指出，助手的首要职责不是眼看着两个当事人之一不惜任何代价去杀死另一个，而是尽可能调停，使事件的解决不诉诸武力。这事就太难了，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方愿意道歉。书中还有几处捉弄人的难题，如应用最广泛的是第九章：“当冒犯行为还没有使矛盾激化或还未被评判，或这行为起因于对事情的错误估价和误会，则刀枪相见的解决方式必须排除。”什么样的污辱不能说成是“对事情的错误估价造成的”呢？卷末是许多信件，以备各方的当事人查用。一封信是由被冒犯者写的，责成两个朋友保护他的利益；一封是对冒犯者的挑战书，按意大利语是 *cartello di sfida*，还有各式各样其他文件的范本。

这本书很有实用价值，它总结了几个世纪的经验，为普通法律和正规程序不能解决甚或会使之扩大化的错综复杂、令人烦恼的纠纷指出了圆通而不失尊严的解决办法。很明显，这些纠纷由第三者来处理会更好些，因为他们能以比当事者冷静的头脑对事情进行考虑和评理。要是这样，就不会有人被杀死了。如果奥斯卡·王尔德按这本书的指导向昆士伯利的侯爵提出挑战而不去诉诸法庭，他恐怕就能长久地生活和工作，一直活到他的风格被公

众接受、得到上流社会的尊敬、对文艺界起到有益作用的那一天。

每当人们想到决斗时的场景：黎明时分，草坪上两个光着膀子的冤家对头手拿武器，周围是助手们和适当的随身用具，就会感到那种高度不可能又存在实际可能性的威胁。要不是这种威胁，那么四位彬彬有礼的朋友之间的协商恐怕很容易延长到世界末日（没有哪方会承认甘拜下风，作出令人满意的道歉）。决斗现在很少发生，大概三、四年里有一次，但终归还是有。进行决斗不仅对于主要当事人的生命具有直接的威胁，由于决斗被法律严格禁止，那些导演决斗的助手、医生、专家也很有可能会进监狱。对个人自由的优先考虑无疑缩短了助手作出决定所用的时间，有助于他们采用最和平的解决办法。

设想一个朋友激昂地打电话给你，告诉你他陷入了麻烦，他协同他的另一位朋友（也是助手）来跟你碰头，一块儿商讨对策。你匆匆披阅了手边的一本杰利的书，以寻找适用的内容；你抄下 194 书末一封能对上号的信函（从敌手滋事挑衅到你向他提出挑战之间只允许有四十八小时）。你做所有这些事情时忍不住要暗笑那些滑稽古老的程序、术语和错杂的噜嗦事。我为朋友当过几次助手（传统上认为新闻记者是这类事务的专家），每当说起行话，办着例行的事情，我总觉得好象是在一出蹩脚的化妆表演中扮演着一个角色。

可一当肩并肩地与另一位助手站在一块，穿起好象做弥撒或开委员会会议时用的黑色礼服，气氛就不同了。我把刚刚抄好的信递给惹起事端者，看到他满脸通红地想解释什么，就断然用传统的公式化言辞制止他：“对不住，我们什么也不要听你说，请提出你的两个朋友的名字，我们俩只乐于同他们谈话，整个下午我们都会等着，再见。”尽管话说得颠三倒四，姿式摆得很做作，但我在这个时刻还是不禁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庄严肃穆的感觉。

我曾有一次不得不在罗马一家生意兴隆的咖啡馆里，在跑堂的吆喝声、咖啡机的丝丝声、顾客的谈话声中向一个共产党新闻记者递交这样的一封信，（我只能安排在这个时间、地点约会他，因为按规定时间已经很紧迫了，约会之前我们曾与专家争论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算做绅士的问题，浪费了宝贵的几小时。这个问题在杰利的书里可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个共产党员冒雨来了，他合上伞，老远就看见了我們，一边笑着打招呼，一边走过来说：“你们疯啦？为什么偏要在太阳落山之前见我？”他嘻笑着接过信，根本没想到里面会写些什么，大概足以为是某种愚蠢的玩笑吧。可是当他读了那篇咬文嚼字的陈腐文字之后，脸色就变得苍白严肃了。显然这个小小的仪式甚至在他身上也发生了作用。最后是党不允许他决斗。他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决斗的资格。

杰利上校的那些解决纠纷的办法无疑是陈腐而愚蠢的，但却
195 一直保存到今天，其原因不仅在于它还时常有用，而且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意大利按骑士的约法和绅士风度解决纠纷的历史之所以比其它任何地方都长，是因为这种办法符合于他们一种最深刻的民族特性，那就是无视正式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不信任国家委派的官吏，而专靠个人的善恶观念、传统的信条和朋友的帮助去解决问题。

在这样一个从未真正接受过封建主义道德训条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政府和法律都软弱无力的社会，很少有能帮助意大利人算计前程、稳泛孤舟的准则。意大利人必须自己保卫自己，早早地就开始当自己的老师（大多数中学办得很糟）和教授（大学穷酸落后，管理不善）。然后当自己的新闻记者（公开发布的国内新闻竟会那么歪曲事实，相信它就是自找倒楣），当自己的文学、电影、艺术评论家（评论文章很少反映影片、书或话剧的价值，而只是

罗列些背景材料，诸如评论者与作者的个人关系，他们各自所属的政党，年龄的差别，哲学上的倾向等），战争时期自己作军事家（没有人会告诉他哪一方将胜利，等到人家告诉他该逃跑时早就已经火烧眉毛了），还得自己作财政专家（辨别哪些税该全交，哪些只交一部分，哪些就干脆不予理睬）。有时他必须自己作律师、警察和法官。总之他的安全不依赖于他与同胞们的共同努力，而主要系于他个人的能力和从娘胎里带来的机敏。

他不久就明白了，他在社会中所能占有的地位，只能是他能够夺得并且能够用自己的权势加以保卫的那种地位。这种个人权势有赖于许多因素：他的能力、才气、精力和决心，而最根本的是他威慑敌手以及在必要时摧毁敌手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在意大利有许多途径可走；有多少不同的情况，几乎就有多少不同的途径。在修道院，在主教教区或梵蒂冈，这类手腕简直令人难以察觉，比如翻一下白眼，略微点点头，说一句拉丁双关语，跟着轻轻笑几声，一篇有关神学小论点的含沙射影的文章，或是一番无缘无故的恭维话，就足以达到目的了。在实业界和政治界，对于一个人可以进行诽谤，给他戴上绿帽子，使他名誉扫地，斩断他与有势力的人物之间的联系，进行讹诈，把他推向毁灭的边缘或逼迫他自杀。在西西里的某些地区，毁掉一个人就意味着干脆把他干掉或不声不响地毒死。

所有这些手段都需要权力。那些内藏杀机而表面温和的言辞，隐蔽的恐吓，断绝一个人生计的决定，都必须有权力作为后盾。若没有权力，任何威胁都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姿态而已。谁要想离开权力而生活，那只能是梦想。不过这些权力只须不多不少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就行了，无须大到怕人的地步。办公桌后面的内阁部长和为他接引宾客的传达员都在盘算着该有多大权力才能适应他们各自的地位，不然的话谁也坐不牢自己的位子。

这种需要迫使每个人在日常的生存竞争中遵从与随时都支配着国际关系的准则大致相同的原则。每个意大利人都必须象君主和政治家制定政策那样用不同的技巧去对付各种不同的问题。绝大多数决定都不允许受感情、好恶、冒险动机或主观愿望的影响，它们通常根据对敌对双方相对力量的仔细估价而做出。加入这个还是那个联盟，战争还是和平，抵抗到最后一息还是立刻投降，这些选择是对双方所能调动的力量做实际的掂量然后顺风倒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涉及多么小规模的交易，意大利人总是互相盯着脸孔的原因之一。他们从对手的眼神中看出（或从对手的声音和所用的字眼中觉察出）他所透露的坚定决心或隐藏的胆怯。他们就根据这种判断来决定何时可以无所顾忌地加码，何时应该收敛一些，何时要让步和接受对方的条件才不失谨慎。当然，拟定投降条件时要不失体面，退却（这扇门总是开着的）时必须做出机巧的假象和好听的解释。他们是如此难得的艺术专家，但他们自己却浑然不知，以致很少有人去描写它。这种艺术无疑有其副作用，它使各种交易速度减慢而且复杂化。没有一件正事能通过通信解决，人们必须跑去面洽。但这艺术也有它的好处，比方说，只要外交仍然是责任重大的严肃交易，意大利人就是天赋之才的外交家。

任何人想了解某些意大利人作出的难于捉摸的决定的真正原因，或想预见意大利某些方面的将来动向，都必须把这种艺术牢记在心。意大利人在现实地估量了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之后，象一切政治家一样，跟强者联盟面向弱者开战。这一行动准则使得在意大利各种矛盾斗争所延续的时间都比别处为短。有些英雄人物相信自己为之奋斗的一方是正义的，即使公众舆论知道这一方必败，他们也仍站在这一方继续战斗。这种人物必然为数很少。

在某些决定、某些历史转折点、某些革命本来还能够避免、防止或转变方向的时候，上述的行为准则却使它们过早地变得不可避免了。这种行为准则还常常使这些决定、转折或革命的结果表面化，不稳定和不真实。

权力，个人的权力，这就是关键之所在。

第十一章 家庭的力量

家庭是力量的第一源泉。在充满敌意的大地上，意大利的家庭是个坚固的堡垒：个人在家庭的垣墙后面，在家庭的成员当中，可以得到慰藉、帮助、劝告、给养、贷款、武器、同盟和帮凶，来帮助他达到他所追求的目的。任何一个有家庭的意大利人，决不是孤独的。家庭就是他的庇护所，他斗争失败之后，就在这里舔吮他的创伤；家庭就是他的武器库和参谋部，使他得以胜利前进。学术界始终承认，意大利的家庭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基本组织结构，是民族气质的自然产物。千百年来，家庭适应着千变万化的环境，不管盛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它都是社会的真正基础。实际上，法律、国家和社会都只有不直接干预家庭的最高利益，才能正常运行。

人们常常稍微带点夸张地形容意大利不外是几百万个家庭拼凑起来的彩色斑斓的马赛克。盲目的本能把这些家庭粘合在一起，活象一些昆虫的群聚，是一个有机的结构，而不是根据成文法律和道德规范构成的理性建筑。在她过去的历史上，甚至在近代以至现代的历史上，国家有时处于最低沉、最衰弱的境地，陷于贫穷，吃了败仗，然而居民却是极其活跃的、既幸福又繁荣。有些悲观的作家把那些时候人民的欢乐活跃和官方机构的腐败无能比作蛆虫在死尸上的愉快群聚。相反，也有少数时候，家庭联盟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相吻合。这时，在外国观察家看来，意大利好象是个团结的、有效率的、强大的国家。

当然这没有什么新颖之处，惊人之处，或独特之处。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有许多国家和人民，当合法当局处于软弱地位、法律遭到怨恨和抵制的时候，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主要是靠家庭来保障的。譬如中国人，在帝制时代，认为对家庭的迷恋远比对国家和对上帝的爱更值得称颂。犹太人也是这样，无论他们在欧洲的什么地方获准定居，他们在表面上遵守当地的法律和要求，但是，内心里却只服从他们的宗教诫律和家庭生活的古老法典，这使他们经历种种迫害，得以幸存下来。 199

因此，意大利人在无法控制、难以预测的社会里，经常生活在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乃属于在家门四壁之内、在血缘亲属当中寻求庇护的人们之列这就不足为奇了。意大利与中国毕竟有许多共同之点：中国人也喜欢彬彬有礼、繁文缛节、礼花耀天、吵吵嚷嚷；美味佳肴、酬宴宾客；喜欢多子多孙、儿孙满堂。中国的艺术也是高度装饰性的和精巧的，但并不总是具有深度；中国人单凭双手，能制作精美的物件。他们是精明的谈判者，机灵的买卖人。意大利在许多方面也酷似犹太人。犹太人同样也有清醒的头脑和求实的观点；他们也属于嘲笑自己怪癖的少数人之列；他们对别人的高风亮节，抱着审慎的怀疑，总是要去探索这种高风亮节背后的真实动机。

然而，意大利人与其他把家庭作为风雷激荡的混沌大海中的救生艇的民族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混沌的无政府状况在意大利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社会的自发状况和自然的发展，而且也是人们的意志深思熟虑的产物、人们精心选择的结果。若干世纪以来，这种状况受到孜孜不倦的培植和加固。因此，家庭的力量不仅是反对混乱的堡垒，而且同时也是产生混乱的主要根源之一。家庭以种种办法，特别是以使得强大的政治体制发挥不了作用的办法，竭力制造混乱。这当然引起一个复杂的问题：政治体制是否只有 200

在家庭衰弱的地方才能欣欣向荣呢？或者反过来说，只是在政治体制不够强大的地方，家庭才繁荣兴旺？无论是哪种情况，政治体制在意大利从来没有交过好运。意大利人只创造了很少的政治制度，他们不得不经常从国外输入很多现成的政治制度——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宪法、两院制、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现在他们威胁着要借用苏俄预制的共产主义。

家庭也是不可征服的，因为它是神圣的方舟，意大利人在方舟里面保存和维护了抵抗外来影响的全部古老理想。这古老理想显然保护了民族的性格，使其免遭污染。由家庭构成的意大利，肯定是真正的意大利，是从多少世纪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精粹的意大利。而法律和制度所规定的意大利，部分地是伪装的；意大利人所想望的国家，从前有过，或者将来会有，但是他们知道现在没有。所有这一切是否要继续下去呢？意大利人将来一切政治制度，是否不可避免地都要被家庭所腐蚀和破坏呢？难道正是出于这种信念，所以意大利人才总是随人摆布，去实验各种新的政治制度、并且很多意大利人不怕革命吗？无政府状态是否会在个国家告终呢？家庭是否会永远占据支配地位呢？这当然就是意大利的历史和政治生活中的待解之谜的核心。

* * *

下面是一幅简化的意大利家庭图画。我认为它是对读者有所启发和教益的理想典范。当然，明智的读者不会不知道在实际生活中如此典型完美的事物是极其罕见的，正象没有任何一个活的人体会完全符合于解剖学教科书上的彩色画像一样。意大利也有些破裂的家庭，亲属不和，脱离关系，分崩离析，无休无止的长期纷争。在西西里，同一家庭的成员常常手持猎枪蹲伏在霸王树篱笆后面，等待着互相厮杀；在伦巴第，同一家庭的成员几乎总是借助于高价聘请的律师，使用所有一切法律伎俩，从一个法

院到另一个法院，争夺他们先人的遗产。然而，亲属间互相斗争的那股极度顽固的劲头，有时也证明他们的斗争是违背他们的本性的；即使是在互相残杀的时候，他们也不能不感到一种几乎是不可抗拒的驱策力量，使他们去遵守古老的戒律，当他们触犯这 201 些戒律时，就会有一种异常深刻的懊悔之感。

大多数家庭都千方百计尽可能忠实于完美的典范。最优秀的典范通常出自具有古风的人们中间，他们也许比别人更能代表意大利风貌，例如农民、渔夫、地主、小城镇的小资产者和道貌岸然的乡间贵族。各阶级的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固执地、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一切传统。在工业化的北方，在大城市的咖啡馆社会里，人们日甚一日地模仿着外国的坏样子。然而，即使这些离经叛道的行为也是表面的。没有一个意大利人会不犹豫地、不懊悔地去作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事情。譬如说，如果他的妻子是他的第一个男孩的母亲，他就不能轻率地遗弃她。

每个家庭成员的忠诚首先是献给家庭。必须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如果可能，使用合法手段，否则也可用非法手段，对家庭予以保护，使之富裕，使之强大，使之受到尊重，为之担忧。任何人都不能蔑视它而不受惩罚。它的荣誉不得玷污。对它受到的一切委屈都必须予以报复。必须拒敌人于家门之外，不使迫近；必须剥夺危险分子的权势，或者干脆予以消灭。每个成员都有义务尽其所能为家庭谋福利，如果有必要，就献出自己的财产；有时，如果绝对不可避免，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人们倾囊相助以挽救亲属免于破产。应该用一切手段保护家庭，使之免遭厄运，免遭政治突变和经济危机的灾难性后果。为了这一点，至少必须有一个代表加入执政党，另外有一个代表加入反对党。治理有方的家庭在内战时必须一分为二，在交战双方都有自己家庭的成员。必

202 须使家庭世代繁荣昌盛，永永远远欣欣向荣。当然，必须有孩子，成群的孩子，特别是能够传宗接代的男孩子。不顾一切地生孩子。在意大利，为孩子呕心沥血。孩子是意大利生活的主人翁。他们的任何一点最小的愿望，都要予以满足。总有一伙人麇集在漂亮的小宝宝周围。卑微的父母，节衣缩食，清苦度日，到处奔波，为的是娇养他们的儿子，为的是送他们上学，盼望他们沿着社会阶梯爬上去。向上爬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后浪推前浪，一代接一代地爬上去，才能爬到宝塔的顶端。

大多数外国人不大注意一个必须了解和记住的基本问题。大多数意大利人仍然还服从双重标准。有一套准则在家庭圈子内有效，在与三亲六故的关系上有效，在与亲密的朋友和接近的同事的交往中有效。另一套准则则调节着外界的生活。在家庭内部，他们总是表现所有一切高尚的品质，这是肤浅的观察家们通常认识不到的：相对说来，他们诚实可靠、忠实坦率、公平正直、恭顺服贴、慷慨大方、纪律严明、英勇豪侠、肯于自我牺牲。这些美德，其他民族通常是奉献给整个国家福利的。意大利人对家庭的忠心就是他们真正的爱国主义。在外部世界里、在社会上的混沌和骚扰中，他们常常不得不使用敌占区地下战士所使用的那些手段。意大利人认为，一切官方的合法当局，在没有证明它友好无害之前，都是怀有敌意的，如果不能置之不顾，就要使它无所作为；必要时，就欺骗它。

在意大利，也有过这样的人，这些人在他们所不赞成的战争中，常常只做仅仅为了活着回家所必要的事情，别的事情不沾边。严格说来，这些人可以被谴责为懦夫。同样是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他们的父母子女，常常作出几乎难以忍受的牺牲，甘冒生命的危险。父亲、兄弟、儿子、孙子（多半是南方人和海岛人，也有较先进的北方人），朝朝暮暮、舍死忘生，

保护他们的妇女免遭蹂躏，保护他们自己免遭侮辱。这些维护家庭尊严的战士，许多人以身系囹圄而终其一生，但是，他们问心无愧。他们自豪地昂首挺胸。他们知道，他们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他们执行了他们承认其有效的一种法律。他们知道，只要有必要，他们的亲戚便会照顾他们的妻子、儿女。 203

意大利人有义务为其家庭提供必要的钱财和力量以对抗权势集团（历史上的所谓百人团）。这一点可以说明意大利的许多特殊风俗习惯的由来，其中也包括古代教皇把他们的侄儿和亲属提升到高位，并且使他们发财致富的风俗习惯。现在讥笑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是容易的，但是应该不带恶意地来研究它。国王和教皇跟所有的意大利人一样，无疑是首先忠于自己的家庭的。但是，国王照例拥有许多的优越条件：他出身名门有钱有势，有许多有用的亲戚眷属、宗族分支；他一般不必烦心如何夺取王位，他知道，他的长子会理所当然地继承他的宝座，在长子身后，还有长子，一脉相承。国王通常都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来促进亲属的利益，扩大家族的领地和财产；此外，他周围还有一群传统的显贵，他们经验丰富，受过忠实为国王服务的训练。

教皇的情况不同，他处于困难的地位，通常是在垂暮之年，有时已是风烛残年，才登上教权的宝座。他的时间有限，必须在为时尚不太晚的短短几年内，为他的亲属办完几件大事，这些事是大多数王室要花几个世纪才能办完的。教皇的亲属实际上什么都需要，因为他们通常都出身微贱、乡气十足、贫穷潦倒。他不知道在他身后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他有权给他们所有的人授与响亮的称号；但是，没有资本和财产，称号便一文不值。他周围的人是很忠诚的，但不是对他个人的忠诚。他们是为罗马教皇尽忠，而不管谁是教皇；他们对教皇的继承人也同样忠诚。

教皇跟所有处境困难的新贵一样，只能依靠他的血缘亲属：亲属们知道，他们的命运是和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204 所有这一切，说明为什么历代教皇那样急不可耐、肆无忌惮，在当选后几天之内，甚至是几小时之内，就为他们的亲属谋求私利。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要是不这样干，本来是很有德行的教皇。他们的心机并不白费，并且产生长期的影响。现在罗马的名门贵族（其中很少具有罗马人血统）仍然是教皇的后裔。其中很多人仍然还侧身于最富有者之林，充分享受着古时特许的权利和掠夺来赃物的果实。即使当年那些不走运的人，只得到罗马郊区古代水渠之间的一些风景优美的牧场，现在也成为富豪了：在本世纪里，他们的地产，在城市范围内，已变成了无价之宝。

关于教皇的晚辈亲属们的收入，我们只掌握一点十六、七世纪的可靠材料，而那个时候，裙带之风已逐渐减退了。我们掌握了有关那时教皇侄儿们的收入的一点可靠情况，这些材料是威尼斯的大使们记下来的。因为他们是商人，对数字很感兴趣。教皇庇护四世的侄儿圣查尔斯·博罗梅奥二十二岁时被立为红衣主教，成绩卓著。他是个伟大圣洁的人，每年有数达五万斯库多的收入，他把这些钱都分送给了贫苦人民或者捐献给神殿圣堂。（博罗梅奥王孙们现在是米兰的世家，他们现在仍然享有巨额财产。居住在自己的邸宅里——米兰博罗梅奥广场的博罗梅奥宫。）格雷戈里十三世的私生子贾科莫·布翁孔帕尼奥（该家族现在把这个姓氏写成邦孔帕尼亚），得到价值十二万斯库多的一个庄园；同一教皇的两个红衣主教侄儿各得每年一万斯库多的收入。（本孔帕尼现在还拥有豪华大厦、地产、别墅。他们的最后一个豪华邸宅，是十九世纪的仿古式建筑，现在是威尼托大街的美国大使馆。）

西克斯图斯五世费雷蒂使他的侄儿蒙塔尔托红衣主教得十万

斯库多的教职收入而大发横财。克莱门特七世阿尔多布兰迪尼有两个侄儿，一个是红衣主教，一个是世俗人。一五九九年他对两个侄儿各赠六万斯库多的年俸。据计算他为他的家族积聚的财产总数约为一百万斯库多。（阿尔多布兰迪尼家族现在仍然是意大利最有影响的世家之一。除了其他财产外，他们还拥有弗拉斯卡蒂的著名别墅。这是为当红衣主教的侄儿建造的，这个家族今天还住在那里。那里有宽敞平整的凉台，临轩远眺，罗马全城尽收眼底。亨利·詹姆斯曾在它的花园里度过“不可言喻的时刻”。第二次大战期间，被德国人征用作为凯塞林将军的司令部。）据说保罗五世博尔盖塞曾给与他的亲属近七十万斯库多的现金、每年二万四千斯库多的存款和从各办公机关抽来的二十六万八千斯库多的税收。（博尔盖塞家族至今仍然是教权贵族的四五个名门世家之一，与全欧其他显赫氏族都有联系。他们仍然还拥有博尔盖塞宫，由于该宫稀奇古怪的外貌而以 **Cembalo di Roma**（罗马的铙钹著称）。

格雷戈里十五世的侄儿卢多维科·卢多维西红衣主教，有号称二十万斯库多的收入，整个卢多维西家族从教皇的政府债券中获得八十万斯库多。（卢多维西家族与邦孔帕尼亚家族结合，现在称为邦孔帕尼亚—卢多维西。）巴尔贝里尼家的财产可以回溯到乌尔班八世的两个侄儿，据说他们每年享有约五十万斯库多的收入。他们从主教职务所得总收入达到十万另五千斯库多的创记录数字。巴尔贝里尼家族是所有教皇家族中最贪婪的家族之一。他们修筑了一些城堡，建造了一些宏伟的别墅，在巴尔贝里尼广场建造了一个宫殿，是当时最著名的建筑师博罗米尼和贝尔尼尼设计的。

一个意大利人达到发号施令的地位（因而也成为家族的首脑，不管年岁大小），就会想办法使他的亲属都得到照顾。波拿巴

家族是个最鲜明的例子，如果说世界上有过一个新贵族，那就是拿破仑。拿破仑象大多数教皇那样，知道只能信赖他的血缘亲属，甚至常常连血亲也不信赖。一旦他力所能及，他立即为他的弟兄、姐妹、姻亲、养子作好充分的安排。他的哥哥约瑟夫一度被立为那不勒斯国王，后来晋升为西班牙国王；他的弟弟卢西恩不信任拿破仑，被立为卡尼诺亲王。卡尼诺是罗马北面的一个富庶采邑，在马雷玛。他的妹妹埃利萨嫁给弗利塞·巴乔基亲王，先得到卢卡的公爵领地，后来得到托斯卡纳的大公领地。他的弟弟路易斯当了荷兰国王。他的妹妹波林嫁给卡米洛·博尔盖塞；他的妹妹卡罗琳嫁给约阿希姆·穆拉特，穆拉特被委派为那不勒斯国王。他的弟弟热罗姆娶了个巴尔的摩的美国美女伊丽莎白·帕特森。他被迫与她离婚，另娶了不太漂亮的符腾堡的凯瑟琳，当了威斯特法利亚的国王。他的养子尤金·德博阿尔奈是杰出的意大利总督。

直到今天还可以列举一些这个传统的实例，不过没有那么著名。把亲属分布在关键性岗位上（好象是设防营地周围建立的岗哨），不仅保证他们全都有优厚的收入，而且还保障家族免遭攻击。甚至在教皇家里，现在偶尔还保持了这个习惯。庇护九世拉蒂只把他唯一的侄儿立为伯爵。约翰十三世龙卡利绝对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提高他的农民弟弟和工人侄儿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他们是教皇的亲属。”他坦率地说，“他们每年和我共餐一次。对他们来说，这就够了。”另一方面，庇护十二世帕切利的侄儿们被立为亲王（的确不是他立的，而是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立的。国王这样做是为了使教皇减少麻烦），并且让他们领导一个庞大的商业企业，教会在这家企业里拥有占支配地位的股权。仔细阅读一下流行的一些参考书，就会发现许多当代的例子：天主教民主党著名的政治家们把他们的弟兄、妹夫、内弟、儿子、女婿、堂兄弟姐妹安置在国家控制的或国有化的组织、工业、持股

公司的工作舒服、报酬丰厚的位子上，而他们对这些工作很少受过专门的训练。

上次大战结束以来，至少有一个政界大人物积蓄了大量财产，这是可以和古代教皇家庭的私产媲美的私人财产，是意大利最大的私产之一。他利用他的政治权力在几年之内迅速而巧妙地积聚了这些财产。他在和时间赛跑，因为他也是一个耄耋老叟了。他这样做是心安理得的，因为这显然是为了子孙的未来，而不是为了自己：他已死期将至，对人生再无所求了，但是，子孙们又太年轻，不能担任高薪的要职。意大利私人控制的企业的确也遵循这个传统；在其他国家有时也是这样。这风气还传播到一些小单位，在外省，特别是在南方，有些政府机关，不大的办公 207 署，花哨而俗气的医院，重要的位子都为同姓同宗的人所占据，或者为与同姓同宗多少有点关系的人所占据。一个有野心的人唯一的成功之道是与身居要津的人的女儿结婚。

婚姻关系当然是很重要的，对于提高一个平民家庭的社会影响和繁荣兴旺具有决定意义，就好象古代王室间的婚姻关系那样。许多著名政治领袖的儿子和女儿互相通婚，互相把对方子女网罗在自己的营垒里，从而无形中给政治评论家的工作添麻烦。这些评论家如果不了解各个政治家之间暗地的纽带，有时就无法解释那些表面看来很费解的形势。这些政治家不仅是内部各派的头头，而且互相是儿女亲家。治家谨严的父亲，如今不再强迫不听话的女儿为了家庭而牺牲自己了。象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在一八五九年就被迫这样作过。他有个年轻女儿玛丽亚·克洛蒂尔德公主。他要这位公主与拿破仑·波拿巴王子结婚，以使拿破仑第三对奥地利宣战，帮助她的父亲征服伦巴第。而这位绰号普隆—普隆的拿破仑·波拿巴王子却是一个身体肥胖、已属中年、生活放荡的人。强制在现今已没有必要了。有教养的青年女子希望于一

个男人的自然是能改善她的家庭的社会地位。一个青年男子在她成长的生活圈里有权势显赫的亲戚就会更有吸引力，无论这生活圈是在商界、政界、军界、官场、大学甚至犯罪社会都一样。

譬如说西西里的黑手党大家族就和《哥达年鉴》里的古老贵族家族一样，由新旧婚姻纽带结成的网络，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只是在最近，美国麻醉剂管理局才逐渐认识到移民中间这种关系的意义，并且开始探索这种关系。该局孜孜不倦地制作了美国下层社会那些西西里血统的最有名气的家庭的家谱图，并且发现这个人是那个人的女婿、祖父、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叔祖父、堂兄弟、隔房堂兄弟、远房堂兄弟、教父、教母等等。在美国的
208 这些宗族，有些形成牢固的联锁组织；他们的后代继续互相通婚；另一些人联系虽然不密切、但是关系仍然很牢固，并且共同分享企业股权。他们跟十八九世纪欧洲列强一样，联合起来保卫和平，或者联合起来发动战争；发动进攻战，摧毁共同的对手，征服新的领土，扩大自己的版图；进行防守战，保卫他们的势力范围；进行谈判，签订停战协定，庄严地缔结和平条约。

* * *

意大利的男性，家庭的首脑或后嗣，以其男子气概而理所当然地闻名于全世界。他十分警惕地保卫他的独立性。任何女人也休想使他服从她的意志。他的傲气表现得清清楚楚。你看，在黄昏时分，或者在星期日上午弥撒之后，他漫步小镇街头，显得多么趾高气扬。他的衣冠笔挺，两眼横扫四周，十分得意洋洋。他连眼皮也不抬，用眼角看一个漂亮的姑娘好象不屑一顾的样子。他显然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女人怎么样呢？女人显然是为了供男人消遣、使男人安逸而投生于世的；她好象是在舞台上协助魔术师变戏法的不开口的女郎那样，是无足轻重的装饰品。象所有的地位低下的人那样，象

前殖民地的黑奴那样，务必把她永远置于她应有的地位。这首先是为了她自己。只要她不成为耸人听闻的街谈巷议的牺牲品，她的确能够愉快生活、发挥作用，也比较幸福。她也知道这一点，并且感谢她的当家人。无论什么时候，她一开始忘乎所以，就必然立刻受到教训。古老的意大利谚语说：“女人象鸡蛋，越打越好吃。”

意大利人生来可怜那些无能制服女人的人，可怜那些听任其女人横行无忌的人。他们说，你看，那些感到无拘无束，得以非分妄为的女子，是多么痛苦，多么不自在！他们说，你看，外国的丈夫对妻子胆怯，有时是畏惧，好象她们是肉食动物一样；女人撒娇耍赖，他们也得百依百顺。结果，他们的女人给惯坏了，难以驾驭，并且毫无幸福可言。据说外国的这些丈夫对女人一点不隐瞒自己私下的生活行为和私下的思想活动，向女人汇报每天每时的一举一动和自己所挣的一分一文的来龙去脉，甚至晚上同无害的男朋友外出，也必须请示批准。意大利的情况多么符合自然法则和上帝旨意，而意大利妇女得到她们所得到的待遇是多么感恩戴德！

意大利妇女实际上对丈夫的私生活毫无所知。他有情妇吗？是不是有两个？他是不是今天到这个相好的那儿去，明天又到另一个那儿去？他是不是同时有几个相好的？她毫不为这些问题伤脑筋。她毫无妒忌之心，不为任何可疑之事所触动。她忠贞地等候丈夫归来；丈夫说什么，她听了都感到幸福。至于她自己，她懂得必须谨守妇道，不能对别的男人多看一眼，否则，就该受到严厉的惩罚，遭到遗弃，并且往往被置之死地。她知道她在这个不可改变的制度下的地位，正如南方农民的妻子知道自己的地位一样。南方农妇头顶沉重的包袱，跟在丈夫后面，步行一里又一里，而丈夫却骑在自家的毛驴背上无动于衷。夏天日落后，意大

利南方家庭的一家人坐在门外石阶前面大路上纳凉。男人抽着烟，女人织毛线，谈谈唠唠。男人总是面街而坐，向过往朋友点头招呼。女人总是端庄地把脸转向自家的门墙，除了墙上的石灰和墙基的石头外，什么也不看一眼。只有那些脸皮厚的轻浮女人才不时地把头转向大街。但是，她肯定要遭殃。

当然，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些胡说八道。那是缺乏经验的旅行家们在日记中所写的官样文章。意大利的男人相信它吗？许多男人相信。然而大多数男人暗地怀疑和耽忧。他们终于为这样的事实所刺痛：与他们私通的妇女，大多是有夫之妇；因此，意大利的所有丈夫都不守丈夫之道，没有一个妻子违背为妻之道，
210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地每天都有相当数量的意大利男性，妒忌心强、怀疑心重、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男人，被戴上绿帽子，成为人们轻蔑、嘲弄的对象。几个世纪来的情况显然一直是这样。

表面现象总是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从男人们公开的举止来看，好象事物永远是按照一成不变、无可置疑的风俗习惯进行安排的。妇女情愿充当人类二等成员的角色。她们公开的行动好象真的只不过是脆弱的、驯顺的、适应性强的动物。其实在外表的下面，情况就不一样了。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把话说得太死是不慎重的、不诚实的。现实情况不是千篇一律，而是五光十色的，随着地区、阶级、背景和个人情况而变化。各种现实情况天天在变化着，有时又合并到另一种情况里；所有的现实情况全都模棱两可、难以捉摸、具有多重性格。然而，可以毫无疑义地说，在意大利，男女两性间对特权的划分是干脆利落的，持久不变的。男人挂名是一家之主，但决不是专制的帝王。他掌管总的政策，负责战争、和平和与外界的关系。妻子法定是从属人员，负责卑微的职务；但

是，她的职责范围大半没有明确的规定，活动余地是很大的。

这种安排对男女双方都没有赋予压倒一切的权威。它赋予妇女更大的道义责任。家门和顺，全仗她的努力。但是，多少世纪教育了她，要她使丈夫忘记她实际上的重要性。她处理问题通常非常巧妙，几乎难以察觉；她稳定丈夫的情绪，避免公开较量，但是，一般都在沉默无言中有最后决定权。她当然坚守她的岗位。如果她忘记了这一点，显然会失去她的优势地位。在低收入家庭里，她的岗位可能是厨房；在较富裕的家庭，她的岗位也可能是客厅和闺房；总的说来，她的岗位是晚上的双人床。但是，无论她的岗位在哪里，她的岗位总是拥有人权的位置。男人治理国家，而女人治理男人。意大利实际上是个隐蔽的母权制国家。

情况不能不是这样。每个人的地位、安全、福利取决于力量。²¹¹力量的第一源泉是家庭。家庭的实力取决于许多因素——财富、关系、联盟、名望、身份、幸运——但是，首先取决于家庭内部的内聚力量和世系分支。这些东西都掌握在女人手里，世界各地，概莫能外。意大利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体现这一点。女人操办门当户对、男女般配的婚事，保持与远方亲戚的联系，时时注意每个人的行为是否得体。所谓得体，不是为了她自己和她的幸福，而是为了整个家庭。

意大利妇女意识到她们的重要性。她们知道，如果没有她们，整个家庭结构在几小时内就会象纸牌搭成的房子那样坍塌。她们象蚂蚁那样孜孜不倦，无所畏惧，日日夜夜，尽忠职守。她们把男女英雄们奉献给国王、领袖、旗帜、祖国、宪法、革命、七年计划的那种激情、赤忱和牺牲精神，以及善男信女奉献给上帝的那种激情、赤忱和牺牲精神，献给了家庭。

爱国者、革命家和善男信女所作的斗争和牺牲，都已当之无愧地受到许多人的赞美和歌颂，却没有人想到要称道一下意大利

妇女每时每刻为使她们的男人自立于天地间，使她们的家庭消灾免难，使她们的国家国泰民安所作的浩荡无边、默默无闻、充满勇气、令人敬仰的种种活动。这些妇女很少为人所知。（有一个为人所知的妇女就是米兰的泰拉萨·孔法洛涅里·卡萨蒂伯爵夫人。她的丈夫密谋反对奥地利政府，争取意大利独立，遭到逮捕和审讯，并于一八二三年判处死刑。她奔赴维也纳，跪倒在皇帝脚下，请求他大发慈悲。她成功了。她丈夫的死刑得到减免，终身监禁在波希米亚的斯皮耶尔堡。她一直没有和他通过信，直到死也没有和他再见一面。）

212 有多少无人歌颂的姐妹、妻子、女儿、母亲、姑母、姨母、祖母与意大利男人的痛苦一生搅合在一起，同甘苦，共命运！有多少妇女在许多世纪的外敌入侵、战争失利、饥荒灾难和集体屠杀中，暗暗地把她们的思想、美貌、希望、健康和心神的安宁全都贡献出来，保护家庭，维护家庭的福利！有多少妇女不得不编造谎言、施展诡计、玩弄手腕、密谋策划或者远赴异域，去收集重要的情报，争取有用的同盟者或人质！许多妇女高尚地献出了她们的生命：或者是经年累月、点点滴滴地消耗她们的生命，或者是在必要时一举而献身。她们中有多少竟然敢于持刀杀人！她们中有多少忍辱含羞，过着令人不齿的生活！在历朝历代有多少妇女爬上权贵们冰冷的卧床，并不是为了她们自己的欢乐，而是为了获得她们的丈夫或父辈们的晋升！一个女人为了家庭还能再做些什么呢？

* * *

在意大利的生活中，妇女即使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也是占支配地位的角色，这种情况从许多小小迹象就可以看出来。每年献给“妈妈”的流行歌曲，几乎同献给风流荡妇或浪漫美人的歌曲一样多。“我的妈呀！”是最常用的感叹语。其他国家的人在艰难困苦或情况危急之时，怎样呼唤母亲的呢？德国人是呼唤“Mut-

ter”，法国人呼唤“Mamam”，英国人呼唤“Mother of mine”吗？前线包扎站的意大利伤兵，象伤心的孩子那样，呜呜咽咽地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几乎让人听不见。被判死刑的人，等待射手开枪时，叫喊着“妈呀”。第二个最常听见的感叹语是“Madonna”（圣母马利亚）。这是个超自然的对应词，因为“La Madonna”是女人遭受苦难、自我牺牲的象征。

教会本身欣然鼓励这种民族倾向。在意大利，耶稣基督和他的母亲几乎平等地分享最高尊荣。以各种方式表现圣母显灵、象征圣母品质和特点的、供奉圣母马利亚的教堂也许和供奉耶稣基督的教堂一样多。人们最喜爱、最尊敬、最常去朝拜的地方是供奉圣母马利亚的圣地，庞贝、洛雷托、罗萨里奥、卡尔米尼、迪维诺·阿莫尔等著名圣母祠。令人惊叹的圣母神像，比其他任何神像都多。有些圣母神像是古代以不可思议的办法从东方飘洋过海运来的，据说有几幅是使徒圣约翰所画，有许多是出自意大利名家大师之手。这些圣母神像在解决妇女的特殊问题上特别有用：213 未婚女子向它们祈祷，希望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婚后不育的妇女向它们祈祷，希望身怀六甲；失宠的妻子向它们祈祷，希望重获丈夫欢心；母亲向它们祈祷，希望医好孩子的不治之疾。大多数意大利男人也供奉马利亚。马利亚被用来给受洗礼者命名。马利亚在意大利是正式受国家保护的圣人之一。每月至少有一天对她献祭；圣母的节日不仅为教堂所尊奉，政府机关和私人企业也要尊奉。整个五月是圣母月，有时候，全年都供奉圣母。

必须记住，意大利人十分崇拜圣母马利亚，十分反对对她有所怠慢，以致为了圣母马利亚，他们宁愿让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被新教徒肢解，因为新教徒认为圣母马利亚不值得那样重视。由于全国对圣母马利亚的虔诚，要把所有的基督教徒重新统一起来，变得极端困难，也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主要是意大利信徒的压

力和意大利教士的热忱，推动教会公布了有关圣母马利亚的教义，把人们心爱的传统和传奇经典化、神圣化了。

* * *

意大利的男人对他们的女人理所当然地心存猜疑，严加防范。这是男性的首要责任之一。家庭的稳定和名声取决于妻子的忠诚而不取决于丈夫的忠诚。在这个问题上，意大利法律有明确规定：女人通奸是犯罪，要受惩罚；男人通奸，如果不同时犯有丑恶可耻和野蛮残忍的行为，就不算犯罪。意大利历史上总不乏丈夫、兄弟、儿子惩罚女人的有名事例。因为女人犯了使他们丧失名誉、
214 遭到别人奚落的罪过。实际上，现在每天早上的报纸上还是充满了这类丑闻。然而，女人并没有表现任何一点害怕惩罚的迹象。

这种倾向的精采实例在十六世纪特别多；在所有各世纪中，十六世纪最可称为意大利世纪。譬如，拿颇具姿色的唐娜·佩莱格里纳·本蒂沃利奥的案件来说吧。她于一五九八年在博洛尼亚被她的丈夫乌利塞伯爵下令杀死。她被不公正地怀疑犯有通奸罪。四个蒙面凶手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砍成碎块。她的两个侍女和一个车夫也一起被杀，尸体被扔在大路上。一五九〇年，韦诺斯塔亲王的儿子唐·卡尔洛·杰苏阿尔多在那不勒斯他的邸宅里，亲手杀死他的妻子唐娜·马利亚·达瓦洛斯和她的情夫安德里亚公爵唐·布法里齐亚。费德里戈红衣主教和圣查尔斯的表弟乔万尼·博罗梅奥伯爵，是个笃信宗教的男人。他于一五七七年在米兰，趁吃饭的时候，把他那行为不检的妻子朱利亚·圣塞韦里诺伯爵夫人，刺了三个致命的伤口。

再拿马西莫一家发生的事情来说。不管这个家庭是否真的象他们自称的那样是罗马时代费比乌斯家族和打败过汉尼拔的罗马大将费比乌斯·马克西穆斯的后裔，这个家族的确是罗马最显赫、历史最悠久的家族之一。在事件发生的那个时候，家长莱利奥的

第一个妻子、萨维利族的一位小姐生了六个强壮的儿子。他们全都虎背熊腰，力大无比。在孩子们的母亲于一五七一年去世之后，父亲爱上了一个姑娘。这姑娘在出身、教养和生活经历方面，对那时的罗马亲王来说，都是地位低下、门户不相当的。她叫欧芙罗西娜，出生于乔恰里亚，距吉纳·洛洛布里吉达的故乡不远。她原曾同一个名叫科尔贝里奥的人结婚。她那倾城倾国的姿色，引起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亲王的垂涎。他神魂颠倒，杀死了她的丈夫，然后把这迷人的寡妇带到罗马，作为情妇而藏之金屋。马西莫为了从科隆纳手上夺得这寡妇，不得不更进一步：正式同她结婚。这显然是对他家庭的侮辱，孩子们岂能容忍？一五八五年举行婚礼的晚上，孩子们不让迎她进门。翌日早晨，有五个孩子冲入她的卧室，把她枪杀。六个孩子中只有一个没有参与这次谋杀。莱利奥表扬了这个孩子而谴责其他五个。这老头儿悲痛欲绝，几星期后，跟着他的娇妻也进了坟墓。这个没有过错的儿子蓬佩奥，长大起来成了马西莫这个大世家的继承人。（他的后人维托里奥的行为，表明他继承了比较温和的血统：他娶了电影明星道恩·亚当斯，有个儿子，但是，他想和她离婚；同他那残忍的先辈不一样，他避免流血而诉诸法院。）215

父亲的诅咒在当时还是灵验的。老莱利奥·马西莫的诅咒并没有白费。五个儿子都没有得到好下场。大儿子奥塔维奥在跟土耳其打仗时被炮弹打死在海上。逃避到法国去的另一个儿子杰罗拉莫在与一个贵妇人谈情说爱时，中埋伏，被枪杀。第三个阿莱桑德罗在法尔尼斯将军的部队里当兵，在巴黎附近被枪打死。第四个卢卡，是由于谋杀继母而在罗马被捕的唯一的儿子。根据他的抗辩，他得了释放。他抗辩说，他是为了维护家庭的荣誉而进行报复。然而，他于一五九九年被他自己的弟弟马尔坎托里奥毒死。马尔坎托里奥以犯有杀死亲兄的嫌疑而被捕，关在诺纳

塔楼。他在那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被绑赴圣安杰洛城堡桥头小广场上斩首。

随着几个世纪的岁月流逝，只有下层阶级还完整地保持着这些严峻的传统。实际上他们是今天仍然谨守这些传统的仅有的人。在名门贵族的人们中间，态度已逐渐转变，变得性情温和，情欲放纵。妻子接待情夫越来越慷慨大方，满不在乎。丈夫在处理绿帽子问题上不得不更现实些、文明些、少采用一些流血方式，否则，也许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已经被消灭了。有些丈夫（例如拉韦纳的主乔利伯爵，以随和的丈夫而闻名于世，他的妻子是爱伦的情妇，是这位伟大诗人“最后的依恋”）甚至保持了正常的情绪，良好的食欲，并且和妻子的情夫交了朋友。这些情夫毕竟替他们减轻了负担。十九世纪远近闻名的一位威尼斯美人的丈夫，
216 机智的帕帕多波利伯爵是另一个好典型。有一天晚上，他睡在妻子身旁。从床下传来的吱嘎声、呼吸声和鼾声，他知道，他进门时，惊动了妻子的情夫，使他躲到了床下。伯爵什么也没有说。到了早上，咖啡准备好了，他端一杯咖啡往床下一递，有礼貌地问道：“你喝咖啡放不放糖？”他认为，在地板上睡了整整一夜，就睡在自己的情妇的丈夫的床下，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够严厉的惩罚了。

有的人不喜欢戴绿帽子，但是，他们设法避免戴绿帽子而不使用刺耳的语言和流血的手段。这种谨慎提防而又道德高尚的君子的实例也有一个。他就是生于一八〇九年的贝蒂诺·里卡索利。他虔信宗教，献身政治，认真研究他喜欢的农业。他长得不漂亮；实际上，他长了一对斜眼，并且体形瘦长，姿态象军人，举止带傲气。一八六一年被任命为首相，是加富尔伯爵去世后统一意大利的第二届首相。但是，他在位为时不久，因为他和国王

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国王和他一样刚愎自用。

人们送给贝蒂诺一个绰号，叫做“铁伯爵”。（在最讲究逆来顺受的意大利，这种宁折不屈的性格未必值得称道。这个绰号具有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的讽刺性。）在他结婚后刚几个月的一个晚上，带着年轻的妻子安娜·波娜科尔西去佛罗伦萨参加舞会。在舞会上，一个青年男子在同波娜科尔西跳了几次舞之后，就直截了当地随便向她求爱。丈夫立刻对她说：“亲爱的，我们必须离开这儿。”他陪同她来到等在外面的车上，坐在她身旁，告诉车夫：“到布罗里奥。”布罗里奥是他家的所在，是一座人迹罕至、景色阴郁的城堡，隐蔽在草木不生的童山之间。里卡索利家族很久很久没有人在这里住过了。这对夫妇静静坐在车里，驶过冰天雪地，直到东方发白。丈夫穿的是黑色晚礼服，妻子穿的是跳舞服，他们冻得发抖。实际上，他们在布罗利奥度过了他们一生中余下的岁月。

为了消磨时间，他重建了庄园。现在看起来，这庄园好象是 217
华尔特·司各特的小说里的场景也好像是为浪漫的抒情诗人提供背景而设计的。他还实验种植了不同品种的新葡萄，并且用改良的加工方法酿酒。（作这类事情必须有耐心和毅力。要尝到他种植的杂交种葡萄的最初产品，几乎要花五年时间。）伯爵发现了一种黑葡萄和白葡萄（桑杰奥韦塞的葡萄和乌尔瓦西亚的葡萄）混合酿造的可口饮料，方法是经过连续两次发酵使新酒具有美妙的味道。这种酒人人喜爱。当地葡萄园主人依法泡制，制成佳酿，名曰基安蒂酒，驰名全球。最好的基安蒂酒仍然还是里卡索利，而里卡索利酒中，布罗里奥城堡生产的是最好的、最名贵的品种。就是这样，伯爵设法维持了家庭的圣洁；他妻子的名誉和他的尊严都清白无瑕，并且还积蓄了一笔财富，同时还使邻里乡亲也富裕了

起来。

* * *

意大利的现代生活也正在侵蚀着好端端的家庭的完整性。这种变化显然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家庭衰弱下去，无政府状态是否会猖獗起来？意大利人最终是否会适当地尊重政府机构和典章制度？在各个地方，特别是在北方工业中心，家庭看起来再也不象它过去那样了。这种现象当然在北方更引人注目，因为北方接近欧洲其余部份，是工业化正在促进社会转变并且逐渐富裕起来的地区。北方的意大利人居住在小小的公寓房间里，广大的砖石瓦块的废墟和拥挤的街道把他们和亲属隔开，好象他们住在天涯海角，要隔很久很久才互相见面，有些亲属不可避免地失去联系，逐渐淡忘。年青人要求有他们自己的独立生活，有他们自己的爱好、学业、抱负和朋友，要求和独断专行的父母分居。有些旧式礼仪逐渐被人遗忘，或者是带着点不屑和讽刺的微笑来奉行这些礼仪。

218 离婚逐渐成为上层阶级的习俗。法典里面当然还没有离婚的规定，永远也不会有。不仅教会反对离婚，人民自己正当地认为离婚是野蛮的、灾难性的制度。为了维护某种坚固的堡垒，反对朝秦暮楚，就必须制止采纳离婚制度。在过去，即使最放荡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革命家也不敢提出这个问题。今天的共产党人愤怒地否认他们在考虑这个问题。^①众所周知，婚后生活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满足青春时期的恋爱梦想（那是不可能满足的），不是要达到风流浪漫的心醉神迷，不是要把两颗心灵完美地熔合在一起，而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并且巩固已有的家庭。丈夫和妻

^① 意大利已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举行公民投票，以三比二的多数通过了离婚法，故作者的论断已为事实所否定。——译者

子相依为伴，其乐融融，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也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有一件事绝对必要，这就是，如果夫妻一方或双方受诱骗而误入歧途，有违忠贞之道，他、她或双方处理这件事时，要不危及一个永久性的结构，要不毁灭其他人的生命。犯错误的丈夫或妻子应千方百计给与他的或她的伴侣一切可能的机会来欺骗他自己或她自己。缺乏警惕性（那怕是容易识破的警惕性），把拆开的信到处乱扔的坏习惯，少不更事、一时冲动就不保守秘密，什么都坦白承认，是危险的倾向，必须加以约束。

几年前，热那亚有一个举止稳重的中年已婚的银行家，爱上一个俊俏的女人。这女人是个小康之家的男人的妻子。这银行家常和她在租赁的小房子里幽会。他认为这样的幽会不够味，而愿意到情妇自己舒适的家里去从从容容地和她相见。他在晚上去看她时，总是对她的丈夫说：“亲爱的朋友，我预感到这个数字在今晚的赌盘上准会赢钱。请你到俱乐部走一趟，把我的这些钱压在适当的位子上好吗？”这个丈夫总是拿着钱走了。两小时后他回来说，哎呀，那个数字没有出现，他把钱输掉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年。冷酷无情的道德家们会嘲笑这种文质彬彬的小小把戏，并且脱口说出令人震惊的事实真相：这个丈夫定期把钱放进自己的腰包，是个靠自己的不幸来维持生活的下贱无赖，他的妻子是个下贱的破鞋。冷酷的道德家们会要求这妻子公开承认错误，她的丈夫同她离婚，银行家抛弃妻子和孩子去和她结婚，从而同时毁灭两个家庭。按他们的要求，就破坏了这个微妙而文明的安排。 219

然而，现在很多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狠心地离婚，以便能够再一次结婚。结果，机灵的律师为那些不能摆脱宗教约束的夫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变相离婚。例如，战后许多人钻法律的空子，到与意大利订有对等条约的国家去把婚姻关系解除了；这些条约规定，缔约一方的法院对某些案件的判决，在另一方也有法律效

力。意大利的法院几乎没有一个敢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效力。然而，有一次，有个倔强的老法官使这些判决全都有效。他这样作了几年，直到他退休为止。他解放了成千上万的没有幸福的夫妻。现在，这个漏洞已经被明确的立法和严格的规定所堵塞，但是，人们又在探索其他的办法。离婚，对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无名之辈来说，自然比较容易，因为他们不会引起报纸读者的注意，不会引起广泛的反感。电影明星、有名气的政治家和受人欢迎的歌唱家，就不得不凑合过下去，不离婚了。但是，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在无计可施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现在自行其是，未经市政当局和牧师的恩准，便与新伴侣建立起家庭来。

当然，这种事情过去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始终没有绝迹。但是，过去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非法夫妻再也不象麻疯病人那样不为人所理睬，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并且几乎是偷偷摸摸地活着。现在，人们不再认为他们是被遗弃的人，象安娜·卡列尼娜和渥伦斯基那样。他们到处受到接待和邀请，受到同情和怜悯，被当作是残酷的中世纪法律的无辜受害者而受到鼓励。人们常常出于礼貌而以情夫的姓氏来称女方。通过种种法律游戏，对他们的孩子也非法地赐与男方的姓氏。这种非法同居现在几乎完全是正派的了，事实上是太正派了，以致这些没有正式结婚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当中，有许多人已开始另有风流韵事。

* * *

意大利现在好象很热衷于采纳许多外国风尚，甚至是迫切地这样做，和过去有些时候一样。家庭纪律显然日益松弛。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意大利正在变吗？在看来不值一提的外表下面，在每个家庭紧闭着的门扉里面，为了维护先人之道的实质，一场无言的、隐秘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正在进行着。这场斗争就在每个意大利人的内心深处进行着。其结果大概是一如既往，愉快地表

现得胸怀宽广，豁达大度，而这种表现与骨子里面看不见的真情完全是表里不一的。天真、肤浅的观察家会认为，“意大利再也不是几世纪以来的意大利了”，许多意大利人现在已和别的任何人一样“现代化”了，“深刻的革命”已明显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老练深入的观察家了解得多一些。当然新观念中有些东西会站住脚有些东西无关紧要。但是，旧日生活方式的精神会以某种方式保存下来。意大利人在危急之际，仍然选择站在家庭一边，反对宪兵、警察、法院、舆论，有时甚至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长期来，家庭是波涛翻滚的大海中唯一可靠的航船，这艘航船总是载着全体船员和全部客货，顺利驶向安全地带。事物当然都在变化着，但是，变化是很缓慢的，或者毫无变化。意大利乡间的破旧旅馆，只是把门面和门厅修整一下，其余的原封未动，依然如故。

在最现代化、最富有的社会环境里，家庭力量没有失去其光泽，说明这一点的迹象比比皆是。拿热那亚某甲家七个弟兄来说吧（本来是弟兄八人，其中一个死于车祸），他们共同拥有航运公司、橄榄油炼油厂、其他各种工商企业，价值几十亿里拉。为了维护家庭的团结，他们一致同意，除了自己身上的衣服和妻子儿女身上的衣服以及屋里的家具外，什么东西也不属于他们任何个人。别的任何东西都是共同财产，连汽车也属于共同所有，需要车时可以电话叫车。弟兄们认为，要经营庞大复杂的私营企业而不发生摩擦，家长制的安排是最好的。再以西西里大家庭里的弟弟们为例。在西西里，古老家庭的力量仍然主要依靠世袭称号的声望和世袭土地的收入。意大利法律不承认称号，并且规定大部分遗产应在全体孩子中间平分。为了不让共同财产分成许多小溪小流，并且在一两代人之后逐渐消失，有些弟弟就象世俗的僧侣一样，不结婚，或者结婚不生孩子，以便使家庭的财产、称号、

声望、权威继续传给后代而不致衰落。

不难举出另外一些实例。在日常谈话、业务联系和新闻节目中，都会碰到这些事例。它们是意大利生活的核心。例如不久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要把文学奖金发给那一年最好的处女作的作者。在几个候选人中，有一个人特别受到青睐。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年青人，发表了一本最最优秀的佳作，实际上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文人之子；这文人恰巧是这次文学奖金评奖团的成员，是个拘泥细节的绅士。他感到很为难。他不想参与对他儿子的作品的评判。他不愿指责他儿子的竞争对手。他不愿因偏袒亲属的嫌疑而使他儿子几乎肯定会获得的胜利失去光辉。因此，他决定不参加那一年的评奖团，并且写了封信给他的同事们。这封信表现了他的高风亮节；他在信中没有说明他的顾虑之所在（任何说明都不得不承认，他认为他的儿子可能获胜；而这样的说明也可能被解释为一种施加压力的方式）。他谨慎地避免暗示他的儿子无论如何都配得上得奖，而另外提名两三个作者。这几个人显然不如他儿子的一半。

有一两个评奖员提名他的儿子。但是，这个儿子没有评上。222 宣判他失败的理由，在意大利没有遇到抗辩，并且被一致接受为最终的论据。有一位评奖员说：“我们一定对他有所误解。他一定不是象我们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优秀，因为连他的父亲也认为他不配获奖。他在信中连提也没有提到他的儿子。”所有的评奖员全都同意他的说法。评奖员们寻思，如果连他自己的父亲都没有勇气执行评奖任务，而这项任务是他的内心命令他去执行的，并且是自古以来就一直这样办的，那么，这个儿子该有多糟糕？

意大利人的家庭是由处世严谨的父亲、自我牺牲的母亲、老朽昏聩的祖父祖母、待字闺中的姑姑、兄弟姐妹儿子女儿的配偶、脸布丘疹的青年、成群嘻戏的孩子按不成文的法典和严格的纪律组成的马其顿人的方阵。它好比是一艘航船，航行在危机四伏的黑夜里，隐蔽的、残暴的敌人经常出没其间。这艘船并不是孤帆独航，它周围通常都有庞大的护航队保卫着它的安全。护航队就是那些合法的或非法的组织；家庭对它们有松散的隶属关系。这些组织就是各种集团、宗族、宗派、政党、帮会、工会、协会。这些公开的或秘密的组织是由或多或少具有相同的经历、相同的希望、相同的忧虑和相同的需要的人组成的。

这种安排与战争时期海上航行的实际情况当然有本质的不同。只有在一个组织能够给与家庭以安全和繁荣的希望时，家庭才追随它。只要船长判断，他的航船最好还是悄悄地离弃这个护航队而投靠另一个更合适、更隐蔽的护航队，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在紧急情况下，也许甚至会投靠敌人的护航队。家庭之舟偶尔也会孤独地航行，至少是在短时间内孤舟独驶，借此观察交战双方，看看哪一方会显露出占上风的迹象，哪一方能提供更多的幸存下来的客观机会。

这类联合在各国都很活跃。它们所到之处，无不设法支配人类的活動。实际上，无论什么地方，为了生活上的成功，“进去”就有好处。没有那个根深蒂固的小圈子的同意，要想获得成功的

确是困难的，普天之下，一概如此。有些最有名气的集团，的确并不是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有些纯粹是虚构，或者仅仅有个朦胧的形象和虚幻的影子。有少数集团往往只不过是战败者头脑中的幻想，他们用这些一厢情愿的幻想来为自己没有成功作辩解。然而，有许多集团肯定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有少数也无可否认地在历史留下了痕迹，如法国的共济会和酿私酒者，德国的参谋本部，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华尔街的银行家，英国的国教，苏联的政治局。有的在今天的世界上确实拥有人们所认为的那种力量 and 影响。举一例来说，巴黎的一小批商人和世界各地博物馆长的内圈人物就决定着当代的艺术风格。但是，无论这些集团在别的地方有多大力量，它们都没有意大利的集团过去曾有过的、现在仍然具有的那种深远影响和巨大重要性。

在意大利，强大集团的力量，除了受敌对集团力量的限制外，是没有限制的。它们实际上玩着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游戏，没有规则，没有裁判。当然，法律说起来似乎是至高无上的；准现代化的国家机器表面上看起来是无所不在的，还有后台，有头面人物，有制服，有称号，还有各种机构，但是，这些高官显宦和组织机构与其他国家的官宦和机构之间，有重要的区别。意大利国家机器的每一个分支机构实际上都是一支强大的独立力量，有时，它必须为它的生存而斗争；经常性的斗争则是为了保护它的被保护人和臣民，反对国家机器中所有与之竞争的其他分支。它们为了争取更大的地盘、争取分到更大的预算份额、争取更多的人员编制、为它们的头头争取更高的级别和更大的特权，便不时地互相残酷斗争，但是，常常是偷偷摸摸地斗争，恰象那些私人压力集团一样。

必要的时候，政府各机构携起手来对各种私人集团作斗争；它们不用法律赋予它们的有利条件，仅仅用它们能够调动的力量

作为武器。当私人集团力量弱的时候，就将它们击败；当它们强大的时候，就同它们达成某种妥协。警察和宪兵之间的长期不和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许多意大利人认为，这两股对立的力量的存在，是他们的自由的最好保障。一方总是监视着另一方。）在西西里西部两股警察力量一起和黑手党连续斗争了一百多年。有时黑手党和警察结成同盟，有时警察又和宪兵结成同盟。在两股警察力量联合起来对付非法的黑手党时，它们便暂时占了优势。这不是由于它们代表法律，而是由于它们的力量大。海关卫队和走私犯之间、劳工部和工会之间、财政部和逃税人之间、教育部和老师学生之间、工业部和工业家之间经常发生斗争，如果你要了解这类斗争的微妙之处，就必须记住这一点：国家并不是稳操胜券的。 225

总理本人如果要想他的命令得到贯彻执行，就必须有他自己的后盾，在他自己的政党里有后盾，在官僚体制中有后盾，在教会里有后盾，或者在教会的一个强大宗派里有后盾（如果他是天主教民主党人的话），他很少单单依靠他的宪法权威。大战刚结束时，有几位可敬的但缺乏经验的部长，没有注意到这些（在法西斯政权时期他们系身囹圄成流亡国外，没有接触国内的实际情况），堂而皇之地试图把他们的意志加诸难以驾驭、难以约束的官僚，或者加诸人民，而没有适当的支持者和同盟军。结果，他们都以完全孤立于办公室内、不知所措、无能为力而告终。很少有人给他们来电话，只有亲密的朋友和亲属来看望他们。谁也不向他们汇报情况，办公室服务员甚至不关心给他们供应办公用品，不给他们的墨水瓶灌墨水。在意大利，连圣经和法律的含义和宗旨也会随着运用法律的人或破坏法律的人的力量而改变；税则对势力大、能拉关系的人往往要宽大些、容易逃避些。（势力大、能拉关系就是家庭富有、出身名门的同义语，现在主要指的是那

些亲手控制着许多选票的人。)简言之,一切的一切归根结蒂都不是法律权利的平衡,而是纯粹力量的对比。因此,某种保护对每个人都是必要的。即使没有野心的小人物,仅仅为了不招惹是非,也需要有人鼎力相助。意大利的历史气候始终是特别不稳定的。实际上,在每朝每代,政治变化的潮汐波冲决一切障碍物,把根基不够深、与牢固的东西联系得不结实的一切,一扫而光。在这里,宽宏大量被认为是软弱可欺的表现;对被击败的敌人不存任何一点怜悯之心;反对派并不是公开地等待着轮到它上台,而总是从地而上消失,转入地下,也许在一代或两代之后才重新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百年的老制度消失了;老一代的上层人物消失了;初出茅庐的新领袖必须在他们前进过程中学会假公济私、营私舞弊(有些人就是以积蓄私产为起跑点的);社会的坚强栋梁一夜之间变成了危险的颠覆分子;教科书不得不重写;旧的传统、美德、信仰都遭到谴责,新的传统、美德、信仰以使人手足失措的速度、频率、混乱取而代之。

在这些动乱中,即使奉公守法、安分守己、与人无争的无名之辈,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些迟钝愚鲁的人,那些铮铮铁骨、忠于理想、不屑于迎合新环境的高贵的人,那些孤独无友的人,不可避免地被猛烈的激浪荡涤一光。少数诚实的人远走他乡,移居异国;有些人牺牲了生命、自由或财产;许多人遁世隐居,失去了声望、权威和力量。大多数人都很明白,事态发展丝毫没有使他们感到惊奇。就象人们面临汹涌的拍岸浪涛,为了不被卷入海底而互相拉起手来,意大利人始终必须依附于强大的朋友集团。他们从来不知道下一次历史风暴将在何时爆发;他们只知道那些孤立无援的人已经湮没无闻。

* * *

外国人认为,意大利人是个人主义者,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他们忠诚地为他们自己的组织服务，不过这些组织很少是官方组织。这一点得到为数不多的人的承认，其中包括安东尼奥·葛兰西。他是个思想锐敏、学识渊博的驼背，于一九二一年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当他绝望地病倒在法西斯监狱期间，留下了许多札记，这些札记是他博览群书，受到激发，以密码形式草草记下来的。下面随便摘译一段他的札记。“意大利人是‘个人主义者的民族’，有些人自鸣得意地肯定这一点，另一些人怀着嘲笑和悲观情绪肯定这一点。有人说‘幸甚，幸甚’，另一些人说，‘不幸之至’。意大利人真的是个人主义者吗？真的是个人主义使得一般人今天不关心政治、过去不关心整个民族利益的吗？这就是他们反复地说‘只要有饭吃，让法国人来吧，让西班牙人来吧（全都一样）’的原因吗？一个人不参与社会生活或国家生活，并不一定意味着他过着孤独的生活，过着目空一切的光荣孤立的生活，只考虑建立他自己的经济天地和道德世界。这仅仅说明意大利人宁愿加入另一类型的组织，如小宗派、帮会、卡莫拉和黑手党之类，而不愿加入政党和工会。无论在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都可以看到这种趋势。”

当然，葛兰西天真地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而不顾这样的事实：这些现象远比资本主义古老；事实上有意大利人就有这些现象。奇怪的是，这些现象在资本主义真正强盛的那些先进国家几乎闻所未闻，或者并不普遍。但是，葛兰西真诚相信，共产主义是唯一的济世良方，一旦一切生产手段都成为公有财产，意大利人全都会成为守法的公民。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证据和疑义，他仍不得不坚持他的信念；不如此，就是承认他所做的全部工作和他所付出的全部代价都已付之东流。我们看得更清楚一些。最近的经验表明，意大利人在任何形式的经济组织里，仍然遵循老一套办法。事实上，国家越控制经济活动，人

228 们就越依靠朋友和同谋来保护他们、保卫他们的权力和财产。意大利国有化企业里小宗派之多，无与伦比。葛兰西本人没有活着看见他自己的英雄小党，战后变成了另一个庞大的意大利式的互助协会，仅仅含含糊糊地声称受正统意识形态的支配，而实际上主要是受灵活的机会主义的支配。

* * *

人们把安全寄托于宗派、小集团、黑手党、帮会（意大利人通常把它们叫做Consorterie——朋党）以及那些高尚的、但同样也是非官方的组织。人们加入这些组织并非经过自觉的选择。有些时候，一个人恰好就出身于某个组织。在过去，一个人生来就是一个亲王的臣民，一个小共和国的公民，一个历史传下来的党派的成员（如中世纪的盖尔菲党和吉伯林党的成员），或者一个家族的成员，如蒙塔古家族和卡普莱家族。一个人生来就知道（不需要什么人给他讲），他有义务帮助所有其他成员，并且有权要求其他成员给与帮助。这种自发的组织结构，现在仍然存在着。譬如在北方的南方人和在南方的北方人，天然表现得象秘密社会的成员一样，一见面就互相给与兄弟般的援助。这种纽带十分结实，以致有些人在故乡本来会成为敌人（因为出生在敌对城镇或同一城镇的敌方区域），到了异乡立刻成了盟友和同伙。无论南北各地区的意大利人，在国外相遇时，都遵守这样的义务。他们未曾交谈就互相认识。他们不必开口，只用一个微妙的手势，就一见如故，乐意为对方两肋插刀。

意大利人本能地认可这种狼狈为奸并对它有感情；这种认可和感情可以比作是把那些沉溺于秘密罪行的人暗暗吸引到一起来的互相同情和吸力，好象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和按意大利方式生活也是见不得人的丑事、违反自然的罪恶似的。这种感情几乎把在异族暴政下的全体意大利人团结了起来，也许比处于同样苦难深

溯的任何其他国家的居民团结得更结实。在上次大战期间，法国人、荷兰人、丹麦人自然也想互相帮助，反对德国占领，但是，谁也不如意大利人那样，经受了历史的锻炼，把一切法律置之不顾，递个眼色就互相了解，联合努力反对占领当局。他们懂得一切骗人的诡计。只有极少数不可靠分子支持德国国防军。绝大多数人很快就本能地表现为好象是失散已久的表兄弟。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在他来的第一个农家找到藏身之地而不用耽心害怕。他知道，农民们会欣然冒生命危险来掩护他，给他送饭。同样的特殊优惠也给与盟军越狱逃跑的俘虏。他们很多人能证明这一点。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理想，而且也由于他们因受德国人的迫害而以某种方式成了名誉意大利人。

一个人常常必须选择加入什么集团。选择的范围不是很宽的，谁也不是绝对自由的；他的经历、情趣、阶级、才智、品质、抱负都使得选择范围进一步缩小。然而，人的一生中常常有个下定决心、孤注一掷的时刻。他可以加入的社团，有些是全国性的、有历史的、有势力的；有些是乡土集团。在规模庞大的社团里，还有一些小宗派，象中国的象牙球那样，一层套一层。在这些宗派中，个人必须巧妙地寻找自己的道路。

所有社团中最古老、最庞大、包罗各种各样附属宗派和团体的社团，是世界性教会组织。它是德高望重的，影响深远的，强大的，无所不在的组织。它是国中之国。它遵守它自己的法律，它提供无限的机会，它保护和援助忠诚的信徒，它解决所有各种问题，它在任何情况下促进善男信女的繁荣昌盛、四季平安。它经常公然使得意大利官方生活朝不保夕、虚弱无力。它可以使胆小怕事的人平安度日（可以让他当教区牧师或僧侣）。它可以给野心勃勃的人提供充分的机会（可以使他成为梵蒂冈的外交官、国王和政治家的忏悔神父、宗教团体的会长、天主教大学的校长、

天主教出版社的社长、总管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的高级教士、身负重任的红衣主教，甚至是教皇本身)。一个世俗凡人在教会的帮助下也可以过着受到庇护的幸福生活，教会能够伴随他，一步一步，从生到死，确保他得到一个称心的工作，可靠的前程，保护他免遭竞争者的妒忌，有时还帮助他获得世俗上的成功、名誉、政治权力和财富。

教会内部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是人类一切组织中最错综复杂、最曲折迷离的组织。陌生人从外面看去，它好象是铁板一块。在它内部，小宗派盘根错节。为了上帝更大的光荣，互相间斯斯文文地、几乎难以觉察地斗争着：教皇和他的私人顾问跟罗马教廷斗，罗马教廷跟大主教斗，自由派大主教跟保守派大主教斗，所有的大主教跟低级教士斗，教团跟牧师斗，教团间互相斗，全都顽强地为争霸而斗。世俗天主教徒也分成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小集团，从极其富有的马耳他骑士团到天主教行动团和被排斥于正宗之外的左翼工人组织。

直到近几年前，一个人可以把他的前程寄托于共济会。共济会在意大利是一个强大的秘密组织（和宪警一样也分成对立的两个分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组织在许多行业中都有很大势力，也许控制了意大利国家一级高级职务的大多数。它保护它在各行各业的信徒。共济会会员是反对教权的，他们在一切领域里，在政界、学界、军界和工商界，跟教会势力作斗争。他们的力量现在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今天仍然还有许多类似的大型组织，一个人可以加入进去求得庇护，但是，政党也好，经济联盟也好，各种文化集团也好，没有哪一个组织有教会和旧日的共济会那样强大有力，那样影响深远。一个人也可以同时成为几个有联系的、性质相类的集团的成员，譬如说，他可以是耶稣会的信徒，同时也可以成为左翼天主教行动团的追随者、天主教民主党的

优秀政治家、国营企业的董事。他可以是一个共产党员，以便控制该党拥有压倒优势的文艺界的一个帮派。

一个人也可以加入一些小集团。这种小集团数以千计；有些集团与另一些集团比较起来不大高尚，有些简直是犯罪集团，等而下之，直到西西里农村的黑手党。所有这些集团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拥有强大的力量。当你和一个意大利人打交道时，最好先摸清楚他忠于那个集团，他属于哪个宗派，协会或政党，谁保护他，谁是他的朋友，他从谁那里获得力量。当然没有哪本手册提供这些必要的情报。人们常常矢口否认他们的组织关系。有些团体是秘密的（如旧日的共济会、法西斯统治时期的民主党派、今日的少数几个金融联合体）。然而，情报一般是不难刺探的，人人心里都有数。

一个人为什么要否认他的组织关系呢？原因之一是，虽然加入某种集团或朋党是不可少的，但是，在动乱时期，这可以引起危险，遭到损害。因此，不要太惹人注目是一条好规则。一个人应想法不当旗手，应该只接受稳固的、副手的位置；一个人应避免让人知道他是某人的追随者或者是某种思想的绝对拥护者。谁也不知道下次历史风暴什么时候爆发；以前认为是有利的条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灾难性的不利条件。一个人始终应留一条后路，因此，应设法在敌人营垒中交个朋友。（这件事也容易办到，因为敌人中间很多人也遵守这条规则。）

一九四〇年四月，当一个警察署长以我是法西斯政权的危险敌人而逮捕了我的时候，他对我非常客气。我在候审室等待审问的时候，他派人去附近餐馆给我拿来一份美餐，派人到我家里去取来干净的衬衣、一套换洗衣服和一些零钱，并且偷偷警告我，在审讯的时候，最好是说些什么，不要说什么。他有礼貌地用他的汽车把我送到里贾纳·科埃利监狱。我向他致谢，并问他为什

么这样善意对待我。他坦率地说：“谁也不知道，也许有一天你也会这样对待我。”（那时，法西斯政权还是鼎盛时期，没有受到任何挑战，意大利还守着中立，德国人看起来快要赢得战争的胜利。警察署长是在小心地购买保险券以防万一的不测事变。）

232 几年之后，上次大战的最后几个月，当时我居住的省份格罗塞托的法西斯头目派人来把我叫去。那时意大利被一分而二。南方是合法政府、国王和盟军；北方是德国人、傀儡政府和墨索里尼。格罗塞托仍然属于北方。这法西斯头目正在忙于处理手头上的工作，让我在他的办公室等候了几小时，让我看着他下令命把牲畜藏起来，逃避德国人征用；命令手下人掩护游击队员；提醒另一些游击队员提防即将到来的搜捕。最后他转身对我说，“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在法院谈谈你今天的所见所闻。”战后，我在佩鲁贾谈了这一切。他被判三十年徒刑。

说话坦率常常是危险的事情。含糊其词几乎是所有各界的常规。大多数报纸社论、文艺批评、政治讲话照例都是以华丽词藻掩盖起来的模棱两可的空洞议论。一个人一定不要树立一些不必要的敌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那被广泛接受、毫无争议的意见，会成为胆大妄想而危及自己。一个人应隐瞒自己的思想，有时不必隐瞒的也隐瞒，因为，首先，隐瞒决没有害处，而暴露出来却可能有危险。当然，不暴露思想常常出于更体面的理由。在困难的时候，隐瞒也许是保卫一个人的自由的唯一办法，包括保卫按自己的意志考虑问题的内心自由和实际上一般日常行动的自由。这是共产党国家的公民所熟知的深谋远虑。

杰出的意大利小说家、小品文作家、政论家吉多·皮奥维内在他的题为**La coda di paglia**的新书中充分地探索了这个理论。（**La coda di paglia**意即《干草尾巴》，是意大利古老的寓言，意思是有干草尾巴的人不要走得离火太近。干草尾巴是他过

去生涯中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所造成的，他想忘掉那些事情，那些事严重地限制了他现在成功的可能性。他总是害怕有人会发现已经埋葬的秘密，并且揭发这些秘密使他丢脸。)皮奥维内近来受到舆论界的抨击，因为他现在是真诚的反法西斯战士和共产党的同情者，而在墨索里尼专政的时候，他写过几篇文章讴歌独裁者的文风，赞颂他的反犹政策，并且志愿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站在弗朗哥一边。必须承认，他走得太远了。很少有神志清醒的知识界人士走得这样远。这是不必要的。人们设法获得发迹，甚至跃居要津，并没有歌颂过“领袖”(Il Duce, 指墨索里尼)的某些品质和政策。这些品质本来是他不具有的；他从来也没有认为他具有。这些政策是他自己暗地里也蔑视的，因为它们使他想起他屈从于希特勒的地位。皮奥维内为他自己辩护时说，他的行为也许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非必要性正是为他的行为辩解的最好理由。他认为，他做的事情不只是为了保护他个人的自由，而且也是为了败坏那个政府的名誉。他依据的是他所称的“忧郁型的伪善”。

“我的经历是暴政时期进行欺诈的经历。”他这样写道。但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现在在许多争论问题上，十分热衷于站在意大利共产党一边，重演那可怕的经历。他写道：“我甚至不妄称我的欺诈总是自觉的。自觉的欺诈需要一种品格的力量，一种逻辑上的一致性，一种说谎的勇气，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被颠倒了忠诚，这是和自我牺牲一样难以做到的……我设法使自己具有一点点信心，不要太过份轻视自己。”(顺便说一句，皮奥维内和圭恰迪尼这样的人之间的区别正在这里。圭恰迪尼不想被骗。他有在明知不可救药的邪恶的世界上取得成功的人格力量。)

皮奥维内接着写道：“法西斯时期就是最大限度的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构成的。在我看来，那个时期好象是具有极端的‘心理学的’性质。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在那个时期，人们在内心里把

自己幽禁起来，并且发明了许多自欺欺人的骗术；人们编造一些复杂的、运用智力的方法，以便闭眼不看一些最简单的真理。在我的著作中，还有另一种玄虚之处。我在工作的时候，会进入一种目空一切的狂热状态，使我下笔不能自己，远远超出我应该到此止步的境地。我会十分荒谬地在我的文章中进行夸张，任何一个具有一点点常识的人都会一眼识破。这种现象可以这样来解释：这篇文章写得十分愚蠢，以致连我自己也不承认那是我的文章。我想同它一刀两断，把它说成是我雇来的笨蛋修辞家写的。譬如说把墨索里尼和莎士比亚加以对比，或者甚至把墨索里尼和巴斯卡加以对比，这样一些荒谬的比较也会进入我的脑海。我也可以同样随心所欲地写一写巴曼尼德和卢克莱修。我需要尽可能逃避看起来合情合理对比。”

可惜得很，皮奥维内的故意夸张和可笑的对比当时对轻信的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象他现在所愿意相信的那样。当时许多人认为，在墨索里尼和巴斯卡或莎士比亚之间，归根结蒂一定有某些类似之处，因为是一位很知名的批评家在一家权威报纸上这样说的。其他的人，反法西斯主义者，则认为，皮奥维内是又一个对法西斯政权阿谀逢迎的谄媚者。只有他的密友才知道底蕴：他瞧不起法西斯分子；他并不特别想得到好处，而只是希望避免麻烦；并且，在这场游戏中他十分缺乏经验，以致他不但没有击中目标，而且差距大得难以置信。

尽管皮奥维内自称他是在为他那一代人讲话，但是，不能认为他是完全典型的。诚然，那时和现在他都支持估计能保证他的心神得到最大安宁的一方。一般公认，大概大多数意大利人在任何时候都会这样做。但是，有几个问题把他排除出外。他犯了根本性的过错：他公开承认、分析并且讨论他的选择，把左右两翼的各种辱骂都引到自己身上来，从而浪费掉了用他的伎俩本来可

能得到的好处。他也从来未能完全欺骗他自己或别人。他从来没有从他那种适应性中捞到什么油水。

有一个老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个故事是在柏林封锁时意大利人编出来的。那时，第三次世界大战好象是几周之内就要爆发，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没有成立。故事说，有一天，俄国突然以压倒的优势兵力进攻西欧。各地的防御很快被彻底摧毁。美国当然是毫无准备，不能提供现成的援助。他们通常需要若干年来作出决定、生产装备和训练人员。因此，俄国人在几天之内 235 轻而易举地长驱直入，从易北河直达直布罗陀海峡，征服了不列颠诸岛，把所有的占领区都按他们的政治偏见组织起来。

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消灭了一切反对分子。几年之后，在适当时机，美国在欧洲登陆，打败了俄国人，解放了全欧洲。新的自由政府组织了起来。最后，欧洲大陆上实际上已人烟绝迹，只有为数很少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等等残留在真空地带和空旷的城市里。只有意大利拥塞不堪，人满为患。意大利的五千万人几乎都活了下来，他们显然是记住了他们的一个古老谚语：“好酒存不久，勇士命不长。”

还有另外一个辛辣的故事。这故事更老，也是意大利人在二十年代虚构的。那时法西斯政权刚成立才几年。法西斯党的书记在奴颜婢膝的公司董事陪同下视察一个大工厂。在巡视结束后，全体工人齐集在场院听他讲话。这个法西斯头目在发表演说之前，从主席台上傲慢地扫视一下工人，并问董事：“这些人的政治面貌怎么样？”董事回答说：“三分之一是共产党，三分之一是社会党，其余的分属于几个小党。”那法西斯分子气得脸色铁青：“什么？”他吼道，“他们当中有多少是法西斯党？”董事立刻向他保证：“他们全都是，阁下，他们全都是。”

实际上，许多意大利人严格说来都不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在

几个政党间晃进晃出、隐瞒思想、接受上面强加的官方意见并且鹦鹉学舌，并不觉得有什么为难之处。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希望避免风险，同时也因为他们是怀疑论者。他们认为，一切意识形态同样都是正确的，也同样都是错误的；对他们的问题没有抽象的解决办法；对世界来说，在一时看起来比较容易接受的任何政治制度下，都可以想办法使世界运转，但是，对意大利来说，一切政治制度在意大利运行起来总是有缺陷，因此，以往的一切政治制度在意大利，都相继失败了，并且，在将来迟早全都会失败。他们认为，糟糕的共和国并不比糟糕的君主国好一些；腐败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比腐败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先进。他们知道，共产主义将是意大利式的共产主义滑稽戏。他们认为，对他们的病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 * *

仅仅为了生存而必需的简单伎俩是不难学会的。它们毕竟不是意大利人所专有，而大体上为一切动荡不安的社会所共有。但是，各地又有其难以言喻的讲究和奥妙，非别的地方所能比拟。在这种伎俩方面，意大利早就成了十分熟练的能手，以致他们常常并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结果，生活过得顺心如意，冲突被隐蔽起来，或者大事化小，以致外国人一度认为，意大利人生活在天堂般的国度里，几乎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是有田园牧歌式淳朴生活的乐土，从不发生粗暴的事情，人民幸福欢乐、友好相处。有些人今天仍然还相信这一点。

为了说清楚，让我们扼要重述一下某些基本规则：一个人必须培植他的家庭，尽量少树危险的敌人，尽量多交有用的朋友，因此，任何时候都不惜一切代价来完善助人为乐、和蔼可亲的伎俩。一个人应时刻提高警惕，密切注意地平线上升起的任何一点点云彩，密切注意人们面容上反映出来的任何一点点态度变化。

一个人应加入一个强大的集团，在护航队保护下航行。一个人应当心那些可以决定未来生活的重大事件。

在消极方面，有些事情必须避免：决不要锋芒毕露、狂妄自信、行为鲁莽、态度直率、轻信他人；不要正式接受那些明确的见解，也不要和群众的步调不一致。最重要的是，任何时候都应记住：冲突不是根据法律、根据法官的抽象考虑或根据冲突双方的是非曲直来裁决的，而常常是由纯粹的力量对比来裁决。强权不仅常常就是公理，而且力量常常还等于美丽、教养、聪明和魅力。努力做到了所有这一切的人，可不遭受任何伤害。当然，只是不遭受伤害而已，别无实际上的好处。 237

比仅仅生存下来略胜一筹所需要的伎俩，甚至只是达到一般成功所不可少的伎俩，那就更难以确定、更难以传授得多了。亲身实践过这些伎俩，并且达到小小的发号施令岗位的意大利人，的确是高人一头的英雄，值得羡慕；他们能够在他们自己的乡人之间进行活动，能够看穿一切诡计，并懂得在各种环境下怎样保卫自己。在意大利，要当任何一个头头所必须具备的优点和长处，如当女修道院院长、城市棚户区主任、菜市场黑手党首领、二等火车站站长、山乡小城的市长等等所必须具备的优点和长处，在别的大多数国家足以使这个人成为外交部长、王宫密室的宠幸、参谋长或者共和国的总统。

当然，任何人都可以运用、并且肯定能得到成功的万无一失的药方和久经考验的诀窍是没有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情况。意大利大多数成功的人，跟所有的伟大艺术家一样，看来好象服从几条一般的规律，但实际上各人都在发展自己的特殊技巧，发挥自己独具的才能，卓越地适应于周围环境。这些一般规律，跟通俗手册里所叙述的那些指导一切诡计诈术的规律一样，看起来非常容易遵循，没有什么奥妙之处。它们几乎和有雄心壮志的人在

下面这种时候所遵循的规律一样：这时候社会上充满竞争、竞争者人数众多，且人人残酷无情、聪明睿智，而待攻占的位子为数甚少，防守严密，就象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全盛时期的华尔街、繁华年代的好莱坞那样。

但是，宫廷争宠的人、投机商、好莱坞的野心勃勃的人，很少注定要在各自的陷阱里追求名位而别无出路。他们象赌徒那样自由，赌徒们自愿在自己制造的地狱里受罪，但是，他们随时可以离开赌台。在意大利，这种事却有一个决定性的特点。如果一个人有点野心，想要改善他的命运，他没有别的选择。他知道：他不能只靠自己的身价和才干；他必须在没有规则的比赛中去竞争；赢得胜利的人只是那些在发明麻痹对手或毁灭对手的新方法方面最优秀的人物。他没有停车的侧道，没有后退的台阶，没有擦身的海绵球可以扔掉^①，没有逃避的道路。整个国家是个广阔的战场。大多数奖品都是无足轻重的，而所冒的危险则是致命的。

下面这几条规律，看起来很浅显，其实不然。

第一条：选择恰当的伙伴。一个年青人为了取得成功，不仅必须加入一个强大有力的大集团，而且，一旦加入之后，要慢慢爬上最高层，成为有影响的上层人物之一，领导人之一，如果可能，甚至成为唯一的领袖，以便利用整个集团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任何一个人要单枪匹马做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可能的。他周围必须有自己的人：他必须在大集团内部选择加入一个小集团，最后对它施加影响。他一开始就必须认清楚现存小集团中，哪一个能提供最好的机会。大体上说来，通常都有一个盘踞要津的老人小集团，他们能够保卫他们自己，并且只允许他们自己的朋友得到发

① 在拳击中，扔掉擦身的海绵球是认输的表示。——译者

迹；而有抱负的年青人小集团，决定撵走老年人，取而代之。选择支持哪一个小宗派是件困难的、棘手的事情。富有浪漫色彩和感情用事的偏见，当然必须不予考虑。一个人经不起犯错误，因为，结局一旦明朗了，往后不付出沉重代价几乎不可能改变所处的地位。

第二条(也许是全部规律中最重要的一条)：选择恰当的保护人。各个内部小宗派一般都由几个有影响的人控制，有时由一个领袖控制。在所有各领域都有几个权威。任何一个想胜过别人的年青人都必须依附适当的良师益友，成为他的随从参谋，并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年青人有成千上万的方法去勾引一个较为成熟的人，正如有成千上万的好方法去勾引女人一样。在这方面，也必须记住：只靠伎俩是不够的；任何勾引决不会是完全不动感情的，或者是违背自然亲合力的。女人和老年人很少是傻子。有不为人所勾引的女人，同样，有些老年人，因为害怕从背后捅他一刀，宁愿在他周围有些愚昧无知的唯唯诺诺之辈，碌碌无为的 239 追名逐利之徒。墨索里尼只喜欢奴颜媚骨、平庸无能的走卒。女人一般都喜欢她们一见倾心的男子，和对她们的爱情给与某种回报的男子。保护人喜欢与他们有某些共同点的年青人，这些年青人和他们多少有些共同的思想，羡慕他们，模仿他们。因此，许多候选者中没有几人能够入选。运用招数使自己受到注意、受到选拔，仍然绝不应完全忽视。始终必须运用伎俩来加速和促进出于本性的自然进程。

这就是这场游戏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复杂之处和微妙之处，这就是所有各个层次、所有各种年龄的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的赌博。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本不是描写平淡乏味的求爱过程和色情肉麻的调情场面，而是纯粹描写雄心抱负的巨著，没有一本专著专门研究在意大利人生活中，即使要想有一般的发迹所必需的使人

心碎肠断的对年长保护人的求爱、对严密的小宗派的渗透、错综复杂的策略手段、扑朔迷离的阴谋诡计、没完没了的密谋策划、无穷无尽的将计就计。在推动人前进的爱情和抱负这两种情感中，抱负无疑是更有活力、更能持久、更为丰富多彩，并且呈现出更为激动人心的机会。但是，实际上只有两本著名的小说以意大利为背景专注于这个主题。这两本小说都是外国人写作的。一本是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巴马”，地名，今译为“帕尔马”），一本是索恩通·怀尔德的《阴谋》。

年青人如何起步？首先他必须尽可能到处周旋。他必须出头露面，为人所知。他必须有求必应。这就是权势人物的接待室里总是挤满了人的原因之一。这些人竭诚效劳，以求得宠，有时等待几个小时，只求同这位领袖晤谈几分钟，陪他走几步路，给他递香烟、划火柴、拿衣服，做一切可以引起他注意的事，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加富尔伯爵对这种情况表示哀叹，他常常说：“人们总是宁愿去达官贵人的最差接待室，而不去平常人家最好的接待室。”事实上，在任何特定时期，一个人的力量都可以按他周围的人的数目来精确衡量。无论他走到哪里，有几个宠信总是跟着他，跟着他上街，当他旅行时，跟着他长途跋涉。在意大利南方，至今还把这种奉承者叫做 **clienti**（被保护人），其词源是古罗马时代习惯用来描绘这种人的一个拉丁词 **clientes**。被保护人就是那些尽忠效劳，要求提供援助、保护和意见的人。

贝内文托有过一位老政治家，每天早上在理发铺举行受觐仪式，象古代国王在一棵树下临朝听政一样。他在理发铺里坐在国王宝座式的椅子上，脸上抹满肥皂沫，肩上围着毛巾，理发师给他刮着脸。这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一群吵吵嚷嚷的人围着他，提出请愿，请求帮助，为长大成人的孩子要求工作，要求补助，要求养老金，一片混乱。几个亲信随从保护着他，使他免遭大胆

的人的攻击。这位活象丘庇特的老者，耳朵听着，点头示意，叫着每个人的名字，哈哈大笑，发布命令。这种情况在现代化中心地区不如此明显可见，不如此生动、形象。但是，北方商界、金融界、工业界和科学界的大人物也同样被这些被保护者包围着、追求着，不过考虑得更为周到罢了。

当然，阿谀奉承，功利主义的阿谀奉承历来是得到器重、得到恩宠、得到成功的主要途径。历史上有一个贫穷潦倒、无亲无友的意大利人获得惊人的成功的事例，在圣西门公爵的回忆录中可以找到。这个意大利人只用几个字（确切地说是四个字）一举而改善了他当时的营生和他下半生的事业。（这个事例中的成功，也得到下述情况的帮助：受阿谀奉承的权势人物是个外国人，外国人显然比意大利人容易上勾。）圣西门写道，这件事于一七〇六年发生在帕尔马附近。帕尔马公爵耽心在他的领地上对奥地利人作战的法国人会践踏他的领地，想叫法军指挥官汪多姆公爵把部队后撤几里。

谈判显得特别棘手，特别困难。汪多姆是个有名的难以说服的顽固分子。他反复无常、变幻莫测。他是个有王室血统的私生子，和大多数王家私生子一样，敏感多疑。他固执、机灵、懒惰、傲慢、贪婪。他以搞同性恋而自豪，并且夸耀他的心腹宠儿。他和狗同榻而卧，当母狗在他的床上下崽时，他决不去打扰它们。他每餐都大吃大嚼，吃的大多是他特别喜欢的烧鱼；吃饭时不中断和客人谈话，呕吐时，直接吐到客人面前的盆子里。他说话总是用上兵的粗鲁语言。他总是坐在马桶上接待来客、办理手边事务。

帕尔马公爵派去一个能够引起这位法国司令官重视的使者——帕尔马的主教。这位高贵老练的长者身穿紫红大袍，随带青年教士，直趋法军司令部，但是，他只受到和一般人一样的接

待。在他听到几句粗俗可憎的笑话，看见一些令人反感的情景之后，怒气冲冲地起身离去。有一个聪明的教士，意大利空前未有的最有抱负的人，执拗地继续留下来。“他完全知道汪多姆是个什么样的人。”圣西门写道，“为了按主人的愿望完成目前这项任务，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取悦汪多姆。汪多姆象刚才对待主教那样对待他，当着他的面擦起屁股来。教士一见便高声喊道：‘O culo di angelo!’（‘呵，天使的屁股！’）并跑过去抱着屁股吻起来。”这一来，问题就令人满意地解决了。这个教士，普通园丁的儿子，从此依附了汪多姆，当了他的顾问，最后跟随他到了西班牙。这教士在西班牙成为国王和王后的心腹，被任命为首相。几年后，他被教皇提名为红衣主教。他成了欧洲的主宰，决定着列强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的名字叫朱利奥·阿尔贝罗尼。

* * *

那么，意大利怎么能够在这激烈竞争和残酷无情的世界上运行得这样成绩辉煌呢？意大利人和他们的领袖很少是按客观的能力、才干和经验选拔出来的，大多数是靠他们玩弄阴谋诡计的本事而爬上去的，那么，怎么能够有这样多的意大利人把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呢？各种组织盛行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充满了阿谀逢迎、242 胁肩谄笑，但是，它们毕竟能够正常运行，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能够把这样许多事情做得好呢？怎么能够有这样许多工业在国际市场上与效率高的强手相竞争呢？如果本书前面所说的都真实不虚的话，那么，意大利人为什么想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致失败呢？秘密在哪里呢？

答案是很复杂的。首先，在有些方面，意大利人地位升迁的规律已经中止了。譬如说，只有本事真正过硬的人才能在外科方面达到顶峰。由于某种原因，意大利人把民族的命运托付给庸碌无能、策划阴谋的将军们，毫不介意，而拒绝把他们个人的生命

托付给拙劣的外科医生。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吹捧蹩脚的歌剧演员、指挥、芭蕾舞演员、名妓、男演员、电影导演、厨师、裁缝和飞行员。这些人如果获得成功，全靠他们的一技之长。

还必须记住，十分关心工作，并且具有出类拔萃所必需的额外精力的人，常常轻而易举地就精通了达到顶峰所必需的程序。这种程序是他们的工作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巧妙的伎俩，他们就不能发挥他们所具有的可能性，他们的全部聪明才智就会被埋没。他们学会这种伎俩作为必要知识的组成部分，正如他们学会生活方式和学会读书写字一样。他们的天资使他们处于有利地位。天资毕竟是力量的源泉之一。于是，如我所说，老年人和小宗派宁肯提高对他们有用的人的社会地位。这种人把一般天资和必要的伎俩结合起来，推动他们自己前进。这些年青人客观上常常是配得上提拔的。最后，在大多数私人企业里，西方的竞争习惯和意大利的传统方法相斗争，并且常常占了上风。在社会阶梯的上层和特别庞大的企业里，问题与技术和效率无关，而与纯粹的力量有关。在这些地方，首脑当然是按旧式的意大利方法产生的；只有在社会阶梯的下层和小企业，得到成功的人才限于那些作出成绩的人。

这种优胜劣败的选择方法，冷酷无情地只偏爱那些笨拙粗野的人，他们的唯一优点就是考试及格、工作出色、业务熟练。大 243
多数意大利人当然对这种难以忍受的自由竞争的压力，对这种优胜劣败的选择方法感到不满。他们诘问道，这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按这种生活方式，一个人必须不屈不挠地为他的地位而奋斗，而不是安然躺在有权有势的朋友庇护下乐享清福？这就是经济生活的各种刻板僵硬的组织在意大利受到青睐的原因。人们喜欢前工业世界的那种行会，行会管理各行各业，从学徒一直管到坟墓；在战前，人们喜欢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禁止任何竞争，因为

竞争对国家有危险，并且以难以逾越的关税壁垒把国家保护起来；只要社会主义允许有抱负的人一如既往，可以利用有权有势的亲属的庇护、个人的魅力、阿谀谄媚的方便条件和对有利的机会的锐敏眼光而获得成功，那么，人们今天也喜欢任何类型的社会主义。

写到这里，笔者实际上已向读者介绍了有助于了解意大利风土人情和排除疑云的一切。读者诸君已掌握了全部线索或者几乎是全部线索，能够自己弄清真相，能够看出这些动人心弦、丰富多采的景象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它们的表面现象。诚实的、百思不得其解的专家们争论不休的那些历史上和当代政治中模糊的、矛盾的、难以理解的事件，将象日本的木花那样，一放到水里就开放起来显露出它的秘密。新到罗马的外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对那些模棱两可的官方声明、冠冕堂皇的政治表态，难以捉摸的各种花招，会很容易地了解其确切含义。喜爱意大利的人会弄清楚，他爱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爱。当然，并非每一点细节都能彻底弄清楚，小山谷里始终总是有些薄雾的。过去和现在的某些情况、人物、事件和问题，以及少数几次群情激昂和社会骚动总是说不清楚的。意大利的一切并非都是意大利式的。生活永远不会与理性的、逻辑的、人为的模式完全一致。

有时候，读者也会被弄糊涂；甚至可能由于对打开意大利生活之锁的钥匙运用得太刻板、太缺乏想象力而被引入歧途。必须记住，事物固然并不总是象天真的旁观者看起来那个样子，但是也不总是或者不完全是象抱怀疑态度的和现实主义的观察家所认为的那个样子。外国人也许刚好把一些公平正直的表示、一些关于友谊和爱情的赤诚倾诉、一些无私的英雄行为，说成不过是做做样子而不予重视。他可能把群众热情的浪潮当作纯粹是没有意

义的表演。他可能突然被真实情况弄得大吃一惊。例如一八六〇
245 年九月八日，教皇军队（这军队是由法国人、爱尔兰人、瑞士人、德国人和比利时人志愿军组成的）总司令利昂·德拉莫里西埃雷将军向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二世的意大利王家军队挑战，要求在菲达多堡决一雌雄。那时，他傲慢地说了一句很有名的断语：“意大利人不能打仗。”他了解意大利人。他轻视他们。他在战场上见识过他们。但是，意大利人给了他当头一棒。就在那一天，教皇永远丧失了他的领地。在一九二二年的时候，有多少观察家曾经宣布，法西斯只不过是一堆燃烧起来的稻草，连三个月维持不了？外国人因为持审慎的态度而对意大利人做了错误的估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连意大利人自己，尽管完全了解他们自己的为人之道，几个世纪以来也有那么多次上当受骗，惨遭挫败，因为害怕自己欺骗了自己而弄得毫无作为。

* * *

运用上述的一些原则，就可以澄清源远流长、令人困惑的南方问题，也就是南北两个意大利间的深刻差别的问题。远远看上去，所有的意大利人无疑都有一种民族相似性。他们大多出身于同一民族，显著的特点是黑头发、黑眼睛和轻松愉快的表情。他们是由类似的历史变迁塑造而成的；为了生存，他们发展了或磨砺了同样的才能。他们全都热爱生活并且喜欢表现自己。他们对法律都小心提防；他们全都按圭恰迪尼的方式追求幸福，牺牲社会以增进个人的福利；他们必须保卫自己，保卫他们的家庭和朋党，以免遭到别人的暗算、妒忌、憎恨；他们利用家庭作为诺亚方舟来渡过自然灾害、历史动乱和政治剧变。他们和组织得良好的国家的居民不一样，他们必须依赖他们个人的长处，社会的腐败、他们的适应性、魅力、智慧、机敏，总而言之，是依靠运用他们个人的力量。

所有这些在南方和北方都一样，但是有一点区别。这个区别

是很重要的，它正是十九世纪南方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北方经济 246
发展较为迅速的原因之一。这个区别使得迄今一切企图把两种生活标准拉平的尝试都遭到失败，使得政府在南方的巨额投资，至少有一部分总是使用不当。互相不信任，互相不了解，把两个意大利分隔开来。这种互不信任、互不了解的情况甚至有加深的危险；民族的团结始终是脆弱的，并且可能变得比过去更不牢固。

当然，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个人目的或多或少是一样的。然而，北方人认为，要达到个人的目的，有一条实际可行的道路，这就是发财致富。他们认为，只有财富才能持久地确保家庭的平安无事和繁荣兴旺。与此相反，南方人认为，只有通过获得势力、声望、权威、名誉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无论哪个阶级的北方人，永远试图以各种各样方法来谋求财富。他需要一个工作，进而需要一个好工作，一个更好的工作；他们需要土地、资本、信用贷款、企业股份、房屋、科学技术知识、学费贵但是稀有的大学学位，有了学位可以保证得到待遇优厚的工作，并且得到晋升；他抚育孩子时心中就想着这些目的，教育孩子们成为高薪技术员、工程师和专家。他不惜任何牺牲替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谋求物质福利他需要一个富有的妻子，富有的儿媳和女婿，富有的朋友。他和法国资产阶级一样，几乎纯粹是个经济人。

与此相反，南方人首先需要别人服从他、羡慕他、尊敬他、畏惧他、妒忌他。当然，他也需要财富，但是，他需要财富是用来作为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手段。因此，表面上有钱和真正有钱一样有用。在南方，小农民、目不识丁的零工、修剪橄榄树的工人、开采硫磺的矿工、以及土地所有者、上等俱乐部的高贵成员、新建工业的暴发户，全都设法使有权有势的亲戚朋友感激他们，使 247
敌人畏惧他们，使人人尊敬他们，使他们的家庭享有声誉。

譬如，那不勒斯和米兰的水果蔬菜批发商。他们大体上属于

同一阶级，大体上受过相同的教育。他们各向本地批发商联合会交纳会费；这些联合会是全国批发商联合会的会员。因此，他们可能在开全国代表大会时见面，或甚至在欧洲共同市场代表大会上见面。他们也许互相认识，见面时还点头招呼。他们也泛泛地认为彼此是同行。但是他们的全部相同之处就到此为止。

那个那不勒斯批发商经常带着亲信仆从到乡下去，在明确划定的地区内欺压并且保护农民、强迫农民只把产品按他规定的价格卖给他。他保卫他的地盘和他的附庸农户，使免遭竞争者的侵犯。他带着枪，枪法很准。必要时，他可以杀人。他可以支配杀人凶手。大家知道，他完全不必或者在大部情况下不必亲自开枪就可以杀死他的敌人，从而贯彻他的意志，保护他的权力。如果农户拒绝按他规定的价格出售产品，他有本事让他们的产品烂在地里。农户从来不拒绝把产品卖给他，因为没有任何别的人敢于同他竞争，买走他们的产品。当然，肤浅的观察家不会知道实际的情况，不知道他与农户和零售商间的实际关系，不会注意到这看不见的威胁和恐怖。农户、商人、仆从、零售商、竞争者，全都面带微笑，谈笑风生，插科打诨，交杯共饮，握手言欢。他们看上去好象是最好的朋友。只是偶尔出点问题：警察在乡间小路上发现了一具无名死尸，并且很少把杀人犯找出来。但是，在那那不勒斯，如果一个人小心从事，并且按规矩办事，一般是不会被杀的。

米兰人则完全是另一种人。他更类似于他的外国同行面完全不同于那不勒斯或西西里的竞争者。他不带枪支，没有亲信仆从跟随，很少去看卖东西给他的农户，几乎从来不到农村去。他坐在现代化的办公室里，周围有几台口授打字机，墙上有各种图表，
248 有干练的秘书。他的买卖是通过电话进行的；他与在德国、法国或瑞士的掮客和买主做买卖；他的买卖是一汽车一汽车或一火车

皮一火车皮的维罗纳的蜜桃、那不勒斯的黄杏、西西里的柑桔、阿普利亚的葡萄、托斯卡纳的土豆和白菜。他唯一的目的是按最高的价格向国外开出越来越多的冷藏车、满载越来越多的供国外消费的新鲜产品。他当然挣了大量的钱，在好年份挣的钱比那不勒斯同行多一百倍、一千倍，但是，那不勒斯人满不介意。他对此并不感到不高兴。他需要比金钱更为珍贵、更令人满意的别的东西。他需要遐迩闻名（他的绰号必须在全省之内人人皆知），为人们所畏惧（警察有时也不敢说出他的行踪），拥有权势（在大选期间，政治家们必须来求他帮忙）。他也想要为人爱戴（他也为人伸冤，保护向他求助的平民百姓）。

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证明一个论点。实际生活中决没有这么简单的事。在意大利南北两部分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并不是全部南方都有纯粹的南方特征，全部北方也不全都有北方特征。北意大利有的人显然也把增加他们的势力、权威、声望和地位看得高于一切。在南方，同样也不难发现许多人为了积攒大量金钱，好象也并不急于追求声望。然而，仔细一观察，这些例外情况常常也证实了而不是否定了总的规律。实际情况常常是，北方人看起来在追求权势，只是因为权势可以产生更多的金钱；南方人看起来在追求财富，实际想要的是财富所能带来的声望。例如，在罗马，出身于北方的知名政治家，为了使家里发财而利用他们在政府里的显赫地位，有些南方人则为了成为议员、副部长和内阁部长而积累财产。一般说来，南方人往往为了当官而捞钱，北方人为了捞钱而当官。

这种区别在个别人身上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就两个社会来说，始终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这种区别渗透到每一个细节。它加强了形成鲜明对照的两个意大利的特色。它加深了鸿沟。在一百年的过程中，意大利官方显然只在统一名称、标签和头衔方面取

得了成功，但是，那不是实际问题。拿中央政府任命省长来说，当省长的总是南方人：只有南方人喜欢担任这种待遇菲薄但有权力、有尊荣、有礼仪上的高位的工作。他象主教、红衣主教或大使那样，享受“阁下”的尊称，并且在任何宴席上都坐上席。认为一个北方省份的省长与南方省长有何相似之处那就再错也没有了。在北方，省长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官僚，很少有几个人记得他的名字。在南方，省长是统治者，是社会领袖。他去出席宴会、婚礼、葬礼和命名典礼。有一帮奉承的人和谄媚的人围绕着他。他在电话上随便说句话，或者是自言自语表示一点愿望，都是法律。到现在，他有时还能操纵选举。他坐在黑轿车里，所过之处，人们都摘下帽子，深深鞠躬。

要给这两个社会下个判断，断定哪一个更文明些，从长远来看，哪一个更“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没有意义的。北方显然有较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些物质利益并不能补偿与工业社会不可分的种种危险，如精神上贫乏、粗俗的享乐主义、幼稚的文化生活和感情生活、沉闷乏味的千篇一律、严格的训练和纪律。另一方面，南方人在日常斗争中施展他的全部本领，他常常压倒竞争者，不时享受胜利的乐趣。他有时间去追求闲情逸致。他的生活常常更富于感情，更有人情味，更接近于人的天性和本能。但是，这些优点不能补偿南方的贫苦、无望、不安全和不公正。

南方人对意大利过去的成就所作的伟大贡献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民族如果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冷静地、科学地单纯追求财富，
250 便不可避免地变得迟钝起来。在有献身精神和聪明的人的地方，文明之树和生活之花最为繁荣艳丽。这些人为了获得较为满意的职业而愉快地接受平平常常的生活条件，他们宁愿要高位、名誉、权威、声望或心神安逸，而不是只要金钱。他们就是那些学

者、诗人、艺术家、小说家、圣徒、哲学家、法学家、特立独行之士、自奉简朴的贵族。意大利这类人物的大多产生于南方。他们对意大利贡献甚大。当代意大利有些最好的小说是南方人写的。意大利最伟大的剧作家皮兰德娄就生于西西里阿格里真托附近一个恰当地叫做“混乱”的地方；意大利最伟大的哲学家柯罗齐和最伟大的诗人邓南遮生于阿布鲁齐。国家由南方官僚执政几十年，他们一般都很诚实、能干，治国清廉。各大学的教授过去和现在多数都是南方人，意大利的殖民地主要是由南方人管理，法院主要是由南方人掌管。西西里人形成了外交部的核心，人数超过别的地方的人。有些从事非赢利性文化活动的大出版社就在南方的巴里、那不勒斯和墨西拿。它们在法西斯专政的黑暗时期使得意大利精神不死。

有一种看法，认为南方的许多特性和习惯可以说是“农业社会”、“封建社会”、“前工业社会”的典型；这种看法似乎有道理，但只是片面的，引起误解的。有人认为，只要南方人处在适当的政治经济结构中，他们也会变成北方人。但情况并非如此。譬如说，工业是在十九世纪初同时在意大利南北两端建立起来的。意大利统一后，在按理说相同的条件下，工业在南方衰落了，而在北方却繁荣起来。据权威方面声称，工业之所以衰落是由于南方是封建的。然而，北方同样也是封建的。据说这是由于南方被暴虐的异族统治了几个世纪，但北方的大部分同样也遭受过暴虐的异族统治。

还有人说，北方接近国外市场。事实上，阿尔卑斯山把它和 251
外国隔开，而南方并不缺乏位置优良的方便港口。无论北方和南方都没有煤矿和廉价的原料资源。据说，南方人是北方官僚主义的牺牲品，被皮埃蒙特人或伦巴第的竞争者弄穷了。事实上，统一国家的政府很快就由南方人占了优势。政党也很快由南方人掌

握。他们才是真正知道如何飞黄腾达的人。内阁部长、下院议员、高级官员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决定性的原因在于别的方面：工业革命并不投合南方居民的志趣；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工业革命得不偿失。他们更高兴干别的事情。

* * *

他们在过去不顾艰难困苦，固守着他们的生活方式，有时英勇地反抗入侵者和他们带来的新事物，有时忍受失败、屈辱、贫穷和绝望，都是为了不背叛他们自己的天性和传统。他们有时象西班牙人那样，在山里进行激烈的游击战，有时象中国人那样，好象是驯从地接受了异族的生活方式，为的是把它们中和、消化，转变成某种不可辨认的东西，转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譬如说，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两个法国人国王约瑟夫·波拿巴和约阿希姆·穆拉特把《拿破仑法典》传入了意大利，几年之后，这法典就被意大利的惯例和意大利的解释改变了，以致连法国律师都辨认不出来。甚至连铁路也适应南方的办法。北意大利的铁路轨道在城市与城市间沿着最近便、最省钱的路线铺设。在南方，有时为了使铁路在某个权势人物出生的偏僻村庄面前经过，或者在某个权势人物有乡间住宅的村庄面前经过，有时为了延长里程使负责承修铁路的承包商发财致富，铁路就在整个地区蜿蜒迂回。

252 南方人自然不能再恢复很久以前的那种快活日子了。那个时候，能说当地方言、知道人民癖好的波旁家族的费迪南二世当国王。他在一八五九年去世前，经常夸耀说：“我的王国是个海岛，三面受到盐水的保护，第四面受到圣水的保护。”现在北方的冷风刮遍大地。外国方式自由引进，人民必须装出一付和所有的其他人一样的样子。他们古时的许多美德，现在简直都成了罪恶。他们对新的生产技术感到不舒坦。他们常常被不懂得生活艺术之精华的鲁钝的竞争者所打败，含羞蒙辱。他们不甘心成为搞经济的

人，愚蠢地为挣钱而奔波。同时，他们也不能忍受“劣等人民”或“落后人民”的境遇。他们以他们的过去而自豪。这是南方问题心理上的要害。

这个问题决不是新问题。一百年前，这个问题已经很明显，南方立即受到了注意。新王国宣布成立之后几个月，加富尔的临终遗言就是献给可怜的那不勒斯人的。这位首相在他弥留之际说：“北意大利已建成了王国，再也没有伦巴第人、皮埃蒙特人、托斯卡纳人、罗马人了，我们全都是意大利人，但是，还有那不勒斯人。哦！他们那里有大量贪污腐化的现象。可怜的人民，这不是他们的罪过。他们长期以来遭到非常残暴的统治。那是费迪南南这个坏蛋的罪过。我们必须给他们那个地方树立道德新风，教育儿童和青年，办托儿所和军事学校。我们决不要梦想以侮辱他们的办法来改变他们。他们向我要政府职位、勋章、晋升。他们首先必须工作，必须诚实，然后我会给他们骑士称号，并给与晋级，颁发勋章。但是，我们首先必须不允许他们越轨。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廉洁奉公。我将以自由的原则来治理他们，并且让大家看一看十年的自由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本世纪初以来，为南方制订专门的法律、专门的公共工程计划、专门的投资信贷、专门的财政拨款，一直是意大利政策的一部分。南方要求给与特殊的照顾，焦利蒂和墨索里尼献出他们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来满足南方的这个要求。一九五〇年以来，新的民主共和国用于南方的开支超过过去半个世纪所花的钱的两倍多，并且很可能还要继续花去国家岁入的很大百分比。进步是巨大的。但是，老毛病依然如故。

乘火车或坐汽车在南意大利的任何地方作一次短途旅行，都会证明这一点。旅客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看到用公款建造的许多

公用建筑和大楼，其数量之多超过北方，超过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按年代顺序来说，他首先将看见他曾祖父时代的巨石结构的建筑。那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由最初的波旁家族约瑟夫·波拿巴和约阿希姆·穆拉特建造的。然后，他可以看见费迪南二世建造的数不清的建筑物。所有这些现在仍然是基础工程的大部分：道路、海港、政府大厦、医院、学校。然后他可以看到比较熟悉的、比较一般的建筑。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时期建造的。随后有更多的建筑，是墨索里尼怀着“帝国”的梦想，浪费大量金钱，为了使他的名字和他的政权的名声永存而以经久不朽的大理石和水泥修建的。最后，他将看见战后时期，他的同代人基督教民主党政府所建的耀眼夺目的新大楼。

各个时期的建筑物都显出一副失修的景象，失修的程度自然与它的年龄相称。例如，在那不勒斯城郊有些最老的工厂，是本世纪初盖的，简直已经坍塌，墙上石灰已经剥落。有时，门面上的公司名字，经风吹日晒，已经看不清楚。腐朽的房梁被长满苔藓的屋瓦压得弯弯的；门扇挂在生了锈的折页上；院子里堆满了垃圾、损坏了的机器、风吹雨淋的包装箱、罐头盒等等。当然，工厂还在开办着；轮盘还在转动，机器快要散架了。之所以出现254 这些情况，原因是经济准则被认为是次要的。工厂很少是挣钱的；没人去好好经营。产品质量很差，价钱便宜，还可以卖得出去。但是，之所以便宜，是因为资金主要来自公共基金而不来自贷款，公司享有特殊税收照顾，利息一直很低，从来不花钱进行现代化、维修保养和技术革新。工资比任何别的地方都低，低得可怜。（至少直到前不久还是这样。）

法西斯分子建的工厂稍好一点，至少年代不太久。不过也没有显出一点改进的迹象，没有赶上时代、赶上技术进步的打算。战后的新工厂极端现代化，塑料屋顶，涂着令人目眩的耀眼颜色，

有果子露色、草莓色、桃红色、浅黄绿色。这些工厂情况还相当完好。然而，油漆剥落，湿迹斑斑，预示着它们的前途也不妙。

农业设施一般也是这样。在土地改革公署（这是国家的土地改革和发展组织，它把大块土地划分为小农场）的生机勃勃的新村附近，有时有法西斯时期建立的类似于国营企业的村庄。这些村庄现在已废弃了。（大多数新村也是没有人居住的，装样子的，因为南方农民怎么说也不愿随土地住在村子里，他们愿意住在附近的镇子上。）旧房子听任其倒塌败坏，不花钱去维修。它们看上去好象是被遗忘的远古时期的废墟，草房茅棚乱七八糟成堆；屋顶上荆棘丛生，无花果密密麻麻地抽枝发芽。有的屋顶已塌陷，有的屋顶被风刮走，墙上和地上长满了野草闲花。门窗、梁柱、门槛和其他可以移动的东西，往往已被偷走。这些房子还远不如古庞贝城和赫库兰尼姆城遗址里的废墟，那些废墟在教育部的关怀下，看起来还新一些。

不关心维修的情况是很说明问题的。法律授权南方基金可以花几十亿里拉来促进这个地区的发展和现代化，可是直到今天，这法律也没有任何关于维修的规定。老一代人看见耗资甚巨的工程败坏了，痛心地说这个地区为“公共工程的墓地”。这个说法今天还常常在使用。 255

还有其他一些迹象可以说明，心理动机和非经济动机占了优势。有些为那些肮脏破烂的小镇和村庄服务的建筑物，不论新的旧的，显然都是过分精雕细琢，过分规模宏大，过分豪华浪费了。在第勒尼安和亚得里亚两个海的海边，旅行家们可以看到巨大的海港筑有花岗石或水泥的防波堤、码头、相当考究的仓库。这些不太重要的港口，通常都空空荡荡，鸦雀无声，不过是暴风雨来临时，供零星渔船抛锚的几个避风港而已。同样，可以看到庞大的邮局，每星期只有少数半文盲农民收发几封信和几张明信片。

雄伟的学校大楼里面，只有不多几个学生；拨给学校的一点教育经费，自然不够给大楼供暖和保洁之用。在巴里海滨有一座宪兵营房，原是法西斯政权建造的，那个地点更适合盖豪华公寓或旅馆，现在营房雕梁画栋，再饰以浮雕塑像，但是这些排场显然并不能提高这个宪兵机构的效率。

这种浪费现象常常拿“远见”为理由来解释，说这是为将来的发展准备好适当的方便条件，并且也为了刺激将来的发展。这种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当地的人口和当地的活动一般都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战前还没有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大多数青年人移居外乡，到北方去找工作。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有些公共开支，在本来一无所有的地方开拓了一系列的创业和投资，但是，这种事例为数不多。它们通常是严格从实际出发的，而不是沽名钓誉的。有了机构不一定就能办事。许多这类建筑，无论是很古老的、比较古老的、新的、崭新的，有许多时时使人想起旧日印度王公的雄伟堂皇的大厦，它们是异己的权力和尊荣的孤立象征。

这类建筑物中有许多是出于显示壮观的心理目的。它们所座落的位置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巴勒莫有一个崭新的发
256 电站，这是战后建设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巴勒莫有显示其投资多的倾向。它在一八六〇年被加里波第和他的千人红衫军所攻占、成为新王国的一部分之后，迫不及待地建造了两个歌剧院，都比那不勒斯的圣卡尔洛歌剧院、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和巴黎歌剧院还大。）发电站没有建在远离市区的阴山背后，也没有适当地掩蔽起来，以使它那丑陋的建筑和高大的烟囱不引人注意，使它的烟尘不太令人讨厌。它傲慢地建立在海港附近，正好是市中心，从而毁坏了全意大利最美丽的景色之一，毁坏了古代诗人、画家最珍爱的著名的风景。它所座落的位置正是古时可以建立供奉本地守护神的大教堂的所在；或者在更早的时候，可以在那里建立

一座大理石神庙供奉守护神或宙斯神。总而言之，可以在那里建立一座纪念碑来供奉当时人们认为能给城市带来无限好处的神祇。

社会学家们正确地指出，这种作法并不是南意大利所特有的，各地的穷人都这样做。穷人把他们能得到的钱，都浪费在多余的、奢侈的、浮华的东西上，而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却很吝啬。非洲或拉丁美洲的落后的小共和国，滥用它们那点有限的资源，为“国父”建立大理石纪念碑，而不注意建立污水处理场、足够的学校或医院，有意无意地尽其所能加深贫困，增加文盲和疾病。然而，意大利是个古老的欧洲民族，许多意大利人都以他们的聪明睿智、文化修养而闻名于世；他们都具备必要的经济知识，与相距仅几小时路程的先进榜样有交往。这样国家的公民干了上述那样的事情，就再也不能认为是社会学上的盲目反射的结果，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选择。

* * *

南方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它每朝每日在变化着、发展着、改进着。变化是由无数的因素引起的，其中只有少数是由人在操纵。南方再也不是费迪南国王的“海岛”了；它是一个当代国家的组成部分，欧洲的组成部分，现代世界的组成部分；它不能防止历史发展的冲击，它不能阻拦世界潮流的涌进。最近年代所花的大量金钱不能不产生影响。至少有些钱用得很得当。其余的即使不是按理想的方向来使用，也不能不以某种方式改变南方的面貌。 257

甚至战争也使事物发生变化。南方人从一八六六年到一九四五年，在北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脉、在北非沙漠、在西班牙、在埃塞俄比亚高原、阿尔巴尼亚、希腊和俄国，在遥远的土地上，履行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上次大战期间，还作为战俘到过印度、英国、德国和美国。所有这些人从战争中私下带回来一个决心：要过与以前不同的、较为满意的生活。南方籍的

退役老兵也不例外。从上世纪末以来，劳工移居南北美洲和欧洲其他地区之风一直继续发展着，这股风又引起一股回流，流回来的是金钱，是有经验、有财产的移民，是新思想、新习惯和不安于现状的焦躁情绪。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产阶级中聪明能干的人移居北意大利和中意大利，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现在占居领导地位。南方的士兵带回北方籍妻子。电影和电视迫使闭塞山村的居民去看外界的那些资产阶级的、清洁整齐的、文明礼貌的、遵守纪律的和营养良好的理想化形象。最后，最近几年生气勃勃的经济活动的突然高涨，不能不产生影响。现在，没有技术的失业工人成批流到北方去。留下来的人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工资。

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工厂在主要公路和铁路沿线，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建起来。正在兴建的还更多。当然，有少数工业还有段困难时期。它们匆忙上马，目标不明确，信贷不充分，经验不够用，有时为不正直的人所操纵。另有一些工业生产的东西比别的地方的产品质次价高。南方人不相信专业化，而相信竞争。有许多工厂也很兴旺发达。这是那些由于客观自然条件决定必须建立在适当地点的工厂。这些工厂中，有些是北方的公司建立的，这些北方公司由北方人经营管理，充分享受照顾南方企业的立法所规定的优惠。另外有些工厂，如塔兰托的规模宏大的钢厂，是国家决定开办的，并且由国家提供资金。现在到处都有堪与北欧工业中心媲美的繁荣的工业中心。在东部西西里的叙拉古和奥古斯塔之间连绵的海岸上，据说曾经有过一个名叫迈加拉的希腊人城市。不久以前，在那暗红色海水之滨，还只有弯弯扭扭的橄榄树，成群放牧的牛羊。现在这海岸看上去有些象是纽瓦克、新泽西、加尔维斯顿、得克萨斯，平原上挤满了化工厂、煤气罐、黄红蓝各色管道；复杂的金属架直耸云霄。

各地衰老城市的新区看上去好象是巴西利亚。建筑风格十分大胆，象南美和印度的建筑那样，生怕显得落后于时代，固执古老的习惯，害怕被进步抛在后面。在城市和较为繁荣的乡镇上，连人们的面貌也起了变化。妇女比从前自由一些了，衣著也较为讲究。人们看起来吃得比较好，穿得比较好。街上的顽童也穿上了鞋。乞丐已经绝迹。饮食的习惯也改变了。年青人比他们父辈长得高一些、直一些。他们决心不再象他们的祖先那样，竭力维持一种勉强糊口的生活了，他们再也不听天安命、顺从上帝的意志、期待大人物的恩宠、听任命运的摆布和承受永恒的苦难了。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可观的、有时是难以置信的进步，但是，如果断言南方问题已肯定即将解决，那就太莽撞了。首先，非常贫穷的情况由来太久，扎根太深，实在难以消除。贫困大部分被掩盖起来了，但贫困的压力仍然到处潜伏着。进步和现代化大半只是在少数重要的城市、著名的古迹和最肥沃的农业区周围可以看到。在北方不速之客不常去的任何其他地方，在繁荣地区以外的角落里，在距华丽的新旅馆、工厂或工人住宅区一箭之遥的地方，在走不多远的小山上，在几乎是农村的任何地方，苦难仍然普遍存在。情况是稍好了一点。一些现代化的新设施，一条公路、一个公用电话、一条水渠、下水道、一个新的公墓、一个两周来一次的医生、一个接生站，都使苦难得到缓解。给小孩配给美国剩余面粉和浓缩牛奶、赤贫户免费医疗，也使苦难得到缓解。但是，苦难终究是苦难。

然而，即使苦难消除了，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即使现代化过程还继续下去，即使人人都有房住，有饭吃，有相对的安全感，有医药照顾，有初级教育，有稳定的工作，问题的精神方面还是不会消失。不舒服、不安心、当了历史的不公和别人的贪婪的牺牲品的情绪，想造反、想摆脱罗马中央政府的愿望，还会继续下

去。

南方人当然也想过较好的生活，想达到与西欧平均水平不相上下的标准，想解决他们最迫切的物质问题。他们要求做到这一切，但是，他们还要求一些别的东西。他们要求缩小南北鸿沟；他们要求过北方人过的那种生活。不如此是不能接受的。不如此就是对他们自豪感的伤害和侮辱。他们不了解：显然不如他们聪明的北方同胞为什么有这样极其令人满意的生活条件，这样令人神往的工厂、令人肃然起敬的医院、这样多的金钱？为什么这些东西在南方就不那样令人印象深刻？

在把这些现实的和想象的差距拉平以前，南方人决不会心平气和，南方问题也决不会消失。为什么呢？这有许多原因。首先，用来改善南方境遇的每一个里拉，都有一部分进了北方人的腰包。许多工种的工程师、专家、经理、承包人、熟练工人都来自北方。实际上所有的新工厂和新设备，甚至是灌溉小块农田用的初级水泵，都来自北方。最后，所有的消费品、衬衫、靴鞋、衣服、家具、收音机、电视机、小摩托车，几乎全都来自北方。这些东西南方人越来越买得起。事实上，现在有些东西即使是在南方制造的，也不说是南方制造的，因为南方人认为，穿戴或消费米兰制造的东西更保险，更有气派。

拿西西里的水果馅冰糕来说，它是一种味美可口的冰糕，是西西里的特产，是一千多年前阿拉伯人传下来的。北方的水果馅冰糕只不过是质次的蹩脚仿制品。但是，西西里现在却消费大量米兰工业化生产的水果馅冰糕。本地产品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几家旧式糖果点心店或咖啡馆才能看见。米兰产品更有名气。它在电视上做广告。它可以预先定货，定多少都行。它用冷藏车送货，可以送到最小的山村。它价钱便宜，还清洁卫生。

如果西西里人花点时间和精力去开办一家水果馅冰糕厂，他

们无疑会以他们较好的产品打进米兰，最后打进欧洲其他地方和全世界。他们不这样干：也许因为他们不能建立一个足以办这件事的金融公司。（在南方，谁也不愿当少数股份的股东；谁都想当头头；谁也不太相信他的伙伴。）其次，南方人不愿生产他们最拿手的東西；他们宁愿生产有名气的东西，如钢铁、机器、船舶：如果可能，他们还生产汽车。他们还太轻易屈从于北方的权威，甚至是在象水果馅冰糕的事例中，南方的优势已得到无可争议的普遍承认，也屈从于北方的权威。

最后有一个原因，是根本性的。南方人主要从政治方面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经济方面考虑问题。甚至一个水果馅冰糕厂也只有通过政府某个局的倡议、有势力的内阁部长的同意、大主教的干预或政党的决定，才能在西西里建立起来。在过去几个世纪，南方的大多数建树都是国王倡议的。现在仍然还是这样。办什么厂，在哪里办，拨给多少钱，哪些人来经营管理，都是由政界决定的。只有迟钝愚鲁、缺乏想象力的北方人才不得不依靠自己的主动，被迫靠自己私下来做事情。因此，南方北方经济上的赛跑 261 是不平衡的。这是一场受上面牵线操纵的傀儡和活人之间的赛跑。北方经济必然是较有生气、较有适应力的。北方经济是由通过竞争挑选出来的人经营管理，以经验为指导，以赚钱为目的。南方的进步以尺计，北方的进步以里计。

* * *

只要南方人并不真正要求繁荣，而只要求道义上与北方平等，他们便会继续把大部分精力和金钱只偶尔用于纯粹经济目的，而主要用于显示新获得的或者尚未获得的现代气派、权力和声望。他们的一些新工厂将会继续是一个纪念碑，不是生产财富的工具而是用来说明那个城市或地区，在最现代化、最先进的欧洲，不再被认为属于落后之列。这样的投资自然不能产生示范性的经济

效果，不能产生所要求的心理效果。它们没有填平南北之间的鸿沟，而是加深了鸿沟。有少数南方人会无可奈何地发现这一恼人的事实：从长远来看，只有按可憎的北方标准进行投资，才能可靠地产生南方人所要求的那种效果，即显示气派的心理效果和政治效果。这样的人正在慢慢增加，长远看来，只有他们才能够真正解决南方问题。当然，大多数南方人还没有发现这个令人不快和丧气的真理。意大利人有一种永恒的幻觉，就是把现实和现实的表象混为一谈。大部分南方人正是这种幻觉的牺牲品，他们想要解决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做到，象在过去波旁王朝的国王们统治意大利南方的古朴时代那样进行生产，同时在拥有丰富廉价的工业产品的当代世界进行消费。

歌德说得对：“不亲眼看看西西里，便不能透彻了解意大利。”对初学者来说，西西里是意大利的课堂教学模型；它具有意大利的一切优秀品质，也具有意大利的一切不足之处，并且把这些优缺点加以夸张和渲染，使之更为突出。譬如说，西西里人有治理混乱局面、使之条理化的天赋。西西里人当中制定法律的人是很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新的表达方式的人、提出对现实的新看法的人、提出对世界和人类的新概念的人是很多的。在遥远的过去，阿基米得、斯蒂西科鲁（当他以夜莺般歌喉开始唱歌时，就已预言他未来要成为显赫的诗人）、恩培多克勒和忒俄克里托斯（田园诗的发明人）等名字，已为人们所熟悉；近代的贝利尼、维尔加、皮兰德娄和兰佩杜萨也是引人注意的名字。在西西里岛上，意大利人那种喜虚饰、爱炫耀、讲排场、摆阔气的癖好，大而无当的过分装璜，已达到惊心动魄、超乎常情而近于怪诞荒唐的程度。在整个意大利，精雕细琢的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已不算少了，但是，还赶不上拉古萨、科米索、诺托和叙拉古用当地金色砂石精工巧制的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和宫殿。

意大利各地的人都太聪明了，使生活的节奏或多或少地缓慢了下来，而在西西里，生活实际上已陷于瘫痪。西西里人的聪明实在太过分了，以致总是不得不往外输出一些。他们具有以闪电般的神速捕捉形势的能力，在错综复杂的纠纷中寻找出路的能力，精确估量敌对方力量对比的能力，策划复杂得出奇的阴谋诡计

263 的能力，冷静地控制思想情绪和言谈举止，但在不冒风险的时候又慷慨豪爽、热情奔放的能力，所有这一切常常使本土上的意大利人惊异不置，就好象本土上的意大利人轻易就使来自北欧的外国人目瞪口呆一样。事实上，岛上居民全都十分老练，以致互相抵销，不起作用了。在任何别的地方通过一封信、一次谈话就能实现的最简单的计划，在西西里人之间就变成一件了不得的人事，有关各方都在挖空心思，想出各种鬼点子，以制胜对方，同时预见对方可能采取的一切诡计。结果几乎总是象势均力敌的两个摔跤运动员一样谁也动弹不得。兰佩杜萨把这种可悲的无所作为叫做“僵死之感”。

西西里人最好的美德和大多数意大利人一样，显然不是今天各种组织中无名之辈的那些美德，而是古代英雄的美德，这些英雄以其小小团体对抗整个世界。如果说意大利本土上的人常有豪侠无私之举，那么，西西里人的刚毅不拔、慷慨大方、无私无畏可以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认为，为了保卫他的独特的、正宗的西西里理想已别无他法，他可以毫不犹豫，毫无悔恨，眼睛都不眨一下去迎接死亡，或者色不变，心不跳，置人于死地。如果说大多数意大利人时时巧妙地周旋于法律内外，那么，大多数西西里人似乎完全避开法律。他们是这种技巧的泰斗，全体意大利人公认的无与伦比的冠军。

* * *

每个人的地位如何是由他使人畏惧的程度决定的，是由围绕在他周围的令人畏惧的光圈决定的。在西西里西部尤其是这样。在那里，恐惧就是毫不含糊的死亡之恐惧。而在西西里岛别的地区，这种恐惧却更为微妙，更加隐蔽。经过长时期发展起来的这种不可捉摸的技巧，以恐吓和威胁越来越多的人来获取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办法笼统地被称为“黑手党方法”。黑手党（Mafia）一

词有两种含义：一个是用小写字母的 **mafia**，具有普遍的意义；另一个是用大写字母的 **Mafia**，专指黑手党这个组织，后者是从前者产生出来的。

小写字母拼写的 **mafia** 是流行于全体西西里人当中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社会观念，一种道德准则，一种独特的感受性。他们在襁褓之中就接受这样的教育，或者他们生来就懂得：他们必须互相帮助，支持他们的朋友，对付共同的敌人，²⁶⁴即使是朋友无理、敌人有理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他的尊严，决不忍受一点点轻慢和侮辱而不予以报复；他们必须保守秘密；并且始终提防官方当局和法律。这些原则为所有的西西里人共同遵守。堂堂正正的绅士、卑贱低微的小偷、身居破旧不堪的邸宅而身无半文的穷王孙公子、与在美国的亲友合伙偷运海洛因的走私贩、研究工作遭到失败的博学多识的学者、目不识丁的硫磺矿工，全都遵循这些原则。住在意大利其他地区和海外的西西里人，也小心翼翼地保持了这些原则。事实上，一个西西里人如果不感到有遵循这些原则的义务，那么他就不能自认为是西西里人了。从这个意义来说，任何一个洋洋自得的西西里人都是黑手党分子。西西里人看见一匹昂首阔步、鞍辔华丽、颈项弓拱、鼻孔大张、两眼喷火的优良种马时，就会高叫“好一匹黑手党式的马！”显然，他们并不是说，这匹马是极端秘密的黑手党组织的成员。

按黑手党这个词的更为专门化的第二个含义来说，它是闻名世界的非法组织。它只统治西西里的一部分地区，它的势力达到巴勒莫、帕尔蒂尼科或阿格里真托；但是还没有达到墨西拿、卡塔尼亚和叙拉古。它并不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社团，它并没有等级制度、成文法规、总司令部、居统治地位的上层人物和无可争辩的领袖。它是自发地形成的一种组织，好象蚁群或蜂房那样，

由单个的人和各式各样的小集团结成松散的、随意性的集合体，每个人都服从他那昆虫学的规律，每个集团在它那小小势力范围里至高无上，独立自主，服从它自己的领袖的意志，每个集团在当地强行实施它自己的严厉的原始法规。只有在少有的紧急时刻，黑手党才动员起来，结成一个松散的联盟。

谁也不知道黑手党有多少人。按黑手党一词在刑法上的意义来说，只有少数西西里人才是法律上的黑手党分子。许多人的确不知道他们自己究竟是不是。西部西西里人照例必须与本乡本村或本城的黑手党搞好关系。他们不得不在那里生活，他们必须保
265 卫他们的家庭、工作、财产或企业，并且希望不遇到麻烦。黑手党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的事实，就好象气候、平均降雨量或本地方言那样，是他们永恒的生活环境。要在黑手党和非黑手党分子之间划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往往是不可能的。

以马扎里诺的那些慈善的僧侣为例，他们最近被逮捕了，并且受到审讯，因为他们在黑手党和它的受害人之间充当了引线，而这些受害人遭受了敲诈勒索。这些虔诚的神父耐心地向那个非西西里的法院解释：决不能认为他们是罪犯的说客、煽动者或同谋犯。他们给受害人带去黑手党的勒索信，尽力劝说他们还是出钱为好，并且要快，为的是保全他们的性命。有一两个人固执地不听劝告，结果不是死在偏僻的乡间小路上了吗？是的，这些僧侣也曾亲手写过这样的勒索信，但是，那只是因为那些黑手党分子是文盲，并且没有打字机。

此外，僧侣们指出，他们不是警察，对马扎里诺的执法情况不负责任。他们认为，有勒索者，就有受害者，有必须顺从黑手党的要求才能确保平安的有钱人，也有靠恐吓别人来维持生活和发财致富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些僧侣认为，他们仅仅是在尽他们的职责，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他们所完成的难道不是大

慈大悲的使命吗？（然而，这些僧侣被判有罪，并处以长期徒刑。）

当然，谁都知道，黑手党保护某人免于遭受的那些麻烦，差不多总是黑手党自己策划和控制的，尽管这种事从来没人公开承认。谁都知道，他向当地黑手党头目进的贡，犹如向一个有势力的封建贵族进的贡。谁也没有办法。但是，黑手党和它的受害人之间的关系不限于聚敛金钱。总有一天，黑手党还需要某些其他的好处。到那时候，就谁也不能再拒绝了。一个商人发现，他必须替一个犯了罪的人安排工作，一个银行家必须给一个铤而走险的雇客发放贷款，一个农民必须在谷仓里掩护某些素不相识的人，一连掩护几天，而不能向他们打听任何事情，一个诚实的人必须记清楚他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或者必须忘记眼睁睁看见的事情。所有这些人都是希望避免麻烦，结果却逐渐深陷罗网而不能自拔。266

再举一个例。一个政治候选人需要选票，黑手党在某些选区可以提供；他需要多少，黑手党就可以提供多少。他得到这些选票，心里是不踏实的。但是许多杰出的政治家都这样干过。为什么不这样干呢？奥兰多也许是意大利最高级的宪法权威，西西里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一九一八年任意大利首相，一年之后，在凡尔赛，和劳埃德·乔治、伍德罗·威尔逊、乔治·克列孟梭在一起，成为四巨头之一。就是这个奥兰多总是欢迎黑手党的帮助。上次大战后，意大利于一九四六年举行第一次自由选举时，在臭名昭著的黑手党大本营巴勒莫附近的帕尔蒂尼科（奥兰多于一八九七年第一次在那里当选）挂起了一幅大标语，上面写道：“请投朋友们的朋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尔·奥兰多一票。”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大家都知道“朋友们”是指谁。

无论世界上什么地方，一个候选人当选以后，总得向他的选举人表示谢意。他必须做些事情来报答他们的选票，尽管他可能

并不总是喜欢做这些事情。得胜的候选人到底还有什么事情不替他的选民办呢？在西西里，他可能不得不推荐那些极不称职的人去担任好工作，写信给内阁部长保护形迹可疑的人，保释一个人出狱，阻挠批准危及某些“朋友”（如水源所有主）的权力和收入的公共工程计划（如修建水渠），等等。利用黑手党，并对他们施以恩惠，这种情况必然会使一个人成为黑手党的成员或同谋犯吗？道德家们认为是这样。西西里人则不作肯定。有些人能够保守秘密、施加恩惠、接受恩惠、而且有他们自己的权力和权威，这些权力和权威并不来自黑手党，但是，这些权力和权威使他们267 不时地对黑手党有好处，西西里人把这种人只称之为“受尊敬的人”，也就是强使别人尊重的人，对这种人不应加以伤害。

整个情况显然很复杂。两个黑手党紧密相联。如果第一个黑手党不广泛，第二个黑手党便不能繁荣。一个人如果不是第一个黑手党的首脑，便难以飞黄腾达，达到第二个黑手党的顶峰。难以精确知道，这两个黑手党一个从哪儿开始，另一个在哪儿终结。它们常常互相重迭。这现象深深扎根于历史，扎根于西西里人的性格，扎根于当地习惯；经过许多世纪时间的推移，年月悠邈，它的源头已经弄不清了。

谁也不真正知道“黑手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源出于何处：黑手党是在哪儿产生的；为什么大写字母的黑手党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西西里人不大愿意提这个词，当他们与本土上的意大利人或外国人谈话时，只是点到为止。他们喜欢把黑手党叫做 *Onorata Società*（也就是“光荣的社团”）或某些其他名称。它的成员通常被称为“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冷静的巴勒莫商人在谈到那些他们遇到困难向之求助的有势力的黑手党人的时候，使用了一个轻松的、现代的、事务性的名词，把他们叫做“有资格的人”，“专家”。

关于黑手党的由来，人们所知，不过是这样：几个世纪来，地主们建立了许多私人小军队来保卫他们的家庭和庄园，抵御打家劫舍的土匪。西西里岛长期受贪得无厌的异族统治，处境悲惨，交通不便，对异国法律和体制的反抗到处都是。这些所谓“军团”以严酷的手段维持着某种原始的法制，对最轻微的罪行也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法院，没有监狱。他们认为，法制出于人的本性，纠正错误，保护弱者，惩罚强盗，遭受凌辱的处女要嫁给诱奸者，这是诺曼入侵者于一〇七〇年带到西西里岛的骑士法规在农民中的遗风。木偶剧院过去一直致力于宣扬查理曼大帝的骑士们的丰功伟绩，使这种风气保存下来，大人小孩都常去看。 268

甚至在今天，正统的黑手党人力图维持这样一种虚构的说法，即：他们不是平常的罪犯，而是罪犯的敌人；他们并没有犯罪，只是有时遗憾地被迫使用暴力，以便取得他们的财源，实施他们的法律。他们解释说：这个法律毕竟是几个世纪来西西里唯一有效的法律，是反对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屏障。实际上，那些资深望重的黑手党人的一生，表面看来都是清白无瑕的。他们是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他们言重如山；他们洁身自好，决不与密探、卖淫、毒品或不正直的诈骗发生任何关系。他们从来不出卖朋友。他们始终是虔诚的教徒，慷慨地向本地教区或应当受照顾的穷人捐钱。许多人有姐妹在当修道士，有兄弟在任圣职。在考虑这个社团时，一定不要忘记这种中世纪的遗风，不要忽视这些溢美之词，这并非全属虚构。这一点很重要，它把西西里的黑手党和真正的犯罪组织或彻头彻尾的诈骗集团区别开来；美国的所谓黑手党才真正是彻头彻尾的诈骗集团。这种说法还为同黑手党合作的诚实人开脱。

这个“军团”的大多数领导人，象西方影片中的地方治安首长那样，不时地在土匪当中招募新兵。那些厌倦了绿林生活的老土

匪通常也要求稳定下来，渴望过体面的家庭生活。在地方上只有他们是不怕冒险的人。犯法的人和执法的人之间的分界线越来越难以分辨了。人们从犯法集团过渡到执法集团，然后再回到犯法集团，都很容易。“军团”堕落腐化了。这就诱使他们情不自禁地失去任何控制，而去与他们的敌人——那些亡命之徒——达成工作协议，以使大家都平安地共存共荣。如果土匪遵守协议的规定，在别的领地上去干那抢劫杀人的勾当，他们将受到很好的照顾；如果他们找麻烦，就会遭到毁灭。

269 地主通常是住在巴勒莫或那不勒斯等远离农村的地方。如果他在现场并且发现他的卫队是土匪的同谋犯，就会立即陷于非常尴尬的处境。他没有别的选择，他不得不接受他手下人的意志。这些手下人保护他、保护他的家庭、他的城堡、他的酒窖和粮仓。如果他们不时给邻近地区造成严重破坏，与他有什么相干？为了酬答他们的效劳，他当然不得不付给他们一份收获物（人们不是要向政府交一份收获物吗？），宽容他们的罪行，以他的影响在官方当局那儿袒护他们，使他们不致因在别的地方犯的强奸、绑架、敲诈勒索、抢劫杀人等罪行而受到惩罚。这种原始的朴素形式的黑手党，直到现在，在西西里凡是有大庄园的地方仍然存在，它把冷酷无情的野蛮行为和高尚的情操混为一体。一个外来人继承或购买了一个孤立庄园，很快就有人私下神秘地、礼貌地但又恫吓地告诉他，为了避免麻烦，他最好还是雇用一个本地人当管家，而不要太多打听这个人的底细。这个人大概是原来由于拦路抢劫、杀人放火而坐过几年监狱。在这里所说的外来人，包括来自该岛东部的西西里人。本地的继承人或置产人勿须告诉，他自己懂得。他会做他必须做的一切，或者按“朋友们”规定的价钱把土地卖给被允许从他手中买下土地的人。如果新的庄园主十分愚蠢而不了解传给他的信息，他很快就会理解这件事的含意：他的

葡萄树会在一夜之间被砍倒，他的木材和草库会被放火烧光，他的牛羊牲畜会被偷走，也许他的孩子会被绑架。警察承认他们无能为力，并且好心地劝他，人家叫他做什么就得做什么。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就会成为一个“受尊敬的人”：他将得到荣誉，受到周到的侍候，所到之处都受到高声赞扬，为封建礼貌所包围。当他在街上走过时，素昧平生的人也会摘下帽子向他深深鞠躬。他不仅生活得平安无恙，而且简直象生活在极乐世界一样。

现在还有另外一些黑手党，它们更现代化，更有钱，更有势；它们中大多数专门从各种各样经济活动中榨取贡金。有牲畜牧场黑手党，柠檬园林黑手党，水源黑手党（控制稀有泉水、井水、270灌溉渠），建筑黑手党（如果建筑房子的人不给钱，手脚架就会散架，砌砖工人就会摔死），商业黑手党，公共工程黑手党（他们包揽合同），水果、蔬菜、花卉、水产批发市场的黑手党，等等。它们全都以大体上相同的方式进行活动。它们各在自己的领域内建立秩序，制止小偷，提供保护，防止各种威胁，包括防止合法当局、竞争者、罪犯、税务人员和敌对的黑手党组织的威胁。它们规定价格，安排合同。紧急时，它们可以保证把违犯它们的法律的人处死。必需处死的情况是很少的。它们能够处死任何人这一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就足以使得人人战战兢兢。

这些各自独立的组织的最高首脑往往都是富有的资产阶级、受尊敬的律师、有名的外科医生、或乡间的地主。他们的人生经历清白无瑕，他们的态度和蔼可亲，他们使用交际手腕而不使用武力，说话低声细气，见面打招呼也喜欢老式的：“**Bacio Le mani**”（我吻你的手）。他们的政治态度是保守的，甚至往往是反动的：他们诅咒一切社会进步，因为社会进步必然危及他们的权力；他们希望维持现状。无论什么人上台，他总是站在政府一边，因为他们只能从政府得到好处。他们是讨人喜欢的。他们不能不

如此。

* * *

黑手党的基本核心是家族。有些家族从远古以来就属于“朋友的社团”，每个父亲很自然地把势力范围留给长子，就象国王把他的王国很自然地传给嗣子一样。父亲参与秘密谈判时，总是把长子带在身边。这个长子从来不发言，他看着、听着、记住所有的一切，在老头儿一旦突然被杀的时候，他有备无患。有些新家族白手起家。和所有新露头角的人一样，必须同老家族作斗争，争取生存，然后慢慢站稳脚跟。随着岁月流逝，它们招揽心腹、奴仆和财产，与地主、商人、政客、警察、其他黑手党家族建立牢固的关系。它们的社会地位首先取决于它们的男性成员的人数及其勇敢无畏的精神，然后取决于它们建立了多少有用的关系。在一个村子里，几个黑手党家族只要不在同一个活动领域里竞争，就可以相安共存；每个家族都必须有自己特定的活动范围，都必须准备随时联合起来抵御共同的威胁。

有一些有权势的家族，属于同一地区，从事于相同的或相关联的活动。它们有时感到组成一个稳定的联合是合适的。这种联合称为科什卡（Cosca）。这是组织方面的第二步。科什卡不是平等伙伴的联盟，而是承认一个家族的最高权力及其首领的领导地位才结合在一起的。科什卡这个词本身是方言词汇中“洋蓍”一词的讹用，意思是一些各自独立的叶子，组成一个牢固的单位。一个科什卡与在其他行业里进行活动的科什卡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对同它竞争的科什卡，通常是与之达成工作协议，划定边界，确定领土范围，订立公约，共同遵守。科什卡的确也有互相打仗的。但是，这种情况极少极少。一旦打起来，这个仗就采取传统的世仇形式：某集团的一个人被杀了；随后会有对方组织的另一个人被暗杀，作为报复；然后又会有第三人遭到报复，被冷枪打

死在乡间小路上；接着整个家族会被消灭。如此循环往复，经年累月，直到最后，世仇的起因被完全忘记为止。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蒙雷亚莱的斯托帕格利埃里家族和巴盖里亚的弗拉图齐家族之间互相报仇，牺牲了几百条生命，至今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弗拉图齐家族中的一员萨尔瓦托尔·达米科（他已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当了告密者。他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告诉了警察，并且说，“黑手党会杀死我的。无论是你还是意大利王国的全体警察都救不了我的命。”十一天之后，人们发现他满身弹痕，嘴里塞进一个软木塞（这是斯托帕格利埃里家族的标志），胸口上放着一张卡尔米内修道院的圣母像（这是弗拉图齐家族的标志）。这两个敌对科什卡本来已经忘记了彼此的仇恨，但是他犯下了全体黑手党人认为罪大恶极的罪行，绝对必须予以惩罚。他向当局告了密。这叫做**infamita**（卑鄙无耻）。（几年前，有一个出卖了土匪萨尔瓦托尔·朱利安诺的人，在巴勒莫的乌恰尔东监狱被一杯下毒咖啡毒死。） 272

从事同一活动或类似活动的许多科什卡常常加入一个称为“朋党”的联盟。这个集团也承认一个科什卡有最高权威，它的领袖就是大家的领袖。这种情况是自发地逐步形成的。一些科什卡承认它们当中有一个与其他任何科什卡相比，势力大些，人员多些，朋友多些，钱财多些，高级保护人和社会关系多些，有能力对任何一个公然蔑视它的意志的人给与极严厉的惩罚，可以使一切与之勾结的人、顺从它的人得到好处，这时，这种“朋党”就自然形成了。西西里的所有“朋党”最后形成“光荣的社团”，也就是黑手党。前面说过，它是一个流动的、松散的、没有明确范围的联合组织。

有各种程度的隶属关系：一个家族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单元进行活动而不必与其他家族联合；一个科什卡也可以不联合其他科

什卡而独立进行活动；几个科什卡联合而成的“朋党”也可以独立于全岛的大联合而统治它自己的领地。但是，一种对黑手党的忠诚之心把所有的成员联合了起来：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对任何一个需要支持的“朋友们的朋友”给与一切可能的支持。只要经过一个共同的朋友介绍，即使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都要给与支持，而不问为了什么事。大多数稍微有点地位的黑手党人都认识数以百计的各阶层的黑手党同僚。大头目常常见面，从旁注意彼此的活动，互相对对方作精确的评价，就象各行各业的名人所做的那样。尤其是少数几个头头，由于他们的远见卓识、深谋远虑、坚决果断等特殊品质，由于他们功成业就而闻名于整个西西里。当然，最后有一个人被公认为所有的人中最受尊敬、最可信赖、最受崇拜的；他比别的任何人都更令人畏惧。他就是黑手党的首领。

挑选首领没有严格的规则，没有条例，没有选举运动，没有选举团体。举行会议也是不拘形式的。当然，在过去，在上个世纪，他总是不得不一路闯过去，达到最高宝座，消灭大多数危险的竞争对手。这个过程是要花费无谓的代价的：要花几年时间，要付出数以百计的宝贵生命。现在，首领的产生几乎总是以和平的方式了。与他同等地位的人通常多年以来就知道他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有时，在一个短时间内不止有一个头头，而是有几个同样受尊敬的候选人，这就出现一个“空缺时期”或“王位待选时期”。当然，事情照常进行，头目很快就找到了。他并不是不可缺少的。他只是在他的“朋党”内有绝对权力；在岛上其他地方，他的权力有名无实。他不发布命令、不起草行动计划、不代表黑手党与政府或外部代理人进行谈判。有时，他被请去排解纠纷，结束长期的不和，或确定势力范围；他极少以整个黑手党的名义向反叛者宣战。

* * *

已故的唐维托·卡希奥·费尔罗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至今还受到人们的尊敬，尤其是在西西里。他也许是黑手党空前未有的伟大领袖。他从上世纪末便统治黑手党，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止。（“唐”是拉丁字“dominus”之讹，它的意思比“先生”稍重一点，是用来称呼贵族、有钱的绅士、牧师和黑手党头目人的。）唐维托生于巴勒莫附近的比萨奎诺，父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他很早就显露头角，是个具有伟大品格的青年人。他天生具有一种威严气概。各种人都不由自主地服从他，有什么事情都要去征求他的意见，请他批准。唐维托是使乡村黑手党田园诗般的古风适应二十世纪现代化城市的复杂生活的第一人。犯罪活动都是由他组织的，从最大宗的买卖到偷鸡摸狗，以至在教堂施舍箱里偷几个铜板。所有的罪犯，所有他的心腹，在他心里大体上都有一本帐。罪犯的活动全都要得到他的认可；没有“社团”的批准，或者不向黑手党按惯例纳贡提成，什么也不能干。

当然，犯罪行为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制度下都有。但是，在唐维托的井井有条的世界里，犯罪行为必须受到纪律约束，接受引导，有时巧妙地用来达到有用的目的，并且要纳税。犯罪活动只不过是黑手党许多活动之一。这些人无例外地都要得到黑手党的特许，向黑手党进贡，必要时还得接受征召来保卫黑手党的利益。巴勒莫第一次出现了连乞丐也不再受小流氓欺负和敲诈的局面，乞丐们都编入一定的组织，象所有的商人一样，每天把他们的所得按一定的百分比向负责他们那个地区的“朋友”纳贡。 274

纪律性十分良好。如果一个来自乡村的“受尊敬的人”、来自罗马的政要人物，或者是到西西里来的外宾，在唐维托的管辖区内，出于误会而被偷了，只要他下一道命令，不多一会儿，小提箱、旅行袋、手表或女士们的珠宝首饰就送了回来，并且表示歉意。巴勒莫同西西里东部的卡塔尼亚不一样。卡塔尼亚没有黑手

党控制，无政府状态严重。大家都知道一九二三年发生的墨索里尼丢帽子的事情。那是一个丢脸的事件。这个独裁者当然是个“受尊敬的人”，他到这个城市来访问，与当局磋商当地的紧急问题。他和当地的行政长官、警察首脑、社会名流一起关在行政长官官署开了个长会。会议结束时，他要他的帽子——他那顶圆顶硬礼帽。那时，他仍然打扮得象个赛马场上出身高贵的交际家，脚蹬鞋罩，身穿早礼服，手提文明棍。“领袖”的帽子永远也找不到了，它已被不负责任的无名小偷或者纪念品猎取者偷走了。

巴勒莫的纪律也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二次大战后不久，现在去世的特拉比亚的唐拉伊蒙多·兰扎亲王的英国女朋友，丢了一件很值钱的皮大衣。亲王要她放心，派人找来唐维托的继任人，命令他把皮大衣找回来。兰扎家族是西西里岛上的首户之一。这个家族一千年前就来到岛上，十三世纪时站在西西里国王、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菲特烈二世一边作战。兰扎一家世代是国王和皇帝的顾问、总督、将军和海军上将。唐拉伊蒙多的先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意大利航空事业的泰斗之一。这个家族拥有成千公顷的土地、整个整个的城镇、河流、城堡、邸宅和别墅。他们
275 在西西里可以说绝对是“受尊敬的人”。黑手党领袖谦恭地向兰扎亲王道歉，并且很快就把过去几天在巴勒莫偷的所有皮大衣拿了出来。但是，这位女士的皮大衣却不在里面，它被一个无人知晓的散兵游勇偷去了。这个人也许来自意大利本土，不买“朋友们”的帐。

唐维托使组织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面没有过分诉诸暴力。有的黑手党领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得尸横全岛，被认为是无能，就象不能不发动侵略战争的政治家一样。唐维托进行统治和使人敬畏主要是靠他的伟大品格和他那天性优越。他那令人敬畏的仪表帮了他的忙。他身高，体瘦，衣著讲究而典雅。长长的

白髯使他俨若道貌岸然的圣人、上个世纪新英格兰的传教士或可敬的法官。（实际上他是个文盲。）他的态度雍容尔雅，举止谦恭而庄重。所有的人都很爱戴他。他生性非常慷慨；别人要求帮助，他从来不拒绝；出手十万、百万，借给人、送给人，广为施舍。他不厌其烦地亲自去为人排忧解难，伸冤矫枉。当他外出旅行时，各村村长都在村口盛装以待，鞠躬吻手，向他致敬，他俨然若国王。他是这样一种国王：在他的统治下，和平与秩序得以维持，当然是黑手党的和平而不是意大利王国官方法律所强迫人们接受的和平，但是，人们并不对这两种和平细加区别。

他承认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杀过一个人，只杀过一个，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荣誉、声望和保卫“光荣的社团”。那个人向整个黑手党挑衅，唐维托只能亲手杀死他，而不假手别人。那人就是纽约警察署意大利人小分队的头头圭塞普·佩特罗西诺。他于一九〇九年到巴勒莫来调查“光荣社团”与西西里移民当中的黑手组织之间的关系。佩特罗西诺不是西西里人，不知道西西里的规矩。他是萨莱诺省帕杜拉人，一八七三年十三岁时移民到美国去的。他以为他很安全，因为除了警察外谁也不知道他的到来。在 276 他登上西西里岛后几小时，唐维托就在马里纳广场的大街上法院门前把它枪杀了。

唐维托于一九二六年被逮捕。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是行政长官莫里下令逮捕的。莫里是个顽强的警察。墨索里尼责成他摧毁黑手党。莫里不顾一切成文法律的规定，使用黑手党的方法，对“社团”展开无情的斗争，使得人人都心惊胆战。他暂时成功了。唐维托很快就在整个监狱里建立了他的权威，好象一个深受爱戴的将军混杂在士兵当中被关在集中营里建立起他的权威一样。秩序和纪律第一次统治了监狱。他平息一切争吵，帮助亲密的朋友解决个人的困难。他给贫困的同监犯人的家属送去补助

金，给就要结婚的朋友的女儿送去厚礼。一般说来，他在单人牢房里继续做他在困难条件下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伤感过度，死于狱中。直到前几年，人们还可以看见他用小刀刻在乌恰尔东监狱走廊墙上的一句话。在他死了很久以后，狱中犯人读到这句话时还点头赞许。跟大多数伟大人物的不朽格言一样，这句话也是一种老生常谈。这句话是：“监狱、疾病和贫困见真心。”直到今天，一个被监禁的黑手党人如占有唐维托度过一生中的最后年代的单间牢房，仍然被认为是极大的荣光。

* * *

一个黑手党人竟然不知道自己干的是坏事，这一点是令人吃惊的。他看问题有自己的方式，大概是认为，秩序必须维持，公理必须捍卫。可惜，象他们这样的人，往往必需以暴力手段来执行黑手党的意志。有时他们不幸还不得不通过敲诈、勒索、强抢等手段来为科什卡的执法活动提供经费。有许多对不公正的政府或异族统治进行斗争的组织不也是这样干的吗？当然有些人受到损害，但是，那只是因为他们顽固。人们也承认，要限制这些手段，使之只用于合法的目的，往往是困难的。当然会有可悲滥用权力的事情，权力总是腐蚀人的。所有的黑手党领袖都受到权力的诱惑；有些领袖当了权力的俘虏，得到不好的下场。好的领袖则不是这样，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贪欲。可惜好领袖越来越不多了；情况再也不是唐维托那个时代的情况了。黑手党日益忽视它传统的宗旨，越来越多的黑手党人只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捞钱，而拼命破坏古老的规则。纪律松弛了；这是时代的过错而不全是黑手党的过错。这种趋势在现代世界上到处可见。今天所有的人往往都为他们的私利服务而忘记了道义上的责任。但是，好的黑手党人还是有的，这种人还没有消失。首先他们要求对别人有所帮助。他们认为帮助别人是人生的使命。

请看其中一人的自供：

“达尼洛先生，我生来就是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有人求我帮他一把，我就帮他一把，因为上苍叫我这样做……有个人来对我说：‘我和蒂齐奥发生了争吵，请你帮我排解一下好吗？’我就把他说的那个人叫来，或者根据情况需要，我去看他，让他们两人达成协议。这就是我所具有的权力。我既不徒爱虚荣，也不怀抱野心。我对各种各样的人都张开双臂。我不能对任何人说个‘不’字。即使遇到麻烦也决不能使我不这样做。有一种责任感迫使我帮助他人。当然，你常常得到人们的感谢，你交了朋友，交了很多很多朋友，并且产生了可以要求某种报答的机会……一生中总是有来有往，一报还一报……我的名字已传扬出去……各种各样的人问我投谁的票。他们为了表示感谢我为他们办过的事，感到征求我的指点是他们的义务。他们不了解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向我讨好……譬如说，明天我必须放下打谷，放下牲口，放下我的一切事情，到阿格里真托去。有人请我把一个学生托付给他的老师，使他考试能准保及格。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①

这些教师显然要给那个学生及格分数，不管那学生是多么愚昧无知。教师们不是傻子，他们也要讨好黑手党人。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也用得着他呢？他可以帮助一个人提薪晋级或迁进一套较好的住房。再说，得罪了他是危险的，更是没有必要的。在同一天同一个学校里各种各样要人所托付的孩子，全都升级了，其中许多孩子实际上是一字不认的文盲。多一个学生升级为什么不可以呢？事情就是这样，有恩就有报，施惠于人引起受惠者的感激之情，受惠者懂得，在求到他们时，他们不得不替人办点事来作为报答，也许是把他们的选票投给某个候选人。巴勒莫或罗马的政治家当选了可以给他们很多好处。偏僻乡村的目不识丁的偷鸡贼可能被叫去替有权势的绅士办件小事，如窃取一项文件或

^① 这段话是达尼洛·多尔奇记录的逐字供词，刊印在他的书《废物》里。这里引文略有删节。——原注

钉某人的梢，一个杀人犯可能被命令去杀一个人。这是一条由畏惧而暗地连在一起的没有尽头的链条，表面上是由感激、友谊和甜言蜜语的恭维等纽带来维系的。黑手党分子为什么自称为“朋友”、“朋友的朋友”，自以为他们是乐善好施的庞大互助协会，只是偶尔为了保护他们成员的利益，才勉强地被迫消灭冥顽不化的敌人，违犯官方的法律，原因就在于此。

* * *

有一个人自认为是社会的恩人，是西西里的优秀爱国者，是优秀的天主教徒；这个人就是可以与唐维托相媲美的黑手党最近的领袖唐卡洛·维齐尼。当然他不象永垂不朽的光辉榜样唐维托那样伟大。但他也是够伟大的。唐卡洛生于维拉巴，一九五四年七十七岁时也死于那个地方。他的葬礼比得上一个亲王的葬礼：有乐队，有成行的牧师和僧侣，唱着赞美诗，摇晃着香炉；漆黑的大马牵挽着柩车；鲜花堆成山；成千的农民全都穿着丧服。妇女在哭泣，小孩在嚎叫，老年人伤心落泪哭红了眼。村里所有官方人士全都参加了葬礼；还有来自阿格里真托和巴勒莫的官方人士；有些政治家来自东西西里，来自遥远的罗马。致悼词的人发表了词藻华丽的颂歌，赞扬了死者的美德：他是穷人的朋友，从来没有忽视过求助的人。他没有自私自利之心。教堂正门顶上钉着传统的表示悼念的铭文，铭文以一句简单明了的话结尾：“他是个 **galantuomo**”。**galantuomo** 的意思是诚实的人，有信用的人，有骨气的人，可以信赖的人，但是也是有财产的人：他留下价值近二十亿里拉的硫矿、土地、房屋和各项投资。对他这个文盲农民来说，他也是有广泛社会联系的人。他的叔父是位主教，他的堂兄拥有诺托主教的衔头，是卡尔麦罗圣马利亚修道院修士会的可敬创始人。他的两个弟弟都是传教士，其中一个享有“阁下”尊称的高级教士。

唐卡洛的权力虽然决不能与唐维托的权力等量齐观，但也是很大的。他死后这么多年了，还没有谁能象他那样重新把黑手党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很熟悉他。当你看见他时，你不能想象他能那样令人生畏。他看上去毫无恶意。他身体瘦小，由于风湿病而稍微有点弯腰，穿的是富裕农民穿的那种平绒衣服，头上戴一顶布帽。他的态度和藹可亲，彬彬有礼。只有他的眼睛才显露出他的本色：他双眼呈灰褐色，炯炯有神，非常机敏。早上看他从他的住宅出来是很有意思的。他住的维拉巴广场象个准备上演《乡村骑士》的小舞台，一边是教堂，周围是各种邸宅和破旧失修的房屋。唐卡洛每天早上晨祷的时候准时从小门出来，安详地来回散步，倒背着手，与他的弟弟“阁下”谈话。

墙壁阴影下，街边小路上，出现了一些人，他们早已来到那里，有些人来自远方，等待着和唐卡洛谈话。他们当中有农民，有头带黑面纱的老妪，有年青的黑手党分子，有中产阶级的人。他们轮流地陪他散步，申诉他们的问题。他倾听着，然后，他叫过来一个亲信随从，吩咐他几句，然后召见下一个请愿者。许多人在离开时吻他的手表示感谢。 280

过了一会儿，他坐在广场上咖啡桌旁，象年长的农民或牲口贩子等许多人一样，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继续进行日常的工作。在有人向他汇报一桩纠缠不清的事件或提出一个行动计划时，他点头示意，很少有笑容。只是在他拍别人肩膀时偶尔笑一下，好象是叫那个人放心，给他以鼓励，或者给他以安慰。他那年高德劭，保乡佑民的态度；路人对他招呼致意时的恭敬；他周围的随从；接近他的人的谦卑；他对人们说话时，人们脸上浮现出的感激的微笑：所有这一切使人想起了古代国君在户外露天之下开庭审案、行使司法权的那种情景。人们当然看不见他的王国里的许多受害者。在半个多世纪里，在乡间发现许许多多满身弹痕的尸

体，满面泪痕的寡妇，失去父亲的孤儿。

美国军队加强了唐卡洛的权威。美军在西西里登陆时，他立刻被任命为维拉巴的市长并且赋予充分的权力。他负责安排军用车辆和后勤供应。据说，他为美国人办了很多事，在美军登陆前，向美国谍报人员提供了情报，使整个黑手党组织网都乐意与美国人合作。这个传说有多少真实性还很难说。但是人们知道，在盟军占领下，他恢复了在西法西斯政权下丧失了的全部权力，重新组织了“社团”。自从莫里行政长官把黑手党分子，包括唐卡洛本人，送进监狱，或者放逐到沿海某个荒凉孤岛以来，“社团”已很久很久不存在了。

从第一个美国兵到达维拉巴那天起，直到唐卡洛去世那天为止，他按旧章法进行着铁腕统治。对于在他的地区内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和在整个西西里发生的大多数重要事情，他都得到确确实实的情报。（提供情报是得到好感的一个途径。）任何一笔大交易，没有他的同意就作不成。他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政治观点极端保守。他支持基督教民主党，反对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

共产党人和工会组织是他的私人仇敌。他认为他们是竞争者，是跟他竞争的黑手党的领袖。当西西里的共产党老英雄吉罗拉莫·利考西要在维拉巴的广场召开露天大会时，唐卡洛送信劝他别开这个会，他说：“不安全。”利考西当然知道这个温和的警告是什么意思。由于他是个刚强自负的人，不尊重任何权威，甚至连“朋友”的权威也不尊重，他终于来了，并且对稀稀落落的一小群人讲了话。讲到中途，他的话被枪声打断：唐卡洛的人从房顶向他和他的听众开枪。这小群人慌忙散去。有几个人受了伤，利考西本人也伤了一个膝盖。起初他被丢下来孤零零地躺在空旷的广场上。突然一个黑影落在他的身上。一个老头俯身弯腰在他的身体上方，在寂静中平淡地问道：“我能帮你点什么忙吗？我就是唐

卡洛。”

有些美国人认为，在他们国内的犯罪集团属于西西里的黑手党，实际上是黑手党总部的海外支部，它们全都受发自巴勒莫的命令的指挥。连某些天真的意大利血统的美国罪犯也相信这个神话。他们是从报纸上听说黑手党的。有时，他们来到西西里，不但相信他们属于这个“光荣社团”，而且还认为他们在“社团”中有很高的地位。他们和有钱的外国人一样，顶多不过是“受尊敬的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很快就惊愕地发现，他们仅仅被真正的“朋友”认为是陌生人。卢基·卢恰诺是这些轻易上当的美国人之一。当他被美国驱逐出国，来到巴勒莫的时候，受命监视他的行动的警察官员说：“这个天真的可怜人，他认为，他是黑手党的大人物。”卢基·卢恰诺和有权有势的领袖们周旋，招待他们，显然把他们当朋友来对待。这些“朋友”骗了他一千五百万里拉，劝说他投资于一个糖果厂。这项合伙生意由“朋友”控制，工厂赚钱越多，卢基·卢恰诺就损失越大。这就是这位在美国下层社会具有极大才智的人物在他的本乡本岛从真正黑手党那里受到的待遇。 282

认为有一个世界范围的阴谋集团，总部设在意大利！这种说法很难根除，因为它似乎有道理，并且给人以安慰。它有助于解释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件，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会有那样难以理解的耿耿忠心 and 亲密联合，也可用来辩解某些美国警察机关出奇的无能。犯罪集团的神经中枢在遥远的大洋彼岸，首先必须砍掉龙头，那不是美国人的事，而是意大利人、外国人和那些说莫名其妙的行话的靠不住的人的事。

这种说法还有深刻的心理根源。据说这个国际阴谋集团里都是些阴暗的人、狡诈的人、邪恶的人（他们使用秘密的、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打败那些讨人喜欢的豪侠的对手），就

象另外一些阴暗而狡猾的人的国际阴谋集团，如犹太银行家的国际阴谋集团、耶稣会会士的国际阴谋集团一样，在遥远的他乡异国有其秘密的司令部。这样的组织当然是没有的。要这种组织存在和运行，必须纪律严明，权力集中。那样的组织当然是危险的，但是也容易被发现、被渗透、被摧毁。真正的黑手党之所以不能被有效地击破，原因就在于它不是一个严密的、管理得很好的组织。它是一条多头龙，没有头也可以继续活很久。况且，黑手党对仅仅几哩之外的卡塔尼亚都没有任何影响，怎么能在美国发号施令呢？

然而，美国的神话也有一些根据。迁往美国的许多西西里移民无疑带去了小写字母的黑手党。他们感到他们怀有一种侠义的东西里感情，许多人至今仍然如此。他们仍然与故国亲友保持着联系，有时去看望他们。所有这些关系，必然使他们在必要时互相帮助。许多有钱的西西里裔美国人向故土的孤儿院、医院、学校捐款，为家乡兴建水渠。有些人给亲戚发津贴，供年青的意大利堂兄弟上学。这样的美国人当中，有少数属于犯罪集团，更有特殊的需要。比如一个逃犯偶尔会在远亲的农舍里躲避一个短时间。他当然呆得不久，因为很容易被发现，并且他一点也不喜欢西西里的原始生活条件。一个西西里的逃犯也会在亲戚的帮助下，秘密地登上美国国土，得到资助和假证件。总之，只要他需要，亲戚们就会帮助他，即使他吐露真情也不要紧。（萨尔瓦托雷·朱利亚诺的一个心腹在波士顿有亲戚。人们在得克萨斯州发现他平安无事，用一个假名字在美国空军中工作。）堂兄弟或朋友们合作走私麻醉剂，从巴勒莫偷运到美国港口。但是，众所周知，这种贸易在世界各港口都有：海洛英由挂着各种国旗的船只运进美国；干这种事的有许多国家的人，而不单是西西里人。西西里的犯罪分子和西西里血统的美国犯罪分子之间有种种关系，但是，这

些关系是偶然的、自发的、无组织的关系，不等于是个国际阴谋集团。显然任何来自巴勒莫的命令决不能够决定美国下层社会的重大事情。

* * *

移居美国的西西里移民发现他们处在一个含敌意的异己社会的包围中。他们必须克服难懂的语言、复杂的风俗、严峻的法律和他们所认为的暴虐政权。他们感到被堵塞了获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财富和权威的门径，弄不清是什么原因。他们依恋能够保护他们和安慰他们的东西，依恋教堂、家庭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很快发现，他们的人在故国发展的使异己的法律归于无效的伎俩，在美国也有用。祖先们曾打败过阿拉伯人、诺曼人、安茹的国王们、西班牙人、奥地利人、波旁王室的国王们以及皮埃蒙特人，他们的后代子孙竭力用同样的方法在美国生存下来，取得成功。他们感到他们是处于守势的少数，这种感觉为他们的犯罪组织的名字“我们的事业”（Cosa Nostra）所证实。它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必须加以保卫，不许外人插足”。事实上，他们发现，²⁸⁴古老的伎俩在美国更为有用，更行得通。美国人一般是信任人的，没有防备狡诈诡计的准备，常常不愿意为了他们认为的小问题而与人冲突。

在美国的全体西西里人当中，犯罪分子只是极少数。全体西西里人都遵循同样的古老规则，他们只知道这些规则，也就是所有的意大利人都遵循的规则，不过更加精明罢了。这些规则本来不是不正当的，但是，可以被有效地用来达到不正当的目的。当然，这些规则在政界和大企业里最有用，因为在那里权力是首要因素；在个人能力而不是压力起主要作用的地方，用处小一些。这些规则有助于在美国的许多诚实的西西里人及其后代子孙在社会阶梯上步步高升。

为了击败敌对组织，西西里血统的犯罪分子重建了他们在故国所属的那种非法集团，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使它们立于不败之地。一个被判有罪的美籍匪徒约瑟夫·瓦拉基有一次对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和二十世纪电视观众讲述了西西里的乡村生活情况，这种情况也许和地中海文明一样古老；还讲了荷马史诗中的国王和英雄们决定事情时的指导原则，使二十世纪的电视观众们听得毛骨悚然。他耐心地指出，一个孤立的人在美国下层社会中注定完蛋；他必须附属于一个家族，或者是他自己的家族，或者是接受他加入的家族；若干家族结成大的集团，集团结成同盟，同盟结成名为“我们的事业”的松散联合体，按不成文法行事。当他说话的时候，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出示了仔细绘制的“我们的事业”各家族的联络图。瓦拉基透露，该组织的情况同六十年前唐维托尚未进行改革时在西西里的情况差不多。它仍然需要大事残杀才能保持极不稳定的和平，并决定谁是一把手。他还透露，在美国的西西里人犯罪分子已抛弃了他们祖先的封建旗号，不再自称首先关

285 心为被压迫者伸张农民的正义了。他们关心的是美元，并且通过开妓院，贩毒品等活动来赚钱，这是老辈人所不耻的。

他对事物的看法是片面的。这好比是一个步兵下士看拿破仑的全部事业。在黑手党内，战争也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瓦拉基对领导人之间的长期谈判，对他们所设想的计划，对他们的停战协定和他们不经流血而取得的成功都毫无所知。他只知道战争爆发时发生的事情，只知道枪手出动，叛变的小宗派必须予以消灭。他并不知道，“我们的事业”的真正胜利是不声不响的，金钱和和平平地源源而来。事实上，领袖们越来越抛弃犯罪活动，设法渗透进或多或少合法的买卖（如赌博）或某些真正合法的买卖，他们在这些买卖中取得垄断地位。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垄断正是表明昔日的故技在起作用。谁也不敢跟他们竞争，因为他

们能够用很多方法摧毁竞争对手，必要时，可以把他消灭掉。瓦拉基从来没有和这样的人见过面。甚至联邦调查局也不完全知道他们的名字。即使知道了，也抓不住什么把柄。他们住在远离他们活动的地方，不管是合法活动还是非法活动。他们与一两个代理人联系，控制一大片地区，作现金交易，从来不用电话，很少外出旅行，对慈善事业捐钱，私生活无懈可击。

* * *

无可否认，西西里西部的黑手党基本上是个犯罪组织，给人民造成很大苦难，使得大多数人过着屈辱、悲惨、贫穷、饥饿、恐怖的粗劣生活。黑手党反对并阻挠几乎一切可能的进步。那些幕后人物可以随意阻挠别人的一切活动，一句话就能使他遭到毁灭，因而也就没有人愿意拿钱来投资以改进什么事业了。只有和“朋友们”达成协议的“受尊敬的人”才敢这样做；并且必须付出代价。一旦这些人得到有权势的朋友和同谋者的巨大网络的支持，286那么，即使是无私无畏的政治家也不能战胜这些冷酷无情的对手。

然而，黑手党不只是这样。如果它仅仅是个犯罪组织，仅仅从事于为了金钱而抢劫杀人的活动，就会引起社会谴责的浪潮，就可能遭到反对和摧毁。实际上，黑手党也是一种自发的产物，是人民经过许多世纪的邪恶统治自己发展起来的，目的是想实现一种古风的粗陋的公正，因此黑手党也是维持和平、确保居民安全的一种方式，是合法政府的代用品。国家要想打败它，首先应使法律至高无上，应使西西里人感觉到，信任警察是安全的。现在的情况却是，警察不能保证任何人消灾免难，而“朋友们”却能够保证，还可以给与说不尽的好处。

目前情况空前恶化。黑手党正在迅速腐化堕落。它是毁坏一切健康组织的癌，它是在全意大利流行的较轻疾病的恶化的癌变形式。生活的技巧，以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技巧，以个人的

美德来弥补国家的缺陷的技巧，到头来腐蚀了一切形式的健全政府，妨碍一切合法机关履行职责，使得在政府机构内部纠正缺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十五章 福尔诺沃战役 及其后果

287

查理八世的士兵发现他们来到一块美丽的国土。这是什么地方呢？这里的王公贵族一方面笑容可掬，同时却在下毒害人；这里的茂盛草地隐藏着寒热病；这里的贵妇淑女的嘴唇上带着瘟疫毒菌。在法国官兵看来，意大利已经显得象个光彩夺目的迷人的西尔斯^①，她淡抹浓装，风流四溢，令人魂销。她把那些沉溺于美色的牺牲品藏在芳香的树丛后面，她把那勾引男人的象牙床建筑在受害者的累累白骨之上。然而，她实在太美了。士兵们可能停下一会儿，怀着思乡之情回首眺望已经越过的阿尔卑斯山，但是，他们感到已经无法抗拒她的微笑了。他们必须通过这充满妖气的花园向前进军，走起路来也得小心警惕，拔剑在手，并且象中世纪传说中的英雄奥兰多来到莫尔加纳花园的时候那样，在头盔里塞满玫瑰花，以免太清楚地听见那迷人女妖的歌声。意大利就这样开始了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为北方人民所扮演的角色。《意大利的白色魔鬼》是韦伯斯特的最佳悲剧之一的题名。这个白色魔鬼是罪恶和死亡的女儿。她容光焕发，手里拿着辨别善恶之树的果实，引诱各民族去吞食。意大利就是这样打动了十六世纪人们的幻想。她是阴柔，

① 西尔斯(Circe)，《奥赛罗》中的女妖，引诱男人的女人。——译者

而他们是阳刚；但是，她能教导他们，而他们能够学习。
她给他们欢乐，而他们给她带来了暴力。

J. A. 西蒙兹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一四九二年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分水岭之一。在那一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罗德里哥·博尔贾红衣主教被选为教皇，称为亚历山大六世；西班牙通过征服格拉纳达而达到全国统一，并且把她尚未耗尽的力量指向国外；伟大的洛伦佐·德梅迪奇去世。对意大利来说，这些全都是无可挽救的灾难。发现美洲（几年后便打开了印度洋航道）使世界贸易转入新渠道；亚历山大六世使得德国的宗教改革和英国的教会分立不可避免；西班牙的巩固为西班牙国王、奥地利大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统治欧洲铺平了道路；洛伦佐的死，使他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均势联盟遭到摧毁，这个联盟曾使意大利保持和平和安全，免遭外国的进攻。

在这同一年，刚达到法定年龄的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接待了来自意大利的密使。密使是米兰国君卢多维科·莫罗派遣的。卢多维科是个奸诈人物，他想在这个没有经验的法国年青国王身上试一试意大利政治生活中一个长期使用的策略，即邀请一个外国君王到意大利来打击自己的敌人。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卢多维科当时的敌人就是那不勒斯国王。密使建议查理八世征服那不勒斯，并答应为他的远征出钱，保证他在南进时自由通过北意大利。之所以选中查理，是因为他对那不勒斯的王位有微弱的要求权。（其实，所有的国王对一切王位都可以说有微弱的要求权，譬如说，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对斯图亚特王朝的王位就有含含糊糊的要求权，并且在正式文件中，一直都自称为“塞浦路斯和耶路撒冷国王”。）米兰密使根本没有奢望他们的荒谬

而危险的建议会得到全心全意的欢迎。法国国王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他究竟为什么要为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奖品而远离故土，拿他的权力、财产和生命去冒险呢？

西蒙兹庄重地说：“天公常常为了最重要的目的而俯允利用一些傻瓜或傀儡，对所利用的这块行尸走肉加以特殊保护，让各族人民为他祈祷，对他寄以热望。查理八世就是这样一个傀儡。”圭恰迪尼是这样描绘他的：“他从婴儿时期起就体质虚弱，经常生病；他的身材矮小，面貌丑陋，只是眼神有点威严和气派。他的四肢极不匀称，看起来简直不大象人，倒象个妖怪。他不仅对文学艺术毫无所知，而且几乎不识字。虽然他渴望进行统治，但他生来就不是干这一行的材料。因为，即使在侍从的簇拥之下，他也对他们行使不了权威，保持不了尊严。”这个愚昧面畸形的国王通常是谄媚者和顾问们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用圭恰迪尼的话来说，这些人“大部分是出身卑贱，奴颜婢膝的”。289

查理没有当面嘲笑密使们，没有把他们的建议作为一个致命的圈套而加以拒绝，也没有把他们送进监狱里去。他用心倾听他们的话。事实上，他越思量越喜欢这个主意。因为这个主意符合他年青时读荒诞的传奇故事所引起的旧梦。他要打败异教徒，征服君士坦丁堡，戴上东罗马帝国的皇冠。要做这件事，他可以利用那不勒斯，利用它的军队、舰队、财富和港口。当然他首先想的是法兰西。这个国家动荡不安，军队虚弱，国库空虚，外国敌人威胁着各方边境。查理在他开始他那远征意大利的冒险事业之前，用卢多维科的钱向英国买得和平；以割让几个重要的省份来安抚马克西米连皇帝；把比利牛斯山上一些法国国防重地，给予西班牙的费迪南（那不勒斯国王的亲戚），作为使他保持中立的报酬。一当他已使他的国家处于毫无防卫的境地，他又着手把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子都带出国去。他召集了新的队伍，把给养和船舶

集中在热那亚和马赛两个港口，并且开始南下向里昂进军。这是一四九四年。圭恰迪尼说，“这是意大利最不幸的一年，是意大利灾难年代的第一年。”

在意大利，人们不安地密切注视着即将到来的入侵。只有少数几个人认为查理是发了疯，是在招致灾难，说他把交通线拉得太长，会遭到危险。一旦他深入意大利，他回法国去的路就容易被切断，军队容易被摧毁。许多人准备迎接法国人。在佛罗伦萨，修道士萨沃纳罗拉鬼使神差而又大错特错地宣扬查理，说他是上帝290 的鞭子，被指派来振兴教会，净化精神生活的源泉。很多意大利人象对待历次接踵而至的入侵一样，竭力使自己相信，外国入侵者实际上是来使他们摆脱恶劣的政府和不老实的统治者，建立起模范政权，本地知名人士最终将在其中占居主要地位。大多数意大利人则感到害怕。他们一想到即将到来的“蛮族”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便不寒而栗。他们承认，无论什么大祸临头，他们都是活该倒霉。在卢多维科·莫罗的许多同胞看来，他所做的可以说只不过是吹一口气使长期摇摇欲坠的雪崩倒了下来。

意大利的诸侯在那不勒斯国王率领下，急忙开始紧张的外交活动以组成防御联盟。他们互相访问、亲吻、交换特使、传递信函、赠送礼物和骑士勋章。他们庄严宣誓，无论天崩地裂，都忠于联盟，始终不渝。他们拟订了卓越的军事计划 and 政治计划。他们看起来充满了信心。意大利有最优秀的将军；金钱、军队、给养、武器都比法国多。军事艺术对意大利人来说没有什么秘密。此外，他们是在本国土地上打仗，靠近给养，每一寸土地都很熟悉。他们统筹安排，把士兵分片布置在战略要地上，在那里可以给敌人造成最大的创伤。尽管在纸面上，有利条件都在他们一边，他们仍然感到不放心。除了那不勒斯国王之外，最害怕的就是教皇亚历山大：他耽心如果召开主教会议，可能要把他从教皇宝座

上撵下来。这个宝座是他通过买卖圣职买来的。他的恐惧之心如此强烈，以致他甚至向土耳其的苏丹派去大使，哀求苏丹帮助他对抗一个最能代表基督教的国王。但是，苏丹巴亚泽特二世离得太远，工作太忙，爱莫能助。

防御计划如果坚持下去，本来是容易成功的。但是，执行一个庞大的计划，欲求有效，必须取得绝对的意见一致，而这种意见一致在任何联盟中总是难以维持始终的，在意大利人当中，更是不可能。实际的情况发展，完全不是象计划所设想的那样。当然，有些领袖很勇敢，但是，光靠他们也无能为力。有些领袖简直 291 是荒唐可笑。许多人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一百多年以来，许多战争都是不流血的，打仗如同阅兵游行一样，胜负主要是靠贿赂决定的，法国人只不过会比意大利人稍微难对付一点。另一些人则小心翼翼。他们推想：如果查理终于打赢了，并且决定惩罚那些曾英勇地对他作战的人，怎么办？谁也说不清蛮族将要干什么。那么——这些聪明人想——两边押宝，脚踩两支船不是更好些吗？他们不得不考虑到他们的家庭。于是，许多诸侯一面故意慢慢吞吞地、毫无热情地执行命令，一面又偷偷摸摸地向法国兵营派去密使，或者和法国的朝臣交朋友、拉关系。

查理八世率领三千六百名刀斧手（法国骑士团的精华）、六千名布列塔尼弓箭手、六千名石弩手、八千名加斯康步兵、八千名瑞士和德国雇佣兵，于一四九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离开多芬内省的维埃纳。他一箭未发便从蒙特热内弗尔山口跨过阿尔卑斯山，安全地到达山下平原，于九月十九日进入阿斯蒂城。即使是今天，在和平时期，在良好的公路上，无论是步行还是骑马，轻装快走，也不能比这次行军走得更快了。由于查理的走运，无论是皮埃蒙特还是蒙特费拉特（他经过的头两个意大利诸侯国）都没有起来妨碍他。这两个诸侯国在位的国君当时还是小孩：萨伏依公爵十

二岁；蒙特费拉特侯爵十四岁。他们的母亲和监护人为了避免麻烦，很快就同法国人达成协议，允许他们自由过境。

从那以后，到那不勒斯只不过是一次闲庭信步。那不勒斯的舰队起航太晚，未能在热那亚实现预期的起义，以阻止法国给养登陆。派往北边去的那不勒斯军队，没有走出亚得利亚海边的切泽纳。其他盟国军队由于必须停下来打一些小仗和制止兵变而遭到阻滞、削弱和分散。威尼斯坐山观虎斗，想等别人全都精疲力尽的时候，它站在胜利者一边进行干涉。佛罗伦萨的皮耶罗·德梅迪奇控制着亚平宁的各个关口，本来可以不太费力就能堵住入侵者（一九四四年冬，已被削弱和击败的德军统帅凯塞林，在这条战线上轻而易举地就堵住了强大的盟军），但是，他快马加鞭，奔赴法国兵营，把他所有山寨的钥匙交给查理，同时拱手交出了萨尔扎纳、皮耶特拉桑塔、比萨和莱戈恩。这一来就使法军不必沿着夹在大海和崇山峻岭之间的狭窄平原杀开一条血路。佛罗伦萨人听到消息，义愤填膺，便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国君。查理于十一月十七日进城时，佛罗伦萨又一次成为自由的共和国。人们向查理欢呼，把他当作解放者。

他周身披挂，骑马来到梅迪奇的宫庭，对显贵们说，他是作为征服者而不是作为客人来到这里的。他要大量的金钱。他总是缺钱，有多少也不够。佛罗伦萨的大臣们拒绝了他的条件。他倔强地坚持。于是，皮耶罗·卡波尼夺过写着这些条件的文书，当着查理的面把它撕得粉碎。具有国王尊严的查理警告他说：“我们要吹起军号。”卡波尼回答说：“我们要敲响警钟。”警钟声一响，每间房子都会变成一个堡垒，各条街道都将用铁链拦起来，成百上千的男人将从各个居民区汹涌而出。查理用一句蹩脚的意大利双关语来掩盖他的失望心情，他说：“Ah, ciappon, ciappon, voi siete un mal ciappon（阉鸡，阉鸡，你是个坏阉

鸡)。”^①这个坏“阉鸡”毕竟没有敲警钟。佛罗伦萨同意付给查理十二万弗罗林，条件是他继续前进，不要停在这里。

查理于一四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达罗马的万民门。下午三点钟法国军队开始入城，到最后一个兵、最后一辆车在耀眼的火炬照耀下鱼贯通过城门时，已是夜里九点钟。人们向他们欢呼，嗓子都嘶哑了。他们叫着“法兰西，法兰西”。场面确实壮观。入城队伍中有身材魁梧的德国人和瑞士人，他们头盔上羽翎招展，甲冑上绣有纹饰；法国骑士团身穿镀金铠甲，外罩丝绸斗篷；国王的苏格兰人卫队身穿格子花呢制服，令人感到新奇；德国雇佣兵手执镰刀似的大戟，令人望而生畏。人们欢呼雀跃，还因为他们希望教皇和他的全家很快就要完蛋。亚历山大六世深谋远虑地在圣安杰洛城堡闭门家中坐。征服者会怎样对待他呢？查理身边有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红衣主教和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红衣主教(他后来成了教皇朱利叶斯二世)，他们敦促查理召开主教会议。但是，国王信任的朝臣之一，一个叫布里孔内特的人，设法扭转了罗马、博尔贾家族、教会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命运。布里孔内特是国王的银匠的女婿，有五个孩子。他由于某种原因急于想当红衣主教。他劝说查理，叫他与教皇和解。

国王放弃了召开主教会议的打算，以换取金钱和几个城堡，并为布里孔内特换来一顶主教的红帽子，把教皇的儿子切萨雷和土耳其苏丹的弟弟德耶姆作为人质。(德耶姆怎样会刚好在罗马城里的呢？这说来话长。苏丹要把他弟弟弄死，但是奇怪得很，他不想杀他，或者不想在君士坦丁堡杀他。他把他送到教皇那里，以每年四万金币的养老金把他养起来。但有一项秘密谅解：要很快把德耶姆干掉。谁也不愿看到每年付四万金币的客人死掉。这

^① 意语ciappon=cappona，意为阉鸡，发音与capo(首领)相近，故为双关语。
——译者

位穆斯林亲王就暂时寄寓在罗马宫廷里，身体非常健康，而这个宫廷里每周都有许多朝臣和王室成员被杀身死。然而，德耶姆终于还是死了，也许是在他成为查理的座上客以后被毒死的。据认为，亚历山大宁愿对苏丹守信用而不是对法国国王守信用。）

查理在罗马停留了一个月之后，受到那不勒斯人的欢迎、欢呼和盛宴款待。那不勒斯人总是为更换主子而高兴。查理和在别的地方一样，沉浸在欢乐中；他尽情享受跳舞、比武、家宴、国宴之乐趣，尽情享受全城最美丽、最热情、出身最高贵的淑女们的爱情。不久，查理开始惹起人民的厌烦和恼怒。他装腔作势，招人反感。他勒索大量贡物，把王国一切肥缺、头衔、封地分给他的扈从。

五月十七日，他大出洋相，排演了一场示威游行，想为他这次远征的胜利锦上添花。他打扮得象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皇袍玉带都是他为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加冕典礼而设计好的。他一手执顶上有十字架的圆球（象征王位），一手执君王节杖，头戴大皇冠。（所有的那不勒斯人都知道，这种过早的表演带来的是厄运。譬如说，几个世纪之后，墨索里尼用飞机把他心爱的白马空运到北非，准备作为征服者进入亚历山大港。结果怎么样？他永远也没有进入亚历山大港，失去了北非，勉强把白马活着运回来。）在这场兆头不好的表演后几天，消息传来，意大利人背着查理组成了一个同盟，正在积极准备切断他的退路，并且要搞垮他。那不勒斯显然正在变成一个陷阱。他决定赶快回国，来的时候有多快，回国也要同样快。

意大利的爱国者眼看祖国遭受蹂躏和侮辱而深感痛苦。他们深知，如果对法国国王的胆大妄为不给与严厉惩罚，随之而来的会是什么。这一次他们总算是使大多数诸侯、教皇、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同意把军队集合起来，向法国挑战。胆子大的人们

公开谈论“意大利的抗战”，保卫“意大利的自由”，好象“意大利”这个国家当真存在似的，而不是象圣约翰的最高骑士军团那样，始终严格地只把这个国家叫做“意大利语言”。不过在意大利，爱国心很少成为主要的推动力。同盟的大多数成员不单为了爱国而加入同盟，而是因为在当时加入同盟看来好象安全些，或者危险少些。在这个节骨眼上，支持法国国王或者以保持中立来帮助他，显然都是危险的。法国国王已智穷才尽，他的命运可能也到头了。实际上在意大利这个狭窄半岛的死胡同里，他能从那不勒斯往哪儿去呢？他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人了；他的行为举止不象一个胜利的征服者了。他的决定越来越反复无常。他剩下的钱也不多了。他的军队疲惫不堪，心怀不满，大批死于梅毒（这是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回来的致命的新疾病，法国人在那不勒斯碰上了）。谈 295
谐的亚历山大·博尔贾曾说过，法国人用粉笔和木马刺征服了意大利，因为他们踏着拖鞋，骑着大马，不带武器，传令兵先去号房子，好让他们在最舒服的人家过夜。显然，他们征战的成就，就象他们留在身后的粉笔记号一样，轻轻就抹掉了。一四九五年加入同盟显然是明智的。

* * *

意大利同盟军于一四九五年七月六日与法国人在北意大利福尔诺沃村附近遭遇。福尔诺沃在塔罗河畔，萨尔察纳和帕尔马之间，亚平宁山奇萨山口北端。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迎战法国人，是因为法国人去那不勒斯时曾经走过这地方，人们认为，他们在回国途中一定会再一次经过这里。沿河岸的道路在巉岩峭壁的隘谷中蜿蜒几英里之后，在福尔诺沃附近开始变得挺直，并且缓慢倾斜下降到山下平原。河的上游，河谷凹地是设置埋伏的好地方；河的下游，宽阔平坦，足供骑兵机动、步兵展开。然而它的窄度又足以把所有军事行动压缩在限定的战场上。

法国人约有九千五百名战斗员，其中大部分因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食物不足，疾病缠身，体质虚弱。他们害怕短兵相接（他们凭经验知道，他们的处境是危急的），情绪非常沮丧，因为他们不得不放弃征服的土地而没有任何体面的理由。战斗没进行多久，就失去了旧日那种战斗热情。他们的对方人数约为三万，个个精神饱满，武器精良，装备齐全，满怀胜利的信心。他们当中在意大利出生的人（占绝大多数）知道他们是为了祖国，在他们的宗邦故土上，对侮辱了他们大家的劣势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玉碎瓦全的殊死决战。指挥这次战斗的是当时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曼图亚的侯爵弗朗切斯科·冈扎加；他周围还有他家族的人和几个训练有素、忠实可靠的雇佣兵队长。是冈扎加选择了这个地点和这个时机。他制定了一个巧妙的、显然立于不败之地的战斗计划。

法国人知道他们随时都可能与敌人遭遇。那天早上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着。他们准备象通常那样正面迎敌，因为中世纪的军事技术认为，正面进攻是有教养的人唯一高尚的形式。他们把行囊、给养、装备、辎重包括王家的金银财宝（五六千匹满驼满载的骡马队）送到与大路平行的山上去，以免在战斗时成为拖累。他们布置了三百五十名全副武装的骑士打前锋，这些骑士是法兰西骑士团剩下的精华，随后跟着三千名瑞士步兵，按他们的传统队形，成实心方阵并肩前进，锋利的长矛如丛如林。其余的军队由查理亲自率领，按规定的间隔殿其后。预计以法国骑士去打乱意大利人的阵式，以强壮的瑞士步兵去冲散意大利的人员，以国王卫队的苏格兰弓箭手和法国石弩手去大量杀伤意大利人马，最后，作为后卫的三百名法国刀斧手则给与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冈扎加十分机灵，并不按法国人所设想的那样去做。当然，正面进攻也许可能使他确保胜利，因为他拥有人数上的优势，但

是，正面进攻要付出沉重的人员伤亡的代价。他宁愿采取另一种计划，这计划有些不同寻常。利德尔·哈特上尉称之为“迂回逼近”，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常胜将军都使用过这种战术。也正是为了实行这个战术，这位意大利司令官在河谷有活动余地的开阔地带陈兵以待。他的计划是这样：当法国人在塔罗河左岸沿着大路小心翼翼地排成队形鱼贯前进时，意大利人按预计要以轻骑部队反复进击，牵制住敌人的前锋。与此同时，弗朗切斯科·冈扎加本人和他最优秀的雇佣兵队长贝尔纳迪诺·福尔泰布拉乔（他的名字刚好有“铁臂”之意）所领导的两个重骑兵分队，将出敌不意，神速地进入对岸（即右岸），并且同时在两个地点涉水过河，攻击法国人的侧翼，使敌人惊惶失措，打乱他们的队形，把他们逼到山腰，切断其纵队，然后各个击破，分片杀戮。可惜形势没有完全象所计划的那样发展。实际发生的情况如下。

法国前锋部队至少在一个短时间被斯特拉迪奥蒂^①牵制住了。斯特拉迪奥蒂只以短弯刀为武器，并不打算持久地对付重骑兵和瑞士人。他们得到的命令只是骚扰敌人，并且迅速退出战斗。他们给与冈扎加和福尔泰布拉乔运动队伍、进行包围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是，那天反常的大雨提高了河水的水位，涉水过河已不可能。冈扎加试图在他原来设想的过河地点过河，都没成功，损失了不少人马。这些人马受到钢盔铁甲的拖累，游不了水，被汹涌的河水席卷而去。他几次执拗地打算涉水过河，这占去了些宝贵的时间。最后他决定再一次到更上游去试一试。上游河床窄些，河水浅些，但是水流更急。

他的困难很快就使他的计划暴露在法国人面前。法国人看见了他们对侧翼的威胁，转而面向侧翼，准备对付进攻。冈扎加的

① 斯特拉迪奥蒂（Stradioti）是威尼斯招募来在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训练的快速轻骑兵，用来对付土耳其快速轻骑兵的越境袭击。——原注

人有不少终于设法到达右岸，但是，他们是与福尔泰布拉乔的人在同一个地点过河的。结果，两个分队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其后，他们又发现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一条给磨房供水的泥岸陡峭粘滑的深沟。又损失了一些人马，又浪费了一些宝贵的时间。这时，法国人重整队形，充分利用意大利人的困难，向他们发起了攻击。法国人远离家乡，后退无路，为了活命只有决一死战。

几分钟之内，战斗变成了一场近距离混战的大屠杀。这是两百年间在意大利所看到最血腥的一次战役。长矛断了，用短刀和
298 枪头乱砍乱扎。冈扎加和福尔泰布拉乔的分队所剩下的人马一再发起冲锋，狂喊着“杀呀，杀呀！”和“意大利”“意大利”。大地上很快就密密麻麻地铺盖着已死的和垂死的人和马。失去坐骑的骑士徒步进行战斗。在混战中，冈扎加忽然看见了查理，他带领一小队人马战得正酣（查理是在比武中训练出来的勇敢善战的战士）。少数意大利人重整旗鼓，再一次发起进攻。这本来有可能扭转局面。冈扎加知道这一点。但在他就要抓住或杀死法国国王的时候，他的马受了伤，他摔下马来。在这之前几分钟，福尔泰布拉乔被杀死了。查理得救了。冈扎加所剩下的实际上就是他自己了。他徒步奔走，尽其所能，也仅仅是保住自己的命。

最后结局是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混乱透顶了。当夜色来临时，查理带着剩下的军队溜走了。他飞快地到达阿斯蒂，翻过阿尔卑斯山，没有人追赶他。战场上留下四千具尸体，其中三分之二是意大利人。

福尔诺沃战役是意大利历史的转折点。战争败绩的长远后果时至今日仍然还感觉得到。如果意大利人战胜了，那么他们也许在那时就已发现了作为团结一致的人民的骄傲和产生于保卫共同

的自由和独立的自信；意大利就会作为一个理应受到尊重的国家而出现，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喜欢冒险的外国人要进攻它也得三思而后行。由于害怕遭到毁灭，没有人会敢于轻易跨越阿尔卑斯山。这就会阻止欧洲列强无休止地为意大利的政局而争吵，阻止他们为了缓和各个王朝间的抗衡、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而瓜分栖息着勤劳而无防御的人民的意大利土地。意大利历史、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也许会驶向与今天不同的方向。意大利的民族性格也会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爱国者的声音便不会遭到嘲弄而会受到洗耳恭听。当统一和独立在十九世纪终于到来时，旧习惯已根深蒂固，不能轻易改变了。根据德孔米内斯的记录，福尔诺沃的战斗本身持续了一刻钟，追杀溃败的意大利人用了三刻钟。因此，意大利几个世纪的命运在十五分钟内就输掉了。

意大利人为什么在福尔诺沃一战中失利呢？当然不是由于他们怯懦。这是他们能够理解的一次战斗，是反对深恶痛绝的外国敌人、保卫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荣誉的一次战役，他们在战斗中始终英勇顽强。有利的条件在他们一边。当时所有的报告都一致认为，参加战斗的人都表现得与法国人一样英勇，即使在他们认识到一切希望都已化成泡影之后，他们仍然英勇地面对死亡。这次战役失败，另有别的原因；历史学家们分析这些原因，永远不厌其烦。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天意。查理从他离开法国起，他就一直很幸运，就跟一个小孩或一个醉汉那样幸运。他无数次地侥幸通过了可怕的危险而自己还不知道。他的军队可能由于许多原因中的任何一个面遭到阻挡、杀伐、摧毁，如阿尔卑斯山间的雪崩、一支意大利队伍及时赶到隘口、一个堡垒的抵抗、一些爱国农民的起义，等等。他的幸运实在令人吃惊，以致许多人认为（圭恰迪尼也认为），这次远征得到天神的支持和指引。“Dieu mont-

rait conduire l'entreprise.”（“看来是上帝在领导这次冒险事业。”）这句话，在德孔米内斯的《回忆录》里反复出现许多次。他作为政治顾问，一直陪伴在国王身边。在意大利，七月份是从来不下雨的。在这个月，农村土地焦干，田地象城里街道一样硬，泉水干涸，牲口瘦得皮包骨，大河水落变成小溪流。战斗进行那天，塔罗河河水暴涨，水流喘急。通常在冬天只有几个星期才有这种情况。冈扎加的计划取决于在两个地点同时迅速过河，这计划显然由于查理的幸运和天气而遭失败。大地软绵绵、滑腻腻，
300 不利于一切重骑兵活动，但是，与防守的骑兵相比，对进攻的骑兵更为不利。

意大利的复杂计划，大胆的标准立异，无疑也是造成这次灾难性结局的一个原因。冈扎加选择这个下游的不利地形，也因为他可以更好地部署和调动他的人马，充分利用他在人数上和精神上对法国的优势。然而，他忘记了，在他所设想的那个类型的战役中，为了在野外执行他的策略，并且可能要改变计划以应付意想不到的事变，首先，他手中必需有一个驯服的工具，有一支本国人的军队，乐意服从命令，在必要时能见机行事，灵活运动。而他所有的军队则恰恰相反，是为了这次遭遇战而匆匆拼凑起来的一些小分队的大杂烩。他们的训练方式、战斗经历、武器装备、可靠程度各不相同。当情况发展不妙时，各分队各行其是：有些人冲向激战的漩涡，当场战死，有些人落荒而逃，有些人趁机掳掠战利品，有些人耐心等待着告诉他们下一步怎么办，或者坐山观虎斗，看谁将取胜。牺牲了生命的人无疑是很多的。举一个连队来说，由杰罗拉莫·杰诺瓦指挥的威尼斯步兵连就尽到了他们的责任：哪里战斗激烈，他们就冲向那里。他们三百人中损失了二百人。另一方面，卢多维科·莫罗的米兰小分队，由于没有得到命令，但是也许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没有努力作战。

但是，即使同盟军是统一的、驯顺的、有纪律的工具，冈扎加也没有妥善利用。他设计了一场现代战役，但象个中世纪的旧式领导人那样直接参加战斗。他投身于激战之中，一再领着人马发起冲锋，“不胜利勿宁死”。然而，他本应该安全地留在一边，立于小丘上，冷静地观察事态发展，作出可以挽救这次战斗的唯一决定：在适当时机，把后备队派到能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他未能做到这一点。他在大部分时间是孤独一人，只和他周围的少数几个人联系，太忙于保全他自己的生命和砍杀法国人，而不能通盘考虑整个战役。他没有能够修改他早先发布的命令，修改他的计划。 301

当代的史学家认为，斯特拉迪奥蒂的叛变是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除了大雨的影响之外，这是意大利历史学家们特别喜欢的解释，因为它减轻了民族自豪感受到的伤害。在斯特拉迪奥蒂停止骚扰敌人的先头部队之后，到哪儿去了呢？他们从视界中消失了。他们看见山上驮着法国辎重的一长队骡马，便跑去追捕它们。在这关键时刻，如果有一个精力充沛的小分队赶到，就可能赢得这次战役，而斯特拉迪奥蒂掳掠战利品去了：战利品价值三十万金币，包括国王的头盔、上锋宝剑、印玺、部分文件、多芬（法国王太子）的肖像、可移动的祭坛和几件神圣的遗物。

斯特拉迪奥蒂的指挥官杜奥多在战斗结束后立刻遭到逮捕、审判和降级处分。他干练地为自己辩护；在进行审讯时，他首先指出，冈扎加不应消失在战斗中，而应在一旁坚守岗位，控制后备队。不要忘了，斯特拉迪奥蒂就是斯特拉迪奥蒂，它是非正规部队，只受过一种战术训练，即对敌人的兵营、车队、骑兵进行神速的“打了就跑”的袭击。这种战术的主要目标始终在于敌人的金银财宝，包括女人、奴隶和牲畜。斯特拉迪奥蒂根据他们的本性，做了他们一向所做的事情。由于他们是外国人，是雇佣兵，

为威尼斯效劳是为了金钱，为了分得战利品。总之，他们在感情上对战争的最后结果并不关心。你还希望他们做些别的什么呢？

也许意大利人失败于他们的美德和恶习。他们联合得太晚；他们应该在前一年对查理开战，应该在他来的时候就打他而不是在他回去的时候才打他。他们浪费了十二个月的宝贵时间来玩弄外交策略和巧妙的诡计。当他们最后拿定主意、下定决心要打垮法国人的时候，他们只能匆匆忙忙、七拼八凑、漫无计划地拉起一支部队。部队到达福尔诺沃已差不多是与敌人遭遇的前夕，对冈扎加来说是太晚了，来不及考虑在山里伏击查理。更多的人马到达得更晚，有的是在战斗结束后几天才赶到。决定在开阔的河谷作战也受到意大利式的非军事动机的影响。弗朗切斯科承认，他尽量不远离帕尔马；他不信任帕尔马，害怕帕尔马人抄他的后路。

最后，冈扎加个人的美德和恶习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他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将领，但是，并不如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优秀。他设计的战斗也是为了表现他自己的勇敢。最近意大利专家皮耶罗·皮耶里给他的计划下了个定义，叫做“一个搞糟了的最好的战术”。这位侯爷显然有一支眼睛钉在他自己个人的地位提高上。他为意大利人一种根深蒂固的野心所惑，想趁民族危机使自己成为伟大的历史人物，为群众所欢呼，流芳百世。为了这一点，他不能站在一旁，眼看别人去战斗。他需要表现他自己的英勇，他的家族的英勇，他的曼图亚刀斧手的英勇。他们全都英勇奋战，大部分战死了。最后，在弗朗切斯科看来，他已赢得了胜利。他不是已经占有了这块倾斜的台地吗？他不是俘获了敌人的金银财宝了吗？他不是已迫使法国国王逃跑了吗？他回到曼图亚，建造了一座教堂来感谢上帝，称之为“胜利教堂”，并且铸了一块金质奖牌，镌刻着“纪念意大利重获自由”的字样。请注意“意大利”这个词，它说明同代人是多么清楚地意识到这次战役的民族意义。

然而，其他人都知道，意大利人输掉了这个战役，输掉了这场战争和意大利的自由。

查理八世的远征，可以与十九世纪英国对中华帝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相比。那次远征也是平淡无奇的，就这事件本身来说，它并不重要，但是，它对不可预料的事件引起了连锁反应，并且为长期的外国干涉、流血冲突、内战和起义开辟了道路。英国人（和查理八世的法国人一样）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无能，外国人可以毫无危险地在那里掳掠大批战利品；让全世界看到了这个高度文明的人民的消极无为的软弱性：他们不能紧密团结成一个有内聚力的集体，发挥集体的作用；他们甘心听任粗暴的、残忍的、铁石心肝的侵略者的摆布。以过去的成就而自豪的意大利和中国两个伟大民族所遭受的毁灭和屈辱，燃起了民族主义烈焰，燃起了隐藏在心底的仇外怒火，这些外国人在文化、艺术、处世方式上都不如本国人。如果没有这种仇外心理，就不容易解释随后发生的许多事件。对外国人的憎恨有时爆发为猛烈的流血反抗，随后又是一段时期的因循苟安、奴性十足的屈从。所有这一切的后果一直影响到今天。法西斯主义和义和团起义，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和共产主义在意大利的巩固，全都有许多根源，有些根源在于遥远的、半遗忘的败绩和复仇的愿望。

然而欧洲列强带给中国的，是基于昌明的科学、严密的组织、现代的武器的完全不同的文化；带给意大利的则是共同文化中较为落后但仍然可以辨认的形态。弗朗切斯科·冈扎加无疑是比查理高明的将领。可是外国人在战场上的决心、勇气和纪律性，是自发的，是能够团结在他们的领袖周围的人的美德。法国人和在他们之后的所有其他入侵者所使用的武器和策略，都是意大利发现和完善的，这一点使得意大利人的耻辱更为深重。鸦片战争导

致一个老朽帝国的最终崩溃，导致一个古老文化的终结，那个文化未曾创造出保卫自己的手段。与此相反，欧洲人对意大利的侵略，虽然摧毁了她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但却激励意大利人在给他们留有活动余地的领域里作更大的努力，在那些领域里，他们是没有匹敌的。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他们就在艺术和新兴科学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只是到后来才逐渐衰落了。

304 福尔诺沃战役后发生的事情是复杂的，悲剧性的。连老牌《大英百科全书》也为必须向读者阐明后来发生的事件而叫苦不迭，最后还是放弃了。它的第十一版（剑桥，一九一一年版，第XV卷，第41页）悲叹地说：“在这里探索那个时期的复杂的阴谋诡计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一四九五年以后的三十多个年头里，欧洲一切可用的军队都到过意大利。奥地利人、德国人、勃艮第人、法国人、佛兰芒人、西班牙人、匈牙利人、其他各种各样的人，或越过阿尔卑斯山，或者乘船登陆意大利。连瑞士人也离开他们宁静的幽谷，兴旺的牛羊，来到意大利战场，他们或者在别人旗帜下当雇佣兵，或者打着自己的旗帜，到意大利来捞取好处。瑞士人有一种众所周知的天性，善于掌握时机，稳得好处。各个国家的人轮番地与另一国的人结成永久性同盟，然后又破坏这同盟，另结新同盟，向前进军，然后又向后退却，打仗，媾和，又重新打仗。当人们读到那几十年的详细历史时，有时会头晕脑胀，不由地想起旧日无声喜剧电影，到结尾部分，都是你打我，我打你，象发酒疯似地混战一场。

外国人轮番地胜利、失败，意大利人却总是失败者。情况好的时候，他们也必须为各种人供应食品、饲料和住所，成袋的金币。情况好的时候不多。大多数时候情况都很糟，人民遭屠杀，财产遭抢劫，妇女遭强奸，田园遭蹂躏，农舍遭拆毁，仓库遭洗

劫，酒桶被射穿，教堂遭亵渎，牛羊遭屠宰，美丽的城市被洗劫一空、夷为平地、化为灰烬。一群群到处抢劫掳掠的散兵游勇，逃兵叛卒，欧洲社会的渣滓在农村到处游荡。饥饿和鼠疫象燎原野火一样蔓延。意大利人不是在本乡本镇被杀死在家里，就是被杀死在各个战场上。那怕是一次小小的战斗，意大利人也总是牺牲品，有的是因为参加了战争的这一方或那一方，有的则不过是无辜的旁观者，同样都难以幸免。

当地的诸侯和共和国，不能彼此结成自己的军事同盟来保卫他们的国家，经常是加入这个或那个外国人的联盟，以与个人的竞争对手为敌，派遣他们的臣民成群地投入战斗，成群地死于 305 无数的莫名其妙、无足轻重的战争。那些到外国军队里去当雇佣兵的意大利人认为，兵营里的生活比别的任何地方的生活都要好些。福尔诺沃战役以后三十多年，意大利的情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十八个月的情况一样，打着各种旗号的同盟军都在打德国人，法西斯分子打反法西斯分子，城市变成瓦砾，饥饿的儿童到处行乞，妇女为一块面包而卖身，男人被秘密警察放逐出国、严刑折磨、肉体消灭，饥饿、绝望、腐败、疾病到处蔓延。看来谁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结束这种毫无意义的破坏。

在流血动乱三十三年之后，一五二七年，一支帝国新军进军罗马。新军是乱七八糟拼凑的，包括德国雇佣兵、西班牙士兵和意大利雇佣兵。德国雇佣兵是狂热的路德派信徒，招募他们是希望他们对反对教皇会表现出格外的热情。西班牙士兵是狂热的大主教徒。新军由波旁王室的总管率领，他是法国国王的叛徒。和查理五世的全体士兵一样，这些军队都是不发薪饷的，他们靠的是强征暴敛、洗劫城市。一五二七年五月六日，日落前两小时，天大雾，王室总管带着梯子逼近罗马城墙时被杀死。本书努托·切利尼在他的回忆里夸口说，是他用右弩把王室总管射死的。严

肃的历史学家都不相信他的话。总共没有射几箭；没有什么抵抗。爬上城墙，打开城门，征服罗马，只是几小时的事。

罗马听任三万士兵任意奸淫、掳掠、残杀达九个月之久；没有一个有权威的司令官来制止他们。教皇克莱门特七世被囚在圣安杰洛城堡，日夜看见城里四面八方冒出火头，滚滚浓烟翻腾而上；日夜听见妇女们的嚎啕、受酷刑折磨的男人的惨叫，交织着酒醉的士兵们的哄笑和歌声。他喃喃自语地念着圣经里约伯诅咒自己生日的话：“既然没有把我母亲怀孕的门户关闭，也就不会让我的眼睛看不见人世的苦难。”整个欧洲都为这些骇人的传闻而震惊。连续几个月，男人被放在拉肢刑架上，要他们说出藏钱的地方；包括尼姑修女在内的妇女，不管老少贵贱，都遭到成队的谑笑士兵的强奸；无价之宝的艺术珍品横遭破坏或永远散失；高级教士被绑架，勒索赎金，并且让他们身穿贵重的神圣法衣，倒骑在毛驴背上，假扮一副亵渎神圣的丑态，游街示众。教堂里值钱的东西、不值钱的东西全都被抢劫一空；神圣的遗物和书籍跟垃圾和腐烂的死尸一起扔在街上。连死人也遭殃：朱利叶斯二世的坟墓被撬开，干枯的手上的戒指被盗走。天主教徒表现得和新教徒一样恶劣，意大利士兵表现得和外国士兵一样恶劣，罗马平民表现得和征服者一样恶劣。

罗马屠城，这是福尔诺沃战败的长远后果，是使意大利永远也恢复不了元气的大灾难，是在意大利民族性格上留下永远洗雪不掉的瘢痕的大创伤。没有一个意大利人曾怀疑过，灾难产生于意大利人自己的过错。七拼八凑、乌合之众的帝国军队晃晃荡荡地南进时，为什么没有一个领袖有魄力和勇气来制止他们呢？为什么人民不揭竿而起反对外国暴徒呢？

罗马屠城是史无其例的民族耻辱。人们首先会想到一九四〇

年的巴黎陷落，但那次事件实际上也不能与罗马屠城相比拟。第三共和的巴黎也是欧洲最富丽堂皇、最光辉灿烂的城市，许多世纪积累起来的无价财富的宝库，世界的图书馆，最优秀的新旧艺术珍品的收藏处，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的聚集地。但是，巴黎没有遭受毁灭和洗劫；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完整无损。它使征服者感到敬畏。这些野蛮人挤满了博物馆，充斥于音乐厅和法兰西喜剧院。他们虽然折磨活着的法国爱国志士，却尊敬死去的法国文化英雄。罗马则不同，它被洗劫一空，毫无怜惜。它那光荣的过去，它那壮丽的古迹，对它的伟大的美好回忆，充斥于许多宫殿和教堂的艺术杰作，充满图书馆和百宝箱的珍品，都未能保护它，使它少遭一点凌辱。实际上，它的全部优良品质（跟大多数罗马妇女的美貌、有些妇女的美德、少数妇女的高贵一样）使得暴行更加不可阻挡。 307

但是，当时的罗马比一九四〇年的巴黎优越得多。罗马是上帝在地上的宝座，是耶稣基督在其上建立他的教堂的岩石，是广大的精神帝国的中心，直到几年前全体基督徒还一直是这个精神帝国的臣民。伤害罗马的人比犯了一般暴行还更严重：他们犯了不可挽回的渎圣罪。象意大利人那样，眼看着他们神圣的城市遭到玷污而不能扬起一个手指来改变它的厄运，不仅是他们军事上、政治上无能的证明；而是对他们的道德和精神遗产的背叛。罗马城的毁灭和耶路撒冷的毁灭一样，可以说是上帝震怒，惩罚人民的堕落和罪恶的明显标志。这摧毁了他们的灵魂，不可弥补地削弱了他们的自豪感和作为一个民族而生存的意志，因为罗马和耶路撒冷一样，也是民族生存的象征。意大利人没有达到统一，但是，始终觉得他们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不是由国王、士兵和政治家建立的，而是由教士、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建立的。意大利人不顾一切地热爱这个精神上的统一国

家，它的首都就是罗马，但不是台伯河畔石头造的罗马，而是书本上和传说中的精神上的罗马。它曾使但丁、科拉、彼特拉克着迷，还要使以后所有的意大利伟人着迷。罗马是伟大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心爱的每件东西的发源地，没有罗马，意大利人就不能安宁。失去罗马是不可弥补的。

查理五世皇帝在长年战乱之后，成了唯一的胜利者。战斗的喧嚣沉寂了，硝烟散落了。他强加于意大利的是沉重的西班牙统治下的和平。意大利人委曲求全，安于现状，没有办法来反对他。他住在遥远的地方，谁也不能毒死他，谋害他，欺骗他，诱捕他，也不能与外国结成联军去打他。他比任何前人都更为强大：他拥有最大的海军、最大的陆军、最多的同盟者、最多的金银财宝，海外属地十分辽阔，至今还没有给它画出地图。在他的帝国，太阳是永远不落山的。他还于一五三〇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他仁慈地同意由教皇同时加冕为皇帝和意大利国王。意大利国王的金冠被称为“铁冠”，因为据说它那上面有一颗真正的钉死耶稣的十字架的铁钉，那是一件年代久远的古物（它也许原属君士坦丁大帝所有）。这金冠保存在米兰附近蒙扎的大教堂里，是伦巴第的泰奥多琳达王后留在那里的，现在还在那里，很少用过，从来没有挪到远离蒙扎的地方。皇帝的金冠则保存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以前的皇帝（第一个是八〇〇年的查理曼）都在那里加冕或者在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但是，查理没有时间先到蒙扎，然后到罗马去。他轻蔑地说，他不习惯跟着王冠跑，而是要王冠跟着他跑。他命令把皇冠和王冠都带到在罗马和蒙扎中途的博洛尼亚来，并且命令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在那里与他相会。教皇温顺地接受了他的要求。一五二九年七月，皇帝命令安德烈亚·

多里亚到巴塞罗那来迎接他，然后经过十四天的艰苦历程，横渡地中海，在热那亚登陆，向博洛尼亚前进。

教皇和皇帝的这次会晤，是意大利历史上的转折点之一。它以极大的排场和声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教会的精神霸权和西班牙的世俗统治。这次会见仪式在意大利结束了无与伦比的智力焕发和巨大苦难的神奇时代，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这就是屈从于外国统治三百多年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可以说意大利没有自己的历史。

博洛尼亚作了盛大的准备。经过多年的战乱，当然没有钱，人民悲观失望，心怀敌意。人们注意到，在教皇进城时，他的随从高喊“克莱门特教皇万岁！”的口号，居民中没有人响应。教皇和他的宫廷人员全都穿丧服。在罗马遭洗劫后，他们发誓不再刮脸，蓄须不剃，以纪念过去的苦难。然而市政当局和城里贵族还是凑得足够的钱，为皇帝举办了令人难忘的欢迎会。四面八方贵客云集，意大利所有的王公大人全都光临。教皇由最杰出的红衣主教、来自罗马教廷和各主教区的高级教士伴随着。皇帝无论走到哪里，后面都跟随着成群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的宫廷显贵以及英国、法国、苏格兰、匈牙利、波希米亚和葡萄牙的大使。 309

韦罗尼卡·甘巴拉把她的寓所对很多文人开放。人们可以看到诗人本博、毛罗、莫尔扎同情趣横溢的贝尔尼、学识渊博的维达、举止端庄的特里西诺和马尔坎托尼奥·弗拉米尼奥相周旋。保罗·焦维奥和圭恰迪尼也在那里。在罗马被屠城之后，在意大利最富裕的城市被毁灭之后，在三十五年连绵不断的战争之后，意大利仍然还保存下来的文艺复兴的光彩、才智和时尚都集中在欢庆、游乐、社交、盛宴、舞会的夕阳余晖的回光返照中。

弗朗切斯科·马佐拉（人称小帕尔马人）画了一幅查理的

像，前额上有传谣女神与他相伴，大力士神童赫尔克里士正在把地球奉献给他。提香有好几次得到给皇帝画像的荣幸。他的一幅皇帝画像，全副金盔金甲、跨下雪白战马，与真人一般大小。这幅画已经遗失，其余的保存了下来。查理对提香非常满意，亲自替他拾起掉在地上的画笔，封他为骑士，委任他为皇帝的画师，享受固定的年金。

人们观察到，查理和他的随行人员在游览博洛尼亚的街道时，总是穿戴西班牙式的服饰。意大利人穿当时流行的欢快、鲜艳色采的衣服，如红色、绿色、黄色、粉色、蓝色，质料是丝绸、锦缎、天鹅绒、针织品和毛呢。西班牙人穿黑色套服、黑色丝袜、黑靴黑鞋，黑绒帽子插上黑羽毛。珠宝钮扣，查理胸前金羊毛勋章的金链子和吊着的羔羊，在一派黑色中闪闪发光。西班牙人面色苍白，从来没有笑脸。人们仅仅看见查理笑过一回，是
310 冲着一位女士微微一笑，因为那位女士从阳台上向他投去一枝鲜花。要不是由于意大利人迅速抛弃了他们五光十色的漂亮衣服，而采纳征服者的风尚，穿著西班牙的黑色丧服，这样的琐屑小事，本来是不值一提的。看起来好象整个国家都在为遭受外国暴君的奴役，为失去了自由而披麻戴孝。在后来的一代人中，人们愁眉苦脸，面带着与他们的黑袍相一致的悲哀失望的表情，正如我们在肖像画中所看到的那样。有位诗人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他写道：

黑袍适合于我们的时代。

袍子曾经一度是白色，

后来变得多彩多姿，

现在又变得象非洲摩尔人那样黑，

黑得象朔日的夜色，

象沉沉的地狱，

象奸诈的贼心，
象混浊的社会。
无知令人头疼，
恐怖叫人心碎。

勿忘奇耻大辱，
避开鲜艳的颜色。
颜色为我们哀悼，
哀悼郁郁不得志的英雄，
哀悼夜间失去的灵魂，
哀悼我们悲惨的结局
——我们忍受的暴君，
还有诱饵、锁链、子弹和绞索。

不用说读者都知道，黑色也是法西斯政权的官方颜色。墨索里尼从头到脚穿的戴的全是黑色，他的全体部长也是这样，穿戴一身黑。

第十六章 长期持续的 巴洛克风格

意大利的情况犹如那些年老色衰的著名美女，她们在垂暮之年仍不甘心放弃她们的姿态、发型、风骚和时尚。意大利到现在仍然墨守着查理五世加冕以后两个世纪以来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这一点是任何一个企图了解这个混乱国家的任何一点情况的人，企图了解它过去的事件、当前的发展、艺术的流派、政治的演变的人，所必须记住的；也是任何一个意欲探索蒙着迷雾的未来的人所必须记住的。你一定不要上当受骗（意大利的许多东西都是纯粹的假相），你必须看看表层下面的情况，然后你将发现意大利的现实一般说来仍然是巴洛克式的现实。

巴洛克是个神秘的名词。有些学者（其中也包括贝内代托·柯罗齐）认为，这名词来源于一个生造的词（**b-a-r-o-c-o**）。中世纪学者发明这个生造的词来给迟钝的学生教一个特别复杂的逻辑推理形式，确切地说就是教给他们三段论式中的第二格的第四式。另一些人认为，这个词是一种畸形怪状的珍珠的古老名称，这种畸形珍珠现在在意大利仍然叫做巴洛克珍珠。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这个名词渐渐被用来隐约比喻任何一件复杂得莫名其妙、百无一用、变幻莫测、阴阳怪气的东西。类似于极少使用的三段论式或棱角极不规则的珍珠，例如转弯抹角的理论、佶屈聱牙的诗词、华而不实的建筑。后来，巴洛克一词渐渐用来指整个一个历史时期，这就是巴洛克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巴洛克式的人有

巴洛克式的思想，过巴洛克式的生活，周围都是巴洛克风格的艺术。这个时代与我们当前时代有相似之处，而这种相似决非偶然。

在巴洛克时代以前，各种各样东西都是松散的、自发的、舒适的、随便的；到巴洛克时代，各种各样东西在整个欧洲都变得刻板、划一、多少有点不合人性了。专制君主们削平了所有的对 312 手，几乎是无人反抗地进行着统治；大国的国王们广为结盟，朝秦暮楚，好象在玩王朝之间抢座位的缓慢游戏。小诸侯和共和国落得有位无权，不能自主。他们威风扫地，变成了无所作为、无可奈何、有苦难言的陪臣附庸。小型战争的危险减少了，但是，燃起波及全世界的大火的威胁永远存在。中央集权发展了有效统治的工具：法律制定并且执行了；官僚体制强大起来，并且迅速扩大，有档案，表格，礼仪，有权处罚那些不服从的人。约定成俗的一点点自由，达官显贵、同业公会、城镇、大学、宗教团体、各行各业或任何个人所有的特权，只要不唯命是从，都被销磨殆尽。人们在统治者的意志面前，实际上是逆来顺受，毫无办法。

一切未予禁止的经济活动都受到严格控制。国王垄断了主要的必需品，只有他可以向国外出口或从国外进口。为了支持军队和庞大的统治机器，捐税象雨点般地往下派，人民的负担空前沉重。在一切领域都建立了牢固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军队再也不是胡乱挑选的、专门干放火、抢劫、强奸之类的勾当的乌合之众，而是有了组织系统、统一的制服、铁一般的纪律和明确的指挥体系。当局一劳永逸地决定了唯一正确的单词拼写法和语法规则，同样，也决定了一成不变的宫廷礼仪和私生活礼节。城市再也不是人类的需要、感情和爱好的自发的产物，而是国王的建筑师设计的。国王要求有又直又宽的大街，有大的广场。他当然是想使他那伟大、华丽的京城获得巴洛克式的好名声，但也是为了让他的军队有方便的通道去镇压骚乱。什么是美本来是最难捉摸

的，也作了无微不至的规定。宗教生活戒律森严。前一代在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中所进行的激烈争论和反抗销声敛迹了。强迫
313 实行了道德规范，明确规定了教条和原则；礼仪也有了统一的标准。在天主教和新教两个阵营里，正统观念都得到坚定的维护。自由思想家和异端分子在罗马和在日内瓦一样，受到迫害，活活烧死。加泰隆人物理学家兼神学家米圭尔·德塞尔韦图斯在同一个月被巴黎索尔本神学院和加尔文派教徒宣判死刑。

整个社会看起来形成两个层次。在上层有少数几个显贵：在下层有广大衣衫褴褛、形形色色、无权无势的人民大众。这些显贵的权力大多是来自国王的恩宠，来自他们的土地收入。他们受到纵容，在庄园上或者在宫廷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不从事商业、金融、政治或学术活动。德梅迪奇家族的科西莫一世，为了避免麻烦，强迫在佛罗伦萨开大银行、做大买卖的家族把资本投入农村产业，并且赏以堂皇的头衔。人们非常重视头衔。贵族们无所事事，不可避免地变得骄横，无能，迟钝。人民大众被置于愚昧、贫穷、迷信的状态，备受税吏、宗教当局、官僚和士兵的骚扰折磨。穷人有时爆发流血的起义，但都是短命的，没有什么好处的。大多数时候，他们由于得到点施舍，买到点廉价面粉，看到一些富丽堂皇的场面，同时也由于警棍的威胁，而在悲惨中感到满足。表面上的富丽堂皇有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巴洛克时代的公共建筑、教堂、公园、住宅、城市仍然具有令人惊叹的超群卓绝之美的原因。当时所有的大建筑师全都同时也是著名的舞台设计师，这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象舞台上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戏剧。

在辉煌壮丽、群众激昂、欢呼叫喊、鼓乐震天、旗帜招展、礼炮轰鸣的后面，在那个时代的完美无缺、理所当然的秩序下面，存在着一种无可奈何、沉闷忧郁的压抑之感。为了逃避一切，人

们以各种办法寻找精神上的出路，私下反对一切旧传统，公开地或隐蔽地为争取自由或自由的代用品而斗争；寻求在某些禁区的夹缝中自由表现被埋没的天才；到天涯海角，去打未开化的野蛮人，建立殖民地；接受各种危险的政治思想，自愿加入本国的或别国的军队；参加新的宗教迷信，越稀奇古怪、越遭迫害越好。 314 另外一些人，目无法纪，过着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放荡不羁、荒淫无耻、罪行累累的生活。这是巴洛克时代的另一面，是巴洛克式生活中更具巴洛克风格的一面。

当时代转向巴洛克风格时，意大利作为一个战败的被肢解、被压迫的国家，悠然自得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她完全沉湎于巴洛克。结果，显得比欧洲其他任何巴洛克国家更具有巴洛克特色。她树立了一种风格。她的发明创造、生活享受、工艺技巧和设计构思，都受得热心的模仿。罗马成了世界巴洛克的首府。这是因为巴洛克生活充分发挥了人民的许多天赋的才能、情趣和爱好，同时也因为巴洛克生活的要素——压迫、沉闷和反抗——在意大利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强烈。其他国家的严格管制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据说是为了保卫民族的统一和尊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法律的最高权威，而在意大利，统治是由西班牙和教会这两个世界性强权从外部强加的，是为了外在的原因，为它们自己打算，谋求它们自己的利益。

西班牙是个强大的帝国，它统治意大利，象通过总督和附庸诸侯统治许多殖民地一样。教会作为一个世俗团体来看，是许多意大利小国之一，也许比大多数小国更穷、更腐败、更涣散，更盗贼横行，它在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方面，同其他任何小国一样，软弱无能到可笑的程度。但是，它又是一个无比庞大的精神帝国，在每个天主教国家里都有很大的影响。它把美洲大陆的土地一块

一块地分配出去，就象是自己的财产一样。它从天主教诸侯的忠心和天主教群众的虔诚中汲取极大的力量。为首的天主教诸侯是西班牙国王陛下，最狂热地忠诚于罗马教廷的是西班牙人民。这两个帝国互相支持。它们都竭力利用对方来弥补自己的弱点。教会利用西班牙军队来贯彻实施它的教令，保卫天主教的统一；西班牙利用教会在精神上的霸权来使人民俯首贴耳。与一切同盟一样，这两个帝国始终在为争夺霸权而斗争。最后是教会胜利了。它始终是胜利者。

在意大利，人们对政权的表面形式看得更重，对表示效忠的强制性达到了不必要的程度。同时，象如今在东欧任何国家一样，对于服从本国当局，无形中有一种屈辱的、不屑的感觉。秘密反抗、怠工破坏、不服从领导、无政府状态和无法无天被看作是值得称道的有骨气的事情。跟一切被压迫人民一样，意大利人不准独立地进行思考、采取行动、工作和战斗。负责的岗位都被外国人和外国人的忠实奴仆即通敌者所占据，本国平民只能从事没有价值、无足轻重的职业，做不重要的下等工作，否则就只能洁身自好。

几十年过去了。形势变得越来越具有爆炸性。意大利人在欧洲是以最好动、最难驾驭、最有才能著称的，可是只能在极狭窄而次要的领域发挥他们的精力。西班牙总督和意大利小诸侯等统治者比其他大多数统治者更贪得无厌，更愚昧无知，而且也更加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人民大众被有意地置于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为饥饿、更为迷信、更为无知的状态：人们用比任何地方更为奢侈浪费的盛大场面来款待他们，用比任何地方更为豪华浮夸的建筑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同时，任何别的地方也没有这样多的人为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所苦恼，没有这样急于对压迫者进行报复，这样迫切地渴望探求不寻常的办法来逃避这种处境。

* * *

意大利人没有象日本人在十九世纪轮到他们迎接外部世界的挑战时那样做。日本人不费力就了解到，他们的古代文明不过是装璜起来的纸幕，太单薄、太脆弱，不能保护他们。他们去上学。他们去接受西方技术的训练，模仿西方生活方式，采用外国的制服、法律、方法和工作程序。他们学得这样高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西方打败了。意大利人则相反。他们太骄傲自大，不承认有必要向别人学习。他们教导过全世界，那些蛮族还能教给他们什么呢？当然，蛮族已经在意大利得到了军事上的光荣和政治上的统治。但是，这些短命的优势与意大利几个世纪以来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难以匹敌的胜利比较起来，又算得上什么呢？外国人建立的昙花一现的政治结构，与意大利政治天才的伟大繁花硕果比较起来，与意大利人和上帝精诚合作的产物神圣罗马教会比较起来，又算得上什么呢？神圣罗马天主教会按天意是要永存不朽的。意大利人继续培养那些在他们自己看来是不可战胜的优点，但是，正是这些优点也使得他们十分轻易地成为外国人的牺牲品。

许多有才干的意大利人献身于支撑和保卫摇摇欲坠的教会的紧急任务。其中有些人是当时教会所需要的献身于宗教的人，是象查尔斯·博罗梅奥和罗伯托·贝拉明这样的圣徒。那个时期所有的教皇（其中有些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皇）都是意大利人；大多数有名的红衣主教、神学家、作家、学者、传教士、教育家、宗教团体领袖也都是意大利人。他们实际上在几十年间创立了崭新的天主教会。这些人固然是在侍奉上帝，但是，同时也是在为意大利服务，或者说，归根结蒂是在为经过总崩溃之后依然屹立的意大利制度服务。这是唯一的一个仍然能够威慑外国人、支配外国人的东西。当然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从中世纪以来，教会就是意大利人团结一致反对皇权威胁的中心。当一个城镇处在被胜

317 利的敌人征服的边沿、敌人威胁着要剥夺它的自由、抢劫它的财富时，人民就求助于他们的主教，选主教为临时政府的首脑，派他去与敌人进行谈判，以便获得较宽大的条件。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人也是本能地求助于教会。他们被打败了；他们的国土被外国占领，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已经崩溃，疾病和饥饿广泛蔓延，流血革命看来已不可避免。教皇的罗马在世界上的影响显然始终比他们自己的影响要大得多。

当时还有另外一些意大利人，在他们超越所有对手的领域里继续顽强地工作着，这就是艺术和科学的领域。在罗马遭屠城和查理五世在博洛尼亚加冕之后，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小教堂画了“最后的审判”，并且设计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屋顶钟楼；切利尼为佛罗伦萨的兰奇画廊铸造了希腊神帕修斯的铜像；帕拉第奥在威尼斯海上建立起圣乔治大教堂；提香画了他的一些最伟大的杰作；圣索维诺设计了一些最有名的建筑。然而，他们这些作品有些与他们在仅仅几年前完成的作品有所不同，也许可以说是满足于形式上的奇巧，过分追求技艺，变态的夸张，一种新的争奇斗艳。前一代的巨匠陨落的时候，就有几乎同样优秀的一代新人继承他们的工作。新人的行列绵延不绝：廷托莱托生于一五一八年；保罗·委罗内塞生于一五二八年；卡拉瓦乔生于一五七三年；圭多·雷尼生于一五七五年，我们的祖父辈认为他是所有的意大利画家中最伟大的，人称“天降的”圭多。卡拉奇家族杂取众家之长的画家们一五九五年从博洛尼亚来到罗马。彼得罗·达科尔托纳、圭尔奇诺、萨尔瓦托·罗莎、马尼亚斯科，随后也都到罗马来了。这是一支辛勤劳动、多才多艺、极为多产的艺术队伍。他们再也不是早年那种安详虔诚的手艺人了。他们多数人有点疯疯癫癫，象冒险家似地，腰佩长刀、短剑，脚穿马靴、马刺，策马云游天下，常常因为吵架杀了人而到处逃命。

那个时代需要大量的雕塑家和建筑师。他们的艺术之精湛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峰。象贝尔尼尼、博罗米尼、尤瓦拉等人和他318们的门徒，给罗马增添了成百上千的宫殿和教堂，给全城胜景缀满了新颖、壮观的屋顶钟楼，建筑了圣彼得大教堂及其前面的廊柱，给罗马勾画出了今天所具有的面貌。许多雕塑家和建筑师走遍意大利，或云游海外，从一国首都到另一国首都，建筑皇宫、御殿、教堂和花园，规划城市、街道、园林、游廊和喷泉，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所完成的每件作品，都表现出喜爱戏剧性的迷人效果（这种效果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来越引人入胜），都运用前所未有的、大胆的技术手法，每个细节都力求尽善尽美。他们的天才主要也是奉献给教会的，运用蔚为奇观，令人眼花缭乱，人间见所未见的最古艺术效果，来歌颂教会对异教徒和异端分子的胜利。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艺术家中许多人都虔信宗教：米开朗琪罗对拯救他的灵魂着了迷；卡尔洛·多尔奇决心只画能引起宗教热情的主题；卢卡·乔达诺不和忏悔神父一起，便不愿到西班牙去。其他的人也在侍奉上帝同时也为可怜的、不幸的意大利服务中得到安慰。

巴罗克式的意大利人发明了几百年来使全世界眼花缭乱的戏剧形式，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那个时代是喜欢炫耀的时代、装腔作势的时代、感情激动的时代；唯一的现实是想象出来的现实。有独创性的艺术家们设计了不可思议的富丽堂皇的舞台布景，制造了产生难以置信的效果的舞台机关，舞台出现了海上的风暴、真正的洪水、飞着的鸟儿和天使，瞬即变换的道具，看起来好象是延伸到无限远方的奇景。佛罗伦萨艺术剧院是一五七五年由一群自称“妙才班”的不满现状的演员创立的。他们对一夜复一夜地重复作家写的老一套感到厌倦，便根据一个大概的情节，创作了自己的台词和动作。凯塞琳·德梅迪奇为了她的婚礼，把剧团带

到巴黎去，很快就获得巨大的成功。他们和模仿他们的剧团，不久轰动了整个欧洲。

319 各地的人都为那些精采的脸谱而捧腹，例如机灵的仆人阿尔莱基诺和布里盖拉，为交税和贪财的亲戚而烦恼的富商潘塔洛内，模仿各种学者和医生的滑稽演员巴兰宗大夫，生性怯懦而又好吹牛的军人斯帕文塔上尉。漂亮的女仆科隆比娜、不幸的小姐罗绍拉以及她们的情人所表现的那种哀婉情调，叫人听了真的会伤心落泪。艺术剧院影响了欧洲的所有剧院。一些台词已经从剧院渗透到日常语言中。“zany”（小丑）一词于一五八八年成为一个英语词，这个词在威尼斯方言中就是约翰，本来是一个人名，后来变成小丑的代用词了。今天，要是有一个俄国想要说，他给你看的东西，不是专骗外国人的冒牌货，而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他就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你，那决不是trovarobe。Trovarobe这个词的意思是管“找东西”的人，也就是说，他要保证所需道具都要按时在舞台上准备好。后来这种人成了舞台监督，负责舞台布景和灯光。

众所周知，音乐是备受压迫、提心吊胆的人们的安慰。这种艺术即使在动辄得咎的时期，人们也可用来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亨利希·海涅了解这一点。他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在可怜的被奴役的意大利，是不允许用言词来表达思想的。她只能通过音乐来倾诉内心的痛苦。她把对外国压迫的全部仇恨、对自由的热爱、对自己的无能为力的懊丧、对光辉过去的眷恋、对未来的强烈憧憬、对援助的迫切期待，把所有这一切全都变换成她的旋律。”然而，巴洛克式的意大利人必须首先创造音乐，然后才能在音乐中寻求安慰。有一个人不仅把意大利的音乐之舟驶上了光辉的航道，而且还不得不拯救这个新生的产儿，使之免于立即夭折。这个人就是帕莱斯特里纳。当时的教会当局

以厌恶的态度来看待教堂里的歌声。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多数唱诗班都是以外国舶来的下流曲调谱唱圣洁的歌词，使人们联想到酒馆、舞场和妓院。弥撒曲是根据流行的曲调谱成的，并且采用了原来的调名，这些调名更适合于当时的香水牌子，而不适合于宗教乐曲，如《在林荫深处》、《吻吻我》、《再见吧，我的爱情》。这些哀怨小调和猥亵淫曲的原来歌词，常常在作礼拜唱诗时由男高音尖声唱了出来，而男低音却还在那里唱《天主的羔羊》或《餐前圣颂》。这种丑事再也不能容忍了。特兰托宗教会议于一五三六二年九月十七日举行第二十二届会议，决定“把一切淫秽的音乐逐出教堂”。可是，除了下流淫秽的东西，音乐还能给人以什么启示呢？庇护四世指派八个红衣主教举行主教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

八个红衣主教当中有四个决心在教堂里禁绝一切音乐。帕莱斯特里纳的乔瓦尼·皮耶尔·路易吉（人们用他的故乡的名字称他为帕莱斯特里纳），被请来打破僵局。他受命创作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乐曲，这就是以严肃的天主教风格创作新颖的弥撒音乐，这种音乐应当鼓舞绝对圣洁的思想。如果他失败了（大家都认为他会失败。教皇的侄儿查尔斯·博罗梅奥红衣主教亲自对他这样说的），教廷礼拜堂的合唱队和其他所有教堂的乐队全都要解散，音乐就要从宗教仪式中排除。帕莱斯特里纳的任务简单明瞭，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他要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否则就要眼看着他自己以及他的全体同事丢掉饭碗。他创作了至今有名的《马尔切卢斯教皇弥撒曲》。红衣主教们听了之后，情绪平定下来，表示心悦诚服。教堂音乐以它的新形式而永远得救了。与此同时，意大利的音乐也建立起来。如果帕莱斯特里纳没有取得成功，情况又怎样呢？真叫人不寒而栗。

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些学者、文人、艺术家组织的一个民间学会定期在佛罗伦萨的韦尔尼奥宫集会，公开宣布的宗旨是恢复

希腊人的配乐朗诵。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当然是模糊不清、不切实际的，因为，谁也不知道希腊人是怎样唱歌的，也没有希腊音乐传留下来。佛罗伦萨的艺术爱好者们只凭一种朦胧的直觉，认为古人是以乐调来朗诵诗剧的。就象炼金术士寻找点金石，点金石没有找到，却开创了现代化学。韦尔尼奥宫的朋友们创造了与他们所寻求的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就是歌剧。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克劳迪奥·蒙泰韦尔迪的人，在他的剧作《奥尔费奥》^①中发展了宣叙调。它是一颗种籽，历史上所有的歌剧都是从它发展起来的。

327 这种新的戏剧形式，再配上各种技巧、舞台布景、剧场效果、时代服装，立刻得到了成功。

然而，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在一切富丽堂皇和独具匠心的背后，却有一种悲剧性的失望之感。这是一种深重得使人难以理解的精神上的颓丧。例如，在宗教艺术中，教堂的正面建筑雄伟壮丽永垂不朽，工艺精湛出人意表，雕梁画栋惊心动魄，精琢细刻过分矫揉，塑像姿态千奇百怪，石雕披肩迎风招展，圣徒画像横眉怒目，可是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看不见一点亲切的宗教感情，却有另一种感觉，这些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最强烈的愿望是要斩钉切铁地宣布教会已战胜一切敌人，要使全世界相信教会是不可战胜的至尊。当时大多数词藻华丽、语言雄辩、学识渊博的文章，也没有包含一点真理，并且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今天只有专家们才会去读它们。诗歌创造了新的韵律、新的用词遣字方法、新的奇妙的比喻；诗歌娱悦读者、诱惑读者、爱抚读者、使读者感到舒服，勾起春心欲动难以忍受的乐趣。它使我们想起大约在那同时制造出来的许多复杂装置，想起那些大鸟笼子，里面有千差万别的鸟在展翅飞翔，婉转歌唱。它们看起来栩栩如生，其实

① 奥尔费奥(Orfeo)，希腊神话中阿波罗之子，据称是音乐的鼻祖。——译者

都是人的冷静头脑创造出来的。它们的歌唱和飞翔永远是不重复的。

事实上，制造每件东西都不是为了它本身，而主要是为了它产生的效果。两个多世纪以来，无数具有天才的人将他们难以置信的才华奉献给一个民族信念：最好是以虚夸代替现实，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他们以杰作充满世界，为的是给民族生活中的危惧、空虚、混乱、无能和失望求得补偿，以便忘记他们的耻辱和羞愧，忘记他们的集体内疚。这是在疯狂地寻求安慰和对残暴专横的外国鬼子进行报复。意大利人想证明他们有自己的特种的伟大，但到头来始终没有成功，总是遭到嘲笑。他们的成就被认为是可疑的、低人一等的，似乎缺乏男子汉气魄。正如柯罗齐所说，“意大利人完全丧失了他们在智力创造方面严肃认真的好名声；他们的才华给他们带来优秀演员、歌手、作曲家、装饰家、诗人的美名。他们被颂扬为“艺术家的民族”，有时又被藐视为‘骗子’和‘小丑’”。322

有些意大利人不甘心处于无所作为的境地。这种人也许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多。这些古怪的人不喜欢被人逗乐、被人愚弄、被人施恩、被人搞得眼花缭乱。他们对被迫处于无知、受骗、被剥削的地位感到愤恨。他们憎恶被迫乞灵于谋生之术，（谋生之术并无什么奥秘，不外是从愚昧无知、忘恩负义、反复无常的主人那里得到好处的那种伎俩。）这种人的不幸处境，随时随地可见一斑。下面就是一个严肃的作家巴蒂斯塔·瓜里尼在接受委任到费拉拉的宫廷充当诗人之后郁郁不乐地写给朋友的信：“我竭力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象一个演戏的那样，要装出过去时期的那种性格、态度和感情。我已是中年了，还不得不显出很年青的样子，不得不把忧郁换成欢乐，不喜欢的东西也要装作喜欢，把我的智

慧变成愚蠢。总之一句话，从哲学家变成诗人。”柯罗齐说：“熟悉历史文献的人并非经常从中看到宁静和欢乐。勿宁说，连笑声，健康爽朗的笑声都消失了；人们靠装神装鬼，插科打诨，滑稽诗歌，文字游戏，人为地制造欢笑，而不是自发的欢乐的表现。”

有自尊心的意大利人为他们的国家没有法制，他们的民族生活和个人命运得不到法律保障而感到羞愧。他们眼看着周围的人的那种奴颜婢膝、心满意足的状态，感到耻辱。柯罗齐解释道：“意大利在几个世纪以前产生过改革家和殉道者，在后来的复兴运动时期产生了更多的改革家和殉道者。但是，在巴洛克时代则一个也没有产生，因为，在精神上怠惰、苟安、逆来顺受的时代，这种人是不能存在的。”没有许多改革家和殉道者，这也许是事实，
323 但是，确有许多人正因为没有改革家和殉道者而深感痛苦，他们觉得生活空虚，缺乏目标，简直忍受不了，他们中许多人移居国外去了。尽管意大利没有她自己的历史，个别意大利人却力求成为历史人物。有些人成了外国统治者的外交官和政治家，如马扎林红衣主教便是。有些人在别国军队中服务。意大利工程师指挥了围攻安特卫普和围攻拉罗谢尔的工事。亚历山德罗·法尔内斯成了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的大将之一，曾率军在佛朗德平原和法国作战。米兰人加布里埃莱·塞尔贝洛尼保卫过马耳他，抵抗土耳其人的入侵，成为佛朗德地区的西班牙将领，在他的极左翼是西班牙将军阿尔巴公爵，担任基督教舰队炮兵总指挥，乘名叫东泽拉的一六六号军舰在勒班托对土耳其作战。摩德纳人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曾在萨斯巴赫战役中指挥帝国军队，同法国元帅蒂雷纳作战，还写过关于军事艺术的论文（他主张使用训练精良、轻装简骑、运动神速的小部队）。西班牙人把那不勒斯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官兵来源，成千上万的那不勒斯人转战整个欧洲和南北美洲。许多人成了西班牙的名将。

这些人在与民族荣誉有关的问题上十分敏感，说明他们不只是为了薪俸和分享战利品而打仗。他们总是向那些嘲笑意大利军人没勇气、不忠诚的外国人（多半是法国人）挑战。这种有骑士风度的冲突（通常都是意大利人取胜）在意大利人心目中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上学的孩子都要研究它们，法国人当然已经把它们忘记了。这类动人心弦的搏斗第一次发生于一五〇三年，被称为 **Disfida di Barletta**（军用水壶的决斗）。普罗斯佩罗·科隆纳率领的意大利骑兵与孔萨尔沃·德科多巴率领的西班牙人一起，为争夺阿普利亚而与法国作战。一个名叫拉莫特的法国上尉被俘，带到了西班牙兵营。在吃饭的时候，他嘲笑意大利人胆小怯懦、背信弃义。他还说，他愿意带几个法国人在任何时候与同等数目 324 的意大利人较量。对阵于二月十三日在安德里亚和科拉托之间的一个幽静地点举行，十三个法国人对十三个意大利人。结果意大利人把全部对手都打下马来，宣告为胜利者。双方皆无死亡。在这现场树立了一块二十英尺高的石碑，镌刻着崇高的拉丁词句来纪念这件事。拿破仑的士兵于一八〇五年的一个夜晚，推倒了这个石碑。滑铁卢战役后，当地居民又把它骄傲地树立起来。现在它还在那里，隐没在葡萄园中。这提醒意大利人，即使在形势最坏的时候，也不是一切都完了。

另外一次类似的挑战于一六三六年发生在北意大利泰桑河附近克雷瓦库奥雷平原。这一回双方各三十人。他们准备打到有一方全都被杀或残废为止。意大利人先发起攻击。但是，当他们看来几乎是稳操左券的时候，在旁观看这场格斗的法国士兵全都一拥而上，参加搏斗。为了避免大规模混战的危险，双方军官制止了战斗。事后，法国军官为他的部下那种没有骑士风度的行为表示道歉。这一回没有立碑。几个世纪以来，个别的意大利人和外国人之间为了同样原因所进行的决斗，有无数次。到十九世纪初

还有那不勒斯人卡尔洛·菲兰杰里向冒犯那不勒斯人的法国将军挑战并杀死他的事。一八二六年二月十九日，被放逐的那不勒斯将军加布里埃莱·佩培在佛罗伦萨向法国驻托斯卡纳公使馆秘书、诗人拉马丁挑战，因为拉马丁在一首诗中称意大利为“死人的国度”（*La terre des morts*）。拉马丁受了伤，拥抱了对方，并且有骑士风度地认了错。佩培成为佛罗伦萨的风云人物，后以给外国人教意大利文为生。作最后一次这类高尚决斗的是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的堂兄弟，都灵伯爵、萨伏依—奥斯塔的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他向法国亲王亨利·奥尔良挑战。后者从埃塞俄比亚给《费加罗报》写了几篇文章，其中嘲笑了意大利在殖民地的军队。决斗于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凡尔赛附近的沃克雷松进行。亨利·奥尔良受了轻伤。

* * *

许多学识渊博的作家把巴洛克时代民族性格的乖戾完全归因于教会的影响。柯罗齐指出：“不久以前，意大利人被斥为马基雅维利的子孙，现在却被认为是……教士的门徒。”这位那不勒斯老哲学家显然是在嘲笑这种矛盾的说法。这怎么可能呢？马基雅维利是众所周知的“吃教士的人”（*Mangiapreti*），是梵蒂冈政策的死对头，是反对教士腐化堕落的讽刺文章的作者。人民怎么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变得这样快呢？这显然是荒谬的。柯罗齐当然是对的，但也是错的。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只有政治宣传品的作者和新闻记者才敢于给它一个一清二楚、黑白分明的回答。别的任何人都不可解开这个纠缠在一起的乱麻团。

实际上，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人可以说既是马基雅维利的门徒，又是教会的门徒。马基雅维利毕竟不是凭空编造出他的理论来的，而是从当时他的国家的历史事件、他的同胞的行为和他自己固有的偏见推演出来的。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是在天主教的熏陶下

成长起来的，他的反教权思想更多地来自对教会的爱，而不是出于对教会的恨：他只是嘲弄那些不称职的教士和道德败坏的僧侣。同时，教会人士也可能被斥为遵循马基雅维利的规则，这些规则毕竟代表了时代的共同意识，恰如十八世纪的美国人，即使从来没有听说过富兰克林的《波尔·理查德年鉴》，也可以说是在遵循它的格言。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马基雅维利、人民、教皇、本国的红衣主教、罗马教廷、地方教士，全都是意大利人；全都是他们的土地和他们那个时代的产儿。教会可以说是巴洛克时代的母亲，同时也是它的女儿，是当时意大利人民的教师，同时也是他们的学生。意大利的民族性格真正是因为这个而受到歪曲的吗？难道教会的世俗政策没有过分受到意大利本国习惯的影响？

* * *

魔鬼的势力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接近于取得胜利。教会对内外威胁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内部威胁要危险得多，要难对付得多。外部敌人毕竟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识别的、可以面对面地与之斗争的。他们是彰明较著的反叛者、分裂者、异教徒。内部敌人则不容易识别，他们是冷漠分子、怀疑分子唯物主义者；他们宁愿要那一点点眼前的现实享受，而不要捉摸不住的永恒幸福。内部的敌人是迷信、无知、腐化、裙带关系、买卖圣职、追名逐利和教会纪律涣散。更重要的是，教会还得当心它的好朋友，那些误入歧途的热心信徒。他们要不加区别地赶快治愈一切疾病，甘冒传播更为恶毒的新异端邪说并导致教会崩溃的风险。情况的确不妙。连加斯帕雷·孔塔里尼红衣主教这样一个具有不屈不挠的信心、维护教条坚定不移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不能隐瞒我内心的愤慨：有些最著名的天主教城市沾染道德上的瘟疫和荒淫的生活方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许多原定用来收容侍奉上帝的

处女的修道院，现在已经变成妓院。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鄙卑无耻呢？”

在特兰托召开基督教团结会议的时期，教会竟能战胜了它的一切敌人，几乎是一个奇迹。怎样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教会实行了自身的改革，建立了新的教规，根除了许多放荡和腐朽的习惯，恢复和重振了宗教信仰，制止了分裂者和异端分子的发展。经过严峻的考验，教会显得更坚强、更伟大了。罗马呈现出一副行为典范的气派。举止端庄，态度虔诚，面部表情安详而带忏悔，口口声声拥护正统观点，这些都成了社会的时尚。有罪之人不得不实行这样一条准则：“如果不能纯洁，至少也要谨慎。”（*Si non caste tamen caute.*）和拼命求生存的一切组织一样，教会也不得不使用强有力的手段，有些手段甚至是残酷无情的。为了不被敌人所摧毁，它不得不先摧毁敌人，即使因此牺牲一些无辜的旁观者也在所不惜。从西班牙引进了宗教法庭，公布了一大批禁书目录，鼓励精力充沛、勇于进取的耶稣会的多种形式的活动。

宗教法庭使监狱里充满了犯人。一个深感震惊的居民于一五六八年写道：“在罗马，每天都有一些人被焚死，一些人被绞死，一些人被砍头。关人的地方都已人满为患，必须盖新的。”这个人显然由于感情激动说得过分了。监狱也许多年不分青红皂白地关满了人，但是，我们知道，实际的受害并不多，那只是一小批英勇顽强的人；其中有安东尼奥·帕莱亚里奥、布鲁诺、彼得罗·卡尔内塞基和其他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孤独的英国人，他由于粗野地侮辱了旅店老板而于一五八一年八月五日被烧焦。只是在外省有几个案件显得极为严酷。大屠杀只发生过几次，其中一次于一五六一年发生于卡拉布里亚的科森扎附近。那里有一个瓦尔登教派异端分子的聚居地，大约四千人，的确是被全部消灭

了，或被杀死，或被烧死，或被饿死，或被酷刑拷打折磨致死，或在监狱里关死，或从悬崖之巅扔下去摔死。有几个侥幸活下来的人被送到西班牙军舰上去划船。

必须记住，意大利人一般都认为残杀是愚蠢的、令人反感的。在整整几个世纪里，他们遭到登陆的穆斯林海盗和入侵的外国侵略者的屠杀，比他们屠杀别人的次数更多。在上次大战的最后几个月，他们遭到德国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而他们并没有不加区别地杀过德国人。意大利从来没有对政治可疑分子进行大搜捕和集体大屠杀。罗马决不会发生圣巴托·罗缪之夜那样的惨案。有些意大利人不大反对在情况需要时私人杀死自己的仇敌，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法律规定死刑是没有用的，是残酷的。（今天的意大利法典中没有死刑。）人们对法律迫害的憎恶和他们的慈善心肠使他们不加区别地帮助官方权力的一切受害者：他们感到不可抗拒地要同情盗匪、在逃犯、越狱犯以及政治流亡者。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反法西斯战士、英美战俘。他们在东欧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使他们躲过德国盟友的屠杀，把他们偷送到安全地带，给他们提供假证件。 328

因此，十六世纪有许多怀疑正统观念的思想家由于他们的同胞的帮助而得救，便不足奇怪了。其中只有几个是意大利的新教徒。他们大多数（和独裁政权下的无数反法西斯战士一样）是在要逮捕他们的时候，及时得到警报的，也许正是负责逮捕他们的那些官员给他递了消息。有些人聪明机敏，感觉到气氛不妙，不等厄运到来就避开了；有些人适时地作出让步，表面上循规蹈矩，使上级感到满意。另一些人坦率地说明，一个科学的思想家，作为哲学家可以有一套见解，作为基督徒，可以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见解。他们的座右铭是一个名句：“外表必须与时代的潮流一致，

内心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在费拉拉教文学的克莱利奥·卡尔卡尼尼教授在一封信中是这样解释这些规则的：“有些东西压在心里，隐瞒起来，比公之于众要安全些……现在，先辈的教令和长期的习惯已采取了另外的方式，有什么必要再去恢复那久已废弃的古老习俗呢？让我们允许那些东西安息吧。这不是说，我不同意学者们和好古者接受那些东西，而是说，我不想让它们传播给普通人和那些喜欢革新的人，免得引起冲突和暴乱……因此，在我看来，许多论点的讨论应限制在专家的范围之内。我认为最安全的办法是：‘与许多人一起说话，与少数人一起考虑问题’。”大家知道，在后来的意大利历史上，许多人都是“与许多人一起说话，与少数人一起考虑问题”。他们在法西斯独裁政权下也是这样做的。尽管有法西斯的审查制度，柯罗齐还是在二十年间写作和出版了他的著作，因为他的作品隐讳，学术性强，是写给少数人看的。当代伟大政治记者马里奥·米西罗利常常对那些把他看作大师的年青人说，“不要为出版自由而烦恼。归根结蒂，只有蹩脚作家才需要出版自由。”优秀作家总能想办法把煽动性思想含蓄地传达给看得懂的人。

* * *

宗教法庭的力量不能象在西班牙那样对付广大异端分子，而只能对付少数莽撞的领头人；常常是针对书籍者多，对人者少。危险书籍被没收、被毁坏、被焚烧；书的所有者被监禁、被审判；书店停业，出版社停止出版。边境卫队仔细搜查旅客暗藏的出版物。所有这一切，在意大利照例是首先大张旗鼓地彻底干一番，很快就产生了破坏性的心理效果。谨慎的人交出有嫌疑的书，并且告发其他还保存着这些书的人。即使象拉蒂诺·拉蒂尼这样的人（他是受梵蒂冈保护的人，学者），也感到惊恐。他于一五五九年给朋友写信说：“你难道没有听说，不论有什么书都会遭到危险吗？”

在这里，很多年内，没有谁敢写书了……由于你爱我，也爱你自己，请坐下来看一看你的书橱吧，当心不要打开书橱的门，否则那些被禁的学术著作会从门缝把毒气散发到你身上。”

威尼斯共和国学问渊博的神学家弗拉·保罗·萨尔皮，把禁书目录称为“利用宗教使人愚昧的最巧妙的秘诀”，并且竭力警告国外的全体朋友不要偷运书籍给他，因为这些书是会被发现的。然而禁书从来没有停止运进来。有少数书，和现在在苏联一样，由于学者们的需要而允许进口，不如此，学者们就无法批驳这些书的错误理论。控制迟早会变得有气无力，松松垮垮。人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一些要人（他们的行李不受检查）、不引人注意的旅行者、朝圣的香客、商人便把禁书带进了国门。他们有时把禁书 330 装上无害的封面，有时把禁书藏在船的底舱里，有时和货物混在一起。有时论文是手抄的，是私下传播的，甚至是秘密印刷的。

不要忘记，今天的意大利人当中只有极少数人看书，而在十六世纪，看书的只不过几百个有学问的专家。记住这一点，才能确定禁书目录在巴洛克时代对意大利生活究竟有多大影响。看书的人对同胞们并没有多大影响，大多数人是生活在户外的口头文明之中，而不是生活在室内的读书文明之中。不过，禁书的影响仍然是令人窒息的，因为绝大多数爱和平、讲道理的人很容易就给吓住了。“最巧妙的秘诀”没有能使不愿变得愚蠢的人变愚蠢，但是，它无疑地助长了许多人天生偏爱无知的倾向，助长了假装具有上级批准的思想情绪的伎俩。

在意大利没有比耶稣会更具有巴洛克—意大利风格的了。当然，严格说来，耶稣会并不是一个意大利组织。它有西班牙的钢铁般的灵魂。谁都知道，它是由一个通称为圣依格纳秀斯·罗耀拉的人在不多几个西班牙和法国教士帮助下于一五三九年创建

的。这个人是西班牙的下层贵族、士兵、纪律检查员、天生的领袖人物，本来名叫唐伊尼戈·洛佩斯·德雷卡尔德，受封为罗耀拉和奥尼亚斯的勋爵。他给耶稣会注入了严格、英勇和顽强的品格以及西班牙人和他的阶级的偏见。只是在后来，才有第一批意大利信徒加入他的组织。然而耶稣会成功地吸取、解说和鼓励了意大利的巴洛克式生活的主要方面，如遵奉传统、讲究排场、爱好虚夸、机智地规避令人讨厌的法律，等等。

331 耶稣会体制谨严，纪律分明，组织合理，管理有方，标准划一。在这些方面，没有任何世俗团体或基督教团体能胜过它。神父们受命盲目服从上级，“上级代表上帝”，不管他的才智、虔诚和判断能力如何。他们的会长不能开除下级，而要受下级的严密监督。所有的耶稣会士都是一台大机器上可以互换的齿轮；他们能说各种语言，到哪里都能适应环境。他们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并且支配整个社会。他们要做到“教天下人，管天下事”。他们影响了教会，影响了千百万默默无闻的人的私生活，影响了王公诸侯作出的决定。同样地，没有任何别的组织能这样成功地满足意大利人讲究排场，讲究表演效果的心理。

一般所说的巴洛克风格是耶稣会的建筑师们首创的。他们设计了罗马的第一批耶稣会教堂，称为“耶稣会风格”。当时还没有人想到使用对称结构和畸形的珍珠装饰。新教徒和北方天主教徒到现在仍然不相信、不喜欢这种风格，因为它的地中海气味太浓了。耶稣会教堂的设计旨在把信徒们包围在梦境般的氛围之中，包围在有声有色、香烟缭绕的醉人欢乐之中。从来没有哪儿的装饰品有这样豪华，从来没有哪儿的大理石有这样多彩多姿，从来没有哪儿的黄金白银象这样挥霍浪费。巴洛克风格的矫揉造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大理石刻出柔和褶皱，好象天鹅绒和锦缎；墙上灰泥刷上油漆，仿造大理石。一切金碧辉煌的东西也并不都是

用金子作的。

巴罗克风格的实质难道不就是永远要使人陶醉、引人高兴吗？柯罗齐把它叫做“力求出人意表，使人震惊”。当时最伟大诗人焦万巴蒂斯塔·马里诺说：“诗人的目的就在使人惊奇。”他用词遣字力求雕琢，令人莫测，就好象建筑师使用大理石一样。耶稣会教堂里乐音缭绕，引人入胜，讲坛布道，字酌句雕。这样的讲道是前所未闻的，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华丽而甜蜜的辩才，使信徒们大受感动，难以名状。这同其他神父那种枯燥乏味、学究气十足的训人是完全不同的。耶稣会教堂人满为患，而其他许多教堂却门可罗雀。

人们在忏悔时，就各种复杂的难题，热心向耶稣会教堂神父请教。他们很快就成了指导灵魂的艺术的时髦教授。他们的死对头布莱斯·巴斯卡承认：“他们的目的不是败坏道德风尚。那不是 332 他们的计划。但是，他们并不把改革道德风尚作为唯一的目的。这种策略就不好。”他们精心制作了一个有伸缩性的标尺，一种诡辩术，用来衡量人类行为的道德价值。他们使用这种标尺可以不用使有罪的人惊恐而解除他们的包袱；指引他们，说服他们。巴斯卡激愤地说：“这样一来，他们就保住了所有的朋友，防范了所有的敌人。”保罗·萨尔皮神父也憎恨耶稣会，他在信中写道：“耶稣会士有很多退路，很多托词，很多迷惑人的手法；他们比诡辩家还更善变，当人们要用姆指和食指掐住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滑掉了，消失了。”

不过，即使是耶稣会神父们的最严刻的反对者和批判者也并不怀疑，这些神父是决不会让诡辩损害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过着圣洁的生活，任何个人丑闻都沾不到他们的边。在大多数教士都在道德上、理智上陷入泥坑的时候，这些神父们以自己的谦虚谨慎、献身精神、学者风度、诚挚热情和生活上的无懈可击，

为他们自己和一般牧师赢得了尊敬。诡辩只是供普通人用的。

巴斯卡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耶稣会的神父们坚定地相信，只有他们才能拯救教会免于灾难。他们把自己看成是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军队。这个类比可以追溯到耶稣会创始人的军事头脑。他给他的团体取名为耶稣会 (Compagnia di Gesù)，意思就是“耶稣的军队”。Compagnia一词原指雇佣兵队长手下的一伙士兵。他说过，古代僧侣团体就是教会的步兵团，它的任务是坚守阵地，而耶稣会士是教会的轻骑部队，能够迅速行动和迂回作战。他们和一切轻骑部队一样(例如，美国内战时北军名将威廉·谢尔曼的纵队，突击队，快速部队)，要深入到敌后去侦探、搜索、收集情报、捕捉人质和俘虏，尽可能给敌人造成损害，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去完成一切可能出现的任务。

333 依格纳秀斯的军事头脑还认识到意大利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他知道，拯救教会的决战，要在阿尔卑斯山以南进行，和大多数争夺欧洲霸权的世俗战争一样。在别的地方，教会能够赢得影响、势力和权威，但在意大利，教会不是永远得救，就是永远完蛋。因此，他竭力把他大多数优秀人员和他的最大精力集中在意大利，并且在罗马建立了总部。耶稣会为它的特定任务设计武器，研究战术，并且适应当地环境。它发明了一些巧妙的方法，遇到意大利人就用来启迪他们，娱乐他们，教育他们，恐吓他们，哄骗他们，支配他们。它到处建立学校，为贫穷聪明的孩子办免费学校，为出身高贵的孩子办奢华的学校。配备能力高强的学者。这些学校都由胜任的学者领导，是当时最好的学校，目的在于使下一代占统治地位的上层人物都出身于耶稣会，但是同时，也传播了文化知识。它利用许多意大利人的腐败成性，也利用他们的丰富智力、艺术才华、宗教情绪和在教会中的自豪感。

耶稣会完全成功了。几年之内，它实际上征服了人心，控制

了意大利社会。虽然它从来没有丧失它那严峻的西班牙品格，但是，在外国人看来，它显得太意大利化，时代色彩和地方色彩表现得太地道，以致遭到许多方面的反对。它在国外引起的敌意，由于意大利人一直招惹的旧敌意而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耶稣会也使得意大利人的生活更加困难，因为几世纪来各方面对意大利人就疑虑重重，这时又认为他们已成了耶稣会的门徒，疑虑更加重了。

* * *

有些意大利作家，孝子贤孙般地急于寻找他们国家的许多灾难的外部原因。他们认为，西班牙人在南意大利和米兰的长期统治及其无所不在的影响，是意大利某些似乎不治之症的根源。这有一定道理。譬如说，西班牙人对有用的生产性职业抱着一种封建式的轻蔑态度。在整个南方，有身份的人至今还认为，无所事 334 事是出人头地的标志，游手好闲是地位显赫的象征。他们被称为 *galantuomini*。（作者在本书原文第279页上对 *galantuomo* 一词的意义作了解释。*galantuomini* 是 *galantuomo* 的复数形式。——译者）他们也许靠可怜的养老金过日子，或者靠出租几块蚕豆地维持生活。他们可能比面包师、加油站主人或小商店老板要穷得多，但是，他们总是穿戴着硬领、领带、外衣、礼帽，手里提着文明棍。他们把俱乐部的柳条椅搬到大街人行道上坐着，观看过往行人。他们谈论政治，阅读报纸，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对待普通人民。任何职业、任何买卖都不能玷污他们的双手。一个 *galantuomo* 从来不到法院去为他自己的荣誉辩护。他和西班牙贵族一样，自行立法，私设公堂。

由于政府机关几乎都是由南方人管理，而这些南方人一般都属 *galantuomini* 阶级，所以，这些巴罗克式的偏见在最近一百年来或多或少地浸透了整个意大利官场。老百姓在一切政府机关都

受到轻蔑的对待。赋税照例仍然跟西班牙总督强加的赋税一样，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真把每个人都能压垮，而对那些表现了事业心、从事生产的人，尤其具有惩罚性。大多数官吏和政客都认为，经济生活是一种罪恶，应该由当局加以严格控制，象对难治的江河那样，越是加以控制，对每个人都越有好处。这些人中有很多还在梦想一个有秩序、守纪律的国家，在这国家里，国王实际上拥有一切，拥有对一切主要产品的垄断权，保证每个人都过上悲惨的生活，把大量实惠专门分配给他的朋友。这个西班牙的巴洛克之梦在今天常常时髦地隐藏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后面：国王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国王的朋友就是党的机关。

游手好闲的 *galantuomini*（其他大多数意大利人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这样）仍然喜欢华而不实的头衔和各种各样荣誉的称号。这种癖好肯定也是西班牙的舶来品。最初的意大利贵族全都没有什么头衔：威尼斯的贵族只简单以“贵人”相称，其中有些著名的世家可以回溯到罗马帝国衰落时期，只是在奥地利人于一八一五年兼并了威尼斯之后，他们才被赐以伯爵称号，在宫廷中给他们一个适当的位置。热那亚共和国的显贵们被正式批准自称为侯爵，但这种称号只是在去西班牙、英国和法国时才用，因为在那些国家称号才重要。另一方面，古老的那不勒斯王国则充满了头衔。第戎议会的议长、严肃的查尔斯·德布罗塞斯于一七四〇年写道：“那不勒斯那帮人难对付，资产阶级爱虚荣，高层贵族爱炫耀，下层贵族贪头衔……无论什么人想要头衔，就给他一个头衔，结果引起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他真的是个公爵，但不是个绅士’。从前一向是亲自动手侍候我们的卖肉屠夫，现在要通过他的助手来侍候我们，因为他已被封为公爵了。”

头衔就象铜钱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抹去其光辉，失去其价值。今天在意大利任何地方头脑最简单的人也会认为，被称为

dottore (博士)是十分自然的,而不管他是否上过大学。**Signore** (先生)这个称呼也是西班牙人引进的。现在如果仅仅被称为**Signore**,实际上是一种冒犯。一个低级议员,如本书作者,被称为**Onorevole** (尊敬的);不仅在众议院以其议员资格受到这个称呼,而且,侍者和停车场服务员也这样称呼他。第三人称单数的称呼形式也是西班牙人传下来的。这种称呼使得大多数初学意大利语的人感到麻烦。**la sua signoria** (“他先生”)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称呼方式,即不是直接对人说话,而是对他的“气味”说话,也可以说对一个虚幻的人说话。由于**signoria**是阴性名词,要求所有形容词和代名词都是阴性,即使和男人说话也是这样,因此,在外国人当中引起怀疑和混乱。譬如说,“**Come sta lei?**”一句,通常翻译为“你好吗?”,字面意义是“她好吗?”,或者说是“这个看不见的别的女人日子过得怎么样?”西班牙人有一种巴洛克式的爱好,爱好个人表现、华丽的装饰、装模作样。这种时至今日仍然还很普遍的爱好,与对头衔和虚荣的向往是相称的。伟大的巴洛克诗人巴蒂斯塔·瓜里尼(出身于费拉拉的北方人)抱怨说:“我们的时代是个重外表、好表现的时代,人们一年到头都在参加化装舞会。”

毫无疑问,这些西班牙性格中,有一些阻滞和妨碍了进步: 336
无视或轻视经济生活情况,专门注意一切事物的非本质的东西和表面现象,希望不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是通过权势人物的恩赐来改善个人的生活境遇;相信国王(或取代国王的任何人)必定会关心一切。这些习惯在西班牙人已离去之后还缠绵了这样久的时间,这难道真是西班牙人的过错?西班牙人的伟大优点一点也没有在这里生根,这是为什么?西班牙的统治在意大利留下了如此不可磨灭的痕迹,特别是在双西西里王国,但同时由西班牙统治的其他欧洲各省实际上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又是为什么?举

一个例来说，为什么佛兰芒人和荷兰人那样有事业心，外表上那样谦虚，并且那样勤俭节约？为什么大多数米兰人依靠他们自己的首创精神，以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自豪，并且热烈支持不受限制的经济制度？

显然难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毫无疑问，西班牙人和教会在巴洛克时代对形成意大利的民族性格助了一臂之力。意大利人当时所接受的癖好无疑是不能改变的。但是，西班牙人和教会不可避免地只鼓励投合意大利人自己志趣的特性，这些特性也许是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展的。西班牙人和教会都不是神人任意创造的。造成权力真空的是意大利人的败北，是他们不能治理自己，不能满足一个自尊民族的第一基本需要——把外国敌人赶出国土去。西班牙人被吸入了意大利。教会不是一个把异国生活方式强加于拒绝接受这方式的民族的那种异国机构。我们现在懂得，
337 任何统治如果单靠武力来强加于人是不能持久的，也是没有效力的。它至少必需有一些人承认它是真正表达了他们的希望和幻想。教会是用意大利人的深谋远虑、机敏圆滑、聪明智慧来从事它那神圣的、永恒的、全球性的使命的。它是由意大利人领导的。它也不能不体现一些意大利人的理想。人民的意志也决定了政治统治和道德统治的强度和深度。西班牙总督和本国吉斯林毕竟是意大利人民允许他们专横和贪婪到什么程度，他们才专横和贪婪到什么程度的。教会全面渗透到了意大利，因为它不得不肩负起意大利人推给它的责任。对这个问题没有最后的答案。

结 束 语

338

巴洛克时代可能曾使早一代的人困惑不解，但是，对我们来说，可惜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那种严格管制，我们一看就懂，诸如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经济控制，令人动弹不得的家长式统治，富裕的大众社会的强迫性，血腥的、愚蠢的极权主义政权的堕落影响等，过去人们认为这种严苛是可怕的，我们现在却一笑置之。旧日的政府与典型的比较起来，还是相当温和的，效率不高的。旧日的那些达官显贵很少有大规模地干真正的卑鄙勾当的本领；甚至最坏的国王也想要后世称他为高尚的明君。大多数国家的老百姓，过去在统治者面前的确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那时的法律有极大的漏洞；警察没有机关枪、无线电、电话机、窃听器。过去的统治者确实摧残人民，但是，他们引以自豪的害人技术，未必有我们当代人的技术一半精良。巴洛克式的压迫在那个时代是显得可怕，因为，那时它是新出现的，是令人恐惧、令人窒息的。当时全欧洲的人用以自处的办法，同我们亲眼所见当代人的作法一样。人们在类似的情况下，历来都是这样做的。

压迫性的严格管制，并不是象洪水、瘟疫那样完全是不需要的、不正当的。在历代的无政府状态和动乱时期之后，建立严格的管制从来是得到它的受惠者或者受害者的帮助的，有时就是他们引起的，并且往往还受到他们的欢迎。没有这种严格管制，人们便会互相吞吃，工商业便衰落凋敝，生活本身也无法维持。严格管制的好处是明显的：它强使社会好歹处于一种休战状态，使

火车准时开动：它造成一种在政治变动期间各行各业照样运行的假象：它使下层阶级安分守己。它所建立的秩序看起来井井有条，却往往只不过是装点门面。那是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上面的光滑表层，是风雷激荡的大海表面的一轮平镜。深刻的问题并未
339 解决；有些问题变成了坏疽，到头来常常引起一场灾难。

压迫性的严格管制开始时是不声不响的，它所强加于人的种种限制，几乎人人都高兴地认为是必要的，早该如此的。它从强制推行一套法定观念和划一的行为标准入手，只要不及时受到制止，便一直要达到控制一切的地步。控制起初是可见的、外部的，很快就发展到控制人的内心，就象癌一样，看不见，有毒性。许多人自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自由的意志，他们是生活在最好的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由可敬的超人决定的，或者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至高无上的人决定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人们学会了对来自上面的每一点赏赐，或每一点特许表示感谢，学会了爱戴、赞美他们的主子。他们相信流行的口号，因为有很多口号毕竟反映了他们自己的偏见。他们在宏伟壮观的群众场面和激动人心的隆仪盛典中忘记了自己。他们以服务于最高目的、服从于历史使命而自豪。当然，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他们必须闭起嘴巴。他们必须永远不做任何标新立异的事情。他们必须承认伪善和欺骗是明智的行为规则，并且教导他们的孩子如何阿谀奉承、模棱两可、逃避责任、口是心非。归根结蒂，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求得生存。但是，有些人有时知道，或模糊地感觉到，他们是装饰得非常华丽的集中营里的囚徒。能干出可怕的暴行的人和卑怯的懦夫都是少数，同样地，能作出自我牺牲和英雄业绩的人也是少数。大多数心怀不满的人，只能暗自向往已经失去的黄金时代，避免最不愉快的困境，寻求退路和精神安慰。

表面看来，意大利人为了得到上面的恩惠，领受上面的款待

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炫耀，比其他人民更轻易、更热切地屈从于巴罗克式的严格管制。他们热心参加公开的壮观场面和私下的小型表演。他们熟练地运用阿谀奉承、模棱两可、逃避责任等等伎俩。他们也是没有别的办法。造反是不可能的。谁能希望把所有的意大利小国熔合在一起，铸成一把利刃来把外国人赶出去呢？那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承认事实，总得有人发号 340 施令；让外国人和吉斯林分子去做这项令人不愉快的工作吧，让他们去抽税、征兵、招引被统治者的仇恨吧。这样的安排，没有什么不好。法律是必不可少的。法律不仅使得人们有可能生活下去，而且使得人们可以享受生活的乐趣。法律象是障碍赛跑跑道上的障碍。如果没有这些障碍把弱者阻拦在后面，机灵的人怎么能够领先并取得胜利呢？如果没有法律，人们怎么能够玩忽法律呢？

在表面之下，意大利人发明了战胜压迫性的严格管制的各种方法。由于他们不能在战场上保卫他们的民族自由，他们便狂热地为保卫个人的自由和家庭的自由而奋斗；这是他们所了解的唯一自由。保卫这种自由的必要性把单个人的英勇和刚毅磨砺成锋利的刃，这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不能比拟的。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夸耀地写道（司汤达和加里波第后来一字不差地用了他的话）：“意大利人种出的东西是首屈一指的。”处在家庭中心的个人发展出优秀的品质。但是，把他们千百万人加在一起，始终不过是等于一群懦弱的、愚昧的、容易上当受骗的群氓。在和平时期，许多人在他们各自的活动领域里取得了驰名世界的成就。在战时，许多人成为不可战胜的英雄，就象在巴列塔打败法国人的骑士，或者象上次大战期间黑夜潜水进入亚历山大港向停泊在那里的英国军舰施放鱼雷的海军官兵。但是，意大利民族从来没有能解决它的根本问题；意大利的武装力量在打败敌人方面很少取得成功。

意大利从来没有象她的全体人民的总和那样优秀。

人们不仅战胜了统治者，而且还发明了许多卓越的传奇性的方法，使他们的平庸卑微生活的每一小时成为可以忍受的，并且尽可能令人满意。这就是他们的举止、饮食、居室、城市、爱情生活如此令人愉快的原因。这也是他们的艺术或大部分艺术的主要目的是使公众乐以忘忧的原因。他们很自然地被指责为轻浮浅薄，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光辉耀眼的表层之下。这种指责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并不轻浮浅薄，他们只是不能不这样。许多伟大艺术家留下的私人文件，说明他们深深为他们的人生悲剧而苦恼。意大利的文学充满了极度痛苦的呐喊。但丁悲痛地哀怨道：“呵，意大利，奴隶之国，忧愁之乡，暴风雨中的无舵之舟，它不是自己国土的主宰，而是花街柳巷，让别人来寻花问柳。”彼特拉克认为意大利周身创伤，只能用行动，而不能用言词治愈，他说：“古代的勇气在意大利人心中并没有泯灭，英雄气概将重新拿起武器，并且迅速结束战斗！”列奥巴尔迪看见的是说明意大利人过去的光荣的遗迹和纪念物，而不是能使一个国家获得自由的“英雄的桂冠和钢铁的武器”。菲利卡亚从意大利“致命的天赋之美”看到不幸的根源，因为这天赋之美引起了外国的贪欲。甚至连教皇有时也对来自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征服者怒火中烧。“野蛮人，滚出去！”是朱利叶斯二世声讨征服者的战斗呐喊。

许许多多伟大的或接近伟大的意大利艺术家变成了超群的装饰家和献艺者，原因在于没有别的出路，没有解决民族问题的任何可能。他们认为，减轻同胞们的痛苦，使同胞们忘记悲惨的命运，乃是他们道义上的责任。

意大利人还被谴责为对真理不够尊重。当然很少有人真正尊重真理，不仅意大利人是如此。然而，只要他们看见真理，他们就懂得真理；他们并不是笨伯。他们每个人都试图借真理之光来

驾驶个人的小舟，因为任何别的办法都会带来灾难。但是，作为一个集体中，他们有时好象忘记了真理的独特重要性。他们常常根据不同情况或无视真理，或修饰真理，或给真理蒙上一层面纱，或否认真理。他们说谎以讨人喜欢，以引起人们的情绪，以使一种景象显得圆满，以证明一个论点。首先，他们认为，就他们不幸的国家的状况说说谎乃是一种神圣的责任，在道义上是有理的，正如人们编造一些虚构之词来哄骗垂死的病人和他的家属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单个的意大利人几乎始终是明智的，而他的国家在为了讨人喜欢而歪曲真相、夸大事实的方针指导下，几世纪来竟然犯了这样多灾难性错误的又一个原因。

* * *

意大利人在最近四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巴洛克时代。粗略 342 考察一下近代历史上所有的意大利政权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被拿破仑扫除的十八世纪的君主制，复兴运动以后建立的统一王国，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自由派政治家实行的隐蔽的独裁制度，法西斯主义的赤裸裸的独裁制度，以至今天的社会党和天主教的联合统治，全都是纯巴洛克风格的样板。名称和官方的词藻改变了，处方始终是一样的。

这种处方的公式可以归纳如下。这个公式在过去是有效的，也许在未来也足以有效许多年。首先要制服人民。人民是广大的、勤劳的、驯顺的、纯朴的；他们为每天的面包烦心，有时能够承受不可言喻的牺牲，但又不安分的，好新奇的。要尽量少办学校以保持人民的无知状态。要以铁的手腕实行严格管制或摧残工商业，以使人民处于匮乏状态。要任意摆弄措词含混的法律，以使人民不知所措，缺乏安全感。要使权利和义务永远没有明确规定，并滥用职权，使好处总是来自上面的恩典。要时时洒下点小恩小惠，以使人民高兴。给他们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节假

日，让他们大吃大喝。开办豪华的、有时也有点用处的公共工程，以使人民分散注意力。要把大部分钱都花在表面文章上面，过去是用来招募军队和进行毫无意义的战争，现在是用于娱乐、游戏和壮观的场面。在改善人民的精神和物质条件方面要尽量少花钱。要大力迎合人民的最原始的欲求，使他们永远昏昏欲醉。

其次，要制服人数不多的寡头领导集团。这些人总是无休止地互相争吵，为他们的地位并且时常为他们的生命面惊恐万状；他们的权力朝不保夕，依靠几个人或一个人的恩宠，有时甚至依靠居住在国外的外国头目的恩宠。要把这些领导者置于法律之上，这就会使他们当中一大半都处处提防，冷酷无情，贪得无厌，专横跋扈，肆无忌惮。在过去，这种人就是宫廷宠幸、地主贵族、高官显宦、带兵将领；后来，银行家、轮船主、工业家也属于这种343人。昨天他们是法西斯头目；今天他们是群众性政党的领袖，是赢得成百万张选票的政治组织的代表，是私营或国营工业帝国的控制者，工会领袖。旧日的达官显贵较为风雅，较为勇敢，较为彬彬有礼，举止较为端庄尊严；十九世纪的自由派爱国者常常是爱国的，他们鼓励工商业，不时地打算做点什么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今天的领导者则更为聪明，更有学问，更有效率。但是，这些区别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如同他们衣着的款式不同一样。

如果撇开表面上的区别不谈，那就可以看出，今天意大利领导者的行为表现大体上就跟他们的前人的一贯表现一样。他们管理意大利就好象是管“自己的事情”一样；他们实行规模庞大的、雄心勃勃的、令人难忘的政治计划，说这是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但是，一眼就可以识破，他们是明目张胆地为了加强他们自己的权力。他们使唤人民，就好象希腊罗马时代影戏里的道具，一切动作都是遥控操纵的。没人向它们解释影戏的情节。事情也只能如此，不这样是不可思议的。倘若劝导国人培养读书写作的本

领，允许他们获得并享受适度的富足，鼓励尽可能多的人认真负责，那就会危及上层人物的控制，或者按上层人物喜欢的说法，就会削弱社会结构。不过，也可以讲出一些道理来为领导者们辩护：他们是社会的产物，无论是旧日的达官显贵、当代的内阁部长或国家垄断组织的控制者，都与人民具有同样的品质和同样的缺点，怀抱着同样的理想。事实上，意大利人把他塑造成什么样，他们就是什么样。

头脑清醒的意大利人始终明白，他们的国家是一种恶性循环的不幸受害者。民族性格注定产生暴政。暴政加重和恶化民族性格的缺点，并且不可避免地把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如果意大利要从她那可耻的命运中得到拯救，就必须粉碎这种恶性循环。从很早的时期起，爱国者就一致认为，只有夺取独立、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或者是意大利诸国的紧密联盟），人民负起他们³⁴⁴的民政责任和军事责任，最终才会使国家获得新生。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侥幸取得，也不能由外来力量来强加于人而没有意大利人的合作，否则，其结果充其量不外是昙花一现，依然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炫耀，又一次雄伟壮观的场面，但是，在它的背后，旧日的实际情况依然原封未变。

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必须经过意大利历史的一个自发过程才能发生。这过程要由缓慢兴起的人民的愤怒浪潮引起，要在胜利的战争或起义中用鲜血换来。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们当然知道，成功的革命和胜利的战争本身并不值得向往。它们只不过是最终证明人民全心全意地团结一致，证明他们相信他们的共同命运，证明他们承认共同的法律和共同的责任。它们是一种象征，说明一个个单独的意大利人已放弃谋求自己个人私利的斗争，而开始从集体角度考虑问题。但是，怎样才能使意大利人为他们的国家去战斗和牺牲呢？很显然，如果能说服他们去

为国战斗牺牲，也就没有必要让他们去这样做了，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成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了。

必须严肃指出，这个问题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意大利问题的关键，是一切意大利问题的关键，是问题的核心，是意大利历史上许许多多似乎毫无意义的、杂乱无章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中唯一关系重大的问题。这是对民族行为中许多现象的唯一解释，不这样解释便十分费解。这是几世纪来人们在咖啡馆和议会里热烈辩论的问题，是今天仍然还在辩论的问题，是老老少少的所有善良意大利人心中的刺。意大利这样一个拥有生气勃勃的、充分觉醒的、聪明智慧的人民的国度，为什么始终表现得如此软弱？她为什么在各个世纪都受到侵略、蹂躏、洗劫、侮辱，而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卫她自己？

345 在好思考的意大利人看来，取得民族统一和独立似乎是很可贵而又达不到的梦想。首先，人民从来没有真正感到有成为一个国家的必要。圭恰迪尼在考察了他的国家的历史之后痛苦地承认：“意大利决不是一个容易置于单一统治之下的国家。”事实上，早在罗马帝国年代，意大利就成功地抵制了统一法律的普遍适用。当高卢、西班牙、德意志和不列颠在行政上说来都是组织严密、秩序井然的省份的时候，意大利仍然是一块自由城市的大杂烩，一部分是一些自治地区、反叛的山地部落、各自具有不同的方言、神祇和风俗习惯的几乎独立的人民的大杂烩。后来，在中世纪，日耳曼的皇帝们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把意大利统一起来。他们在冰消雪融的春天到来，进行征服、抢劫、并且试图把变化无常的居民熔合在便于管理的封建采邑制度里面。日耳曼人在流血战斗中偶尔也被击退。在不可能打败他们时，意大利人就以花言巧语的谈判来使他们高兴，以含糊其词、极不可靠的条约来欺骗他们，出卖或者腐蚀他们。他们的许多军事胜利的结果不可避免是短命

的。大多数被征服的城市，只要帝国力量在附近，就表现出极为忠诚的样子，但是，一旦帝国力量转身离去，它们马上又回到一贯的叛乱状态。

这有许多原因。不仅象圭恰迪尼所说的那样，意大利人总的说来始终是难以“置于单一统治之下”，而且他们从来没有觉得他们是一个“新”民族，从来没有觉得他们是那些半野蛮、不成熟的民族之一。这些蛮族在罗马帝国消逝之后，为了维持表面的文明秩序而需要严峻的法律和铁一般的纪律。意大利人觉得他们太老大、太聪明，而不能模仿北方人。他们墨守衰朽的罗马生活方式的残余，这种生活方式跟一切衰朽的残余一样，对他们都是十分甜蜜的、惬意的。他们也不能忘记他们过去的伟大；这种回忆在最黑暗的时代，只不过是一点模糊的、神话般的传说，即使如此，他们也牢记不忘。对过去的回忆不仅强烈得足以抵制外国思想和外国制度，而且还足以取而代之。意大利人认为，他们在精神上和文化上已经够统一了，而不需要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一。他们由他们的语言、历史遗迹、艺术、文学、习惯、谋略、伟大人物 346 的声望和对伟大圣徒的记忆而结合在一起。

再往后，当其他欧洲国家由强有力的君王统一起来的时候，意大利人仍然在为维持政治上的分裂而斗争。本地诸侯和王室往往想建立统一的王国或联盟。这样的人是很多的，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可以从伊夫雷亚的侯爵阿尔多因算起（他几乎完成这项大业，但死于一〇一五年）；名单上包括西西里国王和德意志皇帝菲特烈二世（在意大利出生并受教育的“世界奇才”）；包括米兰的维斯康特，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以及其他许多人。那不勒斯国王约阿基姆·穆拉特于一八一四年乘其内兄拿破仑失败之机，曾经企图征服这个国家。有一个英国人也插手过这个问题。那就是英王陛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派驻那不勒斯流亡宫廷的公使威

廉·本廷克勋爵。他在一八一五年以后想建立一个独立的意大利，以与奥地利人和法国人抗衡。直到一八六一年，撒丁国王、萨伏依王朝的维克托·埃马努埃尔才在法国军队、加里波第的志愿军和共和派革命分子的帮助下，成为意大利国王。在这以前的几个世纪里，任何人，任何诸侯，任何革命领袖，任何共和派或王侯家族，都从来没有强大到足以把整个意大利聚集到一个旗帜、一个法律之下。

教皇当然始终是最强大、最有影响的诸侯之一。教会在任何时候都是意大利体制中最有朝气、最为活跃的组织。全体意大利人都全心全意地归属于它，为它效命。照理说，一个教皇本来可以统一意大利，不会有多大困难。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呢？教会是人民反对皇帝的传统同盟军。它一再领导了反对北方侵略者的联盟。但是，人民从来不永远感谢所得到的帮助。他们从来不是教会的长期坚决的支持者。只有当形势需要的时候，当支持教皇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才变成盖尔菲党（教皇派）；一旦教会的最高政治权力成为一种威胁，他们又转而变成吉伯林党（反教皇派）；而当日耳曼人又一次越过阿尔卑斯山时，他们又会回到盖尔菲党。事实上，意大利人竭力阻止这两大对立势力中任何一方占上风。人民以同样自豪的心情认为，他们的国家既是帝国花园，又是上帝在地上的宝座，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只有两者之中的一个。

347 必须承认，这些不自觉的行为型式今天仍然有效。由于意大利现在是通过基督教民主党而间接为教会所统治，越来越多的人本能地加入那个可以被认为等于是当代吉柏林党的政党，它是外国势力所支持的强大组织，这外国势力在意大利事务和世界事务中敌视梵蒂冈和传教士的世俗影响。如果有朝一日共产党终于占了上风，任何一个研究意大利历史的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人民将根据情况，公开地或秘密地去壮大教会组织，人数会越来越多，不顾迫害和死亡，反对他们认为可恨的外来的暴政。

马基雅维利不十分了解意大利历史的这种摆动机制。他认为民族的一切疾病单单是由教会引起的。他在一段著名的文章里写道：

任何一个地方，除非它象法国和西班牙那样，处在一个共和国或一个君主国的统治之下，它就永远不会团结一致、兴旺发达。意大利为什么不能团结一致、兴旺发达，原因端在于教会。因为教会从来没有魄力把它的统治延伸到全国……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十分软弱，在它怕失去其世俗势力的时候，他还能召来外国统治者作为平衡力量，以保住它自己，反对那些有可能成为霸主的强国。教会使我们处于各式各样诸侯贵族统治下。这些诸侯贵族引起不和，导致意大利的衰弱，使得意大利不仅已经成为强大的蛮族的俎上肉，而且也成为各个攻击者的笼中鸡。

这个论点虽然过分简单，但很重要，因为许多善良的意大利人仍然还坚持这种论点。这些人不能轻易承认，如果人民有独立和自由的要求，本来随时可以赢得既反对外国列强、又反对国内教会的独立和自由。那种认为教士们的阴谋诡计太厉害，使得任何自发的运动都不能产生和发展的想法，不过是自我宽慰。不过，这种论点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完全不对。教会的权力始终是强大的，这并不是因为历届教皇都是大政治家，罗马教廷是有远见的团体，意大利人害怕宗教制裁，而是因为意大利人实际上从来不要求成为自己历史的主角，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他们利用教会（他们在不同时期也利用帝国）来阻挠统一，或者在统一已经达到的时候，利用教会来破坏和削弱统一。 348

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所发生的事情已说明了这一点。经过了三代人，三代爱国者、思想家、梦想家、士兵、诗人、音乐家、政

治家、革命家和冒险家，才于一八六一年达到了统一。然而，尽管很多人为统一作出了贡献，但是，这并不是全体意大利人所赢得的统一。并没有人民愤怒的浪潮来推动统一运动。相信复兴运动，相信国家会得到新生的人，是贵族中的少数自由派和进步派以及开明的资产阶级。广大群众、大多数上层人物和农民，都抱着怀疑和缺乏信心的态度观望着事态的发展。结果，民族国家，新生的意大利王国，成了一个容易破碎，毫不安全的结构。自由派使用种种狡猾手段才维持住他们的权力，这些手段和警察方法是外国压迫者和弱小诸侯早就用过的。他们自始至终不得不象所有的虚弱的政府一样，花大量的金钱来整顿军备，发动灾难性的战争，以激起强烈的爱国情绪，使人民处于一种狂热状态。他们耗尽了精力，主要是企图表明意大利是个伟大的世界强国。

各阶级人民大众与教会的联盟、大多数公民的怀疑和民族的性格，削弱了王国的基础。王国奋斗了几十年，企图培养一批精英，改良国家行政，鼓励工商业。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有些成就是独一无二的、令人羡慕的。但是，它从来没有真正解决根本问题。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它的鼎盛时期到了，它的军队打败了溃不成军、丧失斗志的奥匈敌人。但是，对这样一个不久前才成立的脆弱国家来说，用的力气太大了。统一的国家实际上已经崩溃。法西斯专政是警察性的上层建筑，它推迟了新意大利的覆灭，象木柱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土墙一样，支撑着意大利。到一九四四年，意大利在二次大战中失败，真相就大白了。随着盟军的进入，意大利人了解到，他们原来以为百年来的老问题已经最后解决，国家和人民已经新生，现代国家已经形成，其实只不过是使人伤心的巴洛克式的结构而已，而这个巴洛克式的结构牺牲了成百万人的生命，浪费了极为宝贵的可用资源，欺骗了最善良的意大利人达一百年之久。到头来，意大利只落得幻想破灭，一如既往地

顾影自怜。无政府状态遍及大地。这是意大利一向存在的无政府状态，有时是令人惬意的，无形地、自发地按照心照不宣的规则和习惯行事。以怀疑、忍耐和对人们弱点的宽容而使生活得到缓解。在短时间内，无政府状态往往是愉快的，肯定比严格的法律统治要令人满意些。但是，从长远看，它归根结蒂是不可言喻的痛苦、耻辱、不公和暴行的根源。

外国游客被迷住了。他们总是被“意大利的魅力”所征服。意大利人的生活是欢天喜地的、兴高采烈的、令人陶醉的。惬意的生活现在显得比以往更为惬意。很少有旅行者看到外表下面的丑恶、耻辱和痛苦。一百个人之中没有一个人能看出在闪闪发光的镀金表层下而一切都是彻底阴郁的，人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永远不得不苦中取乐，强作笑颜，讨人喜欢，以求糊口。他们怎么能理解这种使最好的意大利人也毫无作为的失意之感和无可奈何的不满情绪呢？伊尼亚齐奥·西洛纳的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描写这种情况，他说：“有一种悲哀，一种微妙的悲哀，不要把它误解为一般的悲哀，它是悔恨、幻灭和痛苦的结果，是美好的灵魂仅仅由于意识到人的命运而在内心深处产生的悲哀。……这种悲哀一直在聪明的意大利人中间普遍存在，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为了避 350
免自杀或发疯，采取了众所周知的一切逃避手段：他们强作欢颜，行为乖戾，放纵情欲，追求美食，热爱祖国，尤其喜欢玩弄词藻；在不同的境遇下，他们可以当警察、僧侣、恐怖分子、战争英雄。我认为，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象这些欢乐的意大利人那样凄凉和绝望。”

只有极少数土生土长的人意识到这些。外国人不懂得这些事情是不奇怪的。外国人之所以兴致勃勃，还因为他们总是发现他们不知不觉地处于优越的地位。意大利的社会结构可以比作橄榄树。这种树在一切树木中最具有意大利特色，从上面看和从下面

看显得完全不一样。它顶上的枝叶深绿有光，而底下的枝叶灰色带粉。意大利人的面孔从上面看显得妩媚、微笑、和气，但是，从下面看则显得矜骄傲慢、横蛮无礼、缺乏同情。外国人在意大利自然而然地侧身于统治阶级的荣誉行列。他们处于优越的地位。他们看意大利是从上面鸟瞰橄榄树。

意大利造成的幻觉给人一种解脱之感。有些国家信奉纪律，作细致的司法管理，培养宁折不弯的道德情操，注重全民教育，争夺军事上的光荣，勤恳地积累、分配和管理财富。这样的国家，不论是否真正达到了它们的理想，或者仅仅是景慕这些理想，都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它们很少是令人愉快的。即使那些追求自由的理想的国家，也可能令人窒息，令人感到压抑。因为自由毕竟只有不偏不倚地执行法律才能予以保证。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几个世纪以来吸引着那些想暂时摆脱他们的民族美德的人。每一个人，不管他在哪里出生，受过什么教育，有什么爱好，在心里都有一个小角落是意大利式的。在这个角落里，人们感到严格的管制令人厌烦，严格的道德规范令人窒息，战争的威胁令人可怕；在这个角落里，人们喜欢轻松并使人欢乐的艺术，景仰郁郁不得志的英雄人物，梦想从有条不紊的生活的约束下得到难以实现的解放。

351 意大利长期以来给人们提供的安慰，在今天比既往更为珍贵得无可比拟。西方世界现在陷入深刻的忧虑不安。西方人精神上的宁静和自尊是建立在传统美德的基础之上的，现在某些传统美德的价值的不可侵犯性也靠不住了。资产阶级的勤奋和节俭被认为对社会越来越有害无益；士兵们无畏的英雄气概再也不需要了；激烈的爱国主义已把人们和民族导向悲剧性的错误；伦理道德已失去其光辉；法律变得不稳定；再也没有谁真正知道究竟还有没有真理。强大民族的时代，以其种族优越性面自豪的时代，主宰

自己命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那些遥远的、实际上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人所决定。这些人就跟十六世纪时意大利人眼中的查理五世一样，强大有力，可望而不可及。他们可以使我们富，也可以使我们穷。他们可以让我们活，也可以把我们全部杀死在睡榻之上。工业化大众社会的严密组织变得越来越令人窒息。人们为了要得到越来越多的俗不可耐的物质财富，不得不象苦役犯那样不停地工作着。向他们灌输的思想都是现成的，给他们提供的艺术都是当局批准的；用以娱乐他们的场面，用以迷惑他们的仪式，用以激励他们的标语口号，用以打动他们的集体感情，都是千篇一律的。现代人在越来越大的没有个性特征的组织的迷宫里，惶然不知所措。只要他们有时间摆脱这种喧嚣，坐下来想想自己，他们就会陷入孤独寂寞和烦闷无聊之中。

生活的艺术，意大利为了击败严格管制而发展起来的这种声名狼藉的艺术，现在正在变成许多人争取生存的宝贵指南。“惬意的生活”正在传播到那些轻视它、害怕它的国家，或者正在那些希望它并不存在的国家表现出来。任何地方的纳税人都试图逃避他们的神圣责任。生活中的小乐趣已获得了新的意义，佳肴、美酒、郊游、漂亮的姑娘、打败对手、甜美的音乐等等。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很自然地云集意大利。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以为，这是度假的好地方。他们为这愉快的宁静之感、心头的轻松之感所吸引。实际上，在他们被吸引去的这个地方，当代世界纠缠不清的新问题到处作祟。本地人很久以前就学会了在这些问题中过日子。其他西方人刚刚进入新的巴洛克时代。许多人还有点勉强，不大相信，缺乏准备。他们还抱着旧日公认的行事之道，并且每当他们发现再也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时，总是感到诧异。意大利人已经发明了古老的计策来克服烦闷和纪律，忘掉耻辱和不幸，催烦恼入睡，在离群索居中寻求舒适。他们还

记得悠远的黄金时代，并且渴望在纵情狂欢中重建那样的时代。他们不犯某些急不可耐的外国人所犯的那种错误。这些外国人盲目地冲进新的人生跑道，不加区别地接受一切腐朽的、伪善的解决办法。意大利人知道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的效用是相对的，知道哪些诡计危险，哪些诡计是靠不住的。他们知道应该在哪里止步。在较小的程度上，意大利也许已又一次成为各民族的教师。

* * *

除了短期的游客外，谁也不认为意大利的生活方式是成功的。它不解决任何问题。它使得问题更为恶化。如果它使意大利人有起码的幸福，本来也可以勉强算是成功。但是，它没有使意大利人幸福。当然，人民享受到它那眼前的好处，如果没有一点眼前的好处，他们便不能忍受那样的生活。但是，他们经常由于不满意而感到苦恼。他们今天一如既往地对他们的命运怒火满腔。在过去一百六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处于革命的边缘，轮番地革国王的命，革外国统治的命，革教會的命，革分裂的命，革地主的命，革资本家的命，革集中化的命。所有这一切当然都在不同的时候对增加民族疾病起了一份作用。政治家们不停地以法律和体制来进行修补。但是，根本的病因谁也没有抓住。使得一切法律和体制实行起来都有缺陷的，是意大利的生活方式，是误以为问题已得到解决的幻觉，是贪图安逸，是顺从地接受人们曾经试图克服的弊端，是对这些弊端加以装饰、使之显得崇高的伎俩，以各种不同的名称来称呼这些弊端、并带着这些弊端过活的伎俩。未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不可避免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产生灾难。意大利人经常清楚地眼看着下一次灾难的到来，但是，象作恶梦的人一样，毫无办法避开它。他们只能作使人娱乐的游戏，力求保卫他的家人，使之免遭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袭击，并且暂时欺骗自己。他们以这样一种想法来安慰自己：当烟消云散之后，意大利

就能再一次兴起，好象长生鸟从灰烬中重新飞起来那样。她不一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吗？个人用以追求私利和保卫他自己的顽强性和迫切性，他对高尚理想和动机的怀疑，壮观的表演，普遍流行的对人的怪癖的放纵，使得意大利人的生活愉快，可以忍受，尽管普遍存在着贫穷、暴政和不公。他们还浪费最优秀的意大利人的努力，使他们白白牺牲，并且使得贫穷、暴政和不公十分难以克服。

专 名 索 引

(条目后数字系原书页码, 检索时请查本书边码)

- Abruzzi, 阿布鲁齐, 161, 250
Acton, Lord, 阿克顿, 勋爵, 185
Acuto, Giovanni, 阿库托, 乔万尼, 18
Adams, Henry, 亚当斯, 亨利, 38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 62, 255
Aetna, Mount, 埃特纳山, 47
Africa, 非洲 (阿非利加), 1, 56, 160
Agrigento, 阿格里真托, 250, 262, 279
Alba, Duke of 阿尔巴大公, 323
Albani, Cardinal Alessandro, 阿尔巴尼, 亚历山德罗红衣主教 33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160, 257, 297
Alberoni, Cardinal Giulio, 阿尔贝罗尼, 朱利奥红衣主教 241
Albornoz, Cardinal Gild', 达尔博诺斯, 红衣主教, 134
Aldobrandini family, 阿尔多布兰迪尼家族 204—5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16
Alexander VI, Pope, 亚历山大六世, 教皇 278—288, 290, 293, 294
Alexandria, 亚历山大, 340
Alfieri, Vittorio, 阿尔菲耶里, 维托里奥 340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54
Algiers, 阿尔及尔, 53
Alps, 阿尔卑斯山, xiii, 16, 18, 19—20, 30, 56, 251, 291, 298, 299
Amalfi, 阿马非, 190
America, 美国, xi, 97, 106, 224, 235, 257, 275, 287, 294;
 artists and students from, 来自美国艺术家和学者 49—50;
 natural beauty of, 美国的天然美 56;

- post-war aid, 战后援助 85, 174—5;
 Sicilian immigrants to, 西西里移民 207—8, 264, 268, 282—5;
 Mafia myth 黑手党神话 281—3
- Amico, Salvatore d', 达米科, 萨尔瓦托尔, 271
- Anagni, 安那尼, 123
- Adria, Don Fabrizio Carafa, Duke of, 安德里亚, 唐法布里齐奥·卡拉法, 公爵, 214
- Angelico, Fra, 安杰利科, 弗拉, xi 注
- Ankhor Vat, 吴哥窟, 55
- Annunzio, Gabriele d', 邓南遮, 加布里埃莱, 79, 93, 138, 250
- Antwerp, 安特卫普, 323
- Apennines, 亚平宁 291, 295
- Appian way, 阿庇安路 31, 48
- Apulia, 阿普利亚, 45, 47, 248
- Arcetri, 阿切特里 169
- Archimedes, 阿基米得 262
- Aristotle, 亚里斯多德, 39
- Ascham, Roger, 阿夏姆, 罗杰, 28
- Asquith, Lady Cynthia, 艾斯奎斯, 辛西娅夫人, 41
- Assisi, 阿西西, 45
- Asti, 阿斯蒂, 291, 298
- Auden, W. H., 奥登, ix
- Aurelian way, 奥雷里安大道 16
- Austerlitz, 奥斯特利茨, 187
- Austria, 奥地利, xiii, 5—6, 144, 207, 211, 304, 346, 349
- Avanti!, 《前进!》, 142, 144, 145
- Avignon, 阿维农, 123, 124—5, 133
- Azeglio, Massimo d', 达泽利奥, 马西莫, 188
- Bacciochi, Prince Felice, 巴乔基, 弗利塞亲王, 205
- Bacciochi, Elisa Bonaparte, Princess, 巴乔基, 埃利萨·波拿巴公主,

- Bajazet II, Sultan, 巴亚泽特二世, 苏丹, 290, 293
- Balabanova, Angelica, 巴拉巴诺娃, 安格利卡, 141
- Balbo, Italo 巴尔博, 伊塔洛, 146
- Balkans, 巴尔干 160
- Balsamo, Giuseppe (Count of Cagliostro), 巴尔萨莫, 朱塞佩, (卡廖斯特罗伯爵), 98—104
- Barberini family, 巴尔贝里尼家族 205
- Bari, 巴里 250, 255
- Barletta, 巴列塔, 323, 340
- Barnum, P. T., 巴农 152, 162
- Beauharnais, Eugène de, 博阿尔奈, 尤金·德, 206
- Belgium, 比利时, 50
- Bellarmino, Roberto, 贝拉明, 罗伯托, 316
- Bellini, Vincenzo, xin., 贝利尼, 温琴佐, xi注 262
- Bembo, Pietro, 本博, 皮埃特罗 309
- Benedetti, Abbé Lucantonio, 贝内代蒂, 卢肯托尼奥神父, 101—3
- Benevento, 贝内文托, 240
- Bentinck, Lord William, 本廷克, 威廉勋爵, 346
- Bentivoglio, Count Ulisse, 本蒂沃利奥, 乌利塞伯爵 214
- Bentivoglio, Donna Pellegrina, 本蒂沃利奥, 唐娜·佩莱格里纳, 214
- Berenson, Bernard, 贝伦森, 贝尔纳, 9
- Bergamo, 贝加莫, 62
- Berlin, 柏林, 55
- Bernardino da Siena, Saint, 圣贝尔纳迪诺·达谢纳, xi注
- Berni, Francesco, 贝尔尼, 弗朗切斯科, 309
- Bernini, Lorenzo, 贝尔尼尼, 洛伦佐, xi注, 205, 317
- Bernis, Cardinal de, 贝尔尼斯, 的红衣主教, 102—3
- Bettina, 贝蒂娜, 52
- Biarritz, 比亚里茨, 88
- Bisacquino, 比萨奎诺, 273

Bisticci, Vespasiano da, 比斯蒂奇, 韦斯帕夏诺·达, 20
 Black Hand, 黑手, 275
 Black Prince, Edward the, 黑太子, 爱德华, 18
 Boccaccio, Giovanni, 薄伽丘, 乔万尼, xi 注
 Bohemia, 波希米亚, 309
 Bohlen, Crupp Von, 波伦, 克鲁伯·冯, 9
 Bologna, 博洛尼亚, xi, 17, 168, 214, 308—9, 317
 Bonaparte family, 波拿巴家族, 205—6, 207
 Bonaparte, Madam Letizia, 波拿巴, 莱蒂齐亚夫人, 114
 Bonaparte, Lucien, Prince of Canino, 波拿巴, 卢西恩, 卡尼诺亲王,
 205
 Bonaparte, Prince Napoleon, 波拿巴, 拿破仑亲王, 207
 Boncompagni family, 邦孔帕尼亚家族, 204, 205
 Book of the Courtier, The (Castiglione), 《为臣之道》(卡斯蒂廖内),
 86—7
 Bordighera, 博迪盖拉, 11
 Borghese family, 博尔盖塞家族, 205
 Borghese, Prince Camillo, 博尔盖塞, 卡米洛亲王, 206
 Borghese, Pauline Bonaparte, Princess, 博尔盖塞, 波林·波拿巴公
 主, 206
 Borgia, Cesare, 博尔贾, 切萨雷, 293
 Borgia family, 博尔贾家族, xi 注
 Borgia, Cardinal Roderigo (later Pope Alexander VI), 博尔贾, 罗得
 里哥红衣主教 (后来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287
 Borromeo family, 博罗梅奥家族, 204
 Borromeo, Saint Charles, 博罗梅奥, 圣查尔斯, 204, 320
 Borromeo, Count Giovanni, 博罗梅奥, 乔万尼伯爵, 214
 Borromeo, Countess Giulia Sanseverino, 博罗梅奥, 朱利亚·圣塞韦
 里诺伯爵夫人, 214
 Borromini, Francesco, 博罗米尼, 弗朗切斯科, 205, 318
 Boston, 波士顿, 55

- Boswell, James, 波斯维尔, 詹姆士, 30
 Botticelli, Sandro, 波提切利, 桑德罗, 6—7
 Bourbon, Constable of, 波旁王室的总管, 305
 Boxer Rising 义和团起义, 303
 Bragadin, Admiral, 布拉加丁, 海军将军, xi 注
 Brenner Pass, 布伦纳山口, 161
 Bresci (assassin), 布莱西, 114
 Brescia, 布雷夏, 91
 Bricconet, Cardinal, 布里孔内特, 红衣主教, 293
 Brolio, 布罗利奥, 216—17
 Broses, Charles de, 布罗塞斯, 查尔斯·德, 335
 Browning, Elizabeth Barrett, 勃朗宁, 伊利莎白, 巴尔雷特, 9
 Browning, Robert, 勃朗宁, 罗伯特, 9
 Bruno, Giordano, 布鲁诺, 焦尔达诺, xiii, 327
 Bukharin, N. I., 布哈林, 115
 Bülow, Prince von, 俾娄, 亲王, 冯, 101
 Buoncompagno, Giacomo, 布翁孔帕尼奥, 贾科莫, 204
 Burgos, 布戈斯, 187
 Burgundy, 勃艮第, 304
 Byron, Lord, 拜伦勋爵, 9, 39—40, 43—4, 138, 215

 Cabala. The (Wilder), 《阴谋》(怀尔德), 239
 Cabot, John and Sebastian, 卡波特, 约翰和塞巴斯蒂安, xi 注
 Caesar, Julius, 凯撒, 尤利乌斯, 31, 123
 Cagliostro, Count Alessandro di, 卡廖斯特罗, 亚历山德罗伯爵, xi 注,
 96, 98—104
 Calabria, 卡拉布里亚, 327
 Calcagnini, Clelio, 卡尔卡尼尼, 克莱利奥, 328
 Caligula, 加利古拉, 74
 Campagna, 罗马城郊, 30, 204
 Campanella, Tomaso, 康帕内拉, 托马索, xi 注, xii

Canino, 卡尼诺, 205
 Cannae, plain of, 卡纳, 平原, 30—1
 Caporetto, 卡波雷托, xiii
 Capponi, Piero 卡波尼, 皮耶罗, 292
 Capri, 加普里, 9, 11, 31, 52, 178
 Capulet family, 卡普莱家族, 228
 Carabinieri, 宪兵, 224—5
 Caracci family, 卡拉奇家族, 317
 Caracciolo, Prince Francesco, 卡拉乔洛, xi 注
 Carafa, Don Fabrizio, Duke of Andria, 卡拉法: 唐·法布里齐奥, 安德里亚公爵, 214
 Caravagio, Michelangelo de, 卡拉瓦焦, 米开朗琪罗, xi 注, 317
 Carnesecchi, Pietro, 卡尔内塞基, 彼得罗, 327
 Caroline (Bonaparte), Queen of Naples, 卡洛琳 (波拿巴), 那不勒斯王后, 206
 Casanova, Giacomo, 卡萨诺瓦, 贾科莫, xi 注, 96—8, 103—4
 Casati, Countess Terasa Confalonieri, 卡萨蒂, 泰拉萨·孔法洛涅里伯爵夫人, 211
 Casatico, 卡萨蒂科, 86
 Cassian way, 卡夏安大道, 16, 30
 Castelfidardo, 菲达尔多堡, 245
 Castiglione, Baldassar, 卡斯蒂廖内, 巴尔达萨尔, 86—7
 Catania, 卡塔尼亚, 62, 264, 274, 282
 Catarina da Siena, Saint, 圣卡塔里纳, xi 注
 Catherine, Queen of Westphalia, 凯瑟琳, 威斯特法利亚王后, 206
 Catholic Action, 天主教行动团, 230
 Cavowr, Count, 加富尔伯爵, xi 注, 239, 252
 Cellini, Benvenuto, 切利尼, 本韦努托, xi 注, 305, 317
 Cerceau, Abbé Jean Antoine de, 切尔切奥的神父安托伊内, 138
 Cesena, 切泽纳 291
 Chaos, “混乱” 250

- Charlemagne, 查理曼大帝, 17, 268, 308
- Charles V. Emperor, 查理五世皇帝, 27, 168, 288, 351;
and sack of Rome, 和罗马的屠城, 305, 306—8;
Crowned at Bologna, 在博洛尼亚加冕, 308—9, 311, 317
- Charles of Bohemia, 波希米亚的查理, 131
- Charles VIII of France, and Fornovo, 法国的查理八世和福尔诺沃,
288—302, 303
- Chateaubriand, Vicomte de, 沙多布里昂, 子爵, 德, 37—8
- Chaucer, Geoffrey, 乔叟, 杰弗里, 17, 81
- Chesterfield, Lord, 切斯特菲尔德, 勋爵, 172
- Childe Harold(Byron), 《查尔德·哈罗德历险记》(拜伦), 138
- China, 中国, 11, 54, 199, 251, 302, 303
- Chitarella, Mgr, 齐塔雷拉, 阁下, 191
- Christian Democrat Party, 天主教民主党, 120, 206, 225, 230,
253, 281, 347
- Church, 教会, 108, 137, 225, 308,
and miracles, 教会和奇迹, 45—6
and sainthood, 教会和圣徒, 46, 47—8
Mussolini's peace with, 墨索里尼与教会的和平, 150;
Guicciardini and, 圭恰迪尼和教会 169;
and cult of Madonna, 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 212—13;
influence and power of, 教会的影响和权力, 229—30, 314—15,
316—17, 346—8;
and Spain, 教会和西班牙, 314—15, 336—7;
and Baroque art, 教会和巴洛克风格的艺术, 317, 318, 319—
21, 326—33, 336—7;
and music, 教会和音乐, 319—20;
Machiavelli and, 马基雅维利和教会, 325, 347;
and inquisition, 教会和宗教法庭, 327, 329;
and Index, 教会和禁书目录, 329—30;
and Society of Jesus, 教会和耶稣会, 330—3

- Cicero, 西塞罗, 30, 123
- Ciociaria, 乔恰里亚, 214
- Cisa Pass. 奇萨山口, 295
- Clemenceau, Georges, 克列孟梭, 乔治, 266
- Clement V, Pope, 克莱门特五世, 教皇, 123
- Clement VI, Pope, 克莱门特六世, 教皇, 125, 131, 133
- Clement VII, Pope, 克莱门特七世, 教皇, 168, 204, 305, 308
- Coda di paglia, la(Piovene), 《干草尾巴》(皮奥维内), 232—3
- Code Napoléon, 拿破仑法典, 251
- Codice cavalleresco Italiano(Gelli), 意大利骑士约法, 192—4
- Cologne, 科隆, 20, 55
- Colonna family, 科隆纳家族, 124, 126
- Colonna, Giovanni, 科隆纳, 乔万尼, 126
- Colonna, Prince Marcantonio, 科隆纳, 马尔坎托尼奥亲王, 214
- Colonna, Prospero, 科隆纳, 普罗斯佩罗, 323
- Colonna, Stefano, 科隆纳, 斯特法诺, 126, 133
- Columbus, Christopher, 哥伦布, 克里斯多芬, xi注., 287
- Comiso, 科米索 262
- Commentaries on the Decades of Livy(Machiavelli) 《论李维的前十年》(马基雅维利), 180
- Communism, Communists,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者, 12, 112, 114—15, 116—17, 120, 173, 182, 200, 227, 230, 235, 236, 347
- Commynes, Philippe de, 孔米内斯, 菲利浦·德, 299
- Como, Lake, 科莫湖, 162
- Conjuration de Nicholas, dit de Rienzi(Cerceau), 《尼古拉斯的阴谋, 李恩佐传略》(切尔切奥), 138
- Constantine, Emperor, 君士坦丁, 皇帝, 130, 132
-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289, 293
- Contarini, Cardinal Gaspare, 孔塔里尼, 加斯帕雷, 红衣主教, 326
-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214—15
- Corberio, Eufrosina, 科尔贝里奥, 欧芙罗西娜, 214—15

Cordoba, Consalvo de, 科多巴, 孔萨尔沃·德, 323
 Corinne(De Staël), 《科林纳》(德施达尔), 53
 Correggio, Antonio da, 柯勒乔, 安东尼奥·达, 34
 Corriere della Sera, 《晚邮报》, 150
 Cortesi, Salvatore, 科泰西, 萨尔瓦托尔, 52
 Cortona, Pietro da, 科尔托纳, 彼得罗·达, 317
 Corvo, Baron(Frederick Rolfe), 科尔沃, 巴伦(弗雷德里克·罗尔夫), 28
 Coryat, Thomas, 柯里亚, 托马斯, 26
 Cosa Nostra, 自己的事情, 283—5
 Cosenza, 科森扎, 327
 Crécy, 克雷西 18
 Crevacuore, 克雷瓦库奥雷, 324
 Crimea, 克里米亚, 54
 Croce, Benedetto, 柯罗齐, 贝内代托, xi注., 154, 311, 322, 328, 331
 Crusades, 十字军东征, 17, 190, 191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297
 Dante Alighieri, 但丁, 阿利吉耶里, xi注, xii, 118, 137, 341
 Denmark, 丹麦, 50, 228
 Divina Commedia(Dante), 《神曲》(但丁), 118
 Djem, 德耶姆, 293
 Dorci, Carlo, 多尔奇, 卡尔洛, 318
 Dorci, Danilo, 多尔奇, 达尼洛, 277
 Donatello, 多纳泰罗, xi注, 59
 Donizetti, Gaetano, 多尼泽蒂, 盖塔诺, xi注
 Doria, Andrea, 多里亚, 安德烈亚, xi注., 308
 Douglas, Norman, 诺曼·道格拉斯, 9, 54, 82, 178
 Dovia di Predappio, 多维亚·迪普雷达皮奥, 140
 Duomo, 多莫, 19
 Düsseldorf, 杜塞尔多夫, 55, 71, 73

Dux, 达克斯, 98

Egypt, 埃及 50, 54, 55

"Egyptian Order", "埃及神社", 100, 101—2

Einaudi, Luigi; 艾瑙第, 路易吉, 109

Empedocles, 恩培多克勒, 262

England, 英格兰, xi, 18, 50, 97, 106, 144, 149, 190, 257, 288, 289, 309;

visitor from, 来自英格兰的游客, 22—3, 27—9, 31—2, 53;

D'Azeglio on, 达泽利奥论英格兰, 188;

Establishment, 英国的国教, 224

and Opium War, 英国和鸦片战争 302—3

Enti di Riforma, 土地改革公署, 254

Essex, 埃塞克斯, 19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153, 257

Fabius Maximus, 费比乌斯·马克西穆斯, 123, 214

Faenza, 法恩扎, xi

Farnese, Alessandro, 法尔内斯, 亚历山德罗, 323

Fascism, Fascist Party, 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党, 12, 112, 119, 120, 148, 164, 172, 182, 225, 231—2, 342—3, 349;

Collapse of, 法西斯党的崩溃 116—17, 349;

founding of, 法西斯的建立, 145;

scarcity of concrete achievements, 具体成就很少, 149—50;

and Mussolini's fall, 法西斯党和墨索里尼的覆灭, 160—1;

democratic parties under, 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民主党派, 230;

ambivalent attitudes to, 对法西斯的矛盾态度, 233—5;

buildings of, 法西斯的建筑物 254, 255

F. B. I.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美国)联邦调查局, 284, 285

Feliciani, Lorenza, 费丽恰妮, 洛伦扎, 99—100, 101, 103

Ferdinand II of Naples, 那不勒斯的费迪南二世, 251—2, 253
 Fermi, Enrico, 费米, 恩里科, xi 注
 Ferrara, 费拉拉, 88, 322, 328
 Ferro, Don Vito Cascio, 费尔罗, 唐·维托·卡希奥, 273—7, 278—9, 284
 Fiesole, 菲耶索莱, 38
 Filangieri, Carlo, 菲兰杰里, 卡尔洛, 187, 188, 324
 Filangieri Gaetano, 菲兰杰里, 加埃塔诺, 187
 Filicaja, Vincenzo da, 菲利卡亚, 文森佐·达, 341
 Flaminian way, 弗拉米尼安大道, 16
 Flaminio, Marcantonio, 弗拉米尼奥, 马尔坎托尼奥, 309
 Florence, 佛罗伦萨, 3, 9, 12, 18, 19, 38, 53, 59, 164, 175, 216, 294, 317, 324;
 Duomo, 多莫, 19;
 Loggia dei Lanzi, 兰奇画廊, 317;
 Palazzo Vernio, 韦尔尼奥宫, 320;
 San Miniato, 圣米尼阿托, 38;
 native of, 佛罗伦萨的本地人, 40, 59;
 under Medicis, 梅迪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 165, 167, 168, 169, 292;
 Teatro dell' arte begun in, 艺术剧院在佛罗伦萨开始活动, 318;
 and opera, 佛罗伦萨和歌剧, 320—1
 Florida, 佛罗里达, 54
 Foggia, 福贾, 47
 Fontanes, Marquis de, 封坦, 侯爵, 德, 37
 Forlì, 福尔利, 140, 143
 Formentor, 佛蒙特, 85
 Formia, 弗米亚, 30
 "Fornarina, La" (Raphael), "面包师的女儿" (拉斐尔), 7, 180
 Fornovo, 福尔诺沃, 295—302, 304, 306
 Fortebraccio, Bernardino, 福尔泰布拉乔, 贝尔纳迪诺, 296—8

France, 法兰西, xi, 11, 18, 50, 55, 97, 101, 106, 144, 190, 248,
 251, 304, 309, 323, 346
 visitors from, 来自法国的游客, 37—8;
 cuisine, 烹饪, 55
 Masons in, 法国的共济会, 224;
 and German occupation, 法国和德国人的占领, 229, 306;
 and Charles VIII's campaign 法国和查理八世的出征, 288,
 289—303;
 frequent military encounters, 频繁的军事冲突, 323—5, 340
 France, Anatole, 法朗士, 安纳托尔, 38
 Francesca, Piero de la, 弗兰切斯卡, 皮耶罗·德拉, xi 注
 Francis of Assisi, Saint, 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 xin, 45
 Franco, General, 弗朗哥将军, 233
 Frankfurt, 法兰克福, 55
 Frascati, 弗拉斯卡蒂 204—5
 Frederick I of Hohenstaufen, King of Sicily, 霍亨斯陶芬的非特烈
 二世, 西西里国王, xi 注, 274, 346
 Friuli, 弗留利 36

 Gaeta, 盖塔, 31
 Galilei, Galileo, 伽利略, 加利莱伊, xi 注, xii
 Gambara, Veronica, 甘巴拉, 韦罗尼卡 309
 Garda, Lake, 加尔达湖, 79, 161
 Gargano, Monte, 加尔加诺山, 45
 Garibaldi, Giuseppe, 加里波第, 朱塞佩, xi 注, 66, 111, 119, 123,
 146注., 256, 340, 346
 Gelli, Jacopo, 杰利, 雅各布 192—4
 Geneva, 日内瓦, 158, 313
 Genoa, 热那亚, xi, 48, 190, 218, 220, 289, 291, 335
 Genova, Gerolamo, 杰诺瓦, 杰罗拉莫, 300
 George, Saint, 圣乔治, 48

Germany, 德意志 (日耳曼), xi, 131, 137, 144, 190, 224, 248, 257, 288, 292, 304, 309;
 visitors from, 来自德国的游客, 2, 5—6, 37;
 medieval emperors' forays, 中世纪日耳曼皇帝的劫掠, 16—17, 345—6;
 artists and students from, 来自德国的艺术家和学者, 50;
 in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 120, 160, 161, 162, 228—9, 327;
 and sack of Rome, 日耳曼和罗马的洗劫, 305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Winckelmann), 《古代艺术史》 (温克曼), 34

Gesualdo, Don Carlo, 唐·卡尔洛·杰苏阿尔多, 214

Gesualdo, Donna Maria d'Avalos, 杰苏阿尔多, 唐娜·马利亚·达瓦洛斯, 214

Ghibelline party, 吉伯林党 (反教皇派), 16, 228, 346—7

Ghiberti, Lorenzo, 吉贝尔提, xi 注

Gibbon, Edward, 吉本, 爱德华, 32, 128, 135, 136

Giolitti, Giovanni, 焦利蒂, 焦万尼, 252

Giordano, Luca, 卢卡·焦达诺, 318

Giotto, 焦托, xi 注 45

Giovio, Paolo, 焦维奥, 保罗, 309

Giuliano, Salvatore, 朱利亚诺, 萨尔瓦托雷, 119, 272, 283

Gladstone, Mary, 格莱斯顿, 玛丽, 185

Goering, Hermann, 戈林, 赫尔曼, 17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 xi, 35—6, 37, 60, 81, 98—9

Gogol, Nikolai, 尼古拉·果戈理, 37, 81

Gonzaga, Francesco, Marquis of Mantua, 冈扎加, 弗朗切斯科, 曼图亚的侯爵, 295—302, 303

Gonzaga, San Luigi, 冈扎加, 圣路易吉, xi 注

Gorki, Maxim, 高尔基, 马克西姆, 9

-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 安东尼奥, 226—7
- Granada, 格拉纳达, 287
- Gray, Thomas, 格雷, 托马斯, 31
- Gray, William (later Bishop of Ely), 格雷, 威廉 (后来的伊利主教), 20
- Greece, 希腊, 33—4, 47, 55, 56, 160, 257, 320
- Gregory I, Pope, 格雷戈里一世, 教皇, 15
- Gregory XIII, Pope, 格雷戈里十三, 教皇, 204
- Gregory XV, Pope, 格雷戈里十五, 教皇, 205
- Grosse Generalstab, 参谋本部, 224
- Grosseto, 格罗塞托, 232
- Guarini, Battista, 巴蒂斯塔·瓜里尼, 322, 335
- Guazzi, Margherita, 马格丽塔·瓜琪, 33
- Guelph party, 盖尔菲党 (教皇派), 16, 228, 346
- Guercino, Il, 圭尔奇诺 317
- Guicciardini, Francesco, 圭恰迪尼, 弗朗切斯科, ix, xi 注, xv, 139, 164—72, 309, 345;
compared with Machiavelli, 与马基雅维利比较, 165—6;
character, 品格, 166;
realism, 现实主义, 164, 166, 169—72, 233;
career, 经历, 167—70;
his ricordi, 他的日记 169—72;
on Charles VIII of France, 圭恰迪尼论法国的查理八世, 288, 289
- Guicciardini, Piero, 圭恰迪尼, 皮埃罗, 166
- Guiccioli, Count, 圭乔利, 伯爵, 215
- Guiccioli, Teresa, 圭乔利, 泰雷萨, 215—16
- Guide for Southern Italy (Murray, 1858), 《南意旅游指南》(穆拉伊, 1858年版), 22
- Gustaf VI, King of Sweden, 古斯塔夫, 瑞典国王, 52
- Hale, J. R., 霍尔, 27—8

- Hamilton, Lady, 汉密尔顿, 夫人; 44
- Hawkwood, Sir John, 霍克伍德, 约翰爵士, 17—19, 50
- Hawthorne, Nathaniel, 霍桑, 纳撒尼尔, 8—9, 12, 41—2
- Heine, Heinrich, 亨利希·海涅, 37, 57, 319
- Henry VII, Emperor, 亨利七世, 皇帝, 123
- Henry VII of England, 英格兰的亨利七世, 86
- Henry of Cornwall, 康沃尔的亨利, 17
- Herculaneum, 赫库兰尼姆 34, 254
- Herzen, Alexander, 赫尔岑, 亚历山大, 39
- Hitler, Adolf, 希特勒, 阿道夫, 17, 85, 155, 156, 159—60, 161, 233
- Holland, 荷兰, 205, 228, 336
- Hollywood, 好莱坞, 56, 237
- Hong Kong, 香港, 54, 56
- Horace, 荷拉斯 31
- Howells, William Dean, 豪厄尔, 威廉·迪安, 59
- Hungary, 匈牙利, 50, 304, 309, 349
- Huxley, Aldous, 赫胥黎, 9
- Ibsen, Henrik, 易卜生, 亨利克, 38
- Index, 禁书目录 327, 329—30
- India, 印度, 55, 255, 257, 258
- Inquisition, 宗教法庭, 327, 329
- Iran, 伊朗, 55
- Irving, Washington, 华盛顿·欧文, 21—2
- Ischia, 伊斯基亚 11
- Ivrea, Ardoim, Marquis of, 伊夫雷亚, 阿尔多因, 侯爵, 346
- James, Henry, 詹姆士, 亨利, 38, 58—9, 205
- Januarius, Saint, 亚努留斯, 圣, 48
- Japan, 日本, 316

- Jérôme, King of Westphalia, 热罗姆, 威斯特法利亚国王, 206
- Jerusalem, 耶路撒冷, 307
- Jesus, Society of, 耶稣会, 101, 230, 327, 330—3
- Jews, 犹太人, 199, 328
- Joan, Queen of Naples, 约安, 那不勒斯王后, 133
- John the Evangelist, Saint, 约翰, 使徒, 圣, 213
- John XXIII; Pope, 约翰二十三世, 教皇, 206
- Johnson, Samuel, 约翰逊, 塞缪尔, 29
- Jorio, Canon Andrea de, 约里奥, 卡农·安德烈, 德, 67—8
- Joseph, King of Naples, 约瑟夫, 那不勒斯国王, 205, 251, 253
- Juarez, Benito, 胡阿雷斯, 贝尼托, 140
- Juliana, Queen of the Netherlands, 朱利安娜, 尼德兰 (比利时) 女王, 52
- Julius II, Pope, 朱利叶斯二世, 教皇, 293, 306, 341
- Juvara, Filippo, 尤瓦拉, 菲利波, 318
- Kesselring, General Albert, 凯塞林, 阿尔伯特, 将军, 205, 292
- Kaunitz, Prince, 康尼茨亲王, 35
- Keats, John, 济慈, 约翰, 26
- Kreuger, Ivar, 克留格尔, 伊瓦尔, 97
- Krupp von Bohlen, Gustav, 克鲁伯·冯波伦, 古斯塔夫, 9
- La-Motte, Captain, 拉莫特, 上尉, 323
- La Rochelle, 拉罗谢尔, 323
- Lamartine, Alphonse de, 拉马丁, 阿芳塞·德, 324
- Lamoricière, General Léon de, 拉莫里西埃雷, 利昂·德, 将军, 245
- Lampedusa, Giuseppe di, 兰佩杜萨, 朱塞佩·迪, 262, 263
- Landor, Walter Savage, 兰道, 沃尔特·萨维奇, 40
- Langhe, the, 兰盖, 153
- Lanza di Trabia, Prince Don Raimondo, 特拉比亚的兰扎, 唐拉伊蒙多亲王, 274

Las Vegas, 拉斯维加斯 56
 Lassels, Richard, 拉塞尔, 理查德, 29
 "Last Judgement"(Michelangelo), 《最后的审判》(米开朗琪罗), 317
 Latini, Latino, 拉蒂尼, 拉蒂诺, 329
 Latium, 拉丁姆, 15
 Lausanne, 洛桑, 141, 143
 Lavater, Johann Kaspar, 拉瓦特, 约翰·卡斯帕, 98
 Law, John, 劳, 约翰, 97
 Lawrence, D. H. 劳伦斯, 41
 Lear, Edward, 李尔, 爱德华, 11
 Leghorn, 莱戈恩, xi, 292
 Lenin, 列宁, 141
 Leningrad, 列宁格勒, X, 55
 Leo X, Pope, 利奥十世, 教皇, 167
 Leonardo da Vinci, 莱昂纳多·达芬奇, xi 注
 Leopardi, Giacomo, 列奥巴尔迪, 贾科莫, xi 注, xv, 341
 Lepanto, 勒班托, 323
 Lerici, 莱里奇, 9
 Li Causi, Girolamo, 吉罗拉莫·利考西 281
 Libro del cortegiano, Il(Castiglione), 《为臣之道》, (卡斯蒂廖内),
 86—7
 Libya, 利比亚, 54
 Liddell Hart, B. H. 利德尔·哈特, 296
 Liechtenstein, 列支敦士登, 57
 Livy, 李维, 123
 Lloyd George, David, 劳埃德·乔治, 戴维, 266
 Lollobrigida, Gina, 洛洛布里吉达, 吉纳, 214
 Lombardy, 伦巴第, 200, 207, 251
 London, 伦敦, 55
 Loreto, 洛雷托, 45, 212
 Lorrain, Claude, 罗兰, 克劳德, 37

- Louis of Bavaria, 巴伐利亚的路易斯, 131
- Louis, King of Holland, 路易斯, 荷兰国王, 205
- Louis, King of Hungary, 路易斯, 匈牙利国王, 133
- Louis XIV, 路易十四, 94, 237
- Loyola, Saint Ignatius, 罗耀拉, 圣依格内秀斯, 330, 333
- Lucca, 卢卡, 88, 205
- Luciano, Lucky, 卢恰诺, 卢基, 281—2
- Ludovisi family, 卢多维西家族, 205
- Ludovisi, Cardinal Ludovico, 卢多维西, 卢多维科红衣主教 205
- Ludwig, Emil, 路德维希, 埃米尔, 163
- Lugo, 卢戈, 69
- Luxemburg, 卢森堡 57
- Lys Rouge, Le (France), 《红百合花》(法朗士), 38
- Lytton, Edward Bulwer, Lord, 李顿, 爱德华·布尔沃, 勋爵, 42, 138
- Macaulay, Lord, 马考莱, 勋爵, 38
- Machiavelli, Niccolò,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xi 注., xii, xiii, xv, 19, 28, 137, 180—1, 190, 325, 347;
compared with Guicciardini, 与圭恰迪尼比较, 164—6
- Madrid, 马德里, xi
- Mafia, 黑手党, 66, 112, 150, 186, 230;
family network, 黑手党的家族网络, 207—8;
and police forces, 黑手党与警察, 225;
power and extent of, 黑手党的势力范围, 264—7;
“protection” and favours, “保护”和恩惠, 265—7, 269—70, 277—9;
origin and definition of, 黑手党的由来和定义, 267—8;
compagnie d'armi and, “军团”和黑手党, 267—9;
spotless outward lives, 表面生活无懈可击, 268;
modern forms of, 黑手党的现代形式, 267—70;

- family nucleus of, 黑手党的家庭核心, 270—2;
- formation of cosche and consorterie, 科斯卡和朋党的形成, 271—3;
- feuds, 世仇, 长期不和, 271—2;
- heads of, 黑手党的首脑, 272, 273—6, 278—81;
- wrong not recognized, 不知道所干的是坏事, 276—8;
- American myth of worldwide conspiracy, 美国的世界阴谋集团的神话, 281—3;
- effect of, 黑手党的影响, 285—6;
- degeneration, 衰退, 286
- Magnasco, Alessandro, 马尼亚斯科, 亚历山德罗, 317
- Malta, Knight of, 马耳他, 骑士团, 101, 230
- Mann, Thomas, 托马斯·曼, 54
- Mantua, 曼图亚, 88, 302
- Manzoni, Alessandro,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 xi 注
- Marble Faun, The(Hawthorne), 《凡的大理石像》(霍桑), 42
- Marbot, Baron de, 马博特, 男爵, 德, 36
- Marcellus, 马切卢斯, 123
- Marconi, Marchese, 马可尼, 马尔凯塞, xi 注
- Marcus Aurelius, 马可斯·奥雷利乌斯, 131
- Maremma, 马雷玛, 205
- Maria Clotilde, Princess, 玛丽亚, 克洛蒂尔德公主, 207
- Maria Theresa, Empress, 玛丽亚·特里萨女皇, 35
- Marienzell, 马里安佐, 187
- Marino, Giovanbattista, 马里诺, 乔万巴蒂斯塔, 331
- Marseilles, 马赛, 289
- Mary, Virgin, 圣母马利亚, 45, 212—13
- Masons, 共济会, 224, 230, 231
- “Mass of Pope Marcellus”(Palestrina)《马尔切卢斯教皇弥撒曲》(帕莱斯特里那), 320
- Massimo family, 马西莫家族, 214—5

- Maximilian I, Emperor, 马克西米连一世, 皇帝, 140, 289
Maximus, Valerius, 马克西姆斯, 瓦莱里乌斯, 123
Maykov, Apollon Nicolayevich, 马依科夫, 阿波隆尼科拉耶维奇,
37
Mazarin, Cardinal, 马扎林, 红衣主教, 323
Mazzarino, 马扎里诺, 265
Mazzini, Giuseppe, 马志尼, 朱塞佩, xi 注, xii
Mazzola, Francesco, 马佐拉, 弗朗切斯科, 309
Medici family, 梅迪奇家族, 165, 167—8, 346
Medici, Alessandro de, 梅迪奇, 亚历山德罗·德, 168
Medici, Catherine de, 梅迪奇, 凯塞琳·德, 318
Medici, Cosimo I de, 梅迪奇, 科西莫第一, 德, 168, 313
Medici, Lorenzo de, 梅迪奇, 洛伦佐·德, xi 注, 287, 288
Medici, Piero de, 梅迪奇, 皮耶罗·德, 291—2
Megara, 迈加拉, 258
Mengs, Raphael, 门斯, 拉斐尔, 33, 34, 35
Menotti, Gian Carlo, 梅诺蒂, 季安·卡尔洛, 50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55
Messina, 墨西拿, 17, 66, 250, 264
Metellus, 梅特卢斯, 123
Mezzogiorno, 南方 106;
problem of, 南方问题, 245—61
Michael, Saint, 米歇尔, 圣, 45
Michelangeli, Benedetti, 米开朗杰利, 贝内代蒂, 49
Michelangelo, 米开朗琪罗, xi 注, 92, 317, 318
Miei ricordi, I(D'Azeglio), 自传(达泽利奥), 188
Milan, 米兰, xi, 6, 53, 71—3, 204, 214, 260, 294, 336;
Galleria, 加莱里亚, 72;
La Scala, 斯卡拉, 55, 256;
Palazzo Borromeo, 博罗梅奥宫, 204;
Via Monte Napoleone 拿破仑山大街, 72;

- Lawrence on, 劳伦斯论米兰, 41;
Mussolini in, 墨索里尼在米兰, 142—3, 145, 146, 162;
his body displayed in, 在米兰悬尸示众, 163;
merchants compared with Neapolitans, 米兰商人与那不勒斯人
比较, 246—9
- Milton, John, 密尔顿, 约翰, 29, 81
- Mimica degli antichi investigata nel gestire napoletano, La(Jorio),
《通过那不勒斯人的手势来解释的古人手势》(约里奥), 67—8
- Missiroli, Mario, 米西罗利, 马里奥, 154, 329
- Mocenigo, Admiral, 莫切尼戈, 海军将军, xi 注
- Modena, 摩德纳, 88, 167
- Modigliani, Amedeo, 莫迪利亚尼, 阿梅代奥, xi 注
- Molotov, V. M., 莫洛托夫, 115
- Molza, Francesco Maria, 莫尔扎, 弗朗切斯科·马利亚, 309
- Monelli, Paolo, 莫内利, 保罗, 152
- Montréal brothers, 蒙雷阿勒两兄弟, 134
- Mont Blanc, 勃朗峰, 38
- Mont Cenis Pass, 切尼斯山口, 18
- Montague family, 蒙塔古家族, 228
- Montaigne, Michel de, 蒙塔伊内, 米凯尔·德, 22, 164
- Montalto, Cardinal, 蒙塔尔托, 红衣主教, 204
- Monte Carlo, 蒙特·卡罗 57, 88
- Monte Mario, 马里奥山, 91
- Montecuccoli, Raimondo, 蒙特库科利, 拉伊蒙多, xi 注, 323
- Monteverdi, Claudio, 蒙泰威尔迪, 克劳迪奥, xi 注, 320
- Montevideo, 蒙得维的亚, 146 注
- Montferrat, 蒙特费拉特, 291
- Montfort, Guy de, 蒙泰福特, 圭·德, 17
- Montgenevre pass, 蒙特热内弗尔山口, 291
- Monthe Axel 芒思, 阿克塞尔, 9
- Monza, 蒙扎 50, 308

- Moore, Thomas, 穆尔, 托马斯, 39—40
- Moravia, Alberto, 莫拉维亚, 阿尔贝托, 85, 93, 183
- Morgagni, Manlio, 莫尔加尼, 曼利奥, 143
- Morgan, J. P., 摩根, 52
- Mori (prefetto), 莫里, 行政长官, 276, 280
- Mornings in Florence (Ruskin), 《佛罗伦萨之晨》(拉斯金), 40
- Moro, Ludovico il, 莫罗, 卢多维科, 288, 289, 290, 300
- Morocco, 摩洛哥, 54
- Morosini, Francesco, 莫罗西尼, 弗朗切斯科, xi 注
- Moscow, 莫斯科, X, 55, 89, 115, 138
- Müller, Chancellor, 米勒, 首相, 35
- Munich, 慕尼黑, 55, 56
- Munthe, Axel, 芒思, 阿克塞尔 9
- Murat, Joachim, 穆拉特, 约阿希姆, 187, 206, 251, 253, 346
- Murat, Caroline Bonaparte, 穆拉特, 卡罗琳·波拿巴, 206
- Musco, Giovanni, 穆斯科, 乔万尼, 172
- Muscovy, 莫斯科, 16. 也请看俄罗斯
- Musset, Alfred de, 缪塞, 阿尔弗雷德·德, 9, 38
- Mussolini, Arnaldo, 墨索里尼, 阿纳尔多, 158
- Mussolini, Benito, 墨索里尼, 贝尼托, 12, 114, 117, 123, 129, 172, 239, 252—3, 294;
 analogy with Cola di Rienzo, 与科拉·迪·李恩佐相似之处, 139—40, 162, 163;
 early career, 早期的经历, 140—2;
 “apostle of violence”, “暴力鼓吹家”, 141, 143;
 edits *Avanti!*, 编辑《前进》报, 142, 144—5;
 in Milan, 墨索里尼在米兰, 142—3
 strange charm, 奇怪的魅力, 143;
 irresolution over First World War,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犹豫不决, 144—5;
 founds Fascist Party, 建立法西斯党, 145;

contrast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mage, 公开形象和私下形象的鲜明对照, 145—7;

his wearing of black, 他穿戴一身黑 146, 147, 310;

and march on Rome, 墨索里尼和向罗马进军, 146—7;

his two decades of power, 他执政二十年, 147—60;

scarcity of concrete achievement, 具体成就很少, 145, 150;

facile approach to problems, 解决问题的捷径, 150;

reason for failure, 失败的原因, 151—3;

as a showman, 一个好表现的人, 152—60;

his use of deceit, 他使用欺骗手段, 155—9;

Self-deception, 自己欺骗自己, 157—60;

flatterers of, 墨索里尼的谄媚者, 158—9, 233, 234;

fall from power, and death, 垮台和死亡, 160—3;

theft of his hat, 他的礼帽被盗。

Mussolini (later Ciano), Edda, 墨索里尼(后来的奇亚诺), 埃达, 143

Mussolini, Rachele, 墨索里尼, 拉凯莱, 114, 142—3, 146

Naples, 那不勒斯, xi, xiii, 30, 44, 53, 62, 72, 79, 80, 88, 119,

185, 186, 187, 205, 214, 247, 248, 250, 256, 346;

(city) Bourbon Museum, 波旁博物馆 67;

Via Caracciolo, 卡拉奇奥罗大街, 67;

patron saint, 守护神, 48;

and mimicry, 那不勒斯的手势, 67—8;

and art of flattery, 谄媚的伎俩, 82, 84;

merchants compared with Milanese, 那不勒斯商人与米兰人相比较, 246—8, 249;

Problems of, 那不勒斯的问题, 252, 253, 254—5;

decaying factories, 衰败的工厂, 253—4;

(Kingdom) Charles VIII of France and, 法国的查理八世和那不勒斯, 288, 289, 291, 293—5;

fighting men of, 那不勒斯的战斗人员, 323;

- plenitude of title, 到处是街头, 335
- Napoleon, 拿破仑, xi 注, 17, 114, 138, 156, 187, 205, 342, 346
- Napoleon III, 拿破仑第三, 207
- Nelson, Lord, 纳尔逊, 勋爵, 44
- Nere, Giovanni della Bande, 内雷, 乔万尼·达莱·班代, xi 注
- Nero, 尼禄, 30, 94
- Nervi, Pier Luigi, 内尔维, 皮耶尔·路易吉, 49
-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 56
- New York, 纽约, 55, 56, 71, 73, 85
- New York State, 纽约州, 56
- North Africa, 北非, 106, 257, 294
- Noto, 诺托, 262, 279
-
- Ojetti, Ugo, 奥耶蒂, 乌戈, 153
- Opium War, 鸦片战争, 302—3
- Orfeo (Monteverdi) 《奥尔菲奥》(蒙特威尔迪), 320
- Orlando, Vittorio, 奥兰多, 维托里奥, 266
- Orléans, Henri d', 奥林斯, 亨利·德, 324
- Orsini family, 奥尔西尼家族, 124
- Ovid, 奥维得, 25
-
- Pacelli family, 帕切利家族, 206
- Padua, 帕杜阿 17
- Padula, 帕杜拉 275
- Paestum, 派斯图姆, 33, 69
- Paganini, Nicolò, 帕格尼尼, 尼科拉, 95
- Paleario, Antonio, 帕莱亚里奥, 安东尼奥, 327
- Palermo, 巴勒莫, 66, 99;
- power station, 巴勒莫发电站, 255—6;
- and Mafia, 巴勒莫和黑手党, 264, 267, 272, 273, 274, 275—6, 279, 281, 283;

Palestrina, Giovanni, 帕莱斯特里纳, 乔万尼 xi 注, 319—20
 Palladio, Andrea, 帕拉第奥, 安德雷亚, 317
 Palmer, Thomas, 帕尔默, 托马斯, 28
 Panama, Canal, 巴拿马运河, 97
 Papadopoli, Count, 帕帕多波利, 伯爵, 215—6
 Parini, Aldo, 帕里尼, 阿尔多, 139—40
 Paris, 巴黎, 49, 55, 56, 88, 101, 115, 224, 256, 306, 307, 318
 Parma, 帕尔马, xi, 88, 167, 240—1, 302
 Partinico, 帕尔蒂尼科, 264, 266
 Pascal, Blaise, 巴斯卡, 布莱斯, 234, 332
 Pater, Walter, 佩特, 沃尔特, 58
 Patterson, Elizabeth, 帕特森, 伊丽莎白, 206
 Paul V, Pope, 保罗五世, 教皇, 205
 Pepe, Gabriele, 佩培, 加布里埃莱, 324
 Pergolesi, Giovanni, 佩尔戈莱塞, 乔万尼, xi 注
 "Persecus"(cellini), "帕修斯"(切利尼), 317
 Perugia, 佩鲁贾, 2, 232
 Petacci, Claretta, 佩塔奇, 克拉蕾塔, 117, 157, 162, 163
 Petrarch, 彼特拉克, xi 注, 17, 125, 137, 307, 341
 Petrosino, Giuseppe, 佩特罗西诺, 圭塞普, 275—6
 Pheidias, 菲迪亚斯, 34, 36
 Philip II of Spain, 西班牙的菲力普二世, 323
 Philomena, Saint, 费罗米纳, 圣, 48
 Piedmont, 皮埃蒙特, 116, 251, 291
 Pieri, Piero, 皮耶里, 皮耶罗, 302
 Pietralcina, Father Pio da, 皮耶特拉西纳, 皮奥·达神父, 45—7
 Pietrasanta, 皮耶特拉桑塔, 292
 Pignatelli, 皮尼亚泰利, 79
 Piovene, Guido, 皮奥维内, 吉多, 232—4
 Pirandello, Luigi, 皮兰德娄, 路易吉, 250, 262
 Pisa, 比萨, 53, 190, 292

- Pistoria, 皮斯托亚, xi
- Pius IV, Pope, 庇护四世, 教皇 204, 320
- Pius IX, Pope, 庇护九世, 教皇 206
- Pius XII, Pope, 庇护十二世, 教皇 206
- Po river, 波河, 62, 69
- Poland, 波兰, 50
- Politburo, 政治局, 224
- Polizia, 警察, 224—5
- Pompeii, 庞贝, 33, 53, 254
- Popes, 教皇, 229;
 non-Catholics' audiences with, 非天主教听众与教皇, 44—5;
 as temporal Sovereigns, 作为世俗统治者, 116, 137, 169, 346, 347;
 nepotism of, 教皇的裙带关系, 203—6;
 loss of temporal power, 丧失世俗权力, 245;
 predominance of Italians, 意大利人占优势, 316;
 failure to unify country, 未能统一国家 346
- Popolo d' Italia, 《意大利人民报》, 145—6
- Porter, Cole, 波特, 科尔, 9
- Portici, 门廊, 34
- Porto Ercole, 埃尔科莱港, 52
- Porto Santo Stefano, 圣斯特凡诺港, 104
- Portugal, 葡萄牙, 309
- Potemkin, Prince, 波将金, 亲王, 85, 100
- Pound, Ezra, 庞德, 艾兹拉, 12
- Prague, 布拉格, xi, 134
- Praxiteles, 普拉克西泰雷斯, 34
- Prince, The (Machiavelli), 《君主论》(马基雅维利), 180
- Prometheus Unbound (Shelley),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雪莱), 37
- Puccini, Giacomo, 普契尼, 贾科莫, xi 注
- Pushkin, Alexander, 亚历山大·普希金, 81

Pyrenees, 比利牛斯山脉, 289

Rachele, 拉凯莱 146

Ragusa, 拉古萨, 262

Rapallo, 拉帕罗, 12

Raphael, 拉斐尔, xi 注, 7, 30, 34, 86, 180

Ratti family, 拉蒂家族, 206

Ravello, 拉维略, 11

Redshirts (Garibaldi's), (加里波第的) 红衫党, 111, 119, 146 注, 256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27—8, 288

Reggio, 雷焦, 167

Reid, Alaslair, 莱德, 阿拉斯泰尔, 85

Reisebilde (Heine), 《游记》(海涅) 319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17, 24—7, 29, 47, 96, 182, 309

Renaissance in Italy (Symonds),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西蒙兹), 178, 287

Reni, Guido, 雷尼, 圭多, 30, 317

Ricasoli, Baron Bettino, 里卡索利, 贝蒂诺男爵, 216—17

Ricasoli, Baroness Anna Bonaccorsi, 里卡索利, 安娜·波娜科尔西伯爵夫人, 216—17

Richard Coeur de Lion 狮心王理查德, 17

Ricordi, I (Guicciardini), 《日记》(圭恰迪尼), 164, 169—71

Rienzi (Lytton), 《历险记》(李顿), 138

Rienzi (Wagner), 《历险记》(瓦格纳), 138

Rienzo, Cola di, 李恩佐, 科拉·迪, xiii;

analogy with Mussolini, 与墨索里尼相似之处, 123, 129, 140, 162, 163;

early success as orator, 早期作为演说家的成功, 123, 125, 126;

in Avignon on embassy to Pope, 在阿维农派驻教皇的大使馆里, 124—5;

friendship with Petrarch, 与彼特拉克的友谊, 125;

cultivates following in Rome, 在罗马培植追随者, 125—6;
 incites rising against nobles, 煽动反对贵族的起义, 126—7;
 given dictatorial powers, 取得独断专行的权力, 127—8;
 aims to unite Italy, 统一意大利的目标, 128, 137;
 increasing flamboyance, 浮夸有增无已, 129—33;
 celebrates acceptance of knighthood, 庆祝获得骑士称号, 129—
 32;
 challenges Pope and Germany, 向教皇和德国挑战, 131;
 aims to revive Roman Empire, 复活罗马帝国的目标, 131,
 132—3;
 crowned tribune, 加冕的护民官, 131—2;
 compared himself to Christ, 自比于耶稣基督, 132;
 leaves Rome after war with nobles, 在与贵族作战后离开罗马, 134;
 triumphant return, 胜利返回罗马, 134—5;
 murdered, 被杀害, 136;
 his real achievement, 他的真正成就, 136—8;
 his appeal to artists, 他对艺术家的呼吁, 138
 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 56
 Risorgimento, 复兴运动, 116, 137, 181—2, 188, 322, 342, 348
 Robbia, Luca della, 罗比亚, 卢卡·德拉, xi 注
 Rohan, Cardinal de, 罗翰, 红衣主教, 101
 Romagna, 罗马尼阿, 69, 140, 166, 168
 Rome, 罗马, xi, 7, 9, 12, 13, 26, 32, 33, 35, 53, 62, 89, 99,
 101, 123—4, 151, 152, 186, 292—3;
 Campidoglio, 罗马市政厅, 91, 126—7, 130, 132, 135;
 Campo dei Fiori, 花府, 124
 Capitol, 卡皮托, 32, 127, 135
 Castel Sant' Angelo, 圣安杰罗城堡, 103, 124, 215, 293, 305;
 Cimitero degli Inglesi, 英国人公墓, 26;
 Coliseum, 竞技场, 12, 31;
 Forum, 古罗马广场, 31;

Hospital of the Holy Chost, 圣灵医院, 132;
 Lateran Palace, 拉特兰宫, 132;
 Milvian bridge, 米尔维安桥, 124;
 Monte Giordano, 焦达诺山, 124;
 Opera, 歌剧, 49—50;
 Palazzo Berghese, 博尔盖塞宫, 205;
 Palazzo Venezia, 韦内齐亚宫, 139, 146, 151, 155;
 Piazza Barberini, 巴尔贝里尼广场, 205;
 Pompey's theatre, 庞贝剧场, 124;
 Quirinale, 奎里纳尔 116, 124, 147;
 Regola quarter, 雷戈拉 123, 129;
 Saint John Lateran, 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 124, 130, 308;
 Saint Peter's, 圣彼得大教堂, 17, 38, 46, 124, 129, 308, 317, 318;
 San Marcello, 圣马切洛, 136;
 Sistine Chapel, 西斯廷小教堂, 317;
 Trinità dei Monti, 三位一体山, 13, 50;
 U. S. Embassy, 美国大使馆, 204;
 Via Veneto, 韦内托大街, 48, 204;
 Villa Albani, 阿尔巴尼别墅 33;
 Villa Malta, 马耳他别墅 101;
 pilgrimage to, 到罗马朝圣, 15—17, 23—4;
 antiquities of, 罗马的古迹 30—1, 32, 123;
 climate, 气候, 36—7, 53—4;
 magical quality of, 不可思议的特性, 37, 38, 41—2;
 la dolce vita in, 罗马的惬意生活, 48, 56;
 artistic life, 艺术生活, 49—50;
 spectacle in, 罗马的壮观场面, 70—1;
 filming in, 罗马的制片业 74—5;
 Hitler's visit to, 希特勒访问罗马, 85;

- Victor Emmanuel I monument, 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二世纪念碑, 90—1;
- March on (1922), 进军罗马, 119, 146—7;
- under Rienzo, 李恩佐统治下, 125—36;
- noble family of, 罗马的名门贵族, 204—6;
- Charles V's sack of, 查理五世对罗马的屠城, 305—7, 317;
- and Baroque art, 罗马和巴洛克艺术, 314, 317
- Roncalli family, 龙卡利家族, 206
- Rosa, Salvator, 萨尔瓦托·罗莎, 317
- Rossi, Ernesto, 罗西, 埃内斯托, 152
- Rossini, Giovacchino, 罗西尼, 乔瓦吉诺, xi 注, 188
- Rovere, Cardinal Giuliano della (Later Pope Julius, II), 罗韦雷, 朱利亚诺·德拉红衣主教, 293
- Rumania, 罗马尼亚, 50
- Ruskin, John, 约翰·拉斯金, 9, 40
- Russia, 俄罗斯, xi, 55, 200, 234—5, 257, 315, 319, 329;
- visitor from, 来自俄国的游客, 1—2, 32, 37, 50, 53;
- Hitler's attack on, 希特勒进攻俄国, 156, 160;
- Politburo, 政治局, 224
- “Sacred Love” (Titian), “神圣的爱” (提香), 7
- Sahara Desert, 撒哈拉沙漠, 54
- Saint Peterburg (Leningrad), 圣彼得堡 (列宁格勒), 100
- Saint-Simon, Duc de, 圣西门公爵, 240—1
- Sallust, 萨卢斯特, 123
- Salvini, Tommaso, 萨尔维尼, 托马索, 152
- “San Giovanni Rotondo”, 圣乔万尼·洛屯多, 45, 46—7
- San Leo, 圣莱奥, 103
- Sanctis, Francesco de, 桑克蒂斯, 弗朗切斯科·德, xv
- Sansovino, Andrea, 圣索维诺, 安德雷亚, 317
- Sardinia, 撒丁, 52, 151

- Sarpi, Fra Paolo, 萨尔皮, 弗拉·保罗, 329, 332
- Sarzana, 萨尔扎纳, 292
- Sassbach, 萨斯巴赫, 323
- Saturn, 农神, 15
- Savona, 萨沃纳, xi
- Savonarola, Girolamo, 萨沃纳罗拉, 季罗拉莫, xiii, 289
- Savoy-Aosta, Victor Emmanuel of, Count of Turin, 萨伏依-奥斯塔的维克托·埃马努埃尔, 都灵的伯爵, 324—5
-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 3, 4, 53
- Schoolmaster, The(Ascham), 《教师须知》(阿夏姆), 28
- Scipio, 西庇阿, 123
- Scotland, 苏格兰, 309
- Scots guard, 苏格兰卫队, 292, 296
- Scotti, Goffredo degli, 斯科蒂, 戈弗雷多, 德利, 132
- Sele river, 塞莱河, 69
- Seneca, 塞涅卡, 123
- Serbelloni, Gabriele, 塞尔贝洛尼, 加布里埃莱, 323
- Servetus, Miguel de, 塞尔韦图斯, 米圭尔·德, 313
- Sforza, Cardinal Ascanio 斯福尔扎, 阿斯卡尼奥红衣主教, 293
-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81, 179, 234
- Shelley, P. B. 雪莱, 9, 37, 43—4
- Sicily, 西西里, 62, 79, 90, 98—9, 119, 160, 248, 250, 258;
 native gestures, 本地手势, 65—7;
 Garibaldi in, 加里波第在西西里, 111, 119—20;
 and Mafia, 西西里和黑手党, 186, 207—8, 224—5, 230, 263—81;
 family feuds, 家族世仇, 200—1;
 family power, 家庭的力量, 207—8, 221;
 U. S. immigrants from, 西西里移居美国的移民, 207—8, 281—6;
 cassate alla Siciliana, 西西里的水果夹心冰糕, 260;

- economic problem, 西西里的经济问题, 260—1;
 “Schoolroom model of Italy”, “意大利的课堂教学模型”, 262;
 native intelligence, 本地的情报, 262—3;
 sense of pride, 自豪感, 263—4
- Silone, Ignazio, 西洛纳, 伊尼亚齐奥, 349—50
- Siren Land (Douglas), 《塞壬之地》(道格拉斯), 82, 178
- Sixtus V, Pope, 西克斯图斯五世, 教皇, 204
- Smollett, Tobias, 斯莫莱特, 多比亚斯, 22
- Socialist Party, 社会党, 120, 144, 343
- Soracte Mount, 索拉克特山, 31
- Sorrento, 索伦托, 9
-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xi, 257, 258,
- South Sea Bubble, 南海泡沫, 97
- Spain, 西班牙, 50, 55, 106, 115, 188, 205, 251, 257, 304, 305, 323;
 and domination of Europe, 西班牙和对欧洲的治疗, 288, 308—10, 314;
 and the Church, 西班牙和教会, 314—15, 327, 336—7;
 and Inquisition, 西班牙和宗教法庭, 327, 329;
 and Society of Jesus, 西班牙和耶稣会, 330;
 influence of domination in South, 西班牙统治南方的影响, 333—7
- Spielberg, 斯皮耶尔堡, 211
- Spoletto, 斯波莱托, 6, 50
- Staël, Madame de, 施达尔, 夫人德, 51—2, 53
- Stalin, Josef, 斯大林, 约瑟夫, 115, 116
- Stavisky, Serge, 斯塔威斯基, 97
- Stendhal, 司汤达, xv, 31, 36, 49, 57, 59, 165, 239, 340
- Stesicorus, 斯蒂西科鲁, 262
- Stradioti, 斯特拉迪奥蒂, 297, 301
- Switzerland, 瑞士, 50, 56, 57, 141, 162, 248, 292, 296, 297, 304
- Sylvester I, Pope, 西尔维斯特一世, 教皇, 130

Symonds, John Addington, 西蒙兹, 约翰·阿丁顿, xv, 25—6,
 27, 287, 288
 Syracuse, 叙拉古 45, 258, 262, 264

 Taormina, 陶米纳, 11, 52
 Taranto, 塔兰托, 258
 Taro river, 塔罗河, 295, 296, 297, 299
 Tarquinia, 塔奎尼亚, 126
 Teatro dei pupi, 木偶剧院, 268
 Teator dell'arte, 艺术剧院, 318—9
 Teodolinda, Queen of the longobards, 伦巴第的泰奥多琳达王后,
 308
 Teutonic Knights, 条顿骑士团, 16
 Teocritus, 忒俄克里托斯, 25, 262
 Thomas of Aquino, Saint, 托马斯·阿奎那, 圣xi 注
 Tiber river, 台伯河, 124, 307
 Tiberius, Emperor, 提比略皇帝, 31, 74
 Tiepolo, 提耶波罗, xi 注
 Tintoretto, 廷托莱托 xi 注, 317
 Titian, 提香, 7, 34, 309, 317
 Tito, President, 铁托总统, 116
 Togliatti, Palmiro, 陶里亚蒂, 114—15, 116
 Torbole, 托博勒 36
 Toscanini, Arturo, 托斯卡尼尼, 阿尔图罗 xi 注, 145
 Trasimeno, Lake, 特拉西梅诺, 30
 Trent, Council of, 特兰托宗教会议 320, 326
 Trieste, 的里雅斯特, 35
 Trilussa (dialect poet), 特里卢萨 (方言诗人), 85
 Trissino, Giangiorgio, 特里西诺, 季安季奥尔季奥, 309
 Troski, Leon, 托洛茨基, 115
 Turenne, Vicomte de, 蒂雷纳, 子爵 323

- Turin, 都灵, 53, 186
 Turin, Victor Emmanuel of Savoy-Aosta, Count of, 都灵的伯爵,
 萨伏依-奥斯塔的维克托·埃马努埃尔, 324
 Turkey, 土耳其, 16, 290, 293, 297, 323
 Tuscany, 托斯卡纳, 104, 205, 248
 Twin, Mark, 马克·吐温, 9
 Tyrrhenian Sea, 第勒尼安海, 255

 Uccello, Paolo, 乌切洛, 保罗, 19
 Ulm, 乌尔姆, 187
 Umberto, 乌姆贝托, 1, 114
 Urban VIII, Pope, 乌尔班八世, 教皇, 205
 Urbino, 乌尔比诺, 2, 26
 Urbino, Guidobaldo d', 乌尔比诺, 圭多巴尔多, 86
 U. S. Army, 美国军队, 280
 U. S. Narcotics Bureau, 美国麻醉局, 207

 Valachi, Joseph, 瓦拉基, 约瑟夫, 284—5
 Valerius Maximus, 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 123
 Valetta, 瓦莱塔, 53
 Valtellina, 瓦尔泰林纳, 162
 Varchi, Benedetto, 瓦尔基, 贝内代托, 167, 168
 Vatican, 梵蒂冈, 53, 347, (也见“教皇”)
 Vaucresson, 沃克雷松, 324
 Velletri, 韦莱特里, 58—9
 Vendome, Louis Joseph, Duc de, 汪多姆, 路易·约瑟夫, 公爵, 代,
 240—1
 “Venerina, Santa”, 圣韦内里纳, 47
 Venice, 威尼斯, xi, 7, 9, 12, 56, 104, 317, 334—5;
 Grand Canal, 主运河, 3, 9, 12, 39;
 Saint Mark's, 圣马可教堂, 17, 72;

Byron in, 拜伦在威尼斯, 43—4;
 climate, 气候, 54;
 trade during Crusades, 十字军东征期间的贸易, 190;
 and Charles VIII, 威尼斯和查理八世, 291, 294, 301;
 mercenaries of, 威尼斯的外国雇佣兵, 301;
 “Venus”(Botticelli), “维纳斯”(波提切利), 6—7
 Verdi, Giuseppe, 威尔第, 朱塞佩, xi 注, 181
 Verga, Giovanni, 韦尔加, 乔万尼, 182, 262
 Verona, 维罗纳, 248
 Veronese, Paolo, 委罗内塞, 保罗, 317
 Verrocchio, Andrea del, 韦罗基奥, 安德雷亚·代尔, xi 注
 Versailles, 凡尔赛, 237, 266
 Vespucci, Amerigo, 韦斯普奇, 阿米里戈, xi 注
 Vesuvius, 维苏威, 48, 53
 Vico, Giovanni B., 维科, 乔万尼, xi 注, xii
 Victor Emmanuel II, 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二世, 90—1, 207, 216,
 245, 346
 Victor Emmanuel III, 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 114, 159, 161, 206,
 232, 288
 Victoria Queen, 维多利亚女王, 9
 Vida, Marco Girolamo, 维达, 马尔科·杰罗拉莫, 309
 Vienna, 维也纳, xi, 35, 55, 79, 211
 Vienne, 维埃纳, 291
 Villalba, 维拉巴, 278—80
 Villani, Filippo, 维拉尼, 菲力浦, 19
 Villani, Matteo, 维拉尼, 马泰奥, 23
 Virgil, 维吉尔, 30
 Visconti family, 维斯康特家族, 346
 Viterbo, 维泰博, 17
 Vitorchiano, 维托奇阿诺, 129
 Vivaldi, Antonio, 维华第, 安东尼奥, xi 注, 6

- Vizzini, Mgr., 维齐尼, 阁下, 279
 Vizzini, Don Calò, 维齐尼, 唐卡洛, 278—81
 Volta, Count, 沃尔塔, 伯爵, xi 注
 Voltaire, 伏尔泰, 97
- Wagner, Richard, 里查德·瓦格纳, 9, 138
 Waldstein, Graf, 瓦尔德施泰因, 格拉夫, 98
 Wall Street, 华尔街, 224, 237
 Warsaw, 华沙, 9
 Washington, 华盛顿, X
 Waste (Dolci), 《废物》(多尔奇), 277 注
 Webster, John, 约翰·韦伯斯特, 28
 Welles, Orson, 韦尔斯, 奥尔逊, 65
 Westphalia, 威斯特法利亚, 206
 White Company, 白帮, 18—9
 Wilde, Oscar, 王尔德, 奥斯卡, 54, 193
 Wilder, Thornton, 怀尔德, 索恩通, 239
 Wilson, 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266
 Winckelmann, Johann Joachim, 温克曼, 约翰·乔基姆, 32—5
 Wordsworth, William, 华滋华斯, 威廉, 39
- Yucatan, 尤卡坦(半岛), 55
- Zanardelli, Giuseppe, 扎纳尔代利, 朱塞佩, 91
 Zhukovsky, V. A., 茹可夫斯基, 37
 Zinoviev, Grigoriy, 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 115
 Zürich, 苏黎世, 71, 73

文化 生活 译 丛

第 一 辑

- | | |
|---------------|----------------|
| 夏洛蒂·勃朗特书信 | 杨静远编译 |
| 我怎样学习和写作 | 高尔基著 戈宝权译 |
| 马雅可夫斯基小传 | 霍尔莎·特里沃雷著 罗大冈译 |
| 富兰克林自传 | 姚善友译 |
| 情爱论 | 瓦西列夫著 赵永穆等译 |
| 列维·斯特劳斯 | 利奇著 王庆仁译 |
| 海明威谈创作 | 董衡巽编选 |
|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 斯·茨威格著 舒昌善译 |
| 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 | 斯特莱切著 戴子钦译 |
|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 | 布鲁克尔著 朱龙华译 |

第 二 辑

- | | |
|-----------------|-------------------|
| 六人 | 鲁多夫·洛克尔著 巴金试译 |
| 笑的历史 | 让·诺安著 果永毅、许崇山译 |
| 阿瑟·米勒论剧散文 | 陈瑞兰译 |
| 艺术与宗教 | 乌格里诺维奇著 王先谦译 |
| 人生五大问题 | 莫罗阿著 傅雷译 |
| 异端的权利 | 斯·茨威格著 赵台安、赵振尧译 |
| 昨天的世界 | 斯·茨威格著 舒昌善译 |
| 番石榴飘香 | 加·加西亚·马尔克斯等著 林一安译 |
| 自我论——一个人对个人自我意识 | 伊·谢·科恩著 佟景韩等译 |
| 兰姆文钞 | 刘炳善译 |